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强 李学勤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洪银兴 钱乘旦 郭齐勇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周斌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余江涛 金国华 顾华明 王瑞书 钱元元

周海歌 姜小青 黄小初 汪修荣 顾爱彬 刘锋

周兴安 吴迪 杨建平 吴源 胡明秀 章祖德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编 刘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凤凰文存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SISTERS AND STRANGERS

姐妹们与陌生人

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美」艾米莉·洪尼格 著

韩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美)艾米莉·洪尼格(Emily Honig)著;韩慈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0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7540-6

I. ①姐… II. ①洪… ②韩… III. ①女职工—研究
—上海市—1911~1949 IV. ①D4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927号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by Emily Honi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9-363

书 名 姐妹们与陌生人

著 者 [美]艾米莉·洪尼格

译 者 韩 慈

责任编辑 张惠玲

装帧设计 陈 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4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540-6

定 价 2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目 录

译者的话	1
致谢	1
引言	1
第一章 上海纺织史	1
“宇宙和筷子的奇异世纪”	2
工业化	7
工业化和政治	18
日本人在上海	19
抗日战争	26
走向解放	29
第二章 在工厂里	34
参观工厂	34
工人的性别分布	41
第三章 工人的来源	49
地域来源	49
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62

第四章 建立关系 71

雇佣权 71

养成工:创造一个新的阶层 79

第五章 包身工 85

“摘桑叶” 87

传统:外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 105

青帮和包身制 110

第六章 工作日 121

一天的开始 124

上工 126

在工厂 129

回家 138

夜工:工作夜 143

工作周 145

休息日 149

假期 151

第七章 工作生活 155

孝顺的女儿 155

棉纱厂工人的晋升 163

结婚,做母亲,工作 172

战争中的女工 185

女工与和平 191

第八章 变化的视角 193

五卅女英雄:重新评价 194

烧香,拜姐妹会 200

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女工 206

中国共产党和女工 214

罢工	222
结论	231
引用文献	236

译者的话

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且不说作者得出了怎样不同于前人的研究观点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也不说作者学术研究方法多么值得学习借鉴；仅是作者严谨求真的治学观就已经让我肃然起敬了。我怀着对学术的敬意之心，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由于本人学识限制，翻译难免有不精当之处，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友情无价。该书的翻译得到了 Eva Chi 博士、吴逢时教授、徐大慰博士、韩荣斌博士，Judy Nakaso、甘均先博士的帮助，谨在此特别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大爱无言。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帮我把翻译手稿输入电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特别感谢我儿子的大力合作。想要对我儿子说一句：亲亲宝贝，妈妈在怀你期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翻译你 Emily 阿姨的这本著作了。

最后，特别感谢刘东先生和王保顶先生的信任和支持。

2010 年夏

于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宿舍

致 谢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很幸运地成为斯坦福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研究生。我们有两位非常慷慨大方的指导教师 Harold Kahn 和 Lyman Van Slyke。他们两位是我的良师益友。这本书是我们知性友谊的结晶之一。除了 Harlod Kahn 和 Lymon van Skyke 二位导师,我的这一研究还得到 Katheryn Bernhardt, Helen Chauncey, Gail Hershatter, Randall Stross 诸位朋友持续的鼓励和莫大的支持。诸如选择研究课题、拟定研究方法、解决电脑问题、逐页校正原稿等,他们都尽可能地帮助我。

若不是得到很多组织和个人的帮助,我原不可能在上海开展我的研究。复旦大学作为我在上海的接待方,为我提供了一个单位能够给予其员工的所有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余子道老师和黄美真老师。感谢他们接收我,为我提供相关的资料,并对我的研究给予宝贵的指导。我还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沈以行老师和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他们帮我安排组织采访,并告诉我他们对于上海工人阶级历史的看法。复旦大学历史系 1977 级的学生,特别是李必玉、赵晓坚(音译),他们帮我阅读文献,把方言的录音翻译为普通话。他们还

时常提醒我在与相关单位打交道时要保持幽默感。我与两位女士邓裕志和耿丽淑的友谊极大地丰富了我在上海的研究经历。她们俩人时常约我聊天,给我讲述解放前她们和女工一起生活,给女工们上课,指导她们的往事。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耐心解答我有关生活史访问的女工们的感激之情,没有她们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完成。

回到美国后,我着手写作和修订我的毕业论文,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诸君外,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妇女史写作小组的同仁们。他们是 Antonia Castaneda, Estelle Freedman, Gary Sue Goodman, Gayle Gullet, Lois Helmboldt, Gail Hershatter, Valerie Matsu-moto, Joanne Meyerowitz, Vicki Ruiz, Francis Taylor。感谢他们对本书中几个章节的评阅及提问。余卫国(音译)懂得苏北的方言,有苏北生活的经验。他帮助检查采访录音翻译得是否正确,并且还向我进一步解释女工所描述的本地风俗。我还要感谢 Margery Wolf, Susan Mann, Marilyn Young 和 Lisa Rofel 等人对原稿的评阅。与他们的不断探讨时常会促使我修订和改变之前的一些看法。我有幸在 Frederic Wakeman, Jr. 教授的指导下用一年的时间修订我的学位论文。Frederic Wakeman, Jr. 教授的建议和热情难能可贵。同时使我受益良多的还有 Joseph Esherick Kay 和 Ann Johnson 对整个文稿的评阅,以及 Andrew Walder, Lynda Shaffer, Philip Huang, Janet Salaff, Laurie Coyle, Christine Kelly 对具体章节的评阅。感谢 Nancy Butcher 对最终稿的仔细编辑。

我的论文的经济赞助来源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来自美国研究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博士后研究经费使我能够于1982—1983年间修改我的论文,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在此期间为我提供了办公地点。我的研究还得到了来自国际劳工协会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日内瓦世界女青年基督教协会 (World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Geneva)、纽约国家女青年基督教协会资料馆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in New York) 的慷慨帮助。Sage 出版社同意将第五章重印。这一章与我的这篇《包身工制度和女工：解放前的上海纱厂》(“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 Pre-Liberation Cotton Mills of Shanghai”, *Modern China*, 9(October 1983), no. 4:421 - 54. ©1983 Sage Publications, Inc) 略有不同。

我要特别感谢三个人：我的父母——Victor 和 Lorraine Honig——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去理解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以及对我这一尝试进行监督批评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Gail Hershatter。

E. H.

引言

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和美国一样,20世纪中国的近代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建立于纺织业与女工、童工的结合之上。上海是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棉纱曾是行业之王,大多数的工厂工人为女性。包括丝厂和卷烟厂的工人在内,女工的比例几乎占上海工人人数的三分之二。就其自身而言,棉纱厂女工曾代表上海无产阶级这一声名卓著的群体总数的三分之一。

与英国的纺织重镇兰开夏(Lancashire)和曼切斯特(Manchester)的情况一样,现代机械和大规模工业在上海的兴起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的出现。^①也和英国相仿,与工人阶级的兴起相伴随的是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发展壮大;1927年的国民革命。和汤普森(E. P. Thompson)对19世纪工业革命的英国的描述一样,中国的棉纱工业很自然地被认为“不仅仅是工业革命的主体,而且是社会革命的主体;不仅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孕育了‘工人运动’本身”^②。

^{①②} 汤普森(E. P. Thompson),第191--192页。

起初正是这一观点引发了我研究上海棉纱厂女工的兴趣。在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文献中，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仅有谢诺(Jean Chesneaux)的《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上海无产阶级的政治化以及工人成长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者的过程。^① 尽管谢诺的研究重点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议题，他也以时间顺序记录了中国工业革命影响下社会关系的变革：从农民到无产者的转变；从传统的以村落为纽带的农业社会的解体到以城市工人联盟为基础的新社会关系出现的转变；从传统互助社会和地方联盟的一员到现代工会和中国共产党成员的转变。从谢诺的开创性研究中，我推论既然棉纱厂女工人数占上海工业无产阶级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那么她们一定曾经历过这些转变，并且是上个世纪20年代革命运动的激进参与者。

在开始研究时我选取的切入点并非女工在劳工运动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在那之前的事，比如工作的性质；工厂里的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女工在成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过程中所经历的变迁。这些问题在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或是被忽略或是被顺带提及。实际上，在这之前并没有西方学者研究过中国近代历史上城市女工的问题。

对解放前中国妇女的研究大体都集中在成名的政治家或学者身上，抑或关注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动员。^② 与之相反，本研究的主体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女工。她们当中有的名字本身便含有强调其身份低微之意味。比如，将在后面相关章节提及的“陈招弟”(音译)，其名“招弟”意为招唤男丁。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女工一样，这一名字包含着父母对生女儿的失望。

我把研究集中在棉纱业，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规模。上海所有工厂工人中绝大多数的女工都被棉纱厂雇用。

^① 谢诺，《中国劳工问题》。

^② 例如见玛丽莲(Young)；达文(Davin)；沃尔夫和维特克(Wolf and Witke)。

其次,棉纱厂是上海所谓的现代化企业中最现代的工厂。很多上海女工无需进工厂,而是在家以合同内再分配(putting-out system)的形式工作。还有一些女工每天离开家到工厂做活,她们的工作地点为小车间或工棚,从事的劳动多为卷烟一类非机械化的工作。在使用机器生产的女工之中,为数不少的人其工厂经营季节性产业,比如缫丝。因而工厂只能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雇用她们。相比之下,棉纱厂的女工几乎都被雇为机械操作工,其所在工厂有数千员工,而且工厂中的机器全年全日无休止地运转。因此,在上海,如果有任何女工群体可以被称为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一定是棉纱厂女工。同时她们也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以季节劳动和家庭生产为模式的乡村经济。

聚焦在棉纱厂也促使我们将视野扩展于地方之外。解放前超过半数的上海棉纱厂由英国和日本的资本家所有,因而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外商棉纱厂考察殖民主义如何影响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政治化。

为了考察上海工厂女工遭受剥削的程度和她们参加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我于1979年前往上海开展我的研究。我遇到了一批中国学者,他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上海劳工运动史研究。他们也把棉纱厂视为当代大规模企业的典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言,这样的企业将在工人中带来革命性的阶级意识。同时他们也相信这些工厂例证了外商对女工的种种盘剥,从而使得女工具有举行罢工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倾向。因此,这一批学者,即上海劳工历史委员会,广泛致力于采访解放前的棉纱厂工人和搜集有关他们的工作状况以及罢工运动的新闻。编写工厂历史的工作则由棉纱厂负责。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两个主题上:解放前的女工遭受的各种剥削以及她们对工人运动的无畏参与。所有这类史料基于一个潜在假设,即工人的贫穷和受压迫程度与他们的反抗程度之间存在直接等同关系:他们所受的压迫越大,其参与集体抗争的可能性也越大。

阅读历史档案以及同解放前工厂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访谈,让我怀疑

这一假设。这一研究也提醒我注意到一系列关于解放前棉纱厂女工工作和政治经历的不同问题：女工之间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持续分化；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分化作用；上海帮会组织——青帮——在调解工人和资本家关系上的作用。社会改革家和政治活动家在解放前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调查、本地报纸文章以及工厂档案都肯定这些问题确实具有史学价值。所有证据都明确地指出：这不是一个关于农民割断与土地的联系转变为工人的问题，同时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工业贫困的受害者转变为具有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女英雄的问题。

在上海工厂工作的女性有着不同的地缘和社会背景。在上海，来自某一地域的女性多聚集在工厂中的某些部门，并且她们彼此多为邻里街坊。有证据显示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棉纱厂车间经常清一色地雇用来自某个地方的人。比如，织工多来自无锡，细纱工多来自上海，粗纱工多来自苏北。在上海，直至今日来自某一村落的人还经常聚居在一起，说家乡话，并保留许多地方风俗。这些不同形式的地方主义在解放后持续了 30 年，这就清楚地表明城市生活和工厂工作并不必然导致不同社会和地缘背景的人结盟。

通过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俗和方言体现的地方主义是工人间最重要的分歧和对立的基础。大部分女工或者是出生在苏北农村（扬子江以北江苏省北部地区，也称江北），或者是出生在江南的乡下（扬子江以南的江苏省）。甚至是今天，地方俚语仍能体现出地域偏见及刻板印象。众所周知的骂人话语是把江北的人叫作猪。在“你是江北猪”基础上衍生出大量的其他骂人话。比如，“你和江北人一样肮脏！”或者甚至说“你和江北人一样下流！”新闻报道证实了在婚姻上上海人仍拒绝接受被介绍给苏北人；毕业生担心他们会被分配到上海周边的苏北区域任教，这些区域的孩子被断定为“不如上海人爱学习”。这些地域偏见的盛行显示解放前的女工并非是浑然一体的单一群体。女工将来自不同地域的工友视为敌人的可能性也许比视资本家为敌人的可能性还大些。

女工间的这些分化较之其他历史背景下纺织业工人的分化并非全然不同,上海工厂中这样的分化被殖民主义所加剧。我的研究表明,以前有关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形成之影响的评价过于简单化。这些评价强调外国工厂的老板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以及随之渗透于工人间的团结一致和民族主义的精神。相反的,我发现苏北籍的女工更愿意在日本工厂工作,在那里她们不需要忍受中国棉纱厂老板高高在上的态度。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江南工人对江北工人的歧视,后者被指责为不爱国。甚至许多江南女工也认为较高的工资和较舒适的工作环境使得日商工厂比华商工厂更优越。看起来,帝国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人团结一致对抗资本家,而是在工人间制造了更加巨大的分化和对立。

我去上海寻找工人和资本家的历史。工人和资本家在他们对解放前生活的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第三方群体——青帮^①。有关近代上海史的研究中,除了探讨20世纪20年代晚期青帮在镇压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外,少有提及青帮。不过,解放前的本地报纸、工厂记录以及上海社会状况的调查都证实了青帮在上海工厂中的重要性。

我采访过的所有的工厂经理都有着生活于青帮恐怖之下的记忆。他们开办棉纱厂要被逼着向青帮头目交纳“保护费”,且时常不得不让青帮头目加入工厂的董事会。许多人被青帮绑架勒索,鉴于此种威胁,工厂经理和工厂主常雇用保镖。

女工们也生活在青帮的恐怖之下。即使其本人没有遭到青帮的侵袭,那么她们的亲戚朋友也或多或少遭遇过。为了避免骚扰,她们从每月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所在地青帮头目的保护费。更有甚者连到工厂工作都要靠青帮之势力。结果,许多女工团体的自发建立都源于女工

^① 除青帮之外上海还有红帮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小帮会。大多数的文献资料以及我采访过的解放前工人、企业家都以“青帮”同时指代青帮本身和其他帮会。除特别说明之外,我采用这一泛指。

们摆脱青帮的基本需求。

包身制形象地体现出青帮之势。在这种制度下,招工员跑到乡下,把十几岁的女孩子从其父母处买来带回上海,把她们雇用给棉纱厂。女孩儿们在工厂挣的工钱归包工头所有。以前,学者们把包身制归因于棉纱厂的外商经营;因不熟悉中文又没有己方的联络,外商工厂主据称只能依靠这些招工员,而后者对女孩子的残酷曾是当代披露现实文章的主题。尽管我采访的女工中少有人经包身制被雇用,她们无一例外地回顾了包身工的悲惨处境,并视之为殖民衍生出的残酷状况的象征。

我采访的棉纱厂经理给出了对包身制的不同解读。他们认为包身制的产生并非源于殖民的存在,而是青帮权势的体现。我发现工厂记录、工业调查证实了这一观点。首先,很显然包身制并不仅限于外商工厂;其次,有充分证据表明资本家们反对这种制度;最后,在上海,包身制的发展与青帮的产生几乎完全同步。

青帮的存在和权势使得上海的工业化进程和女工的经历不同于欧美女工的情况。上海的工业界不是简单地被划分成劳方和资方,帮派对双方都有影响。站在女工立场上来看,那些通过强奸和绑架来威胁她们的青帮混混们一定被视为日常生活中的死对头,对其憎恶之情较之工厂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背景下,工人阶级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反对资本家的意识,可能还有其他的内容。

尽管我主要研究妨碍女工们团结一致以及阶级意识产生的力量,最终势必需要将 these 力量与有关 1920 年代激进劳工运动的记录相整合。除去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27 年国民党政变期间的罢工记录,我几乎找不到证据证明 1920 年代的女工如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的那样,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者。很少有女工加入这一期间建立的激进工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工人数则更少。此外,我没有发现有女工成为 20 年代劳工运动的领袖。

另一方面,厂方为我挑选的采访对象中有许多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工运的积极分子。通过她们向我讲述的她们自己的故事,我意识到有一段工人运动时期西方学者的著作几乎从未提及。^① 由于中国历史学家更为关注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对1927年后留有这样的印象(如同谢夫[Lynda Shaffer]所言),即“中国的工人们仅仅是翻了身就死去了”^②。可是当我查阅文件来补充采访内容时,很清楚的是上海不仅已经有战后的工人武装运动,而且女工冲在运动的最前沿,既是运动的参与者又是运动的领导者。

这种斗争性并不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的女工们已经完全割断了她们同农村的联系;也不意味着地域分化和敌对意识消失,以及她们就此认同自己为城市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我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积极分子的女工,她们依旧是传统的互助社会关系的成员,依旧忠诚于青帮头头和工厂的工头。此外,可以证实的是中国共产党致力组织女工的历史,不单单是进行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以及组织罢工的历史,同时还是与女工拜姐妹的历史。

^① 只有苏珊妮(Pepper)提到过这一时期;马克(Selden)对这一时期进行过简单评,第58—120页。

^② 谢夫(Shaffer):“近代中国劳工史”,第35页。

第一章 上海纺织史

棉纱厂女工的故事并非上海所独有,不过却具有世界性的启示。19世纪西欧和美国,以及20世纪日本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女工开始的。上海工厂女工许多方面的经历是对其海外先驱者经历的回应。

但是上海女工的经历并不简单地由工厂本身决定:工厂的具体结构、烟囱以及机器设备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段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地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是世界上的第六大城市。上海既是中国的重要港口、金融中心、最大的工业中心,也是一座农民的城市:在广阔的市区内许多居民仍从事农耕。

那时的上海还是一个半殖民化的城市。19世纪中叶被迫对外开埠通商后,上海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都竞相争夺对上海的操纵权和上海的财富。每一方都在上海开辟出自己的租界。传教士们加入了生意人的行列,进行传教、办教育,偶尔也参与政治。作为由外国统治的港口,上海成为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逃脱中国政府迫害的避难所。上海是1911年革命者逃离清政府爪牙的避难所,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地。

最后,上海还是一个茶室、酒吧、夜总会、妓院的世界:20世纪30年

代的上海以拥有平均数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的妓女而自夸。这些为上海赢得了罪恶之城、冒险家的乐园以及东方巴黎称号的娱乐场所很多是由帮会成员开办。帮会的存在及其势力使得绑架、谋杀和其他罪恶行径在上海司空见惯。

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工厂女工的经历有影响，尽管她们日常生活几乎只是从家到工厂的两点一线。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在外商工厂工作的经历，这在许多时候得益于帮会之力。一些人在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另一些在共产党人的学校里学习。除非参加重大的政治游行示威，如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她们可能从不曾见识过店铺的华丽和市中心夜晚的霓虹灯。不过许多女工的兄弟或丈夫是运载上海富人的人力车夫或夜总会的服务生，另一些女性的姐妹被拐卖给妓院。还有一些人在外国人拥有的气派西式官邸里做女佣。这些共生的不同世界构成了棉纱厂发展以及女工兴起的大背景。

“宇宙和筷子的奇异世纪”(a wilderness of temples and chopsticks)

上海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始于 19 世纪中叶，以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为标志。对外通商口岸的地位并没有直接为上海带来现代化。讽刺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成为“中国的兰开夏(Lancashire)”的上海，最初仅仅被英国人视为兰开夏生产的丝绸的销售市场。英国植物学家福彻(Robert Fortune)在 1843 年访问上海时，惊呼道：“上海就是中华帝国的门户。”

我所熟知的城市中，没有一座城市拥有如此的优势。……沿河而上，映入眼帘是桅杆密布，顿时展现出这是一个浩大地方贸易的集散地。内陆运输之便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拟。上海看似扬子江的河谷，实属一个辽阔的平原，其间交错着很多美丽的支流，其上更加杂有许多运河，一些为天然，另一些则是令人惊叹的

人工艺术……上海港密布着用于内陆交易的各色船只……自从口岸开放以来,这些船只为我们当地得到认可的商人运送来大量的茶叶和丝绸,作为交换再重新装载上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品而回。我们普通的棉纺商品最受中国人青睐,因为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特有风格进行染色再将其制成合乎当地人口味的产品……毫无疑问将所有的茶叶,以及可能包括最大数量的黑人运到上海的成本要比运往广州或者南方任何一所城市的成本都低。……北部中国巨大的丝绸区近在眼前……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在近几年内上海不仅可与广州相媲美,并且将成为更加重要的城市。^①

如福彻所预见,上海迅速地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上海出口的茶叶从1844年的100万磅增加到1855年的8000万磅。对外贸易的第一个十年上海出口的丝绸总量几乎翻了15倍;1884年从上海出口的丝绸是6433包;截至1855年增加为9.2万包。^② 上海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周边省区如江苏和浙江茶叶和丝绸等商品的贸易中心,而且还是内陆商品的交易中心。扬子江河道使诸如植物油、动物皮毛、鸡蛋、原棉等商品从四川、汉口等地运往上海更加便利了。^③ 正是为了对付加工这些如原棉、丝绸、鸡蛋、羽毛等出口商品的工序,女性首次被拉进上海的工人队伍。^④

与外贸增长相伴随的是城市物理空间的转变。19世纪40年代初外国商人初至上海时,上海还只是一个由周长不到3.5英里的城墙围起来的小城。城墙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房屋”;各种小商店兜售如棉和丝绸产品、竹雕、瓷器,以及其他新奇物件;还有街边小摊贩卖鱼肉菜蔬。对此福彻写道:“餐厅、茶室、糕点铺随处可见……从把厨具背在背上敲打

① 福彻,第110—112页。关于上海作为丝茶贸易中心的优势的更广泛的讨论见墨菲(Murphey)。

② 墨菲,第111页。到1855年,其中58%的中国出口茶和超过60%的出口丝是从上海运来的。

③ 同上,第112页。

④ 孙毓棠,第1卷,第1231页。从1865年—1937年,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内和对外贸易的港口,上海是无与伦比的。墨菲,第116—117页。也参见黄苇。

竹板吸引邻里注意的穷苦人……到可容纳数以百计的客人的宽敞酒楼和茶庄。”^①当代的一本旅游指南把这个地区称为“庙子和筷子的野外”。

相对于城内的熙熙攘攘，城外则是农业平原，其间点缀着零星的庙宇和村庄。平原被连接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黄浦江和连接上海和苏州的苏州河所三分。上海被开放为贸易港口后，第一批外国租界建于从中国城的城墙延伸到苏州河、与黄浦江平行的区域。截至 1848 年，英国租界已经向南延伸到洋泾河；1849 年法国租界跨越洋泾河而建，占据了洋泾河和中国城边界之间的地段（见图 1）。那时美国人尚没有合法的租界，便占据了苏州河北黄浦的虹口区。租界只允许外国人居住；中国人可以留在被城墙圈起的老城之内，但被禁止进入有外国人买下的领地。

这一规定不到十年便被打破。从 1862 年开始持续 40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扬子江沿岸的村庄和城市皆尽荒芜，成千难民逃到上海的外国租界需求庇护。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叶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外国人属地的理想已成为一个短命的回忆。在所谓的外国租界中，有 5000 万的中国人居住在那里，与之相对的外国居民只有 1000 人。

尽管中国人在人数上占优势，但所有的行政权皆归外国人所有。1863 年，美国人占领区与英国租界合并形成公共租界，由被选举出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管辖（法租界仍保持独立，并且有自己的工部局）。尽管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有付市政税的义务，但却没有选举的权利；公民权是保留给租界的外国人的特权。由一个中国法官和英国官员共同负责的混合法庭被建立以处理牵涉中国居民在内的官司。^②

对于外国人而言，维护租界法律和治安的第一要务是设立巡捕房。一些印度锡克教徒（上海人称红头阿三）应征做这一工作，不过大部分巡捕是中国人。其中不少曾是大运河上的漕运船夫，因 19 世纪晚期满清

^① 福彻，第 114 页。

^② 奥泽尔（Hauser），第 60—70 页；卜舛济（Pott），第 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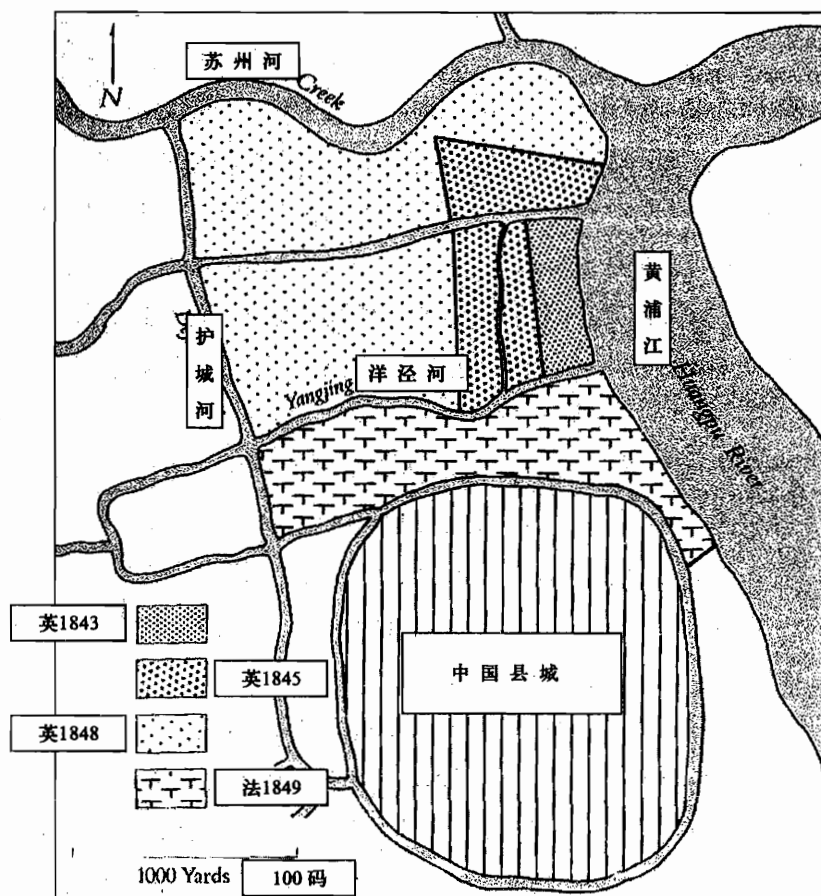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的早期租界 根据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缩放, 剑桥, 马萨诸塞, 1953, 哈佛出版社再版) 改编。

统治者改贡粮运输从漕运为海运而失业。当这些失业的船夫来到上海时,他们也随之带来了青帮的传统。自清朝早期以来,大多数从事漕运的船夫都属于这个秘密组织。青帮借助这些加入巡捕房的漕运船夫,在上海的贸易港建立起了其势力基地。^① 这个基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帮会组织,最终成为上海社会各阶层人员,上至政客、商人下至工人、

^① 王仰清、许映湖;也见凯利(Kelley)。

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的机构。

大多数在公共租界居住的外国人当初是为了从丝绸、茶叶和鸦片贸易的利润中获取好处而来。一些早期在广州起家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颠地洋行(Robert Dent and Company),迅速在曾经被称为“沼泽边的纤夫们踏出来的纤路”^①的上海外滩——黄浦江沿岸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一些为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服务的财团也开始迁移到上海。

除了洋行外,中国银行家们也在公共租界建立了本土商行。山西银行家行会于1892年在虹口建立了自己的办公机构。(因行会大楼内有一“造型奇异的圆顶型剧场,能使人看到自己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影”,该楼后来成为一旅游景点。^②)到19世纪末,已经北移至上海的宁波商人行会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建造宁波商会大楼。宁波和绍兴的商人是当时上海本土银行家行会的核心。^③最终,曾经在广州为外国人做翻译的中国人也移居上海,并成为国外大公司的买办。

整个19世纪,贸易在上海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为工业的缓慢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上海与江南缫丝中心的邻近以及其贸易港的地位,使其成为发展缫丝或缫丝厂以应对外贸需求的理想之地。严格地说,外国人在中国开厂仍是不合法的,但是中国政府在对外妥协让步中,忽略了这些低成本的小型商业投机。^④首家机械化缫丝厂于1862年建立。和之前几个法国和意大利的企业家一样,罗素(Russell)、渣甸(Jardine)和马地臣(Matheson)不久也建立了自己的缫丝厂。到1894年,上海的缫丝厂大约共有5000名工人,大约一半在四家外商工厂工作,其余

① 高梅韦尔(Marg Gamewell),第43页。关于贸易公司从广州搬到上海的讨论,见费正清(Fairbank),《贸易和外交》。

② 《上海及其周边:一本标准指南书》,第53页。

③ 琼斯(Jones),第73—96页。

④ 福伊尔沃克(Feuerwerker),第31—32页。

在五家华商工厂。^① 在 20 世纪前半叶,上海缫丝工业成为继棉纱工业之后雇用女工的第二大雇主。

棉纱厂创办的不祥开端可追溯到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1888 年李鸿章建立了第一家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当织布局于 1890 年开工时,雇用了大约 4000 名工人。然而,他们在那里工作没多久,工厂就毁于 1893 年的一场大火。^② 1891 年李鸿章在杨树浦组建棉纺织布新局,大约雇用了 60 名技术人员和 300 名工人。^③ 在中日战争结束前夕,另外三家纺织厂也在上海建立。^④

到 1894 年,缫丝厂和纺织厂,以及造船厂、机器修理厂、化工厂的发展使得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这些工厂共容纳了 3.6 万多工人,占中国工业工人总人数的 46%。^⑤ 尽管如此,1895 年前,工业依旧从属于商业贸易,后者仍是上海经济的基石。

工业化

1895 年中日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赋予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的权利,在这之后上海才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对上海作为商贸中心和兰开夏产品市场的讨论被对中国劳工潜在价值的宣言所取代。1896 年从英国派来上海的布莱克本(Blackburn)代表团成员坚持在上海发展棉纱工业的价值。代表团的报告指出:“拿东

① 孙毓棠,第 1 卷,第 1175、1195 页。也参见施(Shih),第 51 页。

② 李鸿章在盛宣怀的帮助下,任天津海关总督,1894 年创建了新厂——华盛纱厂。之后,该厂几经重组,厂名几经改变:又新,集成,Yongji(译者注:查阅资料未发现 yongyi,而是三新,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最终,工厂卖给荣氏兄弟改成申新九厂。方(Fong),棉纺织业,第 3—4 页。

③ 后来该厂变成福泰,之后是恒丰。孙毓棠,第 1 卷,第 1197 页。

④ 三家厂是大纯、裕源和三泰。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和贸易》,第 46 页。

⑤ 第二大中心是汉口,大约有 1.3 万工厂工人,其次是广州,大约有 1 万工人。孙毓棠,第 1 卷,第 1202 页。

方的劳动力和我们自己的比较,一方面是大量廉价、顺从而又能干的劳工,配上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机器设备;另一方面是昂贵、专断而又苛求的劳工配以同样的机器设备。”谁能说这是同等的条件呢?对于那些明白利用本地劳动力要比销售英国的布匹更赚钱的上海资本家而言,这难道不是更有利可图吗?^①

诸如这类的告诫很显然被接纳了,英国人最早懂得从外国人在中国所赢得的特权中获利。在上海最大的英国工厂——怡和和老公茂,分别由渣甸和马地臣在 1895 年和 1896 年设立。德国随之设立了瑞记棉纱厂,1897 年美国公司建立了鸿源棉纱厂。^②

最终雄霸上海棉纱工业的日本人通过在 20 世纪早期收购两家破产的华商纱厂而平地起家。^③直到 1911 年,一家名为内外(Naigai Wata)的日本企业,才在沪西的苏州河南岸建立了首家日本棉纱厂。已经在大阪拥有两家棉纱厂的内外棉公司迅速成为上海最大的纺织集团,最终下辖 11 家工厂。^④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海外进口到中国的棉布急剧下降,上海的棉纱业得以繁盛起来。整个 20 世纪前半叶,依靠经营棉纱厂挣得第一桶金的华商三大家族——聂、荣、郭——控制着上海的棉纱业。只有荣氏棉纱厂和郭氏棉纱厂在规模上能与日商和英商棉纱厂相匹敌。

原籍湖南的聂缉槩,起家时曾是曾国藩的属下,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与曾国藩的小女儿结婚。聂缉槩是 19 世纪 90 年代早

① 伯恩(Bourne),第 230—231 页。

② 1913 年瑞记被英国安利兄弟公司买下,成为东方纱厂;1929 年,该厂卖给荣氏兄弟,成为申新七厂。见严,第 345—346 页。

③ 日本人购买了大纯和三泰,后来成为上海第一厂和第二厂。

④ 自在日本设立内外第一厂和第二厂后,1911 年设第三厂,1913 年在上海设第四厂,1914 年设第五厂,1916 年在青岛设第六厂,1918 年公司购买了华商裕源纱厂,成为第九厂。同年他们设第七厂,1919 年设八厂,均在上海。1919 年在青岛设第十厂和第十一厂。1931 年在上海设第十二厂和第十三厂,1923 年设第十四厂和第十五厂。严,第 351 页。

期建立的棉纱新厂的重要投资人之一。当该厂重组为复泰于1909年出售时,聂家将其买下,改名为恒丰棉纱厂。^① 1911年聂缉槩去世,其子聂云台接管棉纱厂。聂云台在1918年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组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成为联合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一战后,他在吴淞建立了新厂,投资于中国机械,(与孔祥熙、陈光甫一起)创办机构以推动中美贸易。^② 聂云台在教育员工方面颇为用心,为此赢得了“慈善家”的美名。他得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青睐,该会于1908年开始在上海开展工作。让女青年会第一批干事欣喜的是:为了实现他帮助生活在杨树浦地区的穷人的愿望,聂云台

把他宽敞的洋房前漂亮的私人花园提供给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游乐场,迄今已接待了约200个孩子。聂先生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父母们安排了中国式的娱乐活动。他花园里的一棵松树被用做圣诞树,上悬约400个小口袋,每个口袋中装着一本品德教育的书,用以赠阅前来的小孩……我真希望你能看见这些孩子坐在地上听聂夫人讲故事的样子……聂女士和聂小姐都参加了由雅各(Jacob)小姐在家教授的圣经班;我们希望她们能尽快接受洗礼。聂先生将在下周六接受洗礼。^③

荣氏家族也于一战期间开始在上海棉纱界崭露头角。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来自无锡。哥哥宗敬7岁时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一个制锚厂学习,曾因病离开上海,后于1890年代早期和弟弟重返上海,在一家本地的银行中做学徒。数年后他们和父亲一道在本地创办了自己的银行。20世纪初叶,他们用经营银行赚取的充足资金创办起面粉厂。和他们家族的申新棉纱厂将在上海华商棉纺织业中称霸一样,荣氏家族的福

① SSKJY:《恒丰纱厂产业发展与改造》,第1—13页。

② 布什(Bush),第53—55页。

③ 引自格蕾丝(Grace L. Coppock)的信,1914年12月1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协会档案,日内瓦)

新面粉厂也成了上海面粉厂中的龙头老大。1916年荣氏兄弟在上海西部兴建了他们家族的第一家棉纱厂——申新一厂。多年来他们在上海建立起另外六家棉纱厂，并在无锡、汉口、常州都另建有分厂。^①

第三大“棉纱家族”是郭家。郭家原籍广东省香山县，19世纪中叶移民到澳大利亚。1907年郭氏两兄弟移居香港，因在那里创建了永安商场并因此成名。他们在上海、旧金山、澳大利亚都分别创建了商场，同时，也在中国投资房地产和保险业。他们共创建了四家棉纱厂，三家在上海，一家在吴淞郊外。第一家棉纱厂于1921年兴建。^②

到一战结束时，以上这些和另一些本土资本家创办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的产业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这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和社会结构。外滩富丽堂皇的办公群——包括罗伯特·登特(Robert Dent)，香港和上海银行，横滨正金洋行(the Yokohama Specie)，北华捷报；海关(the Maritime Customs)；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营造出独特的上海外景。外滩向西延伸至英国人的赛马场，南京路(见图2)起初叫做大马路，成为繁荣的商业街。两大百货公司——先施(Sincere)和永安(Wing On)，“是四五层高的水泥建筑，其内布满了琳琅满目的中外货物，顶层则是中国旅馆和餐厅”^③。晚上的百货公司外霓虹灯的闪烁，象征着上海作为中国最摩登的城市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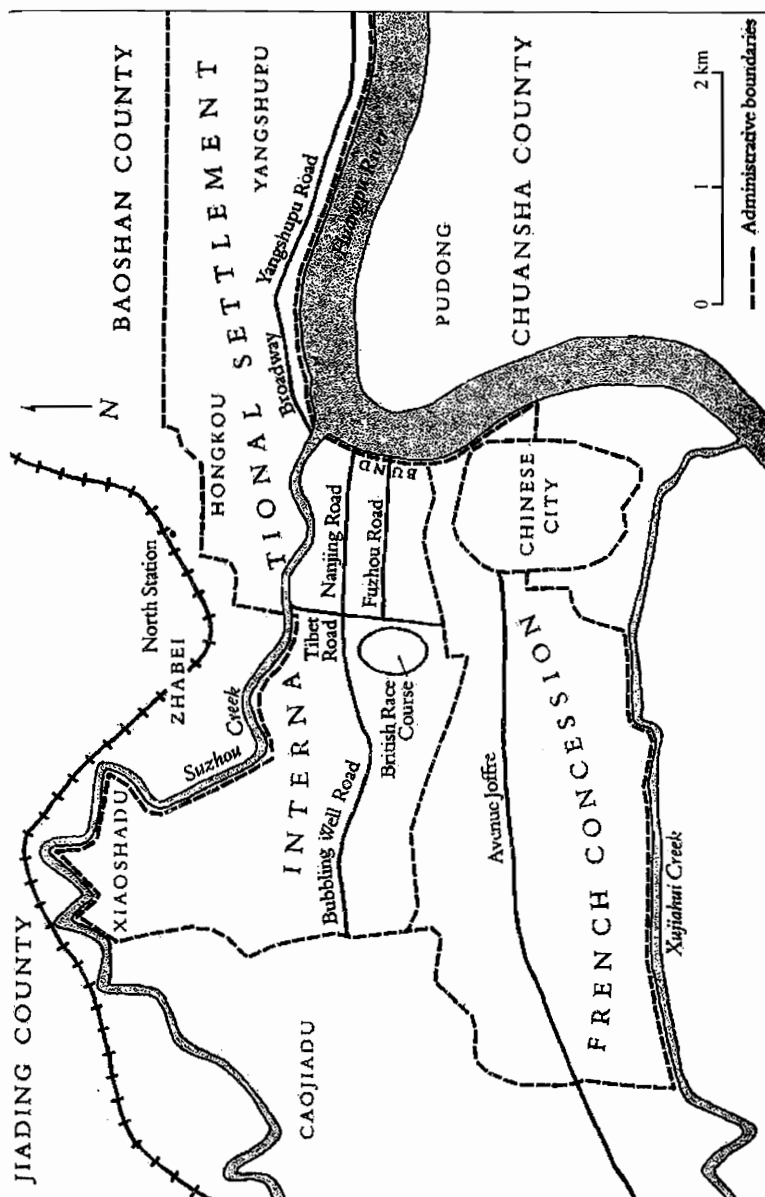
除了跑马厅外，更名为涌泉路的南京路称为“上海贵族区的同义词”^④。涌泉路南部，作为法租界通行要道的霞飞路成了一个同样高雅的富人居住区。中国富商所建豪宅的富丽堂皇丝毫不输给那些外国人。一个新发迹的实业家的居所被描述为“城堡似的用石头建造的府邸，内

① 布什，第58页；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黄逸峰。20世纪初叶，荣氏家族也在无锡开办了几家丝厂。

② 布什，第61—62页；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SSKJY：《上海永安公司的产业、发展和改造》。

③ 奥泽尔，第112、121页。

④ 高梅韦尔，第46页。



地图 2 1919 年的上海, 行政边界, 公里

(Jiading County 嘉定县, Xiaoshadu 小沙渡, Baoshan County 宝山县, North Station 北站, Zhabei 闸北, Hongkou 虹口, Suzhou Creek 苏州河, Caojiadu 曹家渡,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公共租界, Broadway 百老汇路, Yangshupu 杨树浦, Bubbling Well Road 涌泉路, Tibet Road 西藏路, Nanjing Road 南京路, Huangpu River 黄浦江, British Race Course 跑马厅, Fuzhou Road 福州路, Pudong 浦东, Avenue Joffre 霞飞路, Chinese City 中国城, Bound 外滩, Chuansha County 川沙县, French Concession 法租界, Xujiahui Creek 徐家汇河)

配私家泳池、网球场，一辆戴姆勒(Daimler)，两辆伊索塔-弗拉斯尼(Isotta-Fraschinis)……还有多辆小汽车”^①。成千上万的中国女人，包括不少乡下来的移民靠在这些府邸和另一些稍次一等的居住区内当佣人或奶妈过活。^②

一战期间修建的娱乐城——“大世界”和“新世界”——供涌泉路和霞飞路的居民寻欢取乐。“一楼有赌场、歌女、魔术师、小偷、老虎机、烟花、鸟笼、风扇、熏香、杂耍和生姜”，好莱坞的电影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参观大世界之后写道：

上一层是餐厅，其间有不同的戏班表演，更兼斗蟋蟀者、皮条客、助产婆、理发师和掏耳人三教九流之徒。三楼有变戏法的，卖草药的，卖冰激凌和摄影的。一大群身着旗袍的女孩子。在新鲜玩意儿的招牌下是几排摆在外面的冲水马桶。卖者忙着命令一旁嬉笑的消费者不要蹲在地上，而是应当保持一个与店里进口的高档冲水设备相符合的姿势。四楼有射击场、番摊台、旋转轮、按摩椅、针灸室，热毛巾柜台、干鱼、香肠和舞厅……五楼有身着开缝至腋下旗袍的女招待，一只毛绒鲸鱼，说书的，气球，幻灯影片机，面具，一个镜子迷宫，两个保证结果的代写情书摊档，“胶泥制品”，以及布满面目狰狞的神像和香的小庙。在最上层和这个多种欢乐的大楼顶上，一堆走钢丝的人上蹿下跳。其间还有秋千、中国跳棋、麻将、一串串燃烧的鞭炮、彩票和媒婆。^③

上海著名的娱乐产业，包括这样的娱乐城和如维纳斯(Venus)、吉臣(Ambassador)一类的舞厅，为几千名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娱乐中心雇用女招待来吸引顾客；舞厅雇用舞女为以男性为主的顾客提供舞伴。绝

① 费正清(Fairbank):《心系中国》，第64页。所描写的房子是简耿(Ken Cheang)的，耿的家人是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的重要管理者。

② 菊，第7页。

③ 引自潘，第93页。

大多数的著名舞女，比如米高美舞厅(MGM)的五朵金花和百乐门(Paramount)的丁香，一晚就能够赚1000块。^①

和娱乐中心、舞厅一样令人着迷的是福州路上的茶室，距南京南路仅几个街区。娱乐厅和茶室繁荣的生意借中国年轻女性提供的性服务而兴隆。茶室里一位纸醉金迷的观察者曾写道：

到九十点钟营业已正式开始。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布满了方桌，其间小队的年轻女子缓缓前行……她们身着绸缎，佩戴珠宝，浓妆艳抹地跟在每个队伍的领班后面。领班不时地停下来谄媚地吸引客人们对她身后女孩子们的注意力，并滔滔不绝地夸赞她们各自的优点。当有女孩子被选中，领班则由其听天由命，并继续推销剩下的人。……很多的受害者都是在没有反抗力的幼小年龄被卖到这种奴隶制之下……她们一个钟头接着一个钟头被迫待在茶室狭小局促的空间里，等待嫖客们前来取乐。在外面的街上，女人们带着身价或是坐黄包车，或是步行，匆匆赶来茶室。来者络绎不绝，直至夜深茶室打烊方止。^②

除了这些年轻女子和家庭佣人，做苦力的和那些因工作关系出公共租界的人力车夫外，城里的大部分穷人生活在工厂区。到一战结束时工厂区发展到远离黄浦江边或苏州河岸中心商业区的地方。浦东在黄浦江对面，差不多与外滩正相对。尽管日华纺纱公司在那里有几间工厂，浦东并不是重要的棉纱厂区域。浦东主要为英美烟草公司的厂房，以及三井(Mitsui)、标准石油(Standard Oil)、中国商业蒸汽航运公司和怡和(Jardine, Matheson)的码头和货栈。

1919年，黄埔背面苏州河口东侧的杨树浦成为了工厂区。杨树浦成为上海的第一个工业区一点都不奇怪，这里大量的廉价未开发土地和毗

^① 菊，第8页。

^② 高梅韦尔，第48页。

邻水运渠道使其成为理想的厂区。高梅韦尔 1916 年参观访问上海时曾记录道：“杨树浦路，原取白杨树岸路之意，是百老汇路的延伸。由于它主要是一条工厂街道，社会地位很低，杨树浦路与河平行，原应成为上海最漂亮的住宅区，却被工厂最先占据并一直占用下来……和风美景就此浪费在了从早到晚被关在砖墙后面、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①

另外还有两个小型工厂区：虹口和闸北，位于杨树浦西和苏州河的北部。大多数上海缫丝厂，几家小型卷烟厂，火柴厂和针织厂坐落在这两个区域里。^②这两个区最大的区别是虹口几乎完全在公共租界里；而闸北则完全归中国所有，属中国管辖。租界线也把位于苏州河沿岸更西边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棉纱区——小沙渡和曹家渡分割开来。

到 1919 年，这六个区工人共计 181485 人。^{*}几乎半数工人在上海的 26 家棉纱厂（其中 11 家为华商厂，11 家为日商厂，4 家为英商厂）。另外有 4 万工人在机械业，2 万在卷烟厂，5 万—6 万在缫丝厂。^③（见表 1）

表 1 1929 年和 1946 年各行业男工、女工、童工分布表

行 业	工厂数	工 人						总 数
		男 工		女 工		童 工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29								
棉 纱	61	23064	21	84270	76%	3548	3%	110882
缫 丝	107	1712	3	37211	73	12453	24	51376
棉 织	405	6547	22	22394	77	303	1	29244

① 高梅韦尔，第 9 页。

② 钟和巴格维尔(Chung and Bagwell)。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1980)，第 11 页。1919 年，上海总人口大概是 153.8 万人。这一人数近占上海总人口的 12%。

③ 同上，第 8—11 页。在这一时期，中国 62% 的纱锭集中在上海。

续表

行业	工厂数	工人						总数
		男工		女工		童工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烟草	90	7335	30	15703	65	1259	5	24297
印刷	419	9455	71	630	5	3252	24	13337
针织	177	2686	27	7236	71	203	2	10125
机器制造	518	6455	66	0	0	3300	34	9755
造船	13	5994	96	0	0	254	4	6248
绢丝	68	2563	68	1229	32	0	0	3792
鸡蛋	7	1399	39	2186	61	0	0	3585
玻璃制造	30	1588	52	0	0	1455	48	3043
漂染	48	2914	100	0	0	0	0	2914
火柴	7	911	34	1232	46	553	20	2696
搪瓷	16	1857	81	353	15	90	4	2300
面粉	13	2112	100	0	0	0	0	2112
榨油	11	1951	100	0	0	0	0	1951
木工	23	1886	100	0	0	0	0	1886
制革	150	1552	83.9	2	0.1	296	16.0	1850
五金制造	120	1133	69	0	0	516	31	1649
造纸	7	872	56	681	44	0	0	1553
制皂	36	800	72	305	28	0	0	1105
总计	2326	84786	30	173432	61	27482	9	285700
1946								
棉纺	38	10365	22	35306	77	418	1	46089
棉织	42	4284	40.71	6236	59.27	2	0.02	10522
橡胶	8	1579	44	1875	53	95	3	3549

续表

行 业	工厂数	工 人						总 数
		男 工		女 工		童 工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卷烟	10	463	14	2842	83	120	3	3425
毛纺织	9	1095	32	2271	66	58	2	3424
丝纺织	6	578	30.7	1294	69.0	6	0.3	1878
机器制造	14	1506	85	17	1	242	14	1765
针织	12	365	22	1243	75	45	3	1653
酸碱	2	529	35	974	65	0	0	1503
面粉	5	999	99.8	0	0	2	0.2	1001
玻璃制造	9	557	69	16	2	235	29	808
毛巾被毯	5	261	37	424	61	13	2	698
火柴	4	249	40	348	56	22	4	619
搪瓷	4	569	95	13	2	19	3	601
造纸	5	409	68	189	32	0	0	598
造船	2	544	93	0	0	38	7	582
制药	4	128	23	426	77	0	0	554
内衣	3	174	33	338	64	15	3	527
印刷	4	359	84	36	8	34	8	429
榨油	3	360	100	0	0	0	0	360
制针	5	170	55	122	39	17	6	309
制帽	3	175	59	107	36	16	5	298
水热瓶	3	207	76	44	17	20	7	271
电工器材	4	155	70	41	19	25	11	221
制皂	4	181	83	32	15	6	2	219
罐头食品	2	126	63	69	34	6	3	201
软管制造	3	48	28	107	64	13	8	168

续表

行 业	工厂数	工 人						总 数
		男 工		女 工		童 工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五金制造	3	78	62	16	13	32	25	126
调味品	2	101	82	20	16	2	2	123
酸碱	2	95	100	0	0	0	0	95
印铁制罐	2	38	44	48	55	1	1	87
织带	1	26	32	54	68	0	0	80
赛璐珞	1	48	100	0	0	0	0	48
制革	1	38	100	0	0	0	0	38
总计	225	26859	32	54508	66	1502	2	82869

资料来源：1929年的资料来源于上海社会局：《劳工工资和时间，大上海，1929》，上海，1929。1946年的资料来源于上海社会局：《上海工厂劳动统计》，上海，1946。

虽然这些区域距上海市中心仅隔着一条黄浦江或苏州河，其物理外表并不能显示其毗邻中国最国际化的大都市。这里没有大的百货公司、精美的丝绸店或欧洲风格的大宅和别墅，也没有卡巴莱、夜总会和歌舞厅。

工厂区里的大多数居民住的是由泥板地、竹墙和瓦盖构造的两层中国式房子。没有分隔的空间设计使一间屋子能容下三四户家庭。晚上同一个房子常常还要被鸡鸭占去一些。这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居民从附近的小河中取水来洗衣服、洗菜和刷马桶。

工业区当中还有另一个特征鲜明的上海天地，即位于杨树浦的黄浦江畔的贫民窟，该区远离商业区，被苏州河弯曲的河道包裹起来。这些简陋的居所最早始于20世纪初期来上海乞讨或做苦力避难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江苏北部、山东及安徽。他们用破席子、破木板和稻草搭成小屋。屋内多以稻草铺在砖上为床，以旧罐子为炉子。“棚户人”，字面

意思是“棚户区居民”，变成了上海底层人的同义词。

棚户区的扩张紧随着上海工业的增长。1911年，当内外棉株式会社(Naigai Wata)开始在上海西部建造工厂时，苏州河南岸的药水弄和北岸的潭子湾出现了棚户区。尽管频繁的火灾有时会将整个区尽数烧毁，这些棚户区还是被反复地重建。^①

工业化和政治

到1919年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然而，正如五四运动所显示的那样，上海并没有动摇北京作为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运动中心的地位。这种状况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开始转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中流砥柱的棉纱厂女工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参与者。1920年5月，为了宣传这个变化，由左翼五四知识分子编辑的《新青年》发行了一期介绍上海工人状况的专辑。编辑陈独秀为这期有关工人的特刊亲自撰写了一篇长文，调查湖南籍的女工在一家上海棉纱厂的聘用情况。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越来越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移居上海。其中包括积极的工运领袖，如邓中夏、向警予，也包括作家，如鲁迅和巴金。尽管他们中少有人在工厂工作过，但他们却创造了一批有关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写于这一时期的关于1921年后上海罢工浪潮的报道。^②工人的罢工，特别是1922年闸北丝厂女工的罢工，引起了外国传教士对工人状况的关注。传教士的关注促成了1922年上海童工委员会的成立。委员会由工部局任命，其成员包括宋美龄、哈瑞森(Agatha Harrison)(女青年基督协会的临时干事)，以及如内外棉、怡和等主要工业公司的代表。1924年，委员会发表了有关

^① SSKJY:《上海棚户区的变迁》，第4—9页，拉姆森(Lamson):《中国工人住房问题》，第147页。

^② 见邓中夏；巴；向。

工作环境的普查结果,以及一份建议禁止雇用 10 岁以下童工的报告。可惜当工部局将这个建议作为附加法提交给公共租界的选民时,伴随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上海,附加法也最终没有实施。^①

1925 年 5 月 15 日,小沙渡的内外棉五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卫兵枪杀,五卅运动开始。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外国人对上海的统治。5 月 30 日,学生被捕,人们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随即引发暴乱。锡克巡捕在英方要求下向群众开火,10 人被杀,50 人受伤。第二天,即 5 月 31 日,中华总商会宣布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罢工者提出从建立中方对上海警力的控制和在工部局内设代表到提高上海工厂工人的工作待遇等一系列要求。^②

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运动特别是上海棉纱厂的罢工进入新高潮。为了给 1926 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铺路,上海总工会于 1927 年发动了另一起总罢工并取得了成功,在中国管辖的闸北建立了临时市政府。3 月底,蒋介石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没废一枪一弹就进驻了上海。4 月 12 日,蒋介石军队借助青帮武装势力,发动了剿灭工人运动的政变,白色恐怖时期到来。^③

日本人在上海

这些事件发生在 1920 年代日本对上海的经济控制日益增强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崛起在棉纱工业中最为明显:在一战后的十年间,日本在上海的棉纱产业急速扩张。

1919 年日本在上海拥有的棉纱厂(和纱锭)和中国方面的数量差不多。由于许多因素(见表 2),这种平衡很快就发生了改变。首先,1918

^① 安德森(Anderson),第 131—162 页。谢诺:《中国劳工问题》,第 229 页。

^② 谢诺:《中国劳工问题》,第 262—289 页;五卅运动编写组。

^③ 谢诺:《中国劳工问题》,第 345—371 页;黄和周;爱萨克斯(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

年的关税修订提高了对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精品纱和布匹的税率，因此，把制造工序设置在上海对日本人更加有利。第二，日本国内有关夜工工作制的法律使得没有这样的限制的中国更受工厂主的青睐。^① 1919年至1925年间，在上海的日商棉纱厂的数量从11家上升到32家。大部分新厂隶属于大企业集团。在同一时期，华商棉纱厂的数量由11家增加到22家，但大部分华商厂隶属于小公司：每家公司只有一到两家厂。1925年，32家日商棉纱厂只隶属于11家不同的公司，而22家华商棉纱厂则隶属于18家公司。^②

日本在棉纱工业增长的地位也同样地显示在纺织业以外的地方。1920年代初期，日本公司购买了三处码头地皮：两处是在浦东，一处是在杨树浦，而日本拥有的口岸数量稳步增加。^③ 到1930年，日本人已取代英国人成为公共租界里最大的外国人社区。日本人从1890年仅有的800增加到1920年的1000，到1930年达到3000——是那时英国人的三倍。日本人口在苏州河以北，虹口的部分地区形成了“小东京”社区。

在那里，苏州河以北……日本商店的店主和小商人住的是被改造成标准日式风格的中国房子。他们住在那里，盘膝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洗滚烫的热水澡，把鞋子放在外间的厅里。他们教他们的中国男仆们怎么做天妇罗(tempura)和寿喜烧(sukiyaki)，派他们到虹口市场购买新鲜的日本鱼蟹、酱料、生姜和日本蔬菜，全都是九州(Kyushu)运来的新鲜货。在他们小巧的商店里，他们出售日本棉、玩具、录音机、自行车，同时也卖大量的中国商品。^④

① 赵，第119页。

② 上海市棉纺织。上海有11家内外厂，4家日华厂，3家上海厂，4家东华厂，2家喜和厂，2家大康厂，2家丰田厂，2家同兴厂。相对应，在这一时期拥有一家厂以上的华商厂只有申新有三家厂，溥益有2家厂，永安有2家厂。赵，第142页。

③ 卜舛济，第240页。

④ 奥泽尔，第193页。

表 2 棉纱厂规模与工人,选择年份 1921—1947

年 份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工人数
1921				
华商厂	23	499346	3940	—
英商厂	5	259286	2153	—
日商厂	24	352180	1986	—
总 计	52	1110812	8079	33174
1922				
华商厂	24	624142	4240	40739
英商厂	5	257866	2800	13000
日商厂	22	586828	2968	13370
总 计	51	1468836	10008	67109
1924				
华商厂	24	665798	4410	47437
英商厂	5	250516	2863	19000
日商厂	28	629368	3929	43428
总 计	57	1545682	11202	109865
1925				
华商厂	22	677238	5090	44934
英商厂	4	205320	2348	16500
日商厂	32	939428	5836	59262
总 计	58	1821986	13274	120696
1927				
华商厂	24	711756	5116	49908
英商厂	4	205320	2348	16500
日商厂	30	947540	7710	58113
总 计	58	1864616	15174	124521

续 表

年 份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工人数
1928				
华商厂	24	776388	7384	50555
英商厂	3	153320	1800	13000
日商厂	32	1010000	8356	53123
总 计	59	1939708	17540	116678
1929				
华商厂	28	818088	6338	56376
英商厂	3	153320	1900	13000
日商厂	30	1054344	8820	58029
总 计	61	2025752	17058	127405
1930				
华商厂	28	953646	7007	63243
英商厂	3	177228	2480	13189
日商厂	30	1148184	8846	54606
总 计	61	2279058	18333	131038
1931				
华商厂	28	1068920	7864	65146
英商厂	3	170610	2691	13000
日商厂	30	1253100	13685	51103
总 计	61	2492630	24240	129249
1932				
华商厂	28	1082148	7238	65638
英商厂	3	183196	2891	13000
日商厂	30	1284872	12353	42435
总 计	61	2550216	22482	121073

续表

年 份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工人数
1933				
华商厂	31	1126204	7854	55826
英商厂	3	184908	2890	13000
日商厂	30	1287608	13278	44940
总 计	64	2598720	24022	113766
1934				
华商厂	31	1131444	8337	52407
英商厂	4	184908	2891	13000
日商厂	30	1324872	13637	47502
总 计	65	2641224	24865	112909
1935				
华商厂	31	1118218	8540	45159
英商厂	4	227148	4021	10000
日商厂	30	1314388	15208	44863
总 计	65	2659754	27769	100022
1936				
华商厂	31	1114408	8754	54818
英商厂	4	221336	4021	12221
日商厂	30	1331.412	17283	49.842
总 计	65	2667156	30058	116881
1942				
总 计	22	—	—	8177
1943				
总 计	22	—	—	3934

续表

年份	工厂数	纱锭数	织机数	工人数
1947				
华商厂	80	2212648	23822	96692
英商厂	3	45260	24	829
总计	83	2257908	23846	97521

资料来源：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上海，1950。

1931年因日军占领中国满洲而引发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商品首当其冲。随着在上海抵制日货的升级，中国公司拒绝买卖日货，中国银行拒绝承兑日本租地的贷款。大约70万吨日本货物被堆积在港口。一旦有日本船只依靠码头，纠察队就聚集在附近码头。抵制日货的结果是在上海的大多数日商厂被迫暂时停产，许多中国工人因而失业。^①

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因1932年的上海事件而达到白热化。在中日民众于上海市郊发生小规模冲突后，日本领事要求镇压抗日抵制活动，停止抗日宣传。然而上海市市长吴铁成* 还没来得及将同意的决定传达给日方，日本海军已经行动了。日方要求中国十九路军撤出闸北。到1932年1月28日，中国军队继续留守，日军以保护虹口附近的日本居民为借口发动攻击，所谓的不宣而战就此开始。接下来几周的最大战役发生上海火车站周围的闸北区，而该区也是日本轰炸的首要目标。

人口稠密的闸北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了废墟。战争在街道上蔓延，一直延伸到属于公共租界的虹口。楼房在持续的战火中被烧毁或倒塌。工厂被炸成了碎片——其中一间隶属于商务印书馆，在过去30年间，3/4的教科书由该馆提供。教堂、学校、医院以及一所

^①“上海的失业情况”，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刊》1932年2月。（国际劳工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 译者注：作者原书为Wu Dezhen，译者查阅资料发现当时的市长应为吴铁成。

中国大学也被炸毁。^①

日本对上海的轰炸致使 20 万工人失业,许多人也因此失去了家园。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 5 月 5 日双方停战协议的签署。

1932 年,上海经济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纺织业遭遇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一次却是中国资本家被迫停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部分是因抵制日货造成的,抵制日货(用赵冈的话说)“引发了一场考验双方持久力的价格战”^②。为了在抵制日货期间出售他们的棉纱,许多日本工厂大幅度地降低他们的价格,以至于许多中国的工厂主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办法。^③ 1931 年,长江流域的几次洪水使得棉纱厂主很难得到原棉,最终原棉价格昂贵,更加重了棉纱厂主的困难。最致命的是日本占领满洲后,断绝了华商纱厂最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之一。到 1933 年中期,上海 31 家华商厂就有 12 家完全倒闭。其他大多数企业缩短了工作时间。^④ 另一个雇用女工的行业——缫丝业也受到重创。早在 1930 年,上海有 107 家华商缫丝厂,到 1935 年,只剩下 30 家。^⑤ 因此,大萧条时期上海女工的境况尤其悲惨。

1930 年代初中期,上海女工的困境引起了社会改革家的关注,其中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劳工部(成立于 1921 年),现任主任为邓裕志(Cora Deng)。在她的指导下协会为上海女工开办的夜校数量成倍增加,课程内容也越发激进。工会招募了许多曾在美国学习过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中国女性作为职员。除了撰写大量关于女工状况的著作外,她们也鼓励学生写文章描述自己的生活。其中许多文章在协会的中文期

① 奥泽尔,第 202 页。

② 赵,第 167 页。

③ 日本工厂老板已经降低了每包 20 支纱的价格:从 1931 年 6 月的 187 两银子降到 1932 年 10 月的 133 两银子。在同一时期,华商纱厂每包纱的价钱从 189 两银子降到 156 两银子。赵,第 167 页。

④ 可布尔(Coble),第 150—151 页。

⑤ 同上,第 156 页。也参见李莉莲[音译](Lillian Li)。

刊上发表。同时,在美国社会学家拉姆森(Herbert Lamson)的指导下,学生们,如上海大学(1906年由教会在杨树浦建立)社会学系的杨美真,在学校周边的工厂区开展对女工的调查工作。在经济萧条期,女工的状况也引起了于1930年白色恐怖之后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关注。在这些年间,矛盾写了小说《子夜》,描述缫丝厂工人和资本家的困境。夏衍创作了他的“期刊小说”《包身工》,揭露了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状况。这些作家的写作使得1930年代对女工生活的描述格外丰富。

抗日战争

1937年,上海的经济还没来得及从大萧条中复苏,抗日战争就爆发了*。紧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生活在上海华人区的数千华人,正确地预料战争将向南延伸,便开始逃向公共租界的安全地带。

他们每天都在过桥到达安全区,人数与日俱增。租界和法国城的租金上涨。原来7元的房间现在已涨到25元……酷暑之下难民们蹲坐在外滩的岸边而不离去。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其中有一些人还赶着奶牛而来。许多人被驱赶到由市政官员在中国娱乐园临时搭建的难民收容所里。^①

工厂在上海华人区的许多工厂主也迁移到了外国租界区。^②直到8月13日,当日本军队开进吴淞口和江湾时,战争在上海爆发。在的大多数工厂由于炮击、炸弹轰炸、街道战被迫推迟生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14日,当中国飞机计划攻击刚离开外滩停靠在黄浦江的日本战舰“出云号”(Izumo)时,没能击中目标,他们投掷的两颗炸弹反而落在

* 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7年的日军侵华。他们把1937—1945年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这之后简称抗战。

① 奥泽尔,第307页。

② 巴尼特(Barnett),第76—77页。

大马路和外滩的交汇处：一颗炸毁了皇家旅馆的屋顶，另一颗落在了沙逊的华懋饭店前。仅半个小时后，另一架中国轰炸机意外地击中了大世界娱乐中心。然而，几周后，中国的另一架飞机在离大马路较远的地方投掷了炸弹，永安和先施百货公司遭受了巨大损失。^①中日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1月份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为止。从1937年底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共租界成了一座“孤岛”。^②

尽管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战初十年是棉纱工业的第一个繁荣期。一些没有从租界外的区域迁移走的工厂被日本接管下来。^③不管怎样，公共租界的工厂迅速地恢复了生产。另外，1938年，英国或美国公司名下注册的七家新棉纱厂建成。^④棉纱和棉布的高价格使得棉纱厂获利丰厚。例如，英怡和工厂的利润仅从1937年到1938年就增加了三倍。永安三厂是在租界里唯一的一家永安厂，其赚取的利润除了补偿公司三家闲置工厂的损失外，还有剩余。^⑤其他的上海工厂也经历了同样的繁荣。表面看起来，城市生活仍维持着正常。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干事1938年初到上海访问时，给家写信提到：

现在我回到上海差不多六周了。……我回来的第一天就失望了。我所预料中的上海是一个遭受战争破坏的上海——脸色苍白的人们在与贫困和饥饿斗争着；秩序混乱；人们平日里遭受着暴力的威胁。与之相反，我发现一切都很正常。由于人口增加了，公共租界的街道有些拥挤，不过商店和往常一样照常营业。饭店生意兴隆，剧院的上座率甚至比战前还高，许多舞厅还增加了新花样——溜旱冰！^⑥

① 奥泽尔，第310—315页。

② 关于这一时期对上海的细节描述，见陶。

③ 总共有16家厂被日本人接管，包括恒丰、申新五厂、六厂、七厂，盛泰和大丰。

④ 赵，第131页。

⑤ 邓发，第18—27页。

⑥ 写给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信，1938年4月22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一直到1941年12月,日本人最终入侵公共租界,这一表面的正常状态被打破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本地事件发生在黄浦江中段,日本和美国的船队都停靠在那里。……12月8日的黎明前,日本军舰“出云号”与两艘美国船只一道驶入,迫使美国船队投降。

当白天到来时,日本计划占领租界的意图在一些细节上已显现出来。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投掷了几千份用各种语言印制的传单,劝导人们保持冷静,相信日本帝国军队的善意。到上午10:00,哨兵们已聚集在英国、美国和荷兰的领事馆、市政大楼、银行、电报局及公众设施。美国俱乐部立即被日本海军(The Naval Landing Party)接管。苏州河上的花园桥(译者注:今天称外白渡桥)设置了路障,封锁日军,以防其进入租界的其他区域。^①

铁丝网路障遍布全城,日军在所有的桥上都设有哨卡。当中国人经过哨卡时,必须鞠躬致敬,否则他们就会被刺刀刺死。英国和美国的居民被要求向日本军队登记,带红袖章,如果要改变居住地,需要获得日本人的允许。许多人被围捕关押在海防路的一间房子里。那时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上海曾经是最喧闹的城市,现在已变得异常的沉寂。”^②

日本管理者接管了英国和美国所有的工商企业,也接管了1937年后在英国或美国贸易名下的华商工厂。在一些工厂里,纱和布仍在继续生产;在其他工厂,机器设备被废弃,工厂用来为日本军队制造炸弹;有一部分工厂,转产制造军服。到1942年,在原华商工厂中,投入生产的锭子数量已减少了1/3,开工的织布机数量减少了一半。^③ 上海棉纱厂

^① 戴维森—休斯顿(Davidson-Houston)。

^② 来自莉迪娅(Lydia Johnson)的信,1942年2月4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③ SKJY,恒丰,第67页。

工人的数量已经下降到只有 8000 多人；到 1943 年工人人数一直都保持在不到 4000 人的低水平。^①（见表 2）

走向解放

1945 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一个多世纪前设立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首次归属中国政府。政府允许外国企业、银行和工厂（除了那些日本人的企业、银行和工厂外）恢复营业。尽管日本从许多棉纱厂里搬走了机器设备，但战争期间大多数工厂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本可以立即恢复生产。然而，1945 年秋，大多数上海工厂仍继续关门歇业。据估计，在 11 月份，仅有大约 10% 的现有纱锭在运作。^② 战争结束大约一年的时间，棉纱工业才开始恢复。

胡素珊 (Suzanne Pepper) 关于中国内战的研究认为，这种缓慢的恢复与其说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干扰，不如说是由于日本投降后接管的政府官员和军队的腐败。日本投降后，入驻上海的首批军队把巨额的原有物资没收，同时，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拆除和出售了工厂的设备。^③

为了组织接管最初直接或间接属于日本的工厂、仓库及其他产业，1945 年 10 月，敌伪资产监察委员会及敌伪资产处理局成立。在这两个委员会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就查办出在上海地区有 500 余起中国军官试图藏匿敌产案。^④ 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控诉他们军队前任官员的罪行，不过，他们自身也并非就是无辜的。腐败如此肆虐，以至于蒋介石亲笔

① 上海市棉纺织。

② 查尔斯：“于 1936 年相比，上海棉纺工业当前的状况”，1945 年 12 月 24 日，博伊西加斯凯德公司档案，爱达荷州博伊西。（Charles Ferguson, “Present Status of Shanghai’s Cotton Industry Compared with 1936,” Doc. 24, 1945, Boise Cascade Corporation Archives, Boise, Idaho. Courtesy of Warren Tozer.）

③ 胡素珊 (Pepper)，第 22 页。

④ 同上，第 23 页。

给上海市市长写信,电文谕称:

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抢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①

1945年12月,行政院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评估在全国范围内原属于日本资本家的所有棉纱厂产权。这些问题被纺织建设公司继承下来,并且的确在恶化。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部分官员腐败、受贿、违规操作普遍存在。^②同时,设备遗留问题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困难:当1946年初,公司在上海接管了18家原日本工厂时,就抱怨“机器设备几乎相当混乱无序,厂房破旧。”几个月以来,这些工厂只在白天开工。^③

在工厂车间,处在管理层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技术人员。上海区的中国建设纺织公司的一家工厂的一位女工对一名新闻记者说:“过去,当我们的工厂在日本管理下时,只要纱锭出了故障,他们就会立刻修好。”

现在一切管理都漫不经心。如果机器出一点小毛病,没有人会去理会——只是让其像往常一样运作。结果是机器很快就报废了。我担心几年后所有的纱锭都将不能使用。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机器出了问题去问那些技术人员,我们得到的回答,不是说“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哦,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给你一个清晰的答复。然而,据说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遇到困

① 胡素珊,第20页。

② 同上,第67页。

③ “中国纺织工业报告,公司卷,1946”,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47年4月。(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

难,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他们的教科书。在处理机器设备方面,他们不比工人强。^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旗下的工厂以为工人提供各种服务——从浴池、篮球场到为工人提供产假,为其子女提供学校——而自豪。但获取这些权益的程序相当复杂,这些权益对工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

棉纱厂的问题仅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一个症候。这场危机最显著的表现则是空前的通货膨胀,这就使其成为必要:“早上买东西,需要手提满满一手提箱的钱币。”^②工人们频繁罢工,要求根据生活费相应调整他们的工资;要求工厂主发给他们定额的米与衣物。继1927年政变和白色恐怖后,1946—1949年间工运再次活跃起来,其程度犹如20年代中期的工运。如1946年的前六个月,上海的罢工大概发生了250起。^③这些罢工,很大程度上是战后经济严重混乱的产物,大多数是由中国共产党策划的。共产党在地下活动已经十多年了,不过,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开始在上海的企业中积极地发展支部。罢工工人不仅有工厂工人,而且也有上海海关、美国电力公司、法国电车公司以及百货公司的工人。

在此期间,上海也发生了学生频繁示威游行,要求结束1946年国共两党间爆发的内战。1948年1月底,示威游行达到了高潮。在一周内发生了三起重大罢工:同济大学的学生罢课,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告终;申新九厂工人罢工,因国民党派遣军队镇压,致使数名工人死亡,500多工人受伤;约1000名舞女罢工。^④

当这些运动席卷上海时,在中国北方,国民党正在迅速地丢城失地。

① “报人看上海劳工”,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46年6月,第47页。(国际劳工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② 戴维森—休斯顿,第189页。

③ SGYLW:《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第4卷,第32页。

④ “上海解放30周年专辑”,SWZX,1979年。

1949年初,共产党已经越过淮河,正南下前往南京和上海。当军队迅速南下之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干部正在动员工人组成“护厂队”。5月,当人民解放军真正到达上海时,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一位外国居民这样写道:“国民党在上海的抵抗,与其说是有效的,不如说是装点门面,当他们放弃上海时,大多数人是秋毫无损地离开的。”

我们的建筑较高,透过我办公室的窗户,我能够看到他们。没多久,我们看到河对面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几天前,战役就已经临近我们这边了。晚上,我们经常爬上屋顶,看地平线上的红色,每晚,当汽油站的火光、军火库的爆炸以及枪声不是那么遥远时,红色离我们就更近些。嗖嗖的子弹已经在我们的建筑物四周肆虐了三天了,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我们这一区域得救了。在其他地区的朋友们陆陆续续打来电话,邀请我们到他们那儿去做客,一起庆祝胜利。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最后的枪声后一片寂静,看到对面的街道上解放军的黄色军服逐渐增多起来,然后能够走出去观察上海的新面貌。^①

接下来的几天里,在街道上游行的队伍持续不断。不过,上海棉纱厂的庆祝活动几乎没有扰乱生产,工厂基本同往常一样继续开工。一直到1950年代政治运动时,工厂的所有权、经营管理以及组织生产方面才发生急剧的变化。

在解放后的十年间,上海的经济社会面貌和物理面貌再次发生转型。原来为外国人和中国资本家所有的工业、贸易公司和银行逐渐由中国政府接管。沿着外滩的办公群成了上海新政府、劳工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的总部。上海俱乐部(因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20世纪初就已很著名了,是外国商人聚会喜欢去的地方)变成了海军俱乐部。在上海的其他地区,由于大规模清除鸦片烟和扫除卖淫运动,先前繁华的茶馆和夜

^① 玛格丽特(Margaret Garvie),1950年7月7日的信。(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总会的数目骤减。

因此,1949年后,工厂的建筑和机器设备虽然和以前大致相同,但社会环境却完全不同了。

第二章 在工厂里

上海的棉纱厂各不相同。甚至单就某一工厂而言,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然而,为了解女工们用她们睡眠以外的超半数时间工作的这个世界,让我们来看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工厂,即 1925 年的申新一厂的结构及运作情况。^①

参观工厂

1915 年,申新一厂在曹家渡创办,但公司主要办事处不是坐落在曹家渡,而是位于近外滩的上海中心城区的江西路上。厂主(无锡的荣氏兄弟)、总经理以及助理经理在公司主要办事处制定各种决策:购买原棉和机器设备,出售成品纱和布。和大多数华商工厂一样,多数管理人员是厂主的朋友或亲戚。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前来推销原棉的经纪人,并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管理者只是偶尔才会到厂子里去。^②

工程师的职责是将管理计划转化成产品。他们要参与协调从原棉

^① 除了另有说明外,以下的叙述均来自:郭鉴清和仲祖龄,第 31—32 页;手工工作描述;皮克(Peake);上海法制局;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中英纺纱词典(上海,1979)。

^② 布什,第 60 页。

纺成纱,再将纱织成布的整个生产过程。由于他们已在南通纺织学院或在日本、英国学习了纺织工程,他们几乎不掩饰他们对上司无知的蔑视。一位曾在申新某一工厂工作过的工程师抱怨说:“他们甚至分不清棉的好坏。”^①

要观察工厂的运作,必须离开上海市中心的办事处,沿着苏州河向西一直来到曹家渡。在河水向北急转弯处,可以看到坐落在河两岸的棉纱厂以及其他工厂。人们难以从周边众多的工厂中分辨出哪一家是申新一厂。申新一厂由几座砖结构的建筑物组成,占地超过八亩。这一建筑群除了主生产车间外,还包括两间公事房、纱花栈六座、修理厂一座、一个引擎间以及六座工人宿舍。住宿舍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工人,而是工厂行政人员、工厂监管人员,地位处在工人和工程师之间。他们大多数是通过了两年养成工培训的中学毕业生,在养成工培训期间他们全面学习纱的生产和管理知识,同时,他们被要求住宿舍。养成工学习结束后,他们将成为某个车间的工头,最终,他们可能被提升为监管所有的纺纱或纺织车间的工头。^②

棉花先纺成纱,接着织成布的过程是从苏州河岸旁的工厂后门外开始的。在那里,船只把产自江苏、陕西和河北的原棉运进工厂。在装船前,棉花已经是无籽棉了(也就是说,棉籽已从棉花纤维中剥离出来了),然后被紧紧地轧成包以便运输。

穿着至膝的棉衫和草鞋的赤胸苦力们,卸下这些棉包(每包重近500磅),然后把它们扛进棉纱厂的收货室存储起来。当使用棉花时,就将其运往清花间。清花间是工厂里最嘈杂、灰尘最多的部门之一,将棉花纺成纱的第一步将在这里进行。杂乱的棉花被打碎,抖松,洗净。一群男

① 对史文冉(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9月16日。

② 对阎可(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11月22日。这些学生经由他人介绍被允许参加这一计划,紧跟着是一场语文和外语及知识测试。在工厂管理层中,他们在工头和拿摩温之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工人中挑选出来的。

工,称为拆包工,用手推车把大量的棉包从清花间运进来。他们给每一包称重,并按照原棉级别摆成一排,再用锄头把每包棉花的铁丝打开,然后取走包装。之后,另一群男工接班。他们从棉包的顶部拽下几层棉花,投入第一台机器里,清除棉籽、棉梗、棉叶以及沙子,把不同级别的棉搅在一起。从机器的终端吐出的是白色的绒毛般的棉絮。这些棉絮被塞进一个进料槽里,棉絮被摊开形成仍旧绒毛般的薄片棉絮,然后薄片被卷成卷。苦力们用手推车把棉卷从清花间推到梳棉间,梳棉间位于两层楼的纺纱楼内。在梳棉间里,运棉卷男工把沉甸甸的棉卷扛在肩上,然后将其放在梳棉机前。当棉片绕经这一机器时,棉片在一系列的小的金属平面和一个巨大的上面附有几千个细小的金属齿的圆筒间挤压。锯齿梳理棉花,把棉纤维压制成类似的规则的样式,同时去除棉花里有灰尘的短纤维。几小时后,梳棉机上的金属齿就被棉纤维屑覆盖住了。为使机器能有效运转,被称为钢丝工的高水平技工,分两组工作,他们把机器的金属盖儿打开,用钢丝刷洗金属齿。梳棉机吐出的是一缕缕如丝般的纱,被称为生条,然后将生条塞进一个三尺高的圆筒中。大约 55 分钟,装满一桶。之后,男工再换上空筒。

装满生条的筒被放到并条机上,这就标志着生产过程中首次出现女工。在这一房间里的大多数女工,年龄在 25 岁左右,和其他女工一样,基本不识字。她们把 6 只棉条桶放在并条机的一侧,然后把棉条的尾部塞进机器里。偶尔一股断了,机器就会自动停止转动,操作工接好断头,重新开启机器。当 6 股棉条绕经机器后,就合成了一股。接下来,在机器的另一侧,一系列的滚轴把厚度不均匀的棉条拉伸。在机器这侧的女工,把装满盘绕的棉条的筒取走,并及时提供空筒。

对于纺纱而言,这拉伸的棉条既不足够薄,也不足够结实。事实上,它还厚 200 倍。在把棉条送往细纱间前,必须要经粗纱间的三台机器(捻纱机、二道粗纱机、粗纱机)的加工,以使棉条变得既薄又有韧性。

在嘈杂的、热烘烘的、布满灰尘的粗纱间里,装着拉伸好的生条的筒

被排列在捻纱机的一侧。操作这一机器,同操作细纱间的大多数机器一样,需要手巧而不是身体强壮。工厂管理者相信女性的手指要比男性的灵活得多,因此他们逐渐大量地雇用年轻女工。

在捻纱机一侧的女工把装着拉伸好的生条的筒放好。做这一工作的女工先必须把纱穿到捻纱机上,然后,拉动操作杆开启机器。偶尔纱断了,她必须迅速地用手掌把断了的头搓在一起。当一筒纱用完后,她就关上机器,推开空筒,换上装着拉伸好的生条的筒。接着,把新筒中的纱与已缠绕在机器中的纱接到一起。她从中间把两个头劈开,再用手掌搓,直到两个头接到一起。然后,她再次开动机器。

在捻纱机的另一侧,一组滚轴把纱拉伸变薄后,送向机器前方。这样,迅速转动的机器把纱拉伸后首次将纱缠绕到筒管上。筒管缠满后,照看捻纱机前台的女工就会把筒管取走,放到机器的顶部,然后装上空管。她有时把缠好的筒管收进板条箱里。男工把箱子拖到二道粗纱机上。操作二道粗纱机和终端粗纱机的女工实际上也做着这些相同的工作。在二道粗纱机上,两股头道粗纱被拽到一起,拉伸成一股更薄的纱。粗纱机甚至比二道粗纱机转得更快,第三次运行这一过程。当纱缠绕到粗纱机的线轴上时,开始看起来像棉线了。

在粗纱间有几个雇员不是一般的普通工人。首先,一个是总工头,被称做“拿摩温”(the Number One),负责整个车间的分配工作。不过,由于粗纱间非常大,所以在车间的每一组都有几个“小拿摩温”(small Number One),负责监管车间里每一区的工人。“小拿摩温”们的蓝色工作裙套上红色袖章以区别于一般工人。拿摩温们不操作机器:他们在一排排的机器间来回走动,劝导违规的工人。除了拿摩温外,车间还有一个秘书,她跟踪了解每个雇员干了多少工作。她的工资不比普通的机器操作工多,但工作相对比较轻松,有时她可以坐在凳子上织补衣服。

除了女机器操作工外,还有几个修理损坏机器的男机修工。这些机修工的年龄大多在 25 岁左右或 30 岁出头,他们在到工厂工作前已受过

一定的教育。使工厂管理者很惊愕的是,大多数机修工和许多工头、门警一样是青帮成员。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一排排的二道粗纱机和粗纱机的旁边是细纱间。申新一厂属于一般规模,几百排的细纱机上大概装有4万纱锭。大部分工人集中在细纱间,大约占工人总人数的1/3。大多数分派到这一车间的工人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不过,也有许多“童工”。一位美国观察家参观完工厂后写道:“事实上,整个工厂滥用12岁—14岁的小女孩儿,7岁大小的少年遍及全厂。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想尽办法想学习工厂的工作流程。难以分辨出哪些人是在被雇用的,哪些人只是用来消遣的。”^①

细纱间的工人要完成三道工序。男工卸下来自粗纱间的装着筒管的板条箱,放在细纱机顶端。女操作工,每人看管175个纱锭,固定好一个筒管,把线头绕过纱锭。当纱线穿过高速旋转的纱锭时,再次被拉伸变得更薄和有韧性,最后,缠绕到另外一个较小的筒管上。只要纱线断了,女接头工就会迅速把断头接上。落纱工中许多人是仅仅10—12岁的男孩儿,用空管换下缠满的筒管。^②24小时内,每一个纱锭能够纺1.5磅非常粗糙的纱(12—16支)。^③

大多数棉纱被送到织布间,不过有一小部分纱准备成包销售,这一部分被送到摇纱间。在摇纱间与在细纱间一样,女工的主要任务是操作机器,把两股棉纱搓到一起,接上断头,用空管取代满管。筒管上的纱被缠成纱束,送到成包部,称重、成包,之后被送到仓库。

细纱间的大部分纱并不被送往摇纱间,而是被送到织布间。织布间位于大约0.5英里处的一座楼内。在两栋楼之间,“装着新机器的板条

^① 莫泽(Moser),第69页。

^② 同上。尽管莫泽没说工厂的名字,但根据他的叙述几乎可以肯定他参观的工厂是申新厂。

^③ 赵,第159页。这里是14支纱。

箱到处都是……经受着风吹雨打，特别是在上海的冬天和夏天更为严重。”^①

在把棉纱安装到织布机之前，必须经过几项准备性工序。首先，要把棉纱分成两类：经线（决定着织物长度的线）和纬线（与经线垂直，并上下交织的线）。从细纱间纺出的纱能用来作纬线，只是需要把纱安装在织布机一侧的圆形架上。不过，用来作经线的纱线在安装到织布机上纺织前，必须被缠绕、整经、浆纱后，卷到织布机上。首先，由于一个线轴上的线太短不能用做经线，所以必须把许多线轴上的线接起来，形成一条长达 2.7 万尺的连续的线。在经纱间，这些棉纱被缠绕到比一般筒管大得多的圆锥上。这一部门的女工负责换取筒管，接断头，并把缠好的线锥放进板条箱里。同时，她们也必须仔细观察，去除棉纱上的结和小疙瘩，不然在织布的过程中，会引起损坏。

男工把装有线锥的板条箱搬到相邻的整经间，在这间又大又通风的房间里，一侧是几排堆满 9 或 18 个线锥的架子。房屋中间没有机器设备，线锥上的线被拉向房间的另一侧，拉紧的线形成密集的网一直横穿房间。在房间的另一侧，是装有经轴的架子，线缠绕在大的圆柱体上。整经女工首先把线穿过架子前方的向导，将线头缠绕在经轴上，然后踩动踏板使圆柱运转起来。她时不时要停下来接上断头。当经轴满了时，就会有一个男工帮她抬起沉甸甸的线轴，放到手推车上，然后推到隔壁又热又潮湿的浆纱间。

浆纱——将微黄泛白的淀粉浆上到经线上，使其变得更加结实，以能够承受住织布机的摩擦和拉拽。在这一部门工作的男工属于工厂里技术最高和工资最高的工人群体。首先，根据所需经线的数量，把一定数量的线轴固定在浆纱机前方的架子上。譬如，如果最终确定的经线数是 2000 根，那么就需要四轴经线（每轴 500 根）相匹配。

^① 莫泽，第 69 页。

线轴被安装好后，一个工人就会转动手柄使热浆溶液流进机器槽中。当纱线绕出线轴，经过溶液时，槽底部的蒸气阀使液体保持沸腾。当纱线从溶液中探出头时，两个滚轴把多余的液体压榨出去。然后，看管机器的工人必须触摸热纱线，以判断纱线是否已吸收了足够的浆。纱线经由两个旋转的靠蒸气加热的圆筒间烘干。最后，烘干的纱线缠绕到浆纱机另一头工作台上的织布轴上。

织布前进一步的操作是：绘图和设计布的样式。在相当安静和明亮的房间里有七八台架子。每一台架子的一侧放置一个织布轴，女工则坐在架子的另一侧，她用一根细长的金属钩把线头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在她与织布轴之间架子上的一系列金属箝上。这是相当细致的活，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当女工完成一个织布轴后，大约是一两千根线，整个架子就会被送到织布间，安装到织布机上。

“织布间的景象相当有趣……对于参观者而言，机器设备的隆隆声大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然而，对于忙碌的操作人员来说，则几乎感觉不到。每台织布机上梭的穿梭频率通常是每分钟 200 次。”^①织布间大约有 1200 架织机。年轻的“换梭女孩儿”(battery girls)在织布间跑来跑去，取下用完的纬线轴换上新的。每个织工仅工作两年后就能熟练掌握要领，需要同时照看数台织布机。工作时，织工可以坐在窄窄的木凳上，所以，织布适合年长缠足的女工。只要纬线断了，织工就停止机器，重新穿好梭子——带着纬线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然后再开启机器。织成的布被卷到另一轴。车床工都是经过培训的男工，调试和维修机器设备。只要用完一个织布轴，车床工就会换上新的。

织好的布轴被送往验收间，女工们检验布是否有缺陷。在成包部，男工们将布轴成包，运往仓库。申新一厂生产的棉纱以人钟牌商标在市场上出售。

^① 皮克，第 85—86 页。

工人的性别分布

申新厂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男女工分离：在一些部门男工占多数，在另一些部门女工占多数，甚至就是在男女工都有的车间，根据所做工作的不同，工人们也有严格的分工。譬如，在粗纱间，男工负责移纱筒，女工则负责看管机器。然而，这一关于男女工的劳动分工原则不是绝对的。在上海的不同工厂，男女工的分工原则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男女工的劳动分工反映了每一种工作对力量、灵活性和技能的需要，这就影响了三类工人（男工、女工、童工）的供给以及劳动力价格。每一部门的工资不相同，即使是不同部门中做相同工作的工人的工资也不相同。

关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工人的构成，我们知之甚少。许多管理者和工人回顾说，工厂工人最初主要是男工和童工。当 1915 年申新一厂开工运营时，细纱间的大多数工人是 10 岁的小男孩儿和少量的小女孩儿。^① 1908 年发表的一个日本人的调查评论提到，在那个时代能见到女工是比较困难的，许多女性缠足，她们不适合工厂的工作，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人们必须忍受长时间的不间断地工作。^② 一个工厂管理者回忆说，另一个问题是传统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如果女性到工厂工作，人们认为会带来坏运气。在工厂工作的女性被人们瞧不起”^③。

1920 年 5 月《新青年》的劳动专刊，首次发表了关于不同部门劳动性别分工的调查。尽管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每一部门的男工、女工和童工的人数，但他们的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概貌。我们发现在一些工厂里，很显然，这些工作——清花，梳棉，成包，浆纱，穿经——是男工的领地。在整个工厂，男工维修机器，加油，清扫，运棉、纱、布。其他部门，诸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 1 卷，第 132 页。

② 《中国经济全书》，第 107 页。

③ 对方贤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 年 12 月 15 日。

如细纱间、粗纱间、织布间，既有男工又有女工。没有哪个部门只用女工。^①大量的工人(尽管这一调查没有给出具体的比例)是童工。

在接下来的30年间，这一模式发生了改变，雇用女工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那些被认为对于女性要求过高的工作到了20世纪40年代则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劳动分工的变化差不多通常是具体政治环境的结果，诸如工人运动；或者是经济上的制约，诸如由于经济萧条导致的经济约束。

工人性别分布的变化首先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紧随始于1922年一直持续到1927年政变的一连串罢工潮而来。那时，工厂管理者开始强调女工的优点不是偶然的。在20世纪20年代曾帮助指导向雇用更多女工转变的一个工程师，回忆说：“由于男工经常发生纠纷，争吵和罢工时时有发生。女工则相对稳定。”^②在此期间，女工在两个最大的部门——细纱间和粗纱间——成为了主力。管理者并不怀疑女工能够轻松地在细纱间工作。细纱间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具有灵活性，如接头。相对较困难的是让女工进入粗纱间。女工取代男工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进行。20世纪20年代前，女工被雇用从事操作粗纱机的工作，不过男工继续操作捻纱机和二道粗纱机。然而，大约从1922年起，工厂管理者开始雇用女工操作粗纱间的前两台机器。由于这一工作被认为又脏又艰苦，许多工厂发现本地女性不愿从事该工作，他们不得不改从农村招募女性来做。(见第三章)

最初从事这些工作的男工不愿放弃他们的工作。那时在内外棉五厂工作的一个男工还记得，日本管理者过来同男工们谈话说：“‘我们工厂就要倒闭了，不能再继续运营了。我们打算给你们一些钱，你们可以去寻找其他的谋生之路’他们对我们说。正如他们所说，他们一个接一

^① 《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第4—9页。

^② 对何志光(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6月26日。

个的解雇了我们，然后招募女性来做我们原来的工作。”^①1925年2月，在内外和同兴厂都贴了布告，宣布粗纱间的大量男工被解雇。工人们组织起来抗议，2月底，上海日商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

也许这次罢工和仅三个月后的五卅运动大罢工使管理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像他们所预想的那么容易地就把男工给清理掉。两个以前的工厂管理者回忆说：“由于五卅运动，你不能那么明显地用女工来替代男工。你不得不等待空缺的出现。然后，你可以用女性来补充空缺，这样逐渐地取代男工。这项工作花费了几年时间。”^②到20世纪20年代末，从并条到粗纱、细纱和摇纱，大多数机器操作工都换成了女工。（见表3）

在这一时期雇用的许多“妇女”实际上是年龄不超过十二三岁的女孩儿，一些甚至更小。与成年男工相比，她们被认为既容易管理，劳动力又廉价。一位管理者回忆说：“最初工厂的大多数助手是童工。”

童工的工资非常低，不过，他们的效率也非常低，所以，雇用童工实际上是不值得的。工人的效率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因此大约在1924年后我们就不再使用童工了。例如，在细纱间，最初我们主要用小女孩儿作落纱工。但是过后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如果我们用年龄大些的女孩儿，她们工作更快些，所以我们不得不雇用更多年龄较大的女孩儿。这样我们开始尽量用20岁左右的女孩儿。接头工也一样。^③

尽管工厂主有这样的意愿，但是一直到1949年，工厂里仍有相当数量的童工。然而，1937年后他们在工人中的作用开始降低。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期间，劳动分工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①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② 对普陀区工商联会工厂退休管理者的采访，上海，1980年11月5日。

③ 对何志光的采访。1929年后，尽管法律规定雇用10岁以下工人违法，许多工厂隐瞒工人的年龄规避法律。正如某观察家在1930年说的那样：“相对于墨守成规方面，禁用童工的法律在打破常规方面更受人推崇。”莫泽，第68页。

棉纱厂的工厂主们被迫缩小经营规模,经常不得不在某一时期关闭厂房。为此,他们寻找一切可能的办法降低生产成本。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雇用女性来做以前男性做的一些工作。

表3 所选上海工厂的劳工之性别分布,1929年

部 门	男 工		女 工		童 工		总 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纺 纱							
清花间	824	97	26	3	0	0	850
梳棉间							
钢丝	216	100	0	0	0	0	216
梳棉	417	88	56	12	0	0	473
其他	163	100	0	0	0	0	163
粗纱间							
男工头/女工头	65	23	220	77	0	0	285
牵伸	11	1	2046	99	0	0	2057
粗纱	66	1	5138	97	89	2	5293
其他	373	79	6	1	92	20	471
细纱间							
男工头/女工头	48	15	273	85	0	0	321
接头工	7	0.1	9330	98.9	101	1	9438
落纱工	180	32	0	0	388	68	568
其他	491	78	35	5	105	17	631
摇纱间							
女工头	0	0	289	100	0	0	289
摇纱工	0	0	9199	100	0	0	9199
其他	334	71	136	29	0	0	470
成包间							
称重	62	100	0	0	0	0	62
成包	416	99	4	1	0	0	420
其他	65	64	37	36	0	0	102

续 表

部 门	男 工		女 工		童 工		总 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拣花间	77	10	610	80	76	10	763
机械间							
修理工	263	100	0	0	0	0	1780
机工	789	91	0	0	25	9	288
铁匠	913	100	0	0	0	0	789
小工	911	68	169	12	285	20	1365
织布							
整经间							
男工头/女工头	7	47	8	53	0	0	15
整经	70	18	328	82	0	0	398
卷经	48	8	268	43	314	49	630
浆纱	65	100	0	0	0	0	65
卷纬	0	0	1200	100	0	0	1200
穿经	0	0	190	100	0	0	190
其他	188	57	108	33	31	10	327
织布间							
男工头/女工头	47	26	131	74	0	0	178
织布	910	16	4827	84	0	0	5737
其他	57	100	0	0	0	0	57
整理和机械间							
整理	412	80	54	10	49	10	515
机工,铁匠	497	100	0	0	0	0	497
小工	257	95	14	5	0	0	271
总计	10116	22	34702	75	1555	3	46373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局:《劳工工资和时间,大上海,1929》,上海,1929年。第98—102,106—109页。

20世纪30年代前,被雇佣的女性所从事的大多数工作要求有耐心、视力好、手指灵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女性所特有的品质。20世纪30

年代中期,分派给女性的工作出现了不同的种类。女性第一次被要求从事需要一定体力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被认为是男性做的。在大多数工厂里,这就意味着女性开始在成包间工作,并且她们在梳棉间接替了钢丝工的工作。一位管理者回忆说:“大概在1930年,我们当中的一些管理者开始研究如何提高女工数量,降低男工数量。可能大约在1933年,打小包装的工作就换成了女性来做。钢丝工也开始用女性。由于清花太难,因此依旧用男性。随着事态的发展,女性在棉纱厂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最耗体力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也是由女性来做的。曾在杨树浦英商怡和棉纱厂工作过的一位女工写道:“大多数日工男工已经被解雇,这些男工以前是挑沉重货物的。现在女工不得不做这些工作。在车间里你会看到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儿挑着许多棉花和棉纱(这些以前是由成年男工来挑的)。”^②不过,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技术工作诸如机器修理,仍是男工的领地。

这些变化并不经常会导致女工总数的增加。不过,甚至在某一工厂里女工的绝对数减少了,但其相对数是增加的。1932年和1936年间,在申新九厂,女工比例从76.2%上升到82.2%,女工总数则下降了。(见表4)

表4 大萧条期间上海申新第九棉纺厂女工比例

年份	男工人数	女工人数	总人数	女工比例
1932	1263	4039	5302	76.2
1933	1187	3629	4816	75.4
1934	877	3944	4821	81.8
1935	782	3652	4434	82.4
1936	851	3928	4779	82.2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上海,1980年),第557页。

① 对何志光的采访。

② “女工讲述棉纱厂的状况”,《中国论坛》,1933年第3卷,第1期,第15页。

在这一期间,女性从事的工作遭遇了工资的急剧下降,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男工的工资实际上却稍有提高。再看申新,我们发现1931年女细纱工每天挣0.432元,到1935年每天则只能挣0.327元,最近由女性接管的钢丝间的工资从1931年的每天0.530元下降到1935年的每天0.447元。* 相对应,男成包工的工资则从1931年的0.557元升到0.689元。电工的工资从0.587元上升到0.708元。这一现象也发生在永安厂。男工占优势的部门,诸如清花间、成包间、维修间工资都提高了;女工占多数的部门,诸如粗纱间和细纱间,工资则大幅度下降了。^①

尽管雇用女工最初是为了省钱,不过也因此带来了额外的收益:她们是可有可无的。在经济不稳定,工厂时常停业期间,管理者相信解雇女工比较容易。“我们在这一期间愿意更多地用女性。”一个管理者回忆说,“如果生产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减少工人人数,解雇女工则相对容易些。我们很少解雇男工。一般来说,女性不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②这一逻辑引起《纺纱周刊》一个编辑的回应,他固执己见地认为:“我们工厂减少工作量和失业没有真正的直接关系,因为我们大多数工人是工作不到两年的年轻女工。”^③

工人的最终转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48年,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的大部分工厂里,女工人数大概占工人总人数的80%。在一些工厂里,清花间和梳棉间里的女工和男工的人数一样多。实际上,粗纱间、细纱间以及成包间的工人都是女工。在织布间,浆纱是唯一一项仍有男工来从事的工作。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的区分与男

* 1931年1元人民币相当于0.30美元。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639页,《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231。可以说这一分工建立在技术水平基础上的,但是尽管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从事很低技术含量工作的男工的工资降低了,但降幅仍比女工小得多。在申新,清花间男工的工资仅下降了1.2%,然而在细纱间工作的那些人的工资则下降了24.3%。

② 对吴赞婷(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1月22日。

③ “防止减工与失业问题”,《纺纱周刊》1934年第4卷,第24期,第615页。

工工作和女工工作几乎是完全相对应的,几乎所有留在工厂里的男工从事着需要高技术的工作:他们是技术工、机器维修工和电工。女工则从事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她们是机器操作工。^①

棉纱厂工人最重要的区分就是男工和女工间的区分。不过,无论何时,工人中的女工绝不是一个统一的或同质的群体。年龄和婚姻状况将女工群体区分开来——12岁的女孩儿同20多岁的已婚和有孩子的妇女一起工作。而且,在同一工厂里,根据她们的地域来源,不同群体的女工通常吃不同的食物,穿不同风格的服装,相互说着不能为其他群体所理解的方言。对女工来源的考察以及这些区分的影响将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厂概况》;“上海第十二纺织厂劳工福利社概况”,《纺织染工程》,1946年第8卷,第2期,第47—48页;“介绍上海纺建第二纺织厂”,《纺建》,1948年第1卷,第7期,第23—24页;“永安各厂概论”,《纺织周刊》1948年第9卷,4期,第51—56页。

第三章 工人的来源

1907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一个干事报道:“阶级差别伴随着工厂女工,也伴随着她的其他姐妹们。”^①对于当代观察家而言,很显然,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没有典型的棉纱厂女工。这里既有非常贫穷的女性,她们住在茅草棚里,吃的主要是被丢弃在街上的蔬菜,穿的是破烂的棉衣;又有时髦女郎,她们穿着高跟靴子,拿她们挣的工资的一部分烫发、买化妆品和首饰。换句话说,在经济上一些女工比其他女工更富裕。

这些经济上的不同通常反映了地域来源的不同。尽管在棉纱厂工作的大多数女工或者来自上海老城厢或者来自近郊的江苏和浙江农村,她们的籍贯对她们在上海的经历(无论是厂内的还是厂外的)起着决定性影响。

地域来源

在关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女工来源的调查中,大多

^① 克拉丽莎·斯宾塞(Clarissa Spenser):“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工厂的女人们”,1907年。
(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数女工的原籍在这一地理区域内：北至淮河，西至大运河，南至杭州湾的南岸。工厂女工的来源有三个典型的区域：上海老城厢或郊区；城市近郊的江南农村和城镇，诸如无锡、常州以及苏北的农村；从南部的南通到北部的阜宁。^①（见地图 3）由于地域来源是上海女工彼此认同或彼此区分的主要参照之一，因此简要地——察看这三个主要的区域是很重要的。女性不同的乡村经历有助于解释她们在工厂里的不同经历以及她们彼此间的关系。

上海

谈及本地女工，她们既不生活在市中心的金融区，也不生活在奢华的西方人居住区，甚或也不生活在中国城。确切地说，她们生活在第一家棉纱厂所在的郊区。20 世纪的前 20 年间，后来成为工厂区的杨树浦、小沙渡和闸北一带的区域同繁忙的金融区半个世纪前的情景一样都不发达：在村庄里，到处都是耕地，长满杂草的金字塔似的小土丘——坟墓——通常是四处可见。^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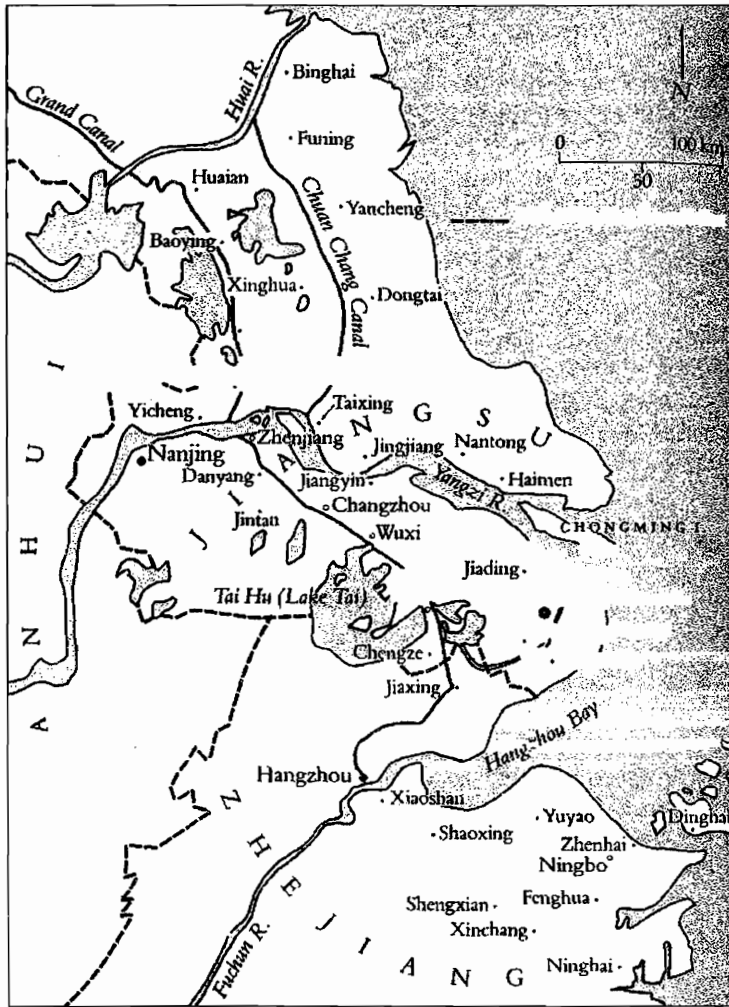
譬如，在工厂兴建前，杨树浦的居民是农民，他们主要种植水稻、冬小麦和棉花。拉姆森在研究这一地区的工业化时，发现只有一小部分“强壮和结实”的女性做农活。除了做家务外，诸如烧饭、缝制衣服和鞋子，大多数女性主要的工作是做手工艺活：纺纱和织布。拉姆森指出：“所做的活慢，产出也少。”^③

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这些村庄的大多数女性已经不再做手工艺活了，而是进了新近建的工厂。当 1930 年拉姆森调查杨树浦的四个村庄时，发现 15—19 岁年龄段的女孩儿共 26 人，全部在工厂工作；20—24

① 宇高(Udaka)，第 329 页；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Minami Manshu)，第 2—3 页。

② 高梅韦尔，第 14—15 页。

③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 1060 页。



地图3 江苏省和浙江省

Grand canal 大运河, Huai R. 淮河, Fuchun R. 富春江, Yangzi R. 扬子江, Chuanchang canal 申场运河, Binhai 滨海, Funing 阜宁, Dongtai 东台, Nantong 南通, Haimen 海门, Chongmingi 崇明, Baoshan 宝山, Wusong 吴淞, Chuansha 川沙, Nanhui 南汇, Fengxian 奉贤, Hangzhou bay 杭州湾, Dinghai 定海, Xiaoshan 萧山, Shaoxing 绍兴, Yuyao 余姚, Zhenhai 镇海, Ningbo 宁波, Shengxian 嵊县, Fenghua 奉化, Xinchang 新昌, Ninghai 宁海, Hangzhou 杭州, Jiaxing 嘉兴, Chengze 盛泽, Tai hu 太湖, Suzhou 苏州, Songjiang 淞江, Shanghai 上海, Jiading 嘉定, Wuxi 无锡, Chnagzhou 常州, Jiantan 金坛, Jianguyin 江阴, Danyang 丹阳, Nanjing 南京, Jingjiang 靖江, Zhenjiang 镇江, Yicheng 仪征, Yaixing 泰兴, Yangzhou 扬州, Yaizhou 泰州, Gaoyou 高邮, Xinghua 兴化, Baoying 宝应, Huaian 淮安, Anhui 安徽, Zhejiang 浙江, Jiangsu 江苏

岁年龄段的女孩共 23 人,其中有 21 人在工厂工作。^① 一个原因是这些女孩儿原先制作的手工艺品市场需求量逐渐下降。因为工厂制作的产品取代了家庭制作的产品,女性们失业了。民国时期,川沙县(与杨树浦相邻)的县志记载了 1927 年的情况:

妇女的副业是编结花边和织毛巾。与织布相似:30 年前织布特别普遍,但现在却已很少见。10 年前,编结花边和织毛巾较普遍。在那时,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儿编结花边每天能挣三四角钱(十角是一元)。现在她们一天只能挣一角钱。因此,除了繁忙的农活时节外,在秋冬季,女性们没有活计可干。……所以,她们就进入西方人的棉纱厂,成了女工。^②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村庄的女性而言,最赚钱的选择是能到工厂工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女性在工厂工作赚的钱是她从事传统手工劳动赚的钱的两倍。拉姆森比较了女性所从事的职业,每年的平均收入如下:工厂工人一年能挣 180.95 元;农民 160.51 元;女裁缝 103.20 元;手工业者 96 元;女算命先生和女医生 60 元。^③

由于她们生活在工厂区,当她们开始在工厂工作时,她们就不需要再搬迁了。尽管她们居住的村庄距工厂有 5 里远,她们却步行或坐独轮车上下班。

除了上海郊区农民家庭的女性外,“本土”工人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她们的家早在 19 世纪晚期就已移居上海。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的许多老百姓为了逃荒,同时希望家中的男劳力能够在上海迅速扩张的商业区找到做苦力的活计。许多家庭全家生活在棚户区的草房里或住在运送他们到上海的船上。高梅韦尔在她 1916 年访问上海期间注意到:“中国

①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 1032 页。

② 中国科学院,第 2 卷,第 421 页。

③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 1034 页。

外滩的显著特征是其船上的居民。”

半尺长的小船被称做舢板，由一个低矮的拱形竹板罩子保护着。小船们依次停泊在岸边，一直朝黄浦江延伸而去。每一艘舢板上都挤满了人，就像一座蚂蚁山，住户是永久居民，他们已经扎根定居在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是来自北方的逃荒饥民，大多数男人们靠做码头苦力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妻子则靠用碎布纳鞋底，以及为那些没有家庭的苦力缝补旧衣服，来增加一些收入补贴家用。固定在木桩的木板将小船和岸连接起来，形成人行小道。蹒跚学步的小孩子在狭窄的木板小路上乱跑着，然而却很少掉进水里或稀泥里。出生、结婚及葬礼使船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通常，两三个空棺材摆放在码头以应付突发事件，同时，特别是当女性织补时，也被用做凳子。^①

这些船民居住区不仅限于辽阔的黄浦江。类似的船民聚集区还有蜿蜒穿越上海的苏州河沿岸和一直向北延伸，在虹口和杨树浦间形成河界的虹口河沿岸。总之，只要有水路的地方，就有船民。

当棉纺织工业开始逐渐增加对女工的需求量时，一些逃难的女性在工厂里寻找工作。1929年，拉姆森曾拜访过的在棉纱厂工作的两个女工都住在“水上小屋”里。^② 1937年，当邓裕志采访数百个工厂女工时，她发现相当多的棉纱厂女工是船民。^③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本地人的另外一个群体开始在工厂里工作：第一代上海工人阶级的女儿。1924年的中国年鉴宣告了城市无产阶级的诞生：“一些人赌博输掉了他们的积蓄，不能返回家乡。一些人为了自由，为了享受夜生活和为了享受更多文化和娱乐的机会，拒绝离开城市去过枯燥无味的务农生活。因此，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就成了永久

① 高梅韦尔，第43页。

② 拉姆森：“中国工人住房问题”，第149页。

③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88页。

的城市劳动者。毫无疑问,随着中国日益工业化,工人数量也在增加。”^①

然而,尽管人们在计算棉纱厂工人时,会把上海周边的女性农民、住在小船上或草棚里移民家庭的女性,以及城市工人的女儿都计算在内,不过上海的女性通常是女工中的少数。^②部分原因在于单靠本地工人不能满足迅速增加的工厂生产的需要。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工厂管理者的态度,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公开表扬从乡村招募来的女性的优点。发表在华商纱厂主联合会期刊的一篇文章提到,“大多数本地女工有家庭,因此,她们把她们的的工作看成‘辅助性工作’,她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由于婚丧嫁娶,她们经常请假,这就降低了工作效率。所以,外来女工比本地女工更好些。”^③大多数工厂女工来自江南和苏北的农村。

江南

从江南城市如无锡、常州周边农村移民而来的女性,来自中国最富饶的农业地区之一。那里土壤肥沃、气温相对暖和、气候湿润、灌溉技术良好,使得种植二茬稻成为可能。近扬子江南岸的地区生产棉花,因此,自明朝起,这一区域已以中国最著名的丝绸之乡之一而著称。^④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的调查表明:女性不是农业生产的主劳力,不过,她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在太湖一带,她们养蚕织丝。在其他地区,她们纺线织布、编芦苇、造草纸或养母鸡下蛋。^⑤正如前面提到的,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乡村家庭手工业的下降引起大量的农村女性往其他地区迁移。对于女性而言,如范小凤,手工业的下降与移民具有很

① 伍德赫德(Woodhead),1924年,第656页。

② 根据工厂的统计数据,上海女工的比例从未超过15%,通常更低。参见宇高,第329页;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Minami manshu),第2—3页;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二三纺织厂概况》和《上海第六纺织厂概况》。

③ 张方佐(译音):“纱厂干部改革与局部整理之我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26年第7卷,第3期。

④ 盖伦和特威切特(Geelen and Twitchett),第41页;克雷塞斯(Cressey),第295—300页。

⑤ 徐方干、汪茂遂:“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期,第83页。也参见焦、汤普逊和陈。

直接的关系。她回顾她 1932 年离开家乡的情形：

我来自江苏省的武进县，靠近无锡。在那里我们养蚕。每年大约在春节前后我们要养蚕宝宝。我们养蚕以补贴家用。我们在我的屋里养蚕，每个人都会参与。后来，当丝开始进口时，我们的市场被进口丝破坏了，靠卖蚕不能挣钱了。没有那些钱，我们就不能安然度日。因此我的父母想方设法送我们几个孩子去工作。^①

范小凤去了上海的一家棉纱厂工作，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成了工会的积极分子。

开弦弓的事例清楚地解释了引起来自农村经济的女性迁移的力量。开弦弓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研究的一个产丝的乡村。该村靠近震泽县，地处太湖东南约 6 里、大运河西约 8 里，在苏州—嘉兴铁道线上。在开弦弓，大约 90% 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农民在其余的土地上种小麦、葡萄、各种蔬菜以及桑树（为蚕提供食物）。^②

费孝通看到那里的女人身着长裙，这就表明在这一区域女性不下田干活。男人从事耕种，女人则负责料理家务和缫丝。^③ 通过询问家庭日常生活预算，他发现女性缫丝的收入几乎不能被看做是补充或次要的，事实上这一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没有女性这部分收入，这一地区的农户家庭将不能维持生计。

费孝通估算一个家庭一年大约需要 200 元维持其基本消费。一般农民家庭一年的水稻收入是 51 蒲式耳，除去家庭消费掉 42 蒲式耳外，他们会把剩余的 9 蒲式耳出售，卖得 22 元。^④ 那么剩余的 178 元有多少

① 对范小凤的采访，北京，1980 年 12 月 6 日。

② 除了特别指出外，以下关于开弦弓的论述建立在费研究的基础上，第 12—16 页。

③ 同上，第 170—171 页。

④ 他的这一计算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在正常条件下他们每年一亩地能产 6 蒲式耳稻子，每蒲式耳稻子能卖 2.5 元。这一计算是针对有地农民。佃农不得不向地主缴纳 20 蒲式耳的稻子作为租金，因此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同上，第 202—203 页。

是通过丝生产获得的呢？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丝产业繁荣时，费孝通计算一般家庭靠生产生丝一年能挣 250 元。^① 因此，根据他的计算，女性工作收入所得对于满足消费而言本应是绰绰有余。“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写道，“生活水平要比上面给定的预期的最低生活标准高得多。村民有足够的钱花费在……各种文娱和礼节性活动上。”^②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在开弦弓附近的丝业急剧衰落。首先，工业化缩小了手工纺丝和织丝的市场。其次，1934 年日本取代了美国丝的市场，实际上就破坏了中国丝的出口。^③ 这些事件对农村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到 1935 年土丝的价格已从每两（1.8 盎司）1 元跌到大约每两 33 分。因此，尽管每家同过去一样生产同等数量的丝，但他们仅挣 45 元。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结果是许多女性——昔日家庭里主要的“养家糊口的人”——失业了。

目前，丝业的衰落打乱了传统协调的经济活动。缫丝工业被现代工厂接收后，农业田的大小仍然同过去一样。由工业变化而剩下的女性劳动力不能为这种小块农田所吸收。这种失调的情况可以从女性在村里闲暇时间较多这一情形中观察到，也可以见之于女性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高度流动性。^④

1936 年，费孝通组织调查，他在调查中发现，在 16—25 岁的女青年共有 106 个，80% 已在开弦弓外的工厂里工作。^⑤

丝业的衰落好像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女性离乡外出工作的原因，并且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她们常把她们的丈夫或父亲留在土地

① 土丝最高价格是每两一块多钱，一般每户能产 250 两。因此，他们大概能挣 300 块钱。除去 50 块钱的成本，他们能挣 250 块钱。

② 同上，第 202 页。

③ 关于这一影响以及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丝绸贸易影响的讨论，参见刘大春（音译）：《上海缫丝工业》。

④ 费孝通，第 170—171 页。

⑤ 同上，第 97 页。

上。女性的工作已成为多余。由于农业仍旧正常运作,男性没有理由离开土地。但是,当女性们离开家乡,她们去哪里呢?一些人被她们家乡附近的工厂招募为工人或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建在无锡和附近的震泽镇的当代缫丝厂能够为一些女性提供工作职位。但是,由于更有效率的机械化生产,工厂并不像手工艺生产那样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费孝通发现以前能够吸纳 350 个农村女性的工作,现在在震泽的工厂里则只需要 70 个女性,将近 300 个开弦弓的女性找不到工作。

一些女性迁移到无锡。20 世纪 20 年代末无锡已成为工业中心——有近 50 家靠蒸汽发动机发动的缫丝厂、5 家面粉厂、9 家棉纱厂、18 家炼油厂和 1 家肥皂厂。和在上海一样,缫丝厂和棉纱厂主要依靠女工。至少,迁移到上海工厂工作的一些女性曾在无锡工厂开始她们的职业。正如在“无锡两姐妹”的故事里所叙述的那样(这个故事刊载在 1928 年的《北华捷报》上),较高的工资前景刺激着一些人沿海迁移。

有两姐妹在无锡的一家工厂里工作。姐姐 24 岁,一个月挣 15 元;妹妹 17 岁,挣的略少一些。一个叫常的无锡妇女现在住在上海,她回无锡的家乡探望,认识了这两个女孩子。她告诉她们,上海工厂的烟囱多得就像树林一样,如果她们愿意来到这块乐土,每月就会轻松地挣到 40 元。^①

除了高工资外,女性从无锡迁往上海也是因为上海工厂能够为她们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工作。^②

乡村手工业的衰落和本地工厂提供的有限机会可能也是女性从无

^①《北华捷报》,1928 年 11 月 3 日。

^②用工人来源的资料来说明女工来源方面并不很准确。资料中涉及到来自无锡的工人可能来自无锡的若干小村庄,抑或他们可能来自无锡市。但这些资料并不包括从事较高级职业的工人。因此来自无锡的工人可能是在乡村工作的缫丝工,在城镇工作的佣人,甚或是无锡某工厂的工人。为了弄清楚江南城市的女性迁往上海的原因和模式,需要对这一地域的工业工人和乡村工人作更为广泛的研究。

锡迁移到上海的原因,不过两城市间社会与经济的联系同样重要。首先,无锡是荣氏家族的家乡,荣氏家族拥有上海最大的华商棉纱厂集团和最大的面粉厂。当荣氏兄弟荣德生和荣宗敬在上海开设他们的第一家棉纱厂时,他们依靠他们的家族关系网招揽核心行政领导人员和技术人员。例如,当1914年兴建申新一厂时,荣氏兄弟从无锡雇佣了一个总经理,这一总经理又从无锡和常州附近的乡村里招募了一批男技工。一些女工头也来自无锡。^①工头们在决定雇用什么人上起着主要作用,她们难免会把机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甚至在非荣氏家族的工厂里,许多管理者和工程师也来自无锡或常州。^②这些人是工厂的技术人员或管理者,他们到上海工作,就为农村工人提供了重要的联系。进一步而言,1908年南京——上海铁路线的建成,促进了人们在城市间的持续流动,如在无锡、常州和上海。无论是工人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很可能在春节和其他节假日期间,以及因婚礼或葬礼等活动返回他们的家乡。

苏北

照字面上翻译,苏北是指扬子江以北的江苏境内的区域,包括从江边的海门和南通到江苏省北端的徐州和连云港。不过,通常这一地理术语是指并不广泛的地区,即沿淮河向南延伸至扬州和泰州南部,西临大运河,东临大海的一片平原。即便是对这一区域的多变地形和经济略有了解的人也会禁不住要问,怎么会把这一区域归入同一个名称下呢?就其主要城市的名称而言,盐城表明在北部的这块区域是围海造地形成的,这块小小的土地出产盐和饲养猪。由于当地人们的主食是面食而不是米饭,因此上海本地人把他们看做北方人。在这片土地的内陆地区,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119页。

^②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概况》,第124—28页。

即串场运河西部,不是盐碱地,因此能够种植棉花。仍进一步向西、向南延伸到扬州和泰州,是被许许多多湖和湿地隔开的大陆,因此,这片湿地适合种植水稻。扬州,位于苏北西南角,是苏北唯一一座规模适中的城市。扬州作为大运河上扬子江贸易的转运点,从7世纪—11世纪,一直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城市之一。之后,尽管扬州仍一直是江苏大盐商之乡,但其重要性逐渐下降。^①(见地图3)

由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要概括女性在苏北乡村经济中的作用是徒劳的。主要以产盐为生的家庭中的女性,当然与那些以种稻米和棉花为生的家庭中的女性不同。不过,来自苏北不同区域的女性有些共同的经历,这就把她们与江南农村的女性或上海的女性区分开来。首先,尽管来自扬州的女性口音不同于来自盐城的女性,但是这两种方言都是由苏北方言演变而来的,苏北方言完全不同于江南人的吴系方言。

其次,几乎来自江南乡村的所有女性都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但是,在苏北除了泰兴周边的地区外(该地区有一些棉纺纱和纺织业),家庭手工业并不普遍。看起来好像苏北女性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泰州和扬州,一个女人曾回顾:俗语说,“种庄稼,收庄稼,女人必须劳动在前;吃鱼、吃肉女人必须享受在后”^②。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描写过1930年代苏北女性,其中有一人(她本人就是苏北本地人)提到:“在给庄稼灌溉和施肥的季节,女人们肩挑七八十磅的粪便在田间如飞般跑来跑去。”^③女性也有责任饲养猪,收割麦子,插秧,划船。总而言之,看起来,女性除了做家务外,还要做几乎男性做的所有工作。^④

最后,苏北移民模式是非常不同于江南模式。正如上面所描述过的,在苏北,当女性在本地的手工业中再也找不到工作时,就会有大批

^① 盖伦和特威切特(Geelen and Twitchett)。

^② 对陈招弟的采访,上海,1981年4月11日。

^③ 曹辉:“江北妇女生活概况”,《女声》,1934年第2卷,第10期,第10—11页。

^④ 同上,同时也参见王南屏,第614—615页。

女性留下家人只身一人移往外地。确切地说,当一些女性从苏北移民时,她们把她们的家人留在家中。上海的包工头经常招募来自扬州和泰州周边地区的十几岁女孩儿。一些女性听说棉纱厂有大量的雇佣机会,她们就会只身一人跑到上海来。一份报纸报道了两个来自泰州的小女孩儿的故事。她们都是住在未来婆家的“童养媳”,劝说她们未来的公婆让她们一起来上海。报纸报道说:“她们已经看到她们那么多的朋友和街坊邻居,一个接一个地都去了上海,在棉纱厂找到工作了,她们也想去。”^①

然而,大多数女性并不是独身一人离开苏北乡村到工厂里碰运气或暂时挣钱补贴家用。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一起永久性地离开乡村。部分原因是因为苏北与上海之间的距离遥远。例如,从盐城到上海坐轮渡要用四天的时间。但是,人们离开苏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洪水、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破坏了他们的庄稼。在1911年、1921年和1931年,苏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在1931年发洪水期间,大运河和淮河肆虐的洪水将61.4百万亩(9.8百万英亩;1亩等于0.16英亩)农田淹没在20英尺深的水中。苏北300多万家庭因洪水而遭受饥荒,无家可归。在这样的背景下,男人和女人一样都特别需要迁移,通常整个家庭移居到上海。^②

尽管乡村贫困是苏北人持续移居外地的背景,但仅是贫穷并不能完全解释苏北移民模式。例如,为什么迁移的女性趋向于来自一些农村,而不是来自于其他至少是一样贫穷的农村。兰德尔(Randail Stross)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来自六合的移民——苏北贫困区中最贫困的区域。^③同理,他们的贫困也不能解释他们选择移民上海的原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迁移到上海。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许多季节性移民,从一

^①《申报》,1930年1月4日。

^{②③}“1931年间中国的洪灾”,《中国经济》,1932年第10卷,第4期,第344页。关于民国时期江苏自然灾害的广泛论述,参见兰德尔(Stross)。

个村庄迁移到另外一个村庄。1921年的一个报道估算,每年冬天,来自苏北的4000—5000个贫困农民去镇江周边地区寻找干农活的机会;当春耕一到,他们会返回河的北部他们的家乡。^①在1930年代中期,每年冬天大约有5万个来自兴化的家庭到河的南部。同时,来自宝应和盐城的农民前往六合为季节性的收获队工作。^②其他人则去了小工业中心,诸如无锡(如在上海一样),他们是无技术劳工的主要来源。^③

来自苏北的移民和那些来自江南的移民一样,社会联系好像是构成人们移往城市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苏北乡村和上海间的社会联系与江南乡村和上海的社会联系非常不同。尽管无锡输出资本家,他们对上海工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宁波向上海输出银行家;但传统意义上苏北输出的主要是贫穷的农民。

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苏北移民占了上海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为了逃避饥荒,大量的苏北人被允许到上海乞讨。1865年10月的《北华捷报》报道:“他们来自这个省的北部,那里遭遇了大规模的蝗灾,地方主要官员给老百姓分发了通行证——说明他们迁移的原因,证明他们具有良好品质,声明他们是好人,但身体虚弱。”^④在上海,这些难民以及之后几年来的那些难民,都加入了乞丐、苦力和棚户居民行列。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上海的大多数人力车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约有10万男性从事人力车夫的工作)和来自苏北的工厂女工都来自同一个村庄:东台、盐城、阜宁、高邮和泰县。^⑤当工厂扩充和招收女工时,这些农民就来到了上海。他们很可能在上海有来自同乡的朋友、亲戚或熟人,这些人已成为上海的前一代移民中的一部分。

①《海关十年一度的报告,1912—1921》(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1912—1921,)第1卷,第386页;转引自中国科学院,第2卷,第639页。

② 兰德尔,第43页。

③ 村松(Muramatsu)发现在地租的账簿里,已经迁离苏北的佃农经常被称做移民。

④ 《北华捷报》,1865年10月4日。转引自裴宜理(Perry),第53页。

⑤ 朱邦兴等,第596页。

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因此,大多数女工来自上海、江南和苏北这三地。甚至当她们来到上海后,她们继续保持着家乡的吃、穿、说话的风格和方式。所以,你能够据此立即判断出她们是无锡人还是扬州人等等。陈招弟解释说:“所有的人都有她们自己的风俗习惯。”

苏北人喜欢穿红色和颜色鲜艳的衣服。来自无锡、常州和同州的人,她们自己有织布机,因此,她们穿她们为自己织的衣服,她们用小方巾包头,也穿长袍。来自南通的人也喜欢穿长袍。来自扬州的人喜欢装饰头发,她们喜欢盘发髻。来自常州和无锡的人喜欢带发夹。

宁波人喜欢吃海鲜。她们甚至不剔除鳞片,不蒸熟就吃。我们上海人不喜欢这样吃。上海人喜欢较咸的食物。安徽人喜欢吃较烫的食物,山东人则喜欢就着很多蒜吃肉菜。^①

来自某一地区的女性无论在棉厂内还是在棉厂外,她们的面部特征和风俗习惯,以及从事的职业都显示出其独特性。

上海每一类劳动力市场几乎都被来自某一乡村区域的人们所占据。正如先前提到过的,人力车夫来自苏北某些乡村。大多数保姆来自绍兴和常州,铜匠来自宁波,澡堂侍者来自扬州。苏北人占据着棉纱工业,宁波人在卷烟厂任职,上海本地人在编织厂工作,来自常州和无锡的工人几乎垄断了棉纱厂,来自浙江农村的工人占据着丝织。^②

如果说有某种单一因素将来自某个地区某个经济部门的人群区分开,那就是上海的社会图景强化了扬子江以南和以北乡村已有的基本差

①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② 《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唐海,第123页。

异。来自苏北贫困区的工人在上海一直从事着工资最低、最累和最脏的工作。从外国使馆在上海设立起,上海开始成长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和港口,苏北移民从事着其他人不愿从事的苦力工作。绝大多数男性不是人力车夫就是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或码头工人,一些人是收粪工或拾荒者。一些来自扬州的人作理发师傅,上海本地人瞧不起这一行当。^①

无论是来自江南还是苏北的雇工,根据籍贯而进行的劳动分工也很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上。地域分层如何体现在女性身上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倡妓这一行。倡妓的最高阶层被称做长三——这一个字来源于顾客付给陪他饮酒的人三元钱——她们住在富丽堂皇的妓院里,只招待上海最富有的商人和官员。她们大部分来自江南。相比之下,来自苏北的女孩儿中有许多人是被骗子从家乡拐买来的,她们处在倡妓业的最底层,被称作野鸡。通常她们在一年长妇女的带领下,出没在上海红灯区(靠近福州路和西藏路的交叉口地带)的街道上拉客。^②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间工业飞速发展,许多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不过,总的来说,苏北人并没有构成工业工人的重要部分。当苏北移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工厂找工作时,他们能找到的几乎都是那些被认为不体面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在卷烟业特别明显:尽管大多数工人来自宁波,来自苏北的工人的比例非常小,但大多数非技术工是那些来自苏北的工人,他们仅仅是被临时雇用。^③ 在缫丝厂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1920年代后期,苏北女性从事最糟糕的工作这一阶层划分,使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邓裕志感到非常震惊。她描述了其参观某一缫丝厂的情景,她写道:

我们走到走廊的正中,进入右手边通往绞丝部的门……这一部门的工人看起来要比其他部门的工人更幸福,她们穿着很好的衣

① 金源(音译):“江北人在上海”,《女声》,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10—11页。

② 屠,第3部分,第76—77页;也参见觉。

③ SSKJY:《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74页。

服,看起来好像来自较殷实的家庭。她们一天只工作六七个小时,一天却挣七角钱,这是工人最高的工资。我从其他女孩儿那里得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管理人员或行政人员的亲戚朋友。在这里你验证了中国家庭的理念——自己的家人是第一位的。

然后我们来到剥茧部和选茧部,这两个部门共用一间房,中间用格子架隔板隔开。他们只要擦干净窗户的话,房间内会更明亮……从部门领导那里得知,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大多数工人来自扬子江北部的农村……这些部门的工作不需要太多技术,工资也相对比其他部门低——最高 50 分钱,初学者仅挣 12 分钱——因此,很自然,这些部门的工人主要是这些北方人(苏北女性)……她们愿意接受低工资。

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些北方女性既粗俗又脏,没有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志气。”^①

在丝业同在卷烟业一样,苏北工人是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工人来自浙江。实际上,看起来只有在棉纱厂大部分女工来自苏北乡村。

根据棉纱厂每一部门女性来源的信息,对苏北人从事的工作类型与江南人从事的工作类型作出绝对性的区分是不够的。不过可以对分派给苏北女性的工作作出大概的描述:通常来自北方的女性,被认为既强壮又结实,习惯于污垢,被分配到最艰苦和最脏的车间工作。她们经常从事在工业化早期由男工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上海本地人或江南女工都不愿意做的。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女性最初被雇用在摇纱间、细纱间和织布间工作时,那些来自苏北的人更有可能被分配到摇纱间。因为在女性所从事的所有工作中,摇纱不仅工资低,而且最难做。李次山(《新青年》的作者)在 1920 年调查上海的工业状况时注意到:“由于来自江北(苏北)妇

^① 邓裕志,第 9—12 页。

女的体质比当地人强壮些,所以多在摇纱间工作。”^①对一家内外棉厂的工厂女工抽取的样本证实了这一印象。在1920年和1930年期间进厂的59个来自苏北乡村的女性中,有34个女性是从摇纱部开始工作的。^②

苏北女性明显占优势的另一项工作是制作粗纱,正如在第二章所阐述的,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制作粗纱的前两个阶段由男性从事,仅第三个阶段由女性从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时期,制作粗纱的前两个阶段,女性开始取代男性。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被雇用从事这一工作,具体是指苏北女性。“这是因为上海本地人不愿从事这一工作”,一个工厂工程师解释说,“这里的工资不一定是最低的,但是工作却是很艰苦。在粗纱部里,到处粉尘飞扬,空气不清洁。由于工作艰苦,苏北人更善于从事这一工作。”^③

另一方面,非苏北来的女性集中在织布间。甚至到1946年,在进入上海第十四厂的江南和上海的女性中,有2/3以上的人是从织布间开始工作的。总的来说,纺织工作需要较高的技术,相应地工资也较高。^④而且,许多从织布间开始工作的江南女性最终成了工厂的工头,甚或是秘书或记录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进厂的女性,有极少数受过一年的学校教育,那些受过一年教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无锡、常州或上海。^⑤

因此,尽管来自江南、苏北和上海的女性可能同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但她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工厂并不是一个大熔炉,在不同部门工作的工人,在工作期间很少相互来往,这种分离状态也同样延伸到工厂以外

①《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第9页。

②退休卡,棉纱厂A(之后均引自退休卡)。这些退休卡是工人们在退休时填写的,不过这只是在1949年后才开始的。因此,解放前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没有退休卡,只有那些1949年后仍继续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才有退休卡。

③对何志光的采访。

④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四纺织厂1946年年度报告》,第63—65页。

⑤退休卡。

她们的生活中。一般说来,苏北人住在棚户区。对无论是小沙渡、曹家渡还是杨树浦这些棚户区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居民来自苏北。来自苏北的工人很少有人搬进邻近的江南移民居住的区域。^①

相互隔离仅是来自江南女性和苏北女性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偏见、歧视和敌意是其他方面。语言反映了江南女性对苏北女性的态度。“江苏北部的人”有两个称谓:苏北人和 kompo nin(苏北人的上海发音)。如果不是没礼貌的话,“苏北人”则被认为是一个中性词。不过,他们更经常地是被称为 kompo nin。无论他们实际上是否来自苏北, kompo nin 被认为(现在仍这样认为)是对人的侮辱。一个讲上海话的人如果想更尖刻地辱骂人时,可能骂其是 kompo zhuhluo(苏北猪猡)。

对穿着的态度也同样生动地体现了对来自苏北女性的歧视。由于江南较繁荣,并且江南女性可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拥有高工资的工作,所以她们看起来非常不同于苏北女性。这一点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奇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主要研究上海工人的作家们注意到,“在工厂外,工人的穿着各式各样”。

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是比较有点知识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穿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棉外套,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完全像读书的学生一样,特别是江南女工欢喜这样打扮。^②

大多数来自江南乡村的女性穿着不一定都那样华丽。不过即使那些不穿长衫、披羊毛大衣、别自来水笔的女性,她们也倾向于用“大方的”蓝色、黑色或灰色的布料做服装。在上海的苏北女性身着大红和绿色的衣服,脚穿粉色袜子和各种颜色的绣花鞋。那些见多识广的南方人认为这样的穿着很丑。当然,她们的态度不能单纯地归因于审美方面的考

^① 拉姆森:“中国工人住房问题”,第 147 页。

^② 朱邦兴等,第 81—82 页。

虑:对于江南女性而言,鲜艳的颜色是与同她们一起工作的苏北女性相对贫穷和落后相联系的。一个女性回忆道:“甚至到今天,如果你买了一件红色的衣服,人们会说:‘那看起来像江北人,太丑了!’”^①

有时,言语辱骂升级为身体攻击。不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下工等轮渡时,一个宁波女工把在上工时同她发生过争吵的苏北籍工友推进了上海纵横交错的众多运河中的一条。^② 苏北女性并不经常遭到这样的人身攻击。一个南通女工夸口说:“我们苏北人真正知道如何制造麻烦。”然后,她回忆起,有一天早上一个苏北人把一桶粪便倒到正往工厂走的一个上海女工的头上。^③

来自不同区域的女工间的敌对情绪,可以理解为是所有在上海的工人在地区竞争中产生的大量问题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所谓的上海派、安徽派、江北派以及宁波派间发生的街头闹事经常出现。^④

这种竞争不是简单地指来自某一区域的工人同另一区域的工人间的斗争。具体来说是指另一层含义,即来自贫困地区的工人同来自富裕地区工人间的竞争。无论在中国、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现象在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中看起来都较普遍。尽管到工厂工作的苏北女性不是来自外国的移民,但是,不管怎样,她们在棉纺工业中的作用与19世纪中叶马萨诸塞的卢维尔(Lowell)棉纱厂爱尔兰移民的作用类似。历史学家杜白琳(Thomas Dublin)在他关于卢维尔女工的研究中,描述的美国北方人与爱尔兰移民间的关系与上海的江南女性与苏北女性间的关系特别相似。像苏北的女性一样,来卢维尔工厂工作的移民是为了逃避爱尔兰的饥饿,爱尔兰人生活在不同的街区,不同的穿着,说不同的语言。

^① 对徐淑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2年10月18日。

^② 《申报》,1924年5月6日。

^③ 对徐淑梅的采访。

^④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第123页;也参见梁(Leung)

在工厂里她们集中在很不理想的车间。哈雷文(Tamara Hareven)发现,在19世纪曼彻斯特的棉纱厂里,遭饥饿侵袭的魁北克人和本地工人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①

这些区分不需要建立在跨越国界的基础上。19世纪末,在某一日本纱厂工作的一个女工,在她日记里记述了来自城市有“教养”的女性和来自贫困落后山村女性之间的敌意。她写到:“这些女孩儿都来自日本。”

来自静冈(shizuoka)的女性是将军家前任家臣的女儿,她们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说东京话,是有魅力的女孩子……来自这些地区如小诸(komoro)、饭山(iiyama)、岩村田藩(iwamurata)和须坂藩(susaka)的这些女孩儿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总的来说,来自城市的人有宜人的外貌。当我这样说时可能激怒了一些人,但是,就是到了现在,来自山区和乡村的人也没有进步。来自山区和乡村的人们言谈举止有些粗俗,城市女孩儿要比她们优雅得多。^②

如同在上海称某人“苏北佬”指他既穷又脏一样,在那家日本工厂称某人为shinshu指他不聪明、举止不当。如果在这些事例中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人瞧不起那些来自贫穷、经常受灾地区的工人。

在20世纪的上海,帝国主义政治进一步强化了工厂女工间的对立。苏北女性愿意在日商工厂工作,甚至在日商工厂工作被认为是不爱国时,她们仍旧如此。在一些情形下,这与其说是她们的选择,不如说是华商工厂喜欢江南工人的结果。正如曾在华商工厂工作过的一个工厂工程师说的那样:“在棉纱厂,我们尽可能地用本地工人。为什么呢?这很难说。如果你说苏北人不是好工人——这不友好。这只是某种社会态

^① 见杜白琳;也见哈雷文(Hareven)。

^② 和田英(Wada),第24—25页。

度。本地人更容易交流,更容易应付。苏北人则较难应付……也许这是一个历史问题。”^①

尽管存在着这种偏好,不过一些苏北女性也成功地在华商工厂找到了工作。她们通常靠改变她们的着装来隐瞒她们籍贯的方法在华商工厂找到工作。通常这样掩饰是她们在上海最初求职方式的一部分:先前来到上海的那些人已告诫她们,当她们求职时她们将会面临着歧视,并且也教给了她们如何来避开这一问题。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社会工作者终于明白了已困扰她一段时间的现象。她知道她们的家庭财政状况,所以她不能理解一些苏北女性是怎样如此迅速地得到时髦的上海服装的。来自苏北乡村的一个女孩儿解释说,已经答应把她介绍到一家华商工厂工作的一个同乡朋友告诫新来者说:“你不能看起来活像土包子那样到工厂去。首先,你须先理个发,做一件长旗袍。你必须买一双新鞋。把裤子弄短一些,袜子长一些。要不然管理者会讨厌你的。”^②

尽管中国管理者对本地女性有显而易见的偏爱,但他们并不能经常决定谁能得到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正如之后将要讨论的,大多数女性经人介绍进了申新一厂。工作的分配除了依赖管理政策和偏好外,至少也同样依赖被雇佣女工间的社会关系网。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苏北女性喜欢到日本工厂工作是有意义。^③由于1932年工厂关闭,许多工人丢掉了工作,当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中国职员正在帮助棉纱厂失业的工人们找工作时,她发现大多数来自苏北的女性不愿意在华商工厂工作。“很多人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他们认为苏北人根本没有良知,是中国人民的汉奸,”她写到,“但是如果你进一步探寻她们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去我们自己人办的工厂工作,或者更好的是,如果你曾经有帮她们在华商工厂找工作的经历,你就绝不会继

① 对何志光的采访。

② 钟。

③ 日商厂和中商厂工作环境的不同将在第七章充分论述。

续谴责她们。”^①当她陪来自苏北的女性去华商工厂时，她发现管理者几乎不掩饰他们的感受。来自苏北女性那令人信服的话语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人像对待上海人那样对待我们（苏北人）。他们拿我们当人待。每天我们上工时他们向我们点头打招呼，并对我们微笑。但是在中国工厂里，他们只把我们看做废物，他们咒骂苏北人是多么的可恶！”^②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职员继续回顾说：

坦率地说，我们对待苏北人的残忍表现与帝国主义对待我们苦力的方式没什么不同，与美国人对待黑人奴隶的方式没什么不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侵略，我们反对美国人使用黑人奴隶。但是我们对待苏北人——我们自己的同胞——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而且，我们经常谴责苏北人不爱国。但是，我们经常歧视他们、打击他们就是爱国吗？如果我们谈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最好从爱我们的同胞开始吧！^③

在30年代，随着抗日情绪的加强，对苏北人的蔑视也加强了。尽管没有迹象表明来自江南或上海的大多数工人为了反抗日本人在上海的迫害而放弃他们在日本工厂的工作，但南方人认为苏北人是汉奸，因为他们继续为日本人工作。一个记者惊呼：“他们的行为像汉奸。”与日本人合作的谴责增强了本地人对苏北工友的蔑视。

换句话说，政治环境使得来自不同区域的工人间的分化在上海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江南工人与苏北工人的分化阻碍了工厂女工间团结的发展，这就帮助了管理者设法控制工人运动。然而，没有证据证明工人间的分化是有意识管理策略的产物。为了理解来自不同区域的工人间的分化是怎样在工厂内部存留下去的，我们必须观察女性是怎样得到工作的？

^{①②③} 雨枝：“关于上海的失业工人”，《女青年月刊》，1932年第11卷，第4期，第45页。雨枝可能是邓裕志的笔名。

第四章 建立关系

不管厂方的政策如何,关系是雇佣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工厂已经确立了招聘和雇佣工人的程序,但管理者并不能经常执行这些程序。

20世纪30年代中期,唐海对工人状况的调查描述了三种招募制度:英国招募制度、中国招募制度、日本招募制度。在英国公司中,诸如大型的怡和厂,买办雇佣工头,工头雇佣工人、发放工资。中国招募制度实质上与之相同,工头招募工人,不过买办、管理者以及工头都不给工人发工资。^①

根据唐海的调查,日本工厂也曾使用过工头制,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事部取代了工头制。人事部根据技术雇用工人。^②他们曾把一批中国女工送往日本学习生产技术,之后不久,为了培训新人设立了养成工计划。

雇佣权

由于日本人最大的野心是试图在战前贯彻实施正式的招募和培训

^① 唐海,第97页。也参见大不列颠外交部(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第20—21页。

^② 唐海,第98页。

制度,所以考察其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自1922年起,许多日商工厂,如日华、大康和内外,都设立了养成工计划。这一制度正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招募十几岁的小女孩儿,在工房里为她们提供食宿,然后让她们在车间里接受培训。1922年当大康建第二家工厂时,工厂代理人招贴布告,如下:

第二厂建成了。粗纱间和摇纱间需要3000名有工作经验的工人和无技术的女工。工人待遇好,并给予免费的职业培训。

工厂向不同城市都派出了招募代理人,那些有意应聘的人应抓住这次机会……

应聘者不得小于13岁。她们须测试身高、体重和视力。身高不得低于四尺三寸。那些长相难看或性情暴烈、粗鄙的人;那些聋哑或沮丧的人;那些缠足的人;以及那些已被其他工厂雇用的人,都不符合招聘条件。一旦被工厂录用,试用期为两周。^①

至少在形式上,日本人有合理的雇佣程序:任何人都有申请工作的自由,只有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才会被录用。但是,在实践中,实施这一制度并非易事。在雇用什么样的工人问题上,中国的工头们经常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尽管用广告、招募代理人和人事部招聘工人,但实际上,工头控制着雇佣制度,他们拒绝放弃这一权力。1926年3月的日商日华棉纱厂的罢工就说明了这一状况。依据《北华捷报》编辑的观点,这场罢工“起因于在雇佣工人问题上,工人们强迫管理者听从他们的建议”^②。报纸报道了引起罢工的一系列事件:2月中旬,九个女工被谴责为麻烦制造者,被摇纱间解雇。当那一部门的女工头推荐雇用某一女工来填补其中的一个空缺时,遭到人事部的拒绝。人事部称尽管该女工以前曾在华商工厂工

^① 宇高,第98—99页。

^② 《北华捷报》,1926年3月6日。

作,但她从来没在日华厂工作过,因此没有真实可信的工作记录。女工头并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坚持要人事部雇用她推荐的人。《北华捷报》的编辑评论说:“实际上,男女工头们靠许诺给工人们雇佣机会的方式,从他们那里收取‘介绍费’,为了得到这一工作已付出了代价的工人们希望得到这一工作,要不然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在这种情形下,非同寻常的是工人们将支持女工头!”

当管理者提议雇用另一个候选人时,本已紧张的形势演变成一种危机。但管理者仍拒绝雇用摇纱间女工头推荐的那个女工,而是接受了清花间女工头推荐的一个养成工。《北华捷报》报道,“只要这个养成工走进摇纱间,那一车间的女工头就会挑起可怕的争吵。她把筒管扔得到处都是,向她的人大声斥责让他们离开。罢工在继续……他们来到工厂院子里,制造一种看起来是刚开始罢工示威的情形。闸北巡捕房以及戈登路站的急救队被召集来了……秩序迅即得到恢复,这一地区被封锁。现在这一工厂的3000名工人走出去参加罢工了。”^①

雇佣纠纷导致几千名工人宣布罢工并不常见。不过,在日商工厂、华商工厂和英商工厂里,女工头们认为决定谁应该在她的车间里工作是她们的权力。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对于女工而言,通过拿摩温的关系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是惯例,而不是例外。1925年一家最大的日本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靠拿摩温介绍进厂的女工为64.3%,正式招募进厂的女工占32.8%,独自申请得到工作的女工占2.9%。^{*}并且只要女工头们能够从买工作的工人那里得到贿赂,补充她们的一般工资收入,她们就不愿

^①《北华捷报》,1926年3月6日。

^{*} 宇高:《中国劳工问题》,第329页。在雇佣权上车间工头和人事部的冲突不是上海所独有的。哈雷文在关于曼切斯特新汉普郡(New Hampshire)棉纱厂的研究中发现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形:“工头们在雇用和解雇工人方面的传统自治和工人们自己在找工作或换工作上对亲戚朋友的习惯性依赖”阻碍了新成立的招聘办公室把雇佣权集中在手的尝试。哈雷文:《家庭时代和工业时代》,第42页。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同工头争夺雇佣权这一问题在纳尔逊(Nelson)的著作中也得到讨论。

让人事部夺取雇佣权。

建立关系

正如一个女工所说的,经人介绍找到一份工作通常意味着“人托人,一直到找到认识拿摩温的人”^①。有时只需要问一下她的亲戚朋友是不是知道哪里在招工。一个女工回顾说:“当我母亲想让我们姐妹开始工作时,她托过去和她一起工作的工友帮忙安排。那时,如果你想为你的孩子找工作,你不得不托亲戚或熟人。他们会帮忙看一下他们工作的地方是否有工作岗位。”^②有时找工作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包括迂回曲折的关系。一个妇女说:“我如何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呢?我三妹在杭州的一家棉纱厂工作。她的拿摩温帮她在上海的大丰棉纱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家日商工厂。我经常去看我妹妹,逐渐认识了那里的拿摩温和工头。工头认识申新九厂的工头,就把我介绍到那里工作。”^③

通常差不多是靠亲戚或同乡的社会关系网来建立起这些关系。由于来自某一乡村的人们倾向于生活在工人生活区的同一弄堂和小巷里,所以向她在上海的新街坊寻求帮助的女性常常是延续地缘纽带,而不是建立新的关系。然而,有时为了寻求被引见给拿摩温的机会,逐渐形成了新的关系网。例如,一个女性经基督教女青年会识字学校同班同学的引见,在永安厂的织布间找到了一份工作。^④

有些女性不能找到亲戚、朋友或熟人帮她们找工作。最终,她们不得不求助于地痞恶霸,他们汇聚在工人街区,希望能够靠“找关系”的生

① 对徐红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4月23日。

② 对顾莲英(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4月24日。

③ 对何宇珍的采访,上海,1981年5月6日。

④ 对顾莲英的采访。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是少数几个把来自不同地方的女性聚在一起的机构之一。在学校里,江南、苏北和上海的女性不仅在一个班,而且一起参加讨论、外出、集会、唱歌跳舞。

意来挣钱。一个妇女回忆说：“如果你不能找到人来为你介绍工作，你可以找地痞恶棍，他们和工厂里的工头有关系。你不得不付给他们5元钱。”为了支付这笔钱，有些人不得不借钱。^①

靠陌生人作中间人来找工作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对于离家前就希望能找到关系的农村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一些胆儿大的犯罪分子借口为乡村女性找工作将她们诱骗到上海来，当她们一到上海就把她们卖给了妓院。无锡两姐妹的遭遇说明了这一脆弱性。这两姐妹根本没像她们的介绍人所承诺的那样到工厂工作。她劝说两姐妹放弃在无锡工厂的工作，把她们带到上海，对她们另有企图。《北华捷报》讲述了她们的遭遇：

女孩儿们来到上海，常女士把她们安顿在她与她的爱人在白克路（译者注：现在的凤阳路）的房子里。她们到后的第三天，常女士要姐姐和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女孩儿很高兴能出去走走看看。大约1小时后，她们就回家了。姐姐发现她的妹妹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去哪了。不过他们都让姐姐确信，如果一个人在上海走丢就像海底里的针，再也不可能找到了。女孩儿的心几乎要碎了。她趴在床上痛哭起来。她难过了一天一夜。当她睡着后，他们把一个男人带进她的房间，她不能摆脱他。

第二天她仍为她妹妹难过。一些怜悯她的近邻告诉她，她妹妹被常的爱人卖到离这不远的一户人家去了。他们建议她去巡捕房寻求帮助……她听取了他们的建议，警察立即逮捕了常女士和她的爱人以及监视女孩的男人。警察从他们那里得知妹妹的去向后，来到女孩儿被卖的地方，逮捕了买女孩儿的妇女。

重新团聚的两姐妹被送进了一所孤儿院。这个案件得到了审理，常和她的爱人被关进了监狱。那个买女孩儿的妇女请求说，她

^① 对上海第二棉纺厂退休女工的采访，1980年10月25日。

买女孩儿没有恶意,他只是想给儿子找个媳妇,她想让女孩儿作她的儿媳妇。法官接受了她的辩词,给她警告处分。两个女孩儿被护送回了无锡老家。^①

在类似的一个案件中,结局更具代表性。在一艘泰州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一个男乘客对两个离家想在上海工厂里找工作的小女孩儿很友善。女孩儿们听说他是永安棉纱厂的厨师,能帮她们在那里找到工作,就同他一起到了他的工厂宿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向她们保证说他正在和工头联系,然而,实际上他已把她们买作童养媳了。^②

讨好拿摩温

对于那些在设法联系到拿摩温的过程中没有误入歧途的人来说,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仅是找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拿摩温同意。劝说拿摩温为被介绍人找工作,常常需要给她送礼。礼物通常是食物或酒:鸡蛋、火腿、红酒;如果要找工作的人的家在上海郊区务农的话,可能会送些新鲜物产。钱很少被用做酬劳。一个妇女讲述了她第一次见棉纱厂拿摩温的情形:

当我开始工作时,我不得不给女工头送各种各样的礼物。曾经和我母亲一起工作的人告诉她工头的住处。当得知工头的住处后,我母亲……借钱买东西作为给工头的礼物。我们自己把礼物送到工头家里。

第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去的,这样工头能够见见我。女工头家离我家不远……她的工资相对高一些,所以她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些。不过,她不富有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她比我母亲年龄大些。

我穿了件较好的衣服,因为如果女工头见我衣服很破,她不愿

^①《北华捷报》,1930年11月3日。

^②《申报》,1930年1月4日。

意要我。起初她说我太小不想雇用我。我母亲说我们实在是太穷了,日子很难维持下去。不过她仍不同意。后来,我母亲又去看了她一次,并给她带去了更多的东西,这次她答应了。^①

得到工头同意后,通常剩下的一道难关就是要通过工厂的身高测试。担心太矮的小女孩用各种方法来增加身高。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脚底下垫东西。一个工人说:“我母亲害怕他们嫌我矮,那么她怎么做呢?她在我的鞋跟下粘上木块,这样我就变得高些了。他们就雇用我了。”^②

得到女工头的同意后,并且也满足了身高的要求,她们就开始工作了。由于实际上工头享有雇用和解雇权,决定工人一天内操作机器台数的权力,甚至决定着高质量棉线的分配,讨好她很重要。因此,工人给工头送礼不会随着其被雇用而结束。工头的生日、春节以及其他节假日,工人们都会给她送礼。相应的,她们得到了稳定的工作。一些女工为了巩固同工头的关系,她们就要拜工头为“干娘”。女工拜工头为“干娘”是指望能得到全面的保护。当然她也期待能送给她干娘礼物。^③

拜保护人并不是女工所独有的:男工拜师傅。1925年,一位记者参观申新一厂时,男工拜师傅的仪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清花间里,在靠近一面墙边,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块一尺长、三寸宽的木板。板的两端各竖着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中间是一支盛着几根香的铁杯。两个看起来20岁出头的小伙子点着香,朝墙连鞠了三躬,最后,在一位较年长的男工面前磕了三个头。^④工厂里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工人与她们的干娘或他们的师傅建立了忠诚与义务的关系,阻碍了工人在他们共同处境基础上彼此团结的发展。

①② 对顾莲英的采访。

③ 对徐淑梅、朱发女(音译)的采访,上海,1982年10月11日;对席佩玉(音译)的采访,上海,1982年9月20日。

④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139页。

女性为自己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后,她们常常会偷偷地把自己的女儿或朋友带进工厂,让她们偷学找工作所必备的技术。一个妇女讲述的她 1918 年进厂的故事就具有代表性。她回忆说:“当我最初在工厂工作时,我是偷偷进来的。”

我用我表姐的工牌进厂。我表姐则只需告诉他们她的工号。由于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他们认识她。我上夜班,那时只有两个门警值班。只要工头一来到我们的车间,我就跑到洗手间里藏起来……一周后新工人测试就要开始了。我不得不给工头送礼,我送去从家乡带来的糯米和一只小鸡。这些是从家乡来的朋友给我带到上海来的。^①

工头不论什么时候巡视车间,只要那些溜进来学习技术的女孩儿藏起来,管理者不会知道工厂里有这些非正式的员工。只有拿摩温知道。对于拿摩温来说,允许女工带亲戚朋友来学技术是有好处的,也是特别有收益的。在她的监管下获得技术的那些人将加入到对她心怀感激的女工行列来,她指望能从她们那里得到礼物。正如马瑞斯(Morris David Morris)在对孟买棉纱厂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孟买棉纱厂里经纪人的作用和上海拿摩温的作用类似。只要工头索取贿赂,那么尽可能监管更多工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由于工人休假需要朋友来替班。所以,工人休假越多,经纪人得到的贿金就越多。^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吃香的工人不一定是最有技术的工人,而是能给拿摩温送最可心礼物的工人。车间里都是贿赂过拿摩温的工人,因此,她们都与拿摩温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厂管理者在控制工厂招募和职工培训过程中取得巨大进展,这一现象才消失。

^① 对朱发女的采访。

^② 马瑞斯,第 135—136 页。

养成工：创造一个新的阶层

那些曾留学日本、英国或美国学习纺织生产和工业管理的工厂管理者，希望在上海的工厂实施现代招募和培训制度，养成工招工机构代表着他们的这一雄心壮志。一些工厂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设法建立了这一制度。工头们对这种干预他们雇佣权的制度很不满，尽管管理者并没有因工头们的反对而放弃，但这一权力经常被青帮篡夺。^①（见第五章）

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要离开上海的确切消息为工厂管理者控制新工厂招募权提供了机会。首先，日本的大型工厂企业被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中国管理者和工程师接替了以前由日本人担任的行政职位。其次，由于许多工厂已经停工，生产能力非常有限，或者在战争期间移到内地，上海工人的规模已急剧缩小。所以，当1945年冬，工厂重新开工时，他们不得不招募大量的新工人。

在怎样安排工作问题上，老工人和新管理者没有达成协议。当几千名老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复工时，工厂主被迫妥协，允许他们填充空职位。不过，华商工厂和那些被国民党官僚接管的企业建立了招收养成工的机构，用来雇用和培训新工人。尽管从表面上看，招募养成工是为了培训当代技术工，但管理者关于养成工制度的公开阐释，几乎没有掩盖他们希望借助养成工计划来控制日益升级的工人运动的真正目的。调查上海棉纺六厂的一个编辑抱怨说，在战争期间，工人们已被敌人的许多“恶俗”侵蚀。结果是一些人

不遵守纪律不负责任。通过在考试的基础上招收工人，然后增加严格的培训和管理，我们就能够创造明天的有礼貌、健

^① 对较早尝试这一制度的叙述，见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336页；《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91页。

康、精神纯洁、有责任心、守纪律的现代工人。这将在工厂里创造新氛围和新力量,使恶人感到羞愧,使无知的人去学习,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这将为我们创造伟大的工业,有利于我们国家的重建。^①

由于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工厂罢工发生在这次调查的时间内,看起来被描述为怀有恶习、犯错误或不守纪律的大多数工人实际上是工会的积极分子。

为了招募养成工,工厂管理者用了一些他们过去曾经使用过的相同的方法,诸如贴布告和联系亲戚。某华商工厂的管理者回忆,他写信给他仍生活在浙江的亲戚,告诉他们,他所在的工厂需要工人,并说明了招募条件。“我告诉他们,我们喜欢小学毕业生,不过,实际上如果他们有关系——如果他们是管理者的亲戚或朋友——那么他们即使没有小学毕业也可以招收。”^②

工人的招募并不都来自管理者的家乡:来自江南的工人和来自苏北的工人一样多。^③然而,如果强调必须识字,则被招募者,不管是来自江南还是来自苏北,都不可能是最贫穷农民的女儿。一个老工人回忆说:“所有的养成工都受过一些教育。他们不是来自农村最贫穷的家庭,而是来自中农家庭。一些人来自苏北——来自苏北的这一部分人已被解放,她们最初家境较好,现在穷了,所以她们离开了家。”^④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是否如这个工人所说的那样,在共产主义者建立解放区后开展的土改运动和较富裕农民的迁移有关系。

战争期间,农村经济的破坏可能加速了富裕人家的女性迁移到上

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论刊》,第253页。(未还原)

② 对普陀区工商联合会工厂退休管理者的采访。

③ 例如,上海第一厂在招募的第一批102名养成工中,12%来自上海,28%来自盐城,12%来自无锡,12%来自武进。见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概况》,第91页。

④ 对徐红梅的采访。

海,到工厂找工作。在1947年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召开的一个女工会议上,一个叫金宝的养成工说,她来自宁波,她和家人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日本占领宁波后,她的父母被杀害,她家遭破坏。之后她就来到了上海,通过了国民党某一工厂的养成工招募考试。^①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使有较好收入家庭的女性离家的因素仍在继续引起女性离家申请养成工计划,如家庭纠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召开的同一次会议上,另外一个养成工说,在她父亲辱骂老板而失业前,她的家境也很好。由于她母亲不能忍受他已失业的丈夫的脾气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②

养成工计划的准入条件

养成工计划的准入条件建立在考试的基础上,仅有1/10的申请人能通过考试。上海棉纱六厂的考试程序具有代表性。

申请人一早就来到了工厂,在小巷里排成一队,参加第一轮测试。一个考官测量每一个女孩的身高并询问她们的年龄。养成工身高必须在4尺6寸到5尺4寸之间,年龄在15—17岁之间。^③符合这些条件的女性才被允许进厂,由主考官进行文化测试。每一个女孩儿要填一张登记表,并且要大声朗读一篇文章。

然后,每个申请者被给出一系列检测其工作能力的测试。首先是手指灵活性的测试。要求被测试者在一分钟内用一只手把钉子放到放钉子板上的洞里。先测右手,后测左手。接下来测试视力和听力,及身体测试来测定其准确的身高,确保被测试者身体状况良好。最后是面试。通常是由工厂管理者亲自组织。面试是为了解申请者的相关信息:她的家庭状况;找工作的目的;脾气秉性。一个通过这一系列折磨人的测试

^{①②}“我们在工厂”,《妇女》,1947年第3卷,第10期,第17页。

^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概况》。

的妇女记得：“测试要用一整天时间。我早上 8:00 进厂，我们一直考到下午 4:00。”^①

通过第一天考试的养成工在第二天进厂时，就被告之必须提供一张照片和一个担保人。保人“必须要有一个店面。不过，不是任意店都可以。如果是一间不够好的店，则必须是大店。店主要有印章，他要把他的印章印在表格上。通常我们不认识店主本人。我们要通过亲戚朋友找保人。你得给他送礼：红酒或药。”^②保人要填写一份表格，填上他的姓名、籍贯、年龄、与被保人的关系，同时他需粘贴半寸的照片。最后，他必须签署一份担保声明，如果被保人在两年养成工未满期间离开，他要担负经济责任。^③

第三天，当申请人提交完盖有印章的担保书和照片后，主考官再次要求她说出她的姓名、年龄、身高和体重。主考官根据第一天记录的信息核对申请人的回答，以防冒名顶替。^④

培训计划

被招收的养成工将要开始两个月的培训计划：不仅要教授她们具体的技能，还要教授她们从纺织生产到国家政治的各种课程。技能培训在每个车间的具体部门进行，课程则在工厂的教室里讲授。

年轻的养成工逐渐熟悉了一天 10 小时的轮班工作。在最初的两周里，她们每天在车间工作 6 个小时，接下来的四周里，每天工作 8 个小时，最后的两周，每天工作 9 个小时。下工后的时间绝不意味着是自由时间或休息时间。养成工们不得不去听关于安全生产、工厂纪律和健康方面的课程。她们被教授怎样写日记，怎样写信，被指导学习数学和思想品德课。厂长助理一周一次或两次来参观这些班级，并为养成工讲解

①② 对李幼英(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11月20日。

③④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论刊》。

当前时事、人际关系或他们自己的工厂与棉纺工业、国民经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车间里,有经验的工人被委任为指导师傅来指导养成工。从理论上说,这一指导能逐渐提高养成工的准确性和速度,使她们能操作更多的机器。但实际上,有时却与管理者的意图背道而驰。譬如,一个女工抱怨说,被分派来指导养成工的“老手”只是象征性地做这一工作。“我不得不极其小心翼翼地待他们,给他们洗衣服,买东西。如果我表现出一丝不满,他们甚至会打我。不过最糟糕的是他们什么都不教给我们。”^①指导者们也许正在试图破坏养成工制度,或者也许他们只是试图凭着他们指导教师的地位来获取利益。让管理者非常烦恼的是一些最热情的指导教师是共产党,他们特别希望能被分派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他们就能够教育和吸收养成工了。

两个月的培训结束时,养成工必须参加另一次测试。通过测试的养成工被分配从事日常轮班,从此他们必须和其他工人一样轮换上夜工和日工。尽管他们的正式培训已结束,但他们养成工生活需要两年。不管他们家住在哪里,在这两年间,他们必须住在养成工的工房里。以前做过养成工的一个上海工人回忆说:“他们在晚上九点关门。如果你九点后回来,你就进不了门。他们就会联系拿摩温,拿摩温将扣你工资。”^②当养成工从工房到工厂或教室去时,他们被要求排成两队走步进去。他们每周休息一天,在休息日,他们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包括合唱、体育运动;每周三有一次例会,在会上管理者鼓励工人们要献身于工厂的生产事业,使生产蒸蒸日上。

为了补充管理者推行的这一制度,人事部为养成工创建了“自治会”。这一协会由12—15个成员不等的小组组成,每组选出一名小组长

① “我们在工厂”,《妇女》,1947年第3卷,第10期,第17页。

② 对李幼英的采访。

来负责他们的生产业绩。^①

除了生产更有效率,更容易组织工人外,养成工制度吸引管理者的另一个方面是:使用养成工的费用要低于付给技术工的工资。在两个月的培训期间,养成工享有食宿另加4角—6角的补助,而没有真正的工资。之后养成工的补助长到6角—8角,不过要从补助中扣除一定数额作为他们在工厂餐厅的就餐费。最后,两年养成工生活结束后,养成工毕业后可以选择是继续住在工房还是搬出去,这时他们和其他工人一样,挣相同的工资。^②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大多数工厂招募了几百个养成工,但养成工制度并没有完全取代以前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雇佣制度。一位管理者回忆说:“有时拿摩温设法绕过这一官方制度。他们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到工厂里,教他们工作……有些女孩儿不能通过养成工考试,她们就给拿摩温送礼,想方设法通过贿赂进厂工作。1945年这一现象仍然存在。”^③由于她们穿戴着厂方发给她们的漂亮衣帽,相对于那些缺乏经济来源的女工而言,养成工看起来像是一个特权群体。所以说,要进入这一计划,受过教育是必备的条件。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占养成工很大比例的苏北女性现在之所以被她们的工友轻蔑地对待,不是因为她们的贫穷而是因为她们的富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养成工是上海工人精英的代表。管理者的目标是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在那里,管理者可以自由雇用那些能证明自己有资格的人,而不是被迫雇用那些与拿摩温有关系的人。养成工的数量表明了工厂管理者成功控制工人招募和培训的程度。工厂中另一个女工群体——包身工——的出现,则标志着管理者成功的局限性。

①②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论刊》,第263页。

③ 对严可的采访。

第五章 包身工

1930年代初期,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夏衍住在上海的杨树浦。他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正在招收商会成员,当 they 与工人们见面时,他们就顺路到夏衍家更衣,把中式长袍或西服换成蓝色的工人制服。夏衍从这些朋友那里了解到城市棉纱厂里的许多年轻包身女工的生活状况。一般女工只要走出工厂大门,就会有相对的自由。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些女孩儿看起来像包工头的囚徒。包工头们去乡村从十几岁女孩儿的父母那里把她们买回来。伴随着在纸上画“×”或按手印,在一定的年限内女孩被包给包工头,为他们工作。

夏衍被他所听说的包身工制度所震惊,他“相当愤怒,决定揭露这一人间地狱”。当他着手调查包身工的状况时,他也脱去了长袍,换上了工人的服装。他连续几周在一家工厂上夜工。一位年轻女性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她在一家日本工厂工作。她与夏衍一起合作,她在她的车间里设法与包身工聊天、探究她们的招募情况以及她们在上海的生活。因她那么渴望了解包身工的状况,她们中的许多人怀疑她一定是探子,为此拒绝和她聊天。

甚至更令人懊恼的是没法参观包身工的生活区:这里有非常严格的

规章制度,除了“被包工头雇用的日本警卫、哨兵和打手”外,参观者几乎是不被允许进入的。夏衍两次在没被门警察觉前,成功地从门警眼皮底下溜进了工厂,完成了他的调查。1936年,他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写了一部短篇通讯《包身工》,这篇通讯是当代关于包身工制度最详尽的报道。^①

20世纪30年代早期,其他几位作家也试图调查这一制度,不过他们也发现进入这一秘密的环境较困难。邓裕志“不止一次被工人告之包身工制度下的女孩儿是被多么糟糕地对待”,因此,她非常想探知更多有关她们困境的情况。和夏衍一样,她发现看管包身工工房的警察是一个难对付的障碍,不过最后,“通过一连串的私人关系”她设法参观了其中一间包身工工房。即便如此,她不得不把她的头发做一下处理,打扮成老农妇的样子,这样让她看起来像包身工的亲戚。^②

社会学家陈翰笙也曾设法研究包身工制度。1930年他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在上海的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棉纱厂里开展有关包身工制度的调查研究。因为“一些人反对这一工作”,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蔡子民要他取消这一项目。自此,他就不再做这一研究了。陈翰笙放弃这一研究后就离开了上海,他开始着手研究乡村经济,这是他较熟悉的领域。^③

从那时起,尽管包身工的苦难成为了社会改革家要求变革的原因和共产主义组织者团结民众的战斗口号,但没有人试图出版其他任何有关这一制度的新作品。一直到解放后,随着记述解放前城市工人经历的大规模运动兴起,有关包身工制度的著述再度盛行。夏衍的小说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包身工被采访,他们的回忆录被编纂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包身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成为了戏剧的主题和之后电影的主题。在这些流行的描述中,包身工制度被传奇化了。违背人性的包身工制度

① 夏,第42—48页。

② 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第1页。

③ 陈翰笙。

的存在,常常被看做是解放前上海棉纱厂女工的典型经历来描述;被作为外国人统治棉纱工业带来的残暴状况和资本家对工人的非人剥削的例证来引用。

然而,对历史资料的考察表明包身工制度既不能归因于残暴的资本家,也不能归因于帝国主义者。本章通过重构包身工制度及追溯其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并特别关注上海棉纱厂产生这一制度的力量,据此说明实际上包身工制度的产生是上海青帮势力的产物。

“摘桑叶”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摘桑叶”暗指贩卖少女的买卖。干这一行当的人——在那时约有 5000 人——是操控从药、鱼、蔬菜、人粪一直到劳动力等交易的地痞恶霸或土匪的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① 那些“摘桑叶”的人把他们的“货”卖作妓女、奴仆、童养媳或棉纱厂童工。

包工头到乡村招揽生意,买来农家女孩儿,把她们带到上海的棉纱厂工作。这些包工头属于一伙组织严密的集团网,众所周知的是青帮。这一关系网络控制着上海的大部分社会、经济和法律机构。尽管几乎所有的描述都把包工头看做“上海当地的恶霸”,但是他们的社会来源或者说他们怎样成为包工头的过程却鲜为人知。同他们购买的女性一样,大多数包工头可能来源于已到上海工作的农民。^② 一些人发现买卖少女和在上海做苦力比起来,能挣更多的钱。上海法院的一个案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个苦力供认,因为除了提供饭外,一天只挣两毛钱,他习惯于在无锡市的街上徘徊,用糖果或其他美食把小孩子从家里引诱出来。然后把这些小孩子带到上海市场上。”^③ 有些包工头是拿摩温的丈夫或妻子。譬

^① 薛,第 172—174 页。薛提到买卖男童的生意叫做“搬石头”。

^② 例如,见善(音译),第 22—23 页。

^③ 《北华捷报》,1935 年 3 月 20 日。

如，一个妇女的丈夫人称瞎老大——永安棉纱厂的拿摩温，他就是一个包工头，最终她也成了包工头。^①包工头比拿摩温挣的钱要多。较成功的包工头也放高利贷；经营茶楼、浴室和理发铺，他们的外表反映了与他们相对应的财富。一个包工头被这样描绘：“一个30多岁的男子，身着黑色绸子夹克衫和黑色绸子裤子，所有的衬垫都用丝毛做的。他干净、整洁，看起来吃得也不错。”^②

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包身工的籍贯，因为甚至对于工厂管理者而言，包身工制度常常是保密的和模糊的，不可能有开展这一研究的记录。不过，可以对包身工的招募模式作一般性的评论，譬如，包工头没去过哪些地方。许多提供大量女工的区域（见第三章的叙述）不是包身工的来源地。无锡、常州或宁波看起来没有出现包身工；与上海隔河相望的区域，如海门，有过非常少的包身工。在浩瀚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包工头去过以下五个区域的其中一个区域：扬州、泰州、泰兴（都在苏北）、嵊县、新昌（两者都在绍兴区域）。^③这些地区很穷，人们愿意卖掉他们的女儿。不过这些区域不一定是穷的地区。如果贫困和招募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更多的包身工本该来自盐城——阜宁和高邮——兴化一带。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味着决定包身工选择招募区域的是社会联系而不是经济状况。

我们只能猜测这些社会联系。正如大多数当代观察家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假定大多数包工头依附于青帮，那么我们知道得较少的是青帮的来源是否能帮助解释他们走访过的区域。例如，我们知道在晚清绍兴、扬州和泰州是青帮活动的中心，而且，控制着上海绑架勒索的青帮大亨顾竹轩，他本人就是苏北人。^④换句话说，青帮的起源地和社会关系网

① 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87页。

② 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第3页。

③ 夏，第30—32页。也参见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578页；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88—89页；《申报》，1930年5月12日，5月22日。

④ 王和许；科尔（Cole）。

与招募包身工活跃的区域有着紧密的联系。

购买

对包工头来说,购买包身工的第一步是走访他或她的故乡。在那里,包工头寻找十几岁的女孩儿,通常是14—18岁,她们易被诱骗到上海。^①有时包工头在村里贴布告,然后与那些有意向的人签署合同。下面记述了在新昌附近一个农村的妇女是怎样被招募。她回忆说:“1945年,一个包工头来我们村招工人。”

这是第一次有人来村里招工人。之后更多人过来招,不过我是第一批。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来自某一工厂或他从哪里来。我们只知道他正在招工。他也来自浙江,但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村子。他与村办公室的人有联系。他已在镇中心的一面墙上贴了布告。如果你想去应召,就要到布告告诉的地址去报名。我们不识字,我们家族的其他人告诉了我布告的内容。他们说:“你家很困难。你可以报名到上海工作。”^②

不过,更为常见的是包工头同他们的亲戚朋友聊天,了解哪家的家境很困难,然后他会去走访这些家庭。一个来自泰兴的妇女回忆说:“我12岁那年,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宫(音译)的招募者,每天都要到小女孩子家中去,谈论她们在上海生活会有多么多么好!”^③有时童养媳(女孩儿的父母已为她安排好婚姻,然后把她送到她未婚夫家生活)会被她们的公婆卖给包工头。^④(见第七章关于童养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① 1937年,上海工部局调查的27个包身女孩儿的案件中,“当她们开始工作时,大多数(22人)年龄在15—19岁之间,两人在10—16岁之间,三人在19岁以上。”上海工部局,1938年,第41页。夏和《包身工血泪仇》中的口述史证实了这一年龄分布,也参见《包身工的仇恨》。

② 对张晓梅(音译)的采访,1981年2月25日。

③ 《包身工的血泪仇》,第44—45页。

④ 朱和梅等编,第2版,第118页。

包工头向潜在的卖家承诺,她们的女儿每天都会有肉吃,有鱼吃,同其他女孩儿同住一间屋子,有一份工作,有机会学习一门技术,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可以去看上海的高楼大厦、两层楼的公交车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①。

除了把他们的女儿卖给包工头外,父母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小女孩儿能做农活,如饲养牛、猪或除草;或者正如她们的母亲所做的那样,能为街坊邻居洗衣服或为地主料理家务。但很难说其中任一项工作能和在上海做一份挣工资的工作一样挣很多钱。

把小女孩儿卖给包工头,既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也不单单是工业化的结果,反而是一纸契约把女孩儿卖作童养媳、新娘或奴仆传统的延续。格林沃尔德(Sue Gronewold)对中国倡妓问题的评论也可以用到包身工身上:“一个繁荣的妇女市场早已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女性都被看做了商品。”^②换句话说,尽管包工头可能已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新人物,但卖小女孩儿的现象是一个古老和熟知的交易。

只要父母同意卖掉他们的女儿,他们就要签署一份契约,契约写在一张白纸或一小片皱巴巴的纸片或布片上。^③下面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契约:

立自愿书人×××,情由当年家中困难,今将小女×××自愿包与招工员×××名下带至上海棉纱厂工作。凭中言明,包得大洋30元整,以三年期满,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洋十元。

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内,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数照补。期满,招工员不再对女孩承担进一步的责任。

① 夏,第44—45页;《包身工的血泪仇》。

② 格林沃尔德(Gronewold),第37页。

③ 徐行之(音译):“炮火下的包身工”,《战时联合旬刊》,1937年第4期,第140页。

恐后无凭，立此承证。^①

有些契约增加了“禁止将女孩用于不道德之目的”这一条款。孩子的父母亲，通常不会读或写，他们就在契约底部按手印或画×。^②

尽管三年 30 元的酬金看起来是较公平的标准工资，但是根据女孩儿的年龄，契约的条款会有许多变化。通常女孩儿被分成三种类型：老（三年支付 50 元）、中（四年支付 40 元）、青（五年支付 30 元）。^③ 有时双方协商契约条款，就像在市场上买食品讨价还价一样。一位妇女回忆说：“包工头对我母亲说，他想招我，会为我提供衣食，我母亲答应了，她说：‘两年 50 元’包工头讨价说：‘三年 50 元’。”^④ 协商好的价格，叫做家庭补贴，很少会被提前全部支付。正如前面所引述的契约样本所说的那样，通常被分成三份，最初所付金额最小，最后支付金额最大，以确保女孩儿在整个契约期间能持续工作下去。在契约期内，工厂支付给女孩儿的工资归包工头所有。^⑤

对于一直生活在农村或小镇上的十几岁女孩子来说，上海包工头的到来，最终促成契约签署的讨价还价，她离开家和包工头一起去城市，整个过程通常看起来特别迅速。根据张贴在她村子的布告，已报名应招的一位妇女说：“我们报名后没多久，就不得不在一周内离开。在我们离开前，包工头甚至没有考察过我们。他只是带走任何愿意去的人。我们 15 个人一起来了。”^⑥

有些包工头一次只把十来个女孩儿带到上海，有些则一次就招募一

① SSKJY, 荣家, 第 1 卷, 第 581 页。类似的契约见丝米勒(Simine Wang)的复述, 第 18 页。

② 《包身工的仇恨》, 第 39 页。

③ 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 第 88 页。1937 年上海工部局在其研究调查的 27 个女孩儿中发现 24 人被包身两年, 3 人被包身三年。所支付的费用从 25 元到 45 元。上海工部局, 1938, 第 41 页。

④ SSKJY:《荣家企业史料》, 第 1 卷, 第 243 页。

⑤ 上海工部局, 1931, 第 41 页; 孙宝山, 第 431 页。

⑥ 对张晓梅的采访。

百来个女孩儿。通常被招募的女孩儿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由于包工头承担去上海的交通费,所以他或她自然会尽可能选择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例如,拉货火车的车厢或轮船的货箱。一位妇女后来讲述了她离开家乡的经历:“第二天(契约签署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我带着就要吃饱饭的梦想离开了。我和其他 11 个女孩子一起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我们 12 个人在轮船的货箱里,招工员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有时候他会来同我们聊天。但是我们走得越远,他说得就越少。”^①

卖

由于包工头没有被棉纱厂雇用,通常他们不能提前知道哪家棉纱厂能雇用他们招来的女孩子。所以他们一到上海,就急于为这些女孩儿找工作。一些包工头告之许多工厂的雇佣代理人,安排他们来看招募来的女孩子,选出他们想雇佣的人。一个女孩儿讲述了这一过程:“我们一到上海,就睡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老板回家了。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接着来自不同工厂的雇佣代理人来看我们,他们将决定他们想雇用的人。”^②

在其他情形下,包工头在很大程度上和一般的求职者没什么区别,包工头在为他招募的女孩儿找工作前,必须给工厂拿摩温送礼。有时,包工头把买贵重礼物的钱从付给女孩父母的钱中扣除。^③ 在另一种情形下,包工头把女孩儿们带到日本工厂,每天早上求职者都在大门口排队等候,女孩儿们也按顺序加入这一队伍。在包工头的监护下,女孩儿们可能更有优势找到工作:首先,包工头会修理她们的头发,用漂亮的衣服打扮她们,在她们的脸上涂上脂粉,这样她们就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包工头可能也会给她们穿上高跟鞋,为的是让她们的身高能达到工厂门

①《包身工的仇恨》,第 39 页。

② 对张晓梅的采访。

③《包身工的血泪仇》,第 44 页。

口标杆的高度,这一高度是工厂要求的最低身高。^①在她们来上海的最初几天里,一些女孩儿被包工头不断地从一家工厂带到另一家工厂,如果这家工厂不想雇用她们,她们也许会被其他工厂雇用。

但是常有一些女孩儿不能被雇用。既然包工头必须要寄钱给她家,轻易放弃她们不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选择。通常包工头会为她们找到其他工作。有些女孩儿被拒绝是由于年龄太小,包工头就会把她们留在身边做佣人一直到她们长大能够在工厂找到工作为止。为老板做过几年家务的一个女孩儿,写下了下面关于她做日常杂务事的伤感叙述:

每天凌晨三点,老板的妻子就会把我叫醒,让我拉风箱,给上早工的包身工做稀粥。如果我做得太慢,她就会揪我的头发或用她的手指敲我的头。她们吃完后,我必须去洗六七个马桶以及老板房间的高痰盂。有时在我没做完前,老板的妻子会嚷着让我去洗尿布。

早上六点,我要和老板的妻子一起去市场。我拎着篮子走在她身后。她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买没有人想要的剩下的蔬菜。我们回家后,我不得不洗这些菜。这时就九点了……但是没有人……在意我是不是吃饭了。老板的妻子对我说,让我把盆里的剩饭菜吃掉。

午饭和晚饭,老板的饭桌上将摆满鱼、肉。我则不得不站在一边,伺候他们进餐。然后,我要去照料工人們的饭菜。接下来,我要刷盘子,最后,我吃他们吃剩下的饭菜。

吃完后,老板的妻子无事可做,于是她就整天打麻将。我则不得不站在她身后,当她打麻将的时候,给她按摩后背。有时她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甚至当她上床睡觉时,我的任务也没结束。我要为她按摩腿和腰,直到她睡着。

^①《包身工的仇恨》,第12—13页,第40页。

大多数晚上,不到十一二点,我不会返回包身工的房间。之后我要找一块地方睡觉。因为这里人多床少,又由于我只是一个佣人,我没有一个真正的地方。我只是挤在其他女孩儿的中间,借用她们被子的一角。或者说,更常见的是,由于女孩儿们太拥挤,她们的被子太小不能盖上她们和我,我需要在地板上找一块空地,把我的棉夹层外套铺上睡觉……我经常是刚找好睡觉的地方,合上眼睛,刚睡着,老板的妻子就招呼我起床做饭。^①

由于许多家务活由已在工厂工作的包身工做,所以没有必要留下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佣人。

另一可能是尽量使没被雇用的女孩儿得到在其他工厂工作的机会,尽管这些工厂工作的工资要比棉纱厂低。例如,一些包身工被缫丝厂雇用,但是那种工作是季节性的。一旦这一季结束,她们的工资也就完结了,包工头不得不为她们另寻雇用机会。^②

更常见的是把她们送到妓院作妓女。像包身工一样,妓女也是从乡村系统地招募来的,通常招妓女的老板和招包身工的包工头并没有真正的区分。如果说有区分的话,这种区分也被进一步模糊了,由于招妓女的人经常假借把她们带到上海工厂工作为由把她们诱骗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两个这样的骗子从绍兴附近的乡村招了八个女孩儿。很显然,这些女孩儿被告之她们将要在棉纱厂工作,但是一到上海,她们其中的几个人就立即被带到法租界的一家妓院里,被卖做了妓女。当案子送到法庭时,其中一个骗子也因涉嫌把其中一个女孩儿卖做童妓被起诉。^③

当地饭馆和茶馆是包工头为他们购买的小女孩儿寻找雇佣机会的另一个去处。不清楚这一活动的范围有多广。与来自嵊县的女孩儿有

①《包身工的血泪仇》,第44页。

②《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171页。

③《申报》,1930年4月28日。

联系的介绍人非常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这一地区以唱绍兴戏的农民戏班子而闻名,也是出了许多包身工的地区。一位作家写道:“去上海当女工的那些人自然有许多演唱机会。最初她们只是互相唱。当包工头知道后,他就挑选出唱得最好的女孩儿,把她们带到工人聚集的餐馆里唱。”^①随着绍兴农民戏越来越受欢迎,包工头开始专门招唱曲的女孩儿,先在上海餐馆里唱,稍后在戏院里演出。

由于包女孩儿在棉纱厂工作的人都属于黑社会,所以“被摘的桑叶”被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兜售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妓院老板、茶馆老板以及包工头靠他们青帮成员的身份相互联系。

“包饭”

在工厂里,包身工和其他工人的待遇是一样的。由于她们直接来自农村,先前没有在棉纱厂工作的经验,她们开始工作的条件和养成工一样,实际上,她们通常被分派使用为培训养成工而准备的机器。像养成工那样,她们要进行一段时期的培训,在此期间她们的工资比技术工低得多。她们的培训期是不固定的。有时工人们要“一直学习直到掌握了技术”,然后她们才有资格享有较高的工资。不过更为常见的是她们被要求做六个月的养成工,尽管大多数人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工作技能。^②

包身工与一般工人、直接被工厂招募的养成工的不同是包身工不能自己持有工资。一位妇女解释说:“当发工资时,拿摩温将给我们一个收据,收据上写着我们将要得到多少钱。然后我们走到窗前排队,他们将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要把这些工资交给我们的老板。”^③在一些较先进的

^① 善,第 22—23 页。

^②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 1 卷,第 577 页;《朋友》,1938 年第 1 卷,第 6 期,第 2 页;“纱厂工人中的包身制”,《纺织周刊》1932 年第 2 卷,第 19 期,第 472—473 页。尽管常常说,包身工挣的只有其他工人的 40%,但却没有证据证明这符合事实。

^③ 《包身工的血泪仇》,第 51 页。

工厂,到年终,工厂会给包身工发两三毛钱作为零用钱。^①但是,包身工的生活和一般女工的生活最大的不同是在工厂之外。包身工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包工头控制着。她没有选择——她住在老板要她住的地方,吃老板为她提供的食物,只有当包工头允许她离开时,她才能离开工房。

一些较富有的包工头有他们自己的工房。据报道:一个来自泰兴的姓黄的包工头有一处工房位于上海东部,挨着日商大康棉纱厂,关了一百多个年龄大的小姑娘。他的另一处工房在上海西部,挨着一家华商工厂,关了六七十个年龄小的。他自己的家在上海东部挨着工房的一处独立房子里,他的一个亲戚管理着上海西部的工房。^②

不过,大多数包工头从工厂主那里租房给他们的包身工住。工厂主一开始建工房,青帮就抓住这一新的收入来源。1933年,一位调查女工住宿问题的社会工作者注意到,大部分房子“被做包身工生意的人垄断了”^③。有时,包工头会租下整个工房区。这是夏衍参观杨树浦的日商工厂后,描述的情形:

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这种工房没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门”,它们的前门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门一样。每扇前门楣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洲”、“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门上,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春联,中间,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597页。

② 《包身工的血泪仇》,第47页。

③ 钟,第45页。

图像。^①

包工头租用一间屋子,每月只支付四五元钱,他们能安排下40—50个女孩儿。通常是两个女孩儿共用一块只容一个人睡觉的地方:上日工的女孩晚上在那里睡,上夜工的女孩儿白天在那里睡。邓裕志记录了她对一间包身工工房的印象:

这个包工头租用了厂主五间两层普通经济房,他设法安置他的全家和90多个包身女孩住在那里。我们参观的第一间房子在一层楼的一间大起居室,起居室干净、清洁,配备了相当好的家具,看起来像是中下层人的卧室。作为包工头私人生活空间,自然不对包身女孩儿开放……

包工头带我们去参观工房,不过他很小心地为我们引路、介绍,正如过后一个工人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只看了最好的工房。这一间工房是二楼的第二间屋子,是一间没有任何隔断的大房子。在地板上有两排睡觉的地方,一排睡四个人。稻草上铺上一个垫子就成了一处睡觉地儿。一些女孩儿用破旧布作铺盖,而一些人则甚至没有铺盖。当她问一些女孩儿,如果遇到很好的晴天,她们是否晒被褥时,包工头回答说:“一些女孩儿已把她们的被褥拿出去晒了,不过,在家乡就已习惯于不用被褥的女孩儿,没被褥也能过。”这有八个睡觉的地儿,但是十六个人在这里休息。两个女孩儿共用一个:一人白天用,另一人晚上用……

这里没有任何家具,哪怕是坏凳子或破桌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板上摆满了盆、包裹,墙上挂满了衣服、毛巾、鞋、袜,以及诸如此类的物品,让人感觉好像置身于轮船的大舱!^②

通常包工头雇用打手来监管工房,同女孩儿一起进出工厂。除了在

^① 夏,第2—5页。

^② 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第3页。

春节期间和大约每周一次规定的日子外,大部分时间包身工不准离开工房或工厂区,甚至她们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也一样。^①

包身工的父母签署的契约规定了包工头有责任为女孩儿提供食物。实际上,包身工制度通俗的名称是源于该制度规定的“包饭”。不过,包工头花在包身工身上的饭钱越少,他们赚得就越多,所以,通常他们提供给女孩儿的食物只能够维持她们的最低生存需要。女孩儿们吃的唯一一次正餐是午饭,包工头经常把饭送到工厂里。午餐是上面点缀着蔬菜(常常是干蔓青、被扔掉的菜叶子和菜帮子、腌洋白菜)的干饭。女孩儿只有在假期时,才能吃到肉或鱼。早餐和晚餐是用印度米做的稀粥和杂粮或残渣如大豆渣。夏衍观察了女孩儿准备早餐的情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②

当包身工不上工时,做饭只是她们被要求做的许多家务之一。除了缝洗她们自己的衣服外:一般包工头发给她们不超过两套衣服,她们必须要缝洗老板一家人的衣服。她们不得不擦地板,倒洗尿壶,照料老板的孩子们。^③ 如果老板是男的,她们有时也被要求提供性服务。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要遭毒打。包身工被她们的老板打和强奸的案件时常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报纸上。来自泰州的18岁女孩儿陶蔻姑(音译)的故事是几百个案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她被包身给来自泰州的32岁男子,生活和工作在沪西。根据陶的叙述,一天早上由于她的脚又肿又痛,没去上班,呆在工房里休息。早上六点,包工头“闯进了房间,把我按在床上,强暴了我。他堵上了我的嘴,我不能出声。接下来的两天,

① 孙宝山,第469页;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第3页;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578页。

② 夏,第50页;孙宝山,第431页;上海工部局:《年报(1938)》,第41—42页。在申新九厂,1937年后,管理者要求包身工在养成工食堂吃午饭。每月要花费4块钱。朱邦兴等编,第79页。

③ 《朋友》,1938年第1卷,第6期,第2页。

他……根本就不让我出去。后来，他又强暴了我好多次。”^①报道了一个类似事件的另一篇文章，特别提到：“包身女孩儿和老板之间的争吵和斗争事件每天都在发生。”^②

综合考虑吃不饱、生活空间拥挤以及被强暴等因素，包身工时常生病就不足为怪了。结核病、脚气病、各种皮肤病是最常见的疾病。由于没有药，开始很小的病经常变得很严重。一位妇女回忆说：“一天工做下来，我们的脚就会肿起来，生出许多大水泡，甚至几个月过去了，脚都不能治愈。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用草纸和破布包包扎扎。我的脚到现在仍有许多疤痕。十个人中九个人脚烂了。”^③

尽管这些包身工相当差的健康状况通常引不起外界的关注，但有时女孩儿们的疾病会引起工厂管理者，甚或当地警察的注意。1939年上海警察控告一个包工头虐待一女孩，该女孩在两次独立体检中被发现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和感染了结核病。当她试图从包工头那里逃脱时，她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根据警方的报道：“搜寻她的包工头突然在码头发现了她，试图强迫她回去。她反抗，在她挣扎时被警察发现了。这个人被中国刑法第二章第286条控告。‘在1938年10月—1939年7月期间，在×××棉纱厂，[他]为了获利而虐待朱美英(音译)’。”^④

然而，极少女孩儿能那么幸运地引起官方的关注。如果她们生病了，通常仍继续工作。不仅是由于包工头强迫她们那么做，而且是因为如果她们旷工，事后她们必须如数补工。每旷一天工，她们必须在合同结束时，多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来补工；在极少情况下，每旷一天工，她们不得不用一个月时间来补工。所以，很少有女孩儿能按最初规定的包身契约时间获得自由。在契约正式结束前，最初被包身三年的许多女孩

①《申报》，1934年7月15日。在这一案件中，包工头被女孩儿的叔叔带到法庭，被控告违反了法律第240条：使用暴力破坏了仍处在青春期的女孩的童贞。

②《申报》，1930年8月26日。

③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577—578页。

④上海工部局：《年报(1939)》，第58页。

儿最终工作了四五年。

许多女孩儿像朱美英一样在合同期满前曾设法逃跑过。从被雇来作门警的恶棍的眼皮底下逃脱并非易事,即使能试图逃离工房区,最终她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很大。成功逃脱的女孩儿会立即被她的老板列入黑名单,由于大多数包工头与工厂里的拿摩温有关系,阻扰她,使她不再被雇用并不困难。^①

“带饭”

当契约包括各种延伸条款,最终期满后,许多女孩儿仍不能割断与包工头的联系。一些人在稍有不同的安排下——被称为“带饭”——继续留了下来。在带饭制度下(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包身工制度的提升),工人不受契约的约束,有权持有她们的工资。她从她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通常是七八块,付给包工头作为房租和伙食费。尽管如此,实际上她同以前一样,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和吃饭。*

考虑到包身工遭受的残酷的待遇,契约期满后她们仍继续留下来,可能让人感到奇怪。然而,她们没什么选择。在她们的契约履行完后,尽管她们已工作了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但她们自己没有钱。大多数女孩仍是十几岁,许多人在上海没有亲戚可以求助。对她们而言,如果她们想在上海继续工作的话,继续留在包工头身边可能是唯一适合她们的安排。^②常常是包工头强迫她们留下来,很可能是想尽可能地榨取她们的工资。一位妇女回忆说:“七年后,老板对我说:‘你要做工,就住在我这里吃带饭,每月交八块钱饭费;要不住在这,工就做不成。’有了七年的经

^① 孙宝山,第469页。

* 在“带饭”的一些事例中,包工头去乡下招募女性到上海工作。那么“带饭”和“包饭”的不同就是不签署契约,没有契约期限。包工头只是向女孩儿许诺说,如果她来上海,他或她将帮她找到一份工作,她将每月支付给他或她七八块的房租和伙食费。“中国劳工和包身工制度”,《人民论坛》,1933年第5卷,第8期,第410页;孙宝山:“上海纺织厂的包身制工人”,《华南周刊》,1932年第1卷,第22期,第466页;屠诗聘编:《上海史大观》,上海,1948年,第3部分,第65页。

^②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8)》,第41—42页。

验,我知道厂里和包身工老板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最后我还是继续呆在他那儿成了一个‘带饭’。”^①其他许多妇女都回忆过被迫成为“带饭”的类似困境。

不仅从乡村招募来的女性和已是包身工的女性会成为一个“带饭”,而且许多已生活在城市的单身年轻女工,可能由于他们能提供最经济的安排,最终也和包工头签订了有关食宿的契约。进一步而言,既然包工头和大多数寄宿地的寄宿者都来自同一个村庄,许多女孩儿已把这一安排当做一种代理家庭。最后,由于包工头控制着大部分找工作的市场和工厂工房,那些想在工厂工作的女孩儿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一位女性叙述了她来上海工作的经历:

我听其他人说,如果你在村里挨饿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去上海找工作。这样你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给家里寄钱,养活家人。我对此一直都铭记在心。直到有一天我终于能够得到一位同乡的引见来到上海,在一家棉纱厂工作。我寄宿在他那儿。其他许多女孩儿和我一样也寄宿在那里。由于他是一个包工头,大家可能都是经他介绍而到工厂工作的。^②

一旦女孩儿在包工头的房子里寄住的话,多种因素使得她很难搬到其他地方去。如果她只是刚到上海,以前也从来没在工厂工作过,最初她不得不先做几个月的养成工。在这期间,她每月挣得很少,不能支付每月八块钱的食宿费。包工头先借给她钱,但借贷利息较高,如果她不完借贷,包工头是不会让她搬走的。^③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包工头的继续帮助,她可能要丢掉工作。如果包工头不仅是房东又是工头或拿摩温的话,更是如此。一个想离开她寄宿住处的女工说:“你只要不吃他

^①《包身工的血泪仇》,第59页。

^②“我的包身工生活”,《女青年月刊》,1934年第15卷,第4期,第23—24页。

^③“中国劳工和包身工制度”,《人民论坛》,1933年第5卷,第8期,第410页。也参见孙宝山,第469页。

的饭,你就找不到工作。在这个社会上,已有太多的人失业了——我又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呢?”^①

不应因此就断定来自乡村的包身工或一来上海就寄宿的女性们常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大多数的当代描述以及解放后编纂的包身工回忆录都叙述了包工头迫害包身工的最极端的例子。不过至少对一些女性而言,由于他们来到上海后,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来自同乡的包工头,为他们介绍工作并提供不算昂贵的食宿,是给予她们的一种支持和帮助。一些女孩儿依靠包身工只是临时之举。一旦她们选择离开,她们已开始在城市里发展她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了。*

利益

无论是“包饭”制还是“带饭”制,包工头都从“摘桑叶”生意中牟取了丰厚利润。一个经营“包饭”制的包工头一个月为一个女孩支付5元的食宿费。只要女孩儿的养成工身份结束,她一个月最少挣12元,这样包工头一年将挣84元,三年就挣252元。扣除招募过程中花费的10元,以及支付给包身工父母的35元(或多或少),三年后,包工头从每个女孩儿身上能挣207元。大多数包工头有10—100个包身工,所以说,包身工生意的确是赚大钱的买卖。有10个女孩儿的包工头,三年后能赚2070元。与此相对,工厂的一个普通工头只挣大约1080元——只是前者的一半。**正如上海工部局的一个报告所说,“如果包工头有8—10个女孩儿,对于

^① 对张晓梅的采访。

* 例如,来自嵊县附近一个乡村的女性描述了1949年她来上海,最初借住在老板那的情形。这个老板也是浙江本地人,在申新九厂工作。六个月后,她开始拿到全额工资了,她就搬出去同来自同村的工友同住。对张晓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2月25日。

** 这些数据是建立在对一个包工头花费的几种不同估算基础上的,是大概的数据。当然,以工资形式花在包身工身上的钱在决定包工头挣多少钱上起重要作用。由于包身工在不同的工厂和不同的车间工作,因此这种花费也多种多样。见上海工部局:《年度报告,1938年10月》,(上海,1938),第41页;孙宝山:“上海纺织厂的包身制工人”,《华南周刊》,1932年第1卷,第22期,第43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北京,1963),第90页。

既无技能又不识字的人来说,他或她的生活一定相当舒服。”或正如孙宝山所说:“许多包工头有两个或更多的妻子毫不奇怪!”

许多关于包工头制的报道,谴责其为“资本家非常残酷剥削工人的”许多方法之一。不过,尽管这种制度明显利于包工头,却不那么明显利于工厂主和工厂管理者。没有证据表明,工厂主认为雇用包身工比雇用其他女工便宜。当包身工在接受培训期间,她们的工资低于养成工或童工的工资,不过一旦她们有资格获得技术工的工资时,很显然,包工头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由于包工头的收入依赖于她们的工资——不断要求厂方支付相应的工资。进一步而言,包身工能够高效工作吗?如果大多数包身工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和前面列举的完全相似的话,可以想像,她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就是没患病,她们身体也会比较虚弱,工作效率可能比其他工人低。

看起来,工厂主已意识到这一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工厂主经常和包工头发生冲突:冲突常常集中在包身工的健康问题上。包身工常带着让人怜悯的疾病或被打的伤痕到工厂车间工作。拿摩温经常设法劝说包身工请几天病假,但是女孩儿们清楚她们不得不补上任何旷工的时间。夏衍讲述了一封写给上海报纸编辑的信。信来自一个男子,1935 年 10 月的一天,他没什么事儿做,顺便去旁听了曹家渡法院的法庭审判,为此他写了这封信。那天开庭的案件是关于一个棉纱厂包身工被他的老板控告偷了他家的金耳环和一些衣服后逃跑的案件。审判中有几个可减轻罪行的情节:上个月包工头要她和他发生性关系,当她拒绝时,他就打她,直到把她的眼都打肿了才罢休。她上工时,工厂管理者让她请假回家休息,但包工头不同意。^① 据同夏衍讨论包身工制度的年轻工人所说,类似这样的案件相当典型。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一家大型棉纱厂研究了三类女工的工作效率:

^① 夏,第 33—34 页。

一类是同她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女工；一类是住在工房自己养活自己的女工；最后一类是在包工头控制下的女工。根据研究结果，工厂管理者意识到：“包身制不好，它生产的是冷漠的、无精打采的工人。”之后，管理者采取了措施限制包身工的人数，并坚持要包工头付钱让他的包身工在工厂餐厅吃饭，“在那里合理的花费可以买到好食物”。上海工部局工业部甚至断言：“为了工厂管理本身的利益最终要废除这一制度。”^①如果工厂主像这些叙述所表明的那样对包身工制不抱任何幻想的话，人们不禁要问最初这种体制怎样在棉纱厂占有一席之地呢？又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那么长时间呢？

许多当代观察家将包身工制的发展归因于日商工厂主。在邓裕志参观包身工工房的报道中，她把这一制度描述为上海日商厂特有的现象。诸如《上海日商纱厂包身工》这样题目的文章常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几位工厂工程师回忆这一制度后，说：“包身工——哦，她们被用在日商工厂里。”或者说和这类似的话。^②

如果包身工制已被限定在日商工厂，那么许多历史学家可能已提供了足够的解释。他们说，由于日本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所以他们除了靠地痞流氓招募工人外，别无选择。只要生产能持续下去，他们不关心工人是怎样被对待的。^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没有系统的记录表明在某一具体时间某一具体工厂包身工的人数，不过可获得的散见数据表明：包身工制绝不仅限于日商工厂。很多包身工确实是在日商纱厂工作，如内外、大康。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英商纱厂也有包身工，特别是怡和厂。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华商工厂的包身工：无论是管理最落后的申新厂，还是管理最现代的永安厂都有包身工。一些观察家指出，在某时华商申新九厂的包身工比上海其他任何工厂的包身

^①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9）》，第58页。可惜，找不到这一研究的细节。

^② 对何志光的采访；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第1页；孙宝山，第470页。

^③ 骆传华，第271页。

工都多:据说在 1936 年 3000 名工人中有 1200 名是包身工。^①一些人认为包身工制始于外商厂,后来传到华商厂,是那样的吗?

传统:外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

为了理解工厂主的国籍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包身工制发展的模式,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可能产生这一制度的传统。

外国的传统

由于那么多关于包身工制度的叙述都将其产生归因于日本工厂^②,因此我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原因促使在上海的日本工厂采纳了这一制度。实际上,在日本国内的棉纱厂有包身工的历史,但是问题在于在上海设厂日本资本家是否认为这一制度值得复制。我们已掌握的日本包身工制度的历史表明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棉纺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劳工的严重短缺,包身工制由此产生。工厂不能再依赖生活在附近的人们,而是必须开始制定招募计划。进藤(Takejiro Shindo)* 写道:“由于对劳工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棉纺工业不得不任命招募代理人购买劳工,尽可能为合适的女性开拓进厂的渠道。”^③劝说父母允许他们十来岁的女儿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并非易事。所以,工厂主发现雇用那些他本人就来自乡村的招募代理人到他们的家乡去招募则是有优势的:他们不仅熟悉乡村的情况和父母们的态度,而且也可以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网。

这样这一群体发展起来:他们从农村招募女性,然后把她们卖给急需工人的工厂。这些包工头常有犯罪记录,他们也招募妓女、艺伎和茶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 1 卷,第 576,579—580 页;旧中国的,第 171 页。

^② 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第 4 页。

* Shindo 是日本丰田纱厂董事会的前主席,丰田纱厂在上海有数个厂子。

^③ 进藤(Shindo),第 42 页。

楼女子。和上海的包工头一样，他们经常靠许诺给她们高工资、夸耀城市的奢华生活来把她们诱骗到城市来，然后把她们安顿在宿舍里，限制她们的行动，并常强迫她们作女仆或“淫乱行为”。

到 20 世纪初期，这一制度在日本乡村已如此的声名狼藉，包身工根本就难以劝说女孩儿们和他们一起进城。1925 年，俊三(Shunzo Yoshisake)这样评价这一制度，他写道：

为了诱骗女性工作，招募代理人不负责任地承诺。他们顽固地劝说她们的令人厌恶的举止，他们暴力的、攻击性的行为以及其他不公平现象已产生了决定性的负面效应。再者，乡民们看到了许多发生在他们朋友身上的突然变故，从中得到了痛彻的醒悟。他们听说在工厂生活冒着健康和生命的危险，一个天真的乡村女孩，又健康又很有活力地离开家乡，不久却拖着微弱的身体，面容憔悴地返回家乡，或传闻她已经完全道德沦丧和堕落了。^①

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 1926 年有个村庄在村长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男工和女工协会，目的是保障从本村招募到城里工作的女性享有一定的工作条件。^②

到 20 世纪 20 年代，问题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为此控制招募制度滥用的法律出台。1924 年 12 月，通过了有关工人招募的法规，要求招工人员必须获得招募执照，并担保“对于女工，她们的贞洁必须得到保护；同时对于男工……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得到保证。”^③很显然，这一法律使这一制度受到控制。

工厂主离开了这些领域：已通过的法律要求他们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待职工，由此劳动力价格提高。在帝国主义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司空见惯。在中国，没有有效的劳工法，并且劳动力价格低廉，这当然吸引日本

①② 俊三(Shunzo)，第 498 页。

③ 同上，第 491 页。

投资者,只要包身工制度确实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那么这些因素就能说明包身工制度的重要性。不过很显然日本的包身工制度并没有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而且,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日商工厂有包身工,但是没有记录表明日商工厂初到上海的几年间使用过包身工制度。换句话说,尽管在日本存在着包身工制度,但是当日本管理者最初在上海设厂时,并没有使用这一制度。

中国的传统

在初到上海的几年间,日本工厂主和英国或中国的工厂主一样,采用的是中国昔日盛行的招募制度。一系列相关联的招募制度发展起来,由于它们的名字如此相似,有时人们常常把它们混淆。而且,尽管较早的招募制度包括包身工制内容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包身工制度在上海并不存在。

易同包身制混淆的制度是包工制。包工制在包身制产生前早就存在了,包身制产生后,和包身制同时并存,有时和包身制合在一起。在包工制中,工厂主和工厂管理者把产权交给工头,工头负责生产一定数量的成品,厂方支付给工头一定数额的费用。工头决定雇用工人的人数和他们的工资,不过工头通常雇用几个副工头来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在中国的采矿业中,有大量关于使用这一制度的记载。^① 在上海,包工制相当广泛地用在码头,工头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仅是运输公司工人工资的20%—40%^②;这一制度也用在上海工部局、法国电车公司(the French Trainway Company)以及一些石油和烟草公司。

上海棉纱厂普遍使用包工制的时间比较早。1916年,美国商务部的一位观察员奥德尔(Ralph Odell)在对中国棉纱厂的调查中,描述了国际

^① 托尔加舍夫(Torgasheff);也参见蒂姆(Wright)。

^② “中国码头工人的包身制”,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32年11月。(国际劳工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棉纱制造公司(the International Cot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最初是一家德国公司)使用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包工制。他注意到这个工厂的所有工人都由一个工头雇用和支付工资,反过来,根据生产产品的数量,管理者支付工头相应的报酬。^① 有时一些华商工厂,如恒丰纱厂和申新的几个工厂,也使用包工制。^②

包工制不同于包身制,但与包身制相容。包身制能够被用在包工制中,也就是说,实际上招募工人的副工头能到乡村招募,同孩子的父母签署契约,把女孩儿带到工厂工作。或者副工头可能与做这样生意的人有联系。但是正如通常所见的那样,工人通过广告应招;或者工人住在上海郊区,工头不为他们提供食宿。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制度是工厂管理者制定的。

不用这一制度的工厂管理者有时任命他们自己的招募代理人。20世纪30年代前,这些代理人有时在和之后的包身制相似的招募条件下,从其他地区招募女孩儿到上海工厂工作;不过,招工人员是工厂员工,而不是地痞流氓。1920年长沙和上海的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例,该事发生在华商厚生厂,工厂主祖籍湖南。根据对一位黄先生(他是负责招募女工的工头)的采访得知,“由于湖南遭受了连绵不断的战火和通货膨胀之害……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总管已答应预留50个工作岗位给从湖南招募来的女性。

招募来的女性不需要签署契约,不过她们被要求工作三年。因为正如黄先生所解释的,工厂已在这些女性身上进行了“投资”。她们离开湖

① 奥德尔(Odell),第163—164页。一战后,当英商安利洋行(the British firm Arnhold Brothers Co.)购买了国际棉纱制造公司后,变成了东方纺纱公司,类似的包工制产生了。1925年工厂管理者给英国领事写信说:“在东方棉纱厂,我们使用工头,这一工头雇佣了许多小女工头,她们掌管着许多纺架和雇佣必要的劳工。”见安德若兄弟给布雷南领事的信,1925年8月4日,大英外事办公室(H. Arnhold to Consul Brenan, Aug. 4, 1925, in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第20—21页。

② SSKJY,恒丰,第7页。

南时,工厂发给她们每个人一个手提皮箱、一个洗脸盆和一只篮子。一个工头解释说:“工厂必须支付这些东西的所有费用。我们必须坚持女工们要工作三年后才能离开。否则我们担心她们并不真心想为我们工作,而只是借此来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在她们工作的三年中,一个月挣八块钱,每个月要从中扣除五元的食宿费。她们住在专门为她们建造的工房里。三年结束后,想继续工作的女工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想离开的女工可以离开。^①

就从上海以外的地方招募来的女性而言,在她们答应要为工厂工作三年的契约下被带到上海来,她们的状况和包饭制类似,但是就她们每月能得到工资(减去每月固定的食宿费)而言,又与带饭制类似。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尝试,工厂管理者想知道湖南女工能否适应工厂工作,他发起并实施了对湖南女性的招募。因此,她们感激工厂管理者,而不是本地的人贩子。

类似的现象在养成工制度中也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当女工在许多操作上取代男工时,创建培训机构的目的就是在小女儿儿被允许参加工作前,为她们提供几年的工作培训。^②这一制度中工厂代理人到农村(通常离上海不远)去招募十几岁的小女儿儿。在培训前,被招募人需要通过非常简单的文化测试、身体检测以及灵活性测试,然后需要提供一个保人确保她将在工厂工作三年。在这三年间,她们住在工厂的工房里。1923年内外厂就招募了一批这样的女孩儿;永安厂1925年也招募了一批这样的女孩儿。^③

同包工制一样,包身工可能被用到养成工制度中:本地包工头可能同负责寻找和雇用养成工的工厂代理人做生意。极少有证据表明这种

①《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第1—41页。

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几乎所有的棉纱厂都为年轻女工设立了工人培训机构时,这一制度才开始变得普遍起来。(见第四章)在1920年代中期,数个这样的机构建立起来。这些刚起步的机构既不同于之后的培训机构也不同于包身制,尽管三者常常混淆。

③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91页;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情况发生过。尽管自1949年后史学术语“包身工制度”和“养成工制度”经常混淆或互用,不过这种可能性也难以完全排除。也许这种混淆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两种制度相似,而且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被杨树浦当地人称为包身工的,在小沙渡则被称为养成工。根据那个时代的资料判断,1949年后许多描述五卅运动期间攻击包身制的劳工运动的记述,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指的是攻击养成工制。工人们之所以反对养成工制,是由于这些年轻的养成工对他们许多人的工作构成了威胁。

青帮和包身制

尽管有几种制度和包身制相似,但仔细考察会发现没有证据证明无论是华商工厂还是外商工厂包身制在1928年前存在过。当代报纸或杂志在描述工人工作状况和罢工情况的记述中,都没有提到过包身制。如果在那个时候存在包身制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在几个文件和印刷物中找到相关报道:新青年的1920年劳工专刊刊载了讨论劳工问题的文章,涉及到了劳工问题的方方面面,然而并没有提到包身制。1924年童工委员会的报告;唐海和宇高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都写于1925年);以及其他关注劳工问题的重要的中国观察家的著作,诸如陈达和马超俊,同样都没有谈及包身制。^①最后,尽管上述有关包身制的叙述来源不同,大部分或者写于1930年代期间,或者是那时在棉纱厂工作的女工的回顾。当然很可能尽管包身制一直都存在,但还不足以吸引这些观察家将其作为某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来专门讨论或给其一个专有的名称;或者也许是虽已有包身制但仅涉及一小部分工人。

然而,1930年包身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一制度被十分清晰又

^① 唐海;宇高;陈达;RSCLC;马超俊。

相当广泛地称为包身制(这一名称在此之前并未出现过),并且引起社会学家的特别关注,如陈翰笙,他在那年组织了一个研究组来调查研究这一制度。乡村女孩儿因洪水或饥馑被她们父母签署的契约所束缚:契约规定她们必须工作三年,她们的父母因此得到一笔微薄的酬金。这一年日报关于这些女孩儿的文章激增。一旦女孩儿来到城市,她们的命运同招募她们的条件一样具有新闻价值,不仅因为她们被安排生活和工作在如前面所描述的肮脏的环境下,而且那么多记者发现最悲惨的是她们到达上海后随之而来发生的事情:由于这些女孩儿或者被包工头强奸或者被卖给其他的地痞恶棍,她们常常失去贞操。

因此,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很有可能已有许多工人从乡村招募而来,但到那时,已经呈现出一种新局面。女工不再简单地被某个为她们提供工作的人所招募以及可能为工头本人工作。现在她们成了包工头——诈骗犯罪关系网的一部分——的私人财产。举例来说,这就意味着能够较容易把试图逃跑的女孩儿列入黑名单以及把那些不能被工厂雇佣的女孩儿卖作女仆或妓女。现在包工头成了广泛的“摘桑叶”关系网的一部分,并与其建立了“关系”。

20 世纪 30 年代前,资本家也需要工人,男女工头也经常负责招募工人,女性也同样是离开乡村到上海的工厂工作。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相当不同的是由于增加了黑社会因素:确切地说,包身制的出现几乎与青帮势力和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张同步。因此,包身工的故事并不简单的是贫困农民、富裕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故事,而恰恰是上海青帮以及青帮如何垄断棉纱厂劳工市场的故事。

青帮

也许青帮是上海政治史和社会史上最难解释的因素。一方面,它被描述为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它仅出现在与工业发展相关的领域。上海青帮已被描述为含有“被路易·波拿巴利用的十二月十日会,俄罗斯黑

帮,以及当代芝加哥的各种诈骗犯和持枪歹徒所具有的特征”^①。青帮自夸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他们的成员。最上层是所谓的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被称作黄麻子)和张啸林。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青帮的普通成员有2000人之多,包括许多政客、国民党劳工领袖、大专学历的人、新闻工作者、警察、军官以及大多数工厂工头和包工头。青帮和上海财政状况关系的历史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帮会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在上海的某一大行业中——不仅在工人和工头之间而且在工厂主和管理者之间——发挥重大作用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1927年的事件可能特别有意义。五卅运动后,加入激进的上海总工会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工人们继续罢工,不断提出更多的要求来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从每周最低额的工资和每周一天的休假到言论和结社自由。在1926—1927年的三次工人起义期间,工人们为从军阀手中夺取对上海的控制权而战斗,彰显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前两次起义失败了,不过,到1927年3月,第三次工人起义后,工人们控制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区,成立了临时市政府。

由于这些事件的警告,上海商界向蒋介石求助反对劳工运动。1920年代后期,资本家设法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仅是镇压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和士兵缉拿劳工领袖和工人积极分子或渗透到工会组织。国民党把这些工作转交给杜月笙为首的青帮。实际上在那时没有其他的组织能够破坏上海的共产主义者掌控的力量。上海条约港口的地位部分地解释了这一困境:大多数工厂位于外国租界内,但中国的军队和警察不允许进入外国租界。尽管官方机构已经组织力量同共产党抗衡,但外国统治使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青帮这样的组织,能够获取广泛的权力。^②

^① 爱萨克斯:《国民党退化的五年》,第93页。

^② 王(音译)(Y. C. Wang),第433—435页。

由于接受了委托要破坏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为此,杜月笙创建了共进社。“共进社设在法租界,这一社团动员和配备了几千名帮会分子。一接到暗号,他们就冲出他们的保护区,镇压工人共产党员……。借助他们的干预,杜月笙为首的青帮设法重新划分政治版图。”^①从1927年起,青帮成了所有争夺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地一种政治势力。

正如大多数研究感到痛惜的那样,帮会在破坏工运方面相当有效。不过他们这样做不是免费的:帮会必须分享工业利润的要求使得工厂主变得很脆弱。一个工厂工程师谈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的这种脆弱性:

在那时,资本家一打开工厂大门,就希望工厂里没有罢工或其他任何事情……在厂门的所有门警都是帮会分子。当你想要门警时,你要和他们联系,他们就派人过来。这样厂门就安全了,如果发生了任何问题或同工人争执,我们要去叫在厂门的这些“老头子”。如果我们不用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跑来破坏工厂。^②

如果工厂主不能满足帮会提出的要控制工厂某些方面运作的要求,那就不是两三个不满的门警跑来攻击工厂那么简单了。这些门警可能会动员起一个广泛的势力关系网对工厂进行严重的破坏。

破坏工厂只是帮会使工厂主服从的许多方法之一,他们攻击、绑架甚或谋杀那些冒犯他们的人也不是没有听说过。益戴勉(音译)的命运可能对其他人是一个警示。益戴勉来自一个买办家庭,是公平洋行保险部的买办。1929年,当关于他被谋杀的报道出现在《北华捷报》上时,他“刚成为东方纱厂的经理,对工厂管理进行了巨大变革”:

5月31日一早,在爱文义路(译者注:今北京西路)发生了另一起严重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当益戴勉先生乘坐他的汽车刚离开他

^① 王(音译)(Y. C. Wang),第433—435页。

^② 对何志光的采访。

的住所——卡德路(译者注:今石门二路)85号时,三个男子冷酷地开枪杀害了他……人们认为买办可能是由于报复被绑架。距他家500英尺,他进行了顽强抵抗。枪击一发生,他的司机就跳出汽车弃他而去。他奋力同三个持枪男子争夺。但由于他伤口的血喷涌而出,他因失血过多而变得非常微弱,最终倒在汽车里。歹徒则丢车弃人逃之夭夭。^①

报道没有具体说明益戴勉因做了什么事情而冒犯了帮会。但据猜测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工厂管理方面实施的制度改革。改革几乎常意味着用通常是从学校毕业,诸如南通纺织学院,精通业务的工程师来取代具有本地影响力但没有技术的包工头和工头。当这些专家开始在工厂工作时,他们遭遇了强烈抵抗,更常见的表现是威胁、打击报复以及其他的迫害。^②

20世纪20年代末期,要求控制劳动力市场仅是使用暴力反对资本家的一个方面。可布尔关于上海资本家的研究证实了青帮对上海资本家的恐怖统治开始于1928年。蒋介石不惜一切为他的政府筹集资金,他寻求青帮的支持,从资本家那里索取金钱。绑架富商或他们的家人,把他们作为获取赎金的人质成为20世纪30年代司空见惯的事件。^③

被暴露的制度

在1932年1月,简言之,包身工问题不只引起报纸的犯罪专栏读者和培育当代高效率的工人问题所困扰的工厂工程师关注。正如一位编辑所评价的那样:“直到两天前,这一新的术语——包身工——才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实际上,它已有一年多的历史了,但是沉迷于上海欢娱的

^①《北华捷报》,1929年2月16日。

^②对陈淑露的采访,上海,1980年11月19日。

^③可布尔。

音乐和女人世界的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罪恶的制度。”^①几百名包身工从半隐蔽的囚禁状态走出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她们是被包工头买来的农村女孩儿的现实震惊了上海。

当1932年日本袭击上海时,包工头处境危险。他们许多人在闸北有房子,日本侵袭上海时,闸北区遭到了最为惨重的损失,他们被迫逃往公共租界。而且,许多日商厂停产,致使大量的包身工女孩儿失业。和其他在失业期间不得不自食其力的失业工人不一样,尽管在她们失业期间包工头拿不到工资,但她们仍有权由包工头提供食宿。包工头发现了让他们自己走出困境的方法:利用建立在公共租界的难民救济机构——安置数千名因日本袭击而无家可归的人。很显然,救济机构的管理者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形,当他们开始对此展开调查时,发现1000多名包身工分布在各种难民收容所中。只要工厂重新开工,包工头就过去把包身工领回来,让他们重新返回工厂工作。一位作者说:“第一步是通知收容所不让人们过来带走这些孩子们。我们必须想办法从包工头那里营救他们。”^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1932年的事件导致包身制的暴露,但也助长了包身制的蔓延。1月,当日本袭击上海时,数千名女工逃离城市,返回她们的家乡。当春天棉纱厂开始恢复生产时,包工头有机会掌控比以前更多的工人。除了设法招回被他们放在收容所的女性外,他们还到乡下去,带回更多的工人。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抗日抵制,甚至使得日商工厂为了恢复生产有必要依赖包工头。1932年4月,13家日本工厂重新部分开工的报告证明了这一观点:

据当地中文报纸报道:“日商厂已高价雇用了20个工头,秘密派他们到泰兴、扬州以及其他内地招募劳工。当整个民族一致抗日

^① “纱厂工人中之包身制”,《纺织周刊》,1932年第2卷,第19期,第472页。

^② 同上,第472—473页。

时,我们的工人不会被允许为日本人工作……因此我们要求应指导各县政府严厉阻止这样的劳工招募,以防止所有的恶性后果。”^①

日本袭击上海后,夏衍能亲身到工厂工作,他的观察证实了包身工数量的增加。他写道:“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急剧增加。举一个例子,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32个女工里面就有24个包身工。”^②的确,在三十年代有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包身制的蔓延。当1932年孙宝山组织他的调查时,他估计在上海所有的工厂大约有1万名包身工。^③到1937年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一个调查证实,在城市的工厂里大约有7—8万名包身工。^④

和五年前一样,当1937年日本袭击上海时,工厂一关闭,包工头就把女孩儿们送到了收容所里。参观完一个收容所后,一位女性写道:

这里的所有难民都是妇女和小孩儿。你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无论是仍在哺乳的面色发黄的年轻母亲,还是头发已很稀少的瘦弱老妇人,亦或营养不良的苍白的小女孩儿——只要你问她们,你就会发现都是在敌人战火中从日商棉纱厂逃出来的女工。

在这些人中,有一群年龄在十二三岁到约十七岁的年轻女孩儿,她们特别吸引人们的眼球。一些女孩儿的手看起来好像从没洗过,一些人裹着小脚。人们一瞥就能判断出她们只是最近才从乡下到城市来的。如果你试图同她们聊天,她们不会开口的。她们害怕你会欺骗她们。

这些女孩儿都是包身工。^⑤

①《北华捷报》,1932年4月12日。因此,这些工厂仅雇用了3000人,远远低于正常的2.5万人。

②夏,第21页。

③孙宝山,第472页。《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书的作者们估计,在1932年日本袭击时,日商工厂的4.8万工人中有一半是包身工。那就是说单在日商厂就有2.4万包身工(比孙对所有工厂的估计要高出两倍多)。没有资料能证明这一数据。

④“包身制下上海日纱厂女工”,《国际劳工通讯》,1937年第4卷,第7期,第54—55页。

⑤“收容所里的包身工”,《战时妇女》,1937年第2期,第2页。

这次这些年轻女性的状况震惊了上海工部局,工部局亲自组织调查,最终得出结论:

代理人为他人找工作,由此获取报酬并不违法。这一惯例在中国较普遍。然而,当女孩儿们被大规模地从周边乡村和家中(尽管是在她们父母的授权下)带走,然后又被置于另一个从这些女孩儿的工作中获取不正当收益的人的控制下时,这种现象应引起当局的注意。工厂管理者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一些雇员在中间人的掌控中。去乡村的代理人经常这样做就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尽管工厂管理者可能不是导致女孩儿们遭受可怜的住宿条件和可怜食物的直接因素,不管怎样他们一定知道这样的情况。不管导致这种状况的责任在于包工头还是在于工厂管理方,显而易见的是一大群年轻人需要当局的保护和监护。^①

在此期间,一些妇女发起了一个集会,制定计划来营救那些至少暂时自由的包身工。首先,她们请求所有的救济机构调查收容所里包身工的人数,并强调这些女孩儿不应再次被送回农村,因为她们的老板可能回去寻找她们或者她们的父母可能会再次买掉她们。她们建议应在确认她们是包身工后,将她们集中送进专门为她们预留的几间收容所,她们在那里能够得到照顾,并能够接受一定的教育。那些参加这次集会的人甚至设想把这些女孩儿送到内地去做抗日的组织工作:“她们既不担负家庭责任,又没有对富裕物质生活的要求。”^②

更客观地讲,妇女组织的成员意识到完成这些计划是困难的。为包身工提供食宿和教育将需要很大一笔资金,靠少数人的捐款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尽管由于战争环境下包工头可能暂时放弃了对女孩儿们的控制,但他们在上海的底层社会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战事

^①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8)》,第40页。

^② 王如一:“再为包身工呼救”,《战时妇女》,1937年第7期,第2—3页。

的爆发可能暂时打击了操纵棉纱工业的地痞流氓,但他们的同伙正在破坏其他行业。1937年年底的新闻报道,谴责自开战以来上海码头沿岸的诈骗分子又出现了,表达了对土匪扩张他们在沿外滩的上海工部局的浮码头势力的关注。有一篇文章指出:“靠胁迫,他们取得了对码头苦力市场的垄断,对运输的货物收取过高的费用,暴力的危险已把其他苦力吓跑了。”^①没有人觉得包工头会放弃他们的权力,也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会强烈地抵制任何要消除他们在工厂势力的尝试。

工厂主的抨击

不只上海工部局和妇女组织试图清除包工头。在很多情况下,工厂管理者也试图充分利用包工头的退却来削弱他们的势力。英商工厂被公认为是包身工最密集的工厂之一。英商工厂的管理者发起了对包工头最严厉的惩罚运动。实际上,1937年春天,在其中最小的工厂里,管理者成功地用“直接雇佣”取代了包身制。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最初的努力换来的是两场罢工的胜利。工人们很可能因被包工头贿赂或威胁而罢工反对取消包身制。最终,公司雇用劳工经理直接负责工人招募工作,这样包工头终于被劳工经理所取代。^②

成功地建立起现代专业的管理制度并不必然确保包工头不来找麻烦。1942年海德(Eleanor Hinder)写道:“甚至在更现代的安排存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人事经理和人事部门直接由公司任命,在管理其事务中,管理人员可能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代理人。“帮会”可能影响雇主和工人间的关系。在某一区域里,帮会头头、老头子,有相当的权威。如果管理者和工人间有了分歧,管理者不得不接受老头子的调停,他们甚至有可能对争端的产生负有责任。而且,管理者可能不得不雇

^{①②}《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0日。

用老头子要推荐的工人。在某一行业中而不是在某一区域中,老头子可能更有影响力。例如,在租界的几个大纱厂中真正的人事经理被认为是某位“老头子”。人事经理,甚至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看起来屈从于这一权势“老板”的影响力。^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表面上看,工厂通过包工制或现代人事部门雇用职工并不重要;工厂是华商工厂、日商工厂或美商工厂同样也不重要。他们都曾在某一时期使用过包身工。管理人员是否了解这一制度是他们唯一的不同。当雇用、解雇以及工资的支付都由工头掌管时,管理者不可能了解包身制。当雇用、解雇和工资的支付都处在人事部门的管理下时,他们可能了解包身制但却无力废除它。

抗战前的几年里包身制看起来已发展到巅峰,不过只要帮会继续掌权,这一制度不可能被破坏。从1937年到解放这一段时间内,没有关于包身制的调查研究。解放后没有数据显示仍有女工归老板所有,不过,仍能见到零星的报道。解放后出版的包身工回忆的报道中,包括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被招募的女工的回忆。当然,日本的入侵造成了这一制度易于持续存在的条件——贫穷;对边远地区的破坏;数千名孤儿被遗弃,任何人都可以收养他们。警方移交给上海工部局儿童保护部的案件,绝大部分是有关孤儿的案件,这些孤儿的经历非常相似:“父母在战争中死去。孩子被街坊带走卖了。”^②

甚至于战后仍有关于女包身工的报道。1948年出版的上海社会状况的普查表明这并非个别情况。女工几乎都是包身工,而且包身制的运作同30年代完全一样。1948年的调查指出:“对于女工来说,这一类型的包身制,一直到现今仍继续存在着。但是由于工厂当局和工会正试图对此进行改革,女包身工的人数正在开始逐渐减少。”^③

^① 海德,第30页。

^②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9)》,第54页。

^③ 屠,第3部分,第75页。

抛开早期作家的描述,那么,包身制不再是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盛行时的包身制了。在 1925—1927 年的工人罢工期间,这一包身制被破坏,只是偶然会再现。包身制可以被看做是五卅运动的产物,不过其原因也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尽管工人管理者可能是想通过雇用这些好控制的工人来削弱工人运动,但是在 1925 年 5 月 30 日开始的工人运动这一背景下,管理者为了控制工人,选择了与青帮结为联盟。结果是青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出现了。

正当工厂主不顾一切设法废除过时的管理制度时(见第四章),青帮势力发展了。这是商业杂志痴迷于介绍美国和日本的现代管理技术的年代。然而,管理者却在帮会的束缚下,一直受帮会的庇护。包工头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控制着 2/3 的纺纱厂女工,这使得自由劳工市场的发展难以想象。资本家既不能自由买他们选中的劳工,工人们也不能自由卖他们的劳动力。

因此,包身制的意义不在于其代表着外国控制棉纱工厂而产生的严重剥削的制度,而在于表明了女工、华商亦或外商的工厂主在上海青帮面前的脆弱性。

第六章 工作日

1963年7月，一场展览在上海纺织二厂向公众开放，工厂大门顶部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展览的主题：“早期日商棉纱厂工人们愤怒的控诉。”* 展厅被纵向分成两个大房间。一个房间里展示的是工厂工人斗争史，包括日本警卫枪杀顾正红事件，这是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线。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展品展示了解放前女工的生活。^①

墙上陈列着照片。一张照片是妇女和孩子们正在布满棉尘的车间看管机器。另一张照片是一个监工正在打一个倒在地上的女工。挨着这张照片是一段引用退休工人的解说：“对于日本工厂老板和管理者而言，痛打中国工人是家常便饭，他们咒骂我们：‘在上海找100只狗很难，但找100个工人却非常容易。’对日本人而言，我们中国工人甚至都比不上狗。”其他的照片则展示当女工们离开工厂前，她们通过工厂的旋转栅门，被搜查是否偷了工厂的东西，以及许多棉纱厂女工们居住的泥土地面的草棚。

* 1945年前，工厂由日商内外棉五厂、六厂、八厂和十二厂构成。

① 这一展览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参观以及展览的展示标签基础上，SSKLY：《五卅运动史料》重印版，第212—231页。

在房间的中心是一个玻璃展箱，陈列着女工曾每天使用的物品：一套服装——一条磨损的蓝棉布夹裤，一件长袖衫，一件前面印着白色数字的工作围裙；紧挨着的是一个小竹篮儿，顶部有提手但部分已解体，女工用这种类型的竹篮带午饭到工厂；几根竹签，旁边的一个挂牌解释说在日本工厂，工人们不得不向工头要求这样一个便条去上厕所。白色便条指允许小便，红色便条指允许大便。这次展览的展品成了解放前工人生活的标志。在其他工厂、博物馆、文化馆也有类似的展览，并且他们还公众提供许多受欢迎的历史手册。这些展览、手册被用来对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过解放前城市工人所遭受的贫困和压迫的年轻人进行阶级教育。^①

棉纱厂女工的日常生活很快被归纳为五六条习以为常的陈词烂调，在每一次展览上，在书中，或“诉苦”* 报告中重复出现：解放前的女工被拿摩温痛打；解放前的女工工作时间长，工资却很低；解放前的女工吃的是烂蔬菜；解放前的女工没有上厕所的自由以及解放前的女工要遭受搜身。总而言之，女工们过着典型的“牛马都不如的生活”。

工厂记录、纺织杂志、当代社会调查、报纸报道以及口述历史都证实了这些习以为常的陈词烂调。然而，这些记录也表明工厂的生活要比这种简单的描述更复杂多变：这些记录把在最困难时期最贫困的女性（日本占领期苏北女性）的特征，作为解放前整个历史时期所有女性的特征。事实上，解放前的整个历史时期跨越了若干个变化着的几十年。这一高度概括、简单化的描述含有三个主要的缺陷：时间划分的模糊；掩盖了工人间的差异；倾向于把女工作为被动的受害者。

首先，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7 年间，人们的生活标准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没什么明显变化，日本占据上海期间，人们生活异常

^① 例如，见《罪恶的旧社会》，《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诉苦”是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和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阶级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工人们和农民们被鼓励向人们诉说他们解放前的痛苦经历。

困难,例如,许多工人除了吃他们在街上捡到的垃圾外,几乎没什么可吃的;日本工头在工厂里辱骂中国女工;日本士兵在街上强暴她们。然而,日本占据上海的几年,仅能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解放的一小段时间。1937年前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的情形提供了一幅非常不同且可能更具代表性的工人生活的画面。

其次,这些概况性的描述忽视了女工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差异,这一差异是由她们的年龄、在家中的地位及经济状况决定的。生活在丈夫家的已婚妇女的经历非常不同于同其母亲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当已婚妇女工作时,也许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同样的,来自苏北农村的贫困移民女性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于其江南工友的生活。确实,江北女性生活在泥土地面的草棚里,仅有一套补丁衣服可穿。不过(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也有女性,特别是来自无锡和常州的女性,她们穿长袍、高跟鞋,有钱购买化妆品及做精致的发型。

最后,这些描述把女性看做被动的、不断遭受迫害的受害者,常常遭到工头和拿摩温的痛打、侮辱的搜身和难以容忍的长时间工作。在她们们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几乎没有时间炫耀或浪漫,但是,她们发现了生活下去的方法。例如,我们发现当她们应该工作时,她们却在她们的机器旁或在筒管上打盹;当她们需要离开一两天时,她们会安排她们的亲戚或街坊邻居来代替她们。工厂12小时的轮班制,常常使得料理家务或照顾孩子更加繁忙,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尽管如此,偶尔看一场本地戏演出或去佛教寺庙祈祷、上香是生活在上海的许多女工工作日中的大事儿。

为了弄清楚她们是如何减轻生活的苦难以及她们自身的苦难,我们设法重构上海棉纱厂女工的日常生活。* 这一日常生活描述了她们作为女性和女工的自我意识最终产生的社会现实。

* 接下来关于工作日的叙述描述的是1937年前棉纱厂工人的生活。日本占领期间以及1945年以后的情况将在后面讨论。

一天的开始

棉纱厂工人的一天从早上四点半开始,这时街道上仍比较黑,除了偶尔会看见一辆运载着许多新鲜蔬菜或一头切好的猪的马车驶过外,街上既寂静又荒凉。附近乡村的农民们赶着马车,把他们的产品运到上海的早市上出售。^①

更为常见的是工人没有钟表,如果她生活在工厂附近。凌晨四点半刺耳的哨音会把她叫醒。^② 不过,大多数女工要靠她们饲养的小鸡,晚上她们把鸡放在厨房。陈招弟回忆说:“当听到公鸡啼叫,我们就起床。通常它们大约是正确的,但不是一直都正确。有时,由于我们不知道确切时间,我们会非常早就到工厂了。不管怎样,只要公鸡一啼叫,我们就再也不敢睡了。”^③

黎明前,她就从床上爬起来。她必须小心翼翼,为的是不把同睡在一个房间的四五个人吵醒,房间的大小可能不超过10—15尺。^④ 她睡在铺有稻草床垫的木床上,一条靛蓝色棉布单,冬天使用一床棉布夹被。一年到头,为了阻止蚊子和苍蝇飞进来,一床黑蓝色的蚊帐挂在床上。^⑤

在动身去工厂前,她要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吃完早餐。第一件事就是汲水,她到最近的公用水管——或者是安装在里弄一头的水龙头取水,或者更常见的是到一口井或附近的小溪旁取水。^⑥ 王罗英(音译)回忆说:“我大概要花10分钟才能走到取水处,我们一天要取两次水。我

①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对早市的活动进行了生动的虚构描述。

② 对高俊(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5月11日和1982年9月27日。

③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④ 根据1929—1930年的调查,平均一个房间居住2.33个成年人,大约 $3\frac{1}{4}$ 平方米。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40—142页。

⑤ 拉姆森:“中国工人住房问题”,第144—145页。

⑥ 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43页。

们取回水后,把水倒进屋内的木桶里,我们会非常节省地用水。”^①如果附近有热水商店的话,她会花上一两分钱买一壶开水,要不然她得自己烧水。^②

接下来的工作也许是生炉子。先把木屑、棉秆、稻草放进底部隔层里,然后上面倒上一层煤球。炉子点着后,半个小时左右,煤就会烧热,生炉子的人坐在炉旁,用扇子扇火使火燃烧起来。^③因故,通常炉子是圆柱状的,用白铁桶制成,叫作吹气炉。冬天,炉子是人们唯一的取暖源。^④

大约早上五点,当她正蹲在炉旁照看火时,粪夫已开始收粪了。由于这里没有地下管道系统,人们要用夜壶,起床后他们把夜壶倒进桶里,放到门外。每天早上,粪夫把粪尿收起来。他们推着粪车穿梭于上海工人街区的大街小巷,叫喊着:“倒马桶了!倒马桶了!”^⑤

她烧开一壶水后,一部分用来洗脸,剩余的做泡饭。用开水把米饭加热。早上,她不会花时间来煮一锅新米饭,而是通常在晚上煮米饭,然后把剩余的米饭留到第二天早上做泡饭,这是上海工人标准的早餐。有时她加上一些腐乳、腌制的蔓菁或咸鱼。^⑥早饭后她把剩余的冷饭倒进

① 对王罗英(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2月25日。

② 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43页。

③ 对王罗英(音译)的采访;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55页;周而复,第88页。

④ 钟,第44页。

⑤ 薛,第171页。也见拉姆森:“中国工人住房问题”,第144—145页。工人街区普遍没有抽水马桶。大多数上海人不得不用夜壶。鲍威尔(John Powell),《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编辑,曾抱怨:“除了一两栋新建筑矗立在外滩外,公共租界既没有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现代管道。抽水马桶和荧幕、电扇一样,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洗手间配备圆形陶瓷缸,人们可以坐在里面洗澡;同时还配备称做“马桶”的卫生设施,马桶是由顶部有一个洞的方形木盒和陶瓷便桶组成。早上男仆收集马桶,把收集的粪尿卖给农民做肥料。鲍威尔,第25—26页。

⑥ 对王罗英的采访;钟,第44页;朱邦兴等,第78页。

竹篮里,作为午餐带到工厂。^① 为了避免被认出是工厂工人的尴尬,一些女工在上班离家前会用报纸包上她们的饭篮子。^②

上工

早上五点半,工厂的哨声再次吹响,提醒住在附近的工人到了该离家上工的时间了。她们步行上班,戏称为乘 11 路公交车。^③ 那些住得较远的工人必须更早些动身。王富英住在宝山县,她每天早上要花 1 小时步行到杨树浦的怡和厂上班。1916 年生活在上海的一个外国人对一年轻女工每天不得不步行两小时才能到工厂的情景印象相当深刻:

由于到工厂要花费她两小时的时间,她每天早上四点就出发了。……许多时候经常是月光正亮时,女孩却错把它看做黎明前的曙光,三点或更早些就动身了。晴天步行并不坏,最初是独自一人,不久她就能加入相同方向步行上班的其他工厂工人的人群中。但是在寒冷的冬日,刮着凛冽的风并下着雨,泥泞的道路有滑倒的危险,会怎样呢? 对于缠足的女性而言则最为艰难。^④

因为害怕遇到街痞恶霸,她们从不独自一人上班。王富英回顾说:“最初,当我还很小时,每天早上我父亲送我上班。后来,我和我哥哥、姐姐一起去上班。”^⑤ 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女孩儿们相约一起结伴去上班。陈招弟解释说:“哦! 我们从不独自一人去上班,我们经常是一起去。我

① 不是所有的女工都在早上做这些工作。这主要取决于她的家庭构成以及她在家中的地位。一位工人记得当她年轻,刚开始工作时,“我母亲烧饭,早上她照看我们起床、做早餐。我那可怜的母亲——她不得不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名女青年基督教协会的工人发现在自己父母家生活的女性要比那些生活在未来婆家的女性更幸运。生活在未来婆家的女性上班前,被指望早起,为她们自己及家人准备早餐。见白:“纱厂里女童工的生活”,第 66—67 页。

② 对徐淑梅的采访。

③ 对高俊的采访。

④ 高梅韦尔,第 223 页。

⑤ 对王富英和她儿子的采访,上海,1981 年 7 月 2 日。

们三人住在同一条街上。你来我家等我或我去你家等你,我们将聚到一起上班,要不不安全。”^①许多女工步行上工要穿过苏州河、黄浦江,或一条流经上海的运河。当她们到了岸边,要乘小船摆渡过去。这些船经常出事儿,如发生在1921年冬天一个晚上的事故:

两天前的晚上,来自闸北的十多个男女工人,他们在苏州河岸登上一艘摆渡船,去西郊的一家棉纱厂上夜工。船虽小但却载着许多人。当船摆渡到河中央时,突然卷起一阵大风,船上所有工人都落水了。生活在船上沿河而居的船民立即抢救他们,但是已有五六人被浪卷走了。^②

轮船的出现使得乘摆渡船过河特别危险,在黄浦江上翻船、沉船的事件更加频繁。

有些女工乘手推车上工,她能够担负起大约1个月1块钱的乘车费。高梅韦尔写道:“上海的手推车是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其价格低廉,是中国人的某一阶层,特别是上下班的妇女和孩子们喜爱的出行工具。经常是八个或十个人拥挤着,两腿垂下来分坐在车两侧。曾经看到一个苦力推着手推车,11个妇女和女孩儿坐在车上。”^③

早上去工厂上工的女工的穿着各式各样,通常她们的穿着反映着她们的家乡的风格和习俗。同时,她们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也依赖于她们自己或她们的家庭能够拿出多少钱来购买。一些家庭预算太紧,女工只能拥有两套衣服——一套冬装、一套夏装。每年夏天一来临,她们就把自己的冬衣拿到当铺换些钱,冬天一到她们就把她们的夏装典当了,把她们的冬衣赎回来。^④

排在工厂大门前的女工,有些穿得非常精致,甚至是“既漂亮又时

①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② “夜里渡苏州河男女工的悲剧”,《劳动界》,1921年1月,第23卷,第8页。

③ 高梅韦尔,第92页。

④ 对徐红梅的采访;朱邦兴等,第80—81页。

尚”；一些人还带着耳坠或项链。^①在杨树浦的永安三厂，许多女工的穿着太过时尚，以至于在1939年管理者发布了有关着装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禁止女工穿着高跟皮鞋上工，禁止烫发、化妆。管理者解释说：“这样穿着违背了工厂的卫生状况。”^②另一方面，在有些工厂，特别是日商厂，好的着装是获得工作的先决条件，这就意味着一些女性不得不超支来买衣服。一个生活在工厂区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解释说：

每天早上，很早你就会看到数百名女工，每个人的着装都非常整洁，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一些人当然会认为她们很满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位女工曾对我说：“穿那么漂亮并非我们所愿。而是因为工厂管理者。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看起来不好看或衣衫褴褛，他们就不会不会喜欢我们，而且甚至可能解雇我们。因此，我们宁愿吃得差些，不要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穿得好些。”^③

穿着各异的女工们聚集在工厂大门附近、人们会看到走路蹒跚的裹脚女工、穿布鞋的女工、穿高跟鞋的女工、穿黑色或条纹裤子和褪色的绿色或蓝色夹克衫的女工以及身着长袍的女工、盘头的老年女工、梳辫子的、短发的甚至卷发的年轻女工。一些人已走了两个小时的行程；一些人离开工房到隔壁的工厂仅用几分钟；一些人步行和摆渡；一些人坐手推车。

在工厂里，几排由包工头带领从工厂工房出来的包身工队伍将加入聚集在工厂大门口附近的女工队伍。当夏衍在日商厂工作时，他发现：“这样两个群体在路上几乎很少交谈，也许外面的女工对她们冷漠的原因，是由于她们看不起这些乡村女孩令人生厌的乡村打扮以及她们奇怪的方言。”^④同样的原因，来自上海或江南城市的女工通常不与来自江北

① 杨美真：《杨树浦衣食住》，第7页。

② “上海永安纱厂改革女工恶习”，《国际劳动通讯》，1939年第6卷，第2期，第74页。

③ 钟，第43页。

④ 夏，第53页。

的女工——尽管她们不是包身工——交谈。

在工厂门口的人群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仅一个班次就有 1000 多名工人工作的棉纱厂为街头的各种小商贩提供了丰富的潜在客源。大多数摊位出售点心、小吃、面条、猪肉云吞面、糯米粉汤、甜蛋糕、糯米糕或大饼。如果有时间和钱的话，在进厂前，女工们可以花几个铜板买一碗面条当早餐吃。一些人买来大饼带进厂，当她们工作时吃。可能食品摊位吸引的顾客最多，不过，这儿也有小贩卖化妆品，如小木梳、脂粉和口袋镜。^①

在工厂

早上五点四十五分，第三遍哨子吹响，巨大的铁门打开了，工人们鱼贯而入。尽管日工是在早上六点开始，但是每个工人被要求提前 15 分钟进厂，这样，她能够提早来到她的机器前准备接管即将结束工作的上夜工的工人。这就使得机器能够持续运转。^② 迟到的工人要受罚。在申新五厂，工人迟到 5 分钟被罚 3 分钱，迟到 10 分钟被罚 5 分钱，迟到 15 分钟被罚 10 分钱。^③

当女工经过大门时，她必须向门警出示她的工牌，以证实她是工厂的职工。在工厂拥有一份固定工作的女工经常帮助她的姐妹或亲戚溜进工厂学习生产纱的技术。工牌的使用不能完全杜绝这种行为。女工把她的工牌给偷学技术的人，然后告诉门警她的工牌丢了。一些人甚至要求办新证，把原来工牌上的名字改掉。这样，学技术的人能继续使用

①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 60 页；“怡和女工的日记”，《女青年月刊》，1936 年第 15 卷，第 4 期，第 21 页。

② 朱邦兴等，第 34 页。有几家工厂要求工人提前半小时到厂。对高俊、史晓梅的采访，上海，1980 年 5 月 11 日。

③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 1 卷，第 177 页。永安厂罚款与之相同。见 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 85 页。

它。这种做法很常见,以至于一些工厂对那些被发现的人给予罚款:丢失工牌罚款5分钱,改换姓名罚款3分钱。^①

进厂后,每个工人都把她的工牌交给一个看管员,同时,看管员则给每个人一张号牌。把所有工人的工牌都收上来后,看管员就拿着这些工牌到工资部,在那里工牌被打上印戳以证明该工人已来上班。打好戳的工牌被送到车间,然后拿摩温将其返还给工人,并同时把号牌收上来。^②

当女工进入车间后,她只有几分钟穿上“油服”(工作服的俗称)。在一些工厂,如日商同兴厂,工厂管理者发给工人们工作服。不过,大多数工厂没有规定的服装,他们只要求工人们穿工作围裙,工作围裙的前面印有数字,后面系有带子。女工通常在围裙前面缝上一两个口袋来放线轴盒、剪刀或其他在工作中使用的工具。^③

六点钟第四遍哨子吹响,夜工工人结束了她们的工作,换掉他们的衣服,同时日工工人立即接管了机器。

在车间

不同工厂情况各异,莫泽——一位美国工厂视察员,这样描述最大的华商棉纱厂中一个厂的车间:“既脏照明效果又差,机器设备和窗户上布满了棉絮。”^④总的来说,日商棉纱厂给观察员的印象要比华商或英商纱厂更清洁、维护得更好。高梅韦尔这样描述“在建筑和设备上代表着当时最新思想”的上海日商厂:“水泥砖墙,牢固的混凝土地板,锯齿式的屋顶,一面有玻璃,使光线更加充足。”^⑤

不管工厂主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英国人,所有的工厂车间有些特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177页。

② 方(Fong):《中国棉纺织业和贸易》,第1卷,第134—135页;对高俊的采访。

③ 朱邦兴等,第80—81页;白,上海,第52—53页。一些工厂除了发“油服”还发“油鞋”。

④ 莫泽,第69页。

⑤ 高梅韦尔第222页。

征是共有的,即噪音和棉尘。在细纱间湿热的空气中,棉尘是最为明显的。夏衍观察到:“精纺粗纺间的空间,肉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

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拆包间和钢丝车间更可不必讲了。……在那种车间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儿就会一律变成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在室中飞舞着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托的场所……做12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①

一排排的细纱机产生那么大噪音,以至于如果女工不大声叫喊或直接对着对方的耳朵说话,就不能被听到。在织布间,噪音甚至更糟糕:在发动机声隆隆的背景下增加了在织布机梭子来往穿梭时有节奏的撞击声。在这里甚至大声叫喊也是徒劳的。工头们经常用衔在嘴里的口哨来命令工人。② 为了不与机器的噪音一争高低,许多工厂已有“一个慢慢旋转的六面体悬挂在厂房的一根梁上,在厂房的任何位置都能够看到它,在六面体的每一面尽可能简化地向工人描述着如何简便地操作机车。”③

工作节奏

从早上六点接管机器一直到下午六点夜工工人接班,在整个工作时间内,不同车间及不同工作类型的女工所做的工作各不相同。例如,在细纱间,接头工、落纱工和扫地工,她们每人都有细微不同的工作规则。

① 夏,第15—16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英国经济代表团:《棉纱代表团的报告》,第54页。

既然接头是工厂里最为普遍的一种工作，我们将看一个接头工在一天内是如何工作的。

一天 12 小时的工作时间内，一个接头工的工作范围是在两排细纱机之间几尺宽的过道。由于她比细纱机矮一两尺，她看不到在她另一侧的一排排的纱架。她靠打在运转的机器顶部的数字来辨认自己的纱架。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站在纱架前。在她的旁边，几个女工负责同一纱架的其余部分，她后面的一些女工照看过道对面的纱架。她的纱架被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木管，每个木管 6 个纱锭。每个接头工负责一定数量的木管，根据她照看的木管数量来支付她的工资，在大多数工厂里，一个接头工至少要看管 12 个木管，一些人能同时看管 24 或 30 个木管。^①

照看一个木管主要是当棉线在筒管上缠绕时，把断头的线接上。她一看到断头就马上跑到那个筒管前抓起线头，把它们缠绕在她的食指上，然后用拇指把线头滚搓几下形成一个结。这个结必须要小，否则当最终织成布时，这个节就会成为布上的瑕疵，当打成结后，接头工用剪刀把多余的线头剪去。一个新手完成这个动作足足要花去一分钟，但是要得到这份工作，要求接头工一分钟能接上 6 个断头，或 10 秒钟接上 1 个断头。

一天的大多数时间，接头工都在设法跟上断头儿。有时她刚接好一个头就迅速发现另一个断头儿，有时同时会有几个线头断掉。线断的频率取决于原棉的湿度、质量以及机器的湿度、质量。^② 有时细纱间的女工在机器传送带上放上细沙来减缓机器旋转速度，这样就降低了断线率。^③

大约每隔半个小时，接头工就用一个小刷子把积在机器表面上的线头刷掉。一天两次，即早上九点和下午两点，她必须要对她看管的区域进行大清理。由于棉絮一直在空气中飘荡，几小时后细纱机器所有裸露

①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 53 页。

② 周而复。

③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 56 页。

的部分覆盖上了薄薄的一层白色棉絮。接头工要用刷子刷掉她面前的环状金属板和钢板上的棉絮。^①

一天内男工要为细纱机加几次油。当纱锭缠满后，落纱工迅速过来将其取下，放进大箱子里。他们把装满的箱子放在过道里，隔一段时间就有男运送工把它们带到经纱间和织布间。

在细纱车间里，负责一部分区域工人的拿摩温们在车间走来走去，以确保每一个工人都在工作。一个工头负责整个细纱间。不同工厂这些管理者管辖工人的范围各不相同。一名英国工厂的视察员发现：“有时，人们看到手持一根小手杖的工头来回走着，用手杖打那些不认真工作的年轻操作工的手掌。”^②有时他们更为残酷，甚至打那些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工人。

在细纱车间，有少数男拿摩温，他们在日常管理中经常对女工进行性骚扰，当他们在车间视察时，同女工调情、拍打她们的脸。^③他们调戏的女工，要是不顺从的话就很可能被惩罚甚至被解雇。由于她能否被分派到车间工作完全取决于拿摩温，因此她几乎不敢破坏同他的关系。王罗英回忆说：“要是男工头的话，那么如果这儿有没配偶的年轻女孩儿，他就想要她们做他的性伴侣，陪他睡觉。如果女孩儿顺从了他，他会给她安排更舒适的工作……如果不顺从男工头，他会给她安排又糟糕又辛苦的工作。由于这种情况，一些女工离开这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工作。”^④《上海日报》经常报道类似日商东华厂某女工的故事：三个工头调戏她，她拒绝了，为此她遭到毒打，受伤严重。^⑤

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二三纺织厂概况》，第 31 页。

② 英国经济代表团：《棉纱代表团的报告》，第 54 页。

③ 叔雯：“上海纱厂女工的生活现状”，《女声》，1933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7 页。

④ 对王罗英的采访。

⑤ 《申报》，1924 年 5 月 2 日。

休息

女工与拿摩温的关系并不总是敌对的。例如,有时当女工们需要休息时,拿摩温同她们是合作的。在所有的日商厂工头们都是在上午九点到茶室休息半小时。如果车间的拿摩温有同情心的话,接头工能利用工头不在的时间休息。只要工头离开,女工就走到过道里,关掉她看管架子上的机器,正旋转的筒管立即停止转动,正在往筒管上缠绕的线也在那静止下来,拿摩温或其他操作员中的一个人将放哨,看到工头回来就暗示工人们恢复生产。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被抓住,就会被罚款或被开除。^①

尽管工头没有离开车间,由于接头工在她的过道里来来回回跑着接断头,几个小时下来,满身全是汗,并且会很累,因此她们仍需要非正式的休息。当她坐下来休息时,被朋友或亲戚带进细纱车间的几十个女孩很感激接头工能给她们练习接头的机会。

这时,接头工可能想上厕所,每个车间都有一个厕所,不过(如前面解释过的)。如果没拿到上厕所的竹签的话,女工不能使用厕所,想上厕所的工人要等拿摩温经过她的细纱机,然后向其索要一支竹签。竹签数目是固定的,如果其他人正在使用竹签,她不得不等待拿摩温的再次到来。^②

在厕所门口,她会遇到女看守,在她被允许入厕前,要检查她的牌子。同时,她也负责确保女工没把棉花或棉纱作为擦手纸带进厕所;如果她抓住这样做的女工,她将立即向工厂管理者报告。^③

看守要确保女工在厕所内不能呆太长时间,因为许多女工延长在厕

① 朱邦兴等,第37页。1925年罢工的成果之一就是争得了休息权:每天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一次在上午的9:00,一次在下午的3:00。然而,1932年日本袭击上海后,在日商厂这项权利被取消,不久后华商厂也随之取消。唯一的例外是华商鸿章纱厂,但是只有一群男工享有这一特权。

② 对王罗英的访谈;SSKLY:《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14—215页。

③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131页。

所的时间来休息。如果看守认真地执行公务,她会定期地冲进厕所查看女工是否在聊天或梳头。要是女工被抓住在厕所梳头的话,要被罚一天的工资。^①

由此可知,安排非正式的休息——关掉机器,让练习工代替,或上洗手间——是调节女工工厂生活的一部分。一位女工回顾她曾被富有经验的女工打发时间的懒洋洋态度所震惊。在她上工的第一天,她写道:

“我的脚开始痛,我的腰也正在痛。我看到……人们偷偷地坐在地板上休息,我很害怕,不得不站在我的机器前,查看断头。最终我真的再也坚持不住了,我决定休息。我向阿喜(介绍我进厂的女工)示意,让她和我一起去洗手间。我蹲在马桶上,就不想再起来。阿喜一直坐在那儿,我不想成为招呼我们起来的人,尽管我很早就小便完了。我在那坐了10分钟,最后当阿喜叫我时我好像睡着了,然后我们返回了机器旁。”^②

工人们唯一的正式休息时间是午饭时间,在大多数工厂,他们允许半小时的吃饭时间,通常在十点开始,不过有时直到中午才开始。^③ 尽管大多数工厂有餐厅,但只是对工头、办公室行政人员以及管理者开放;工人们在她们的机器旁吃午饭。当到了吃饭时间,她们就把她们的上面是豆腐乳、咸鱼或蔬菜的冷饭带到热水管前,把餐篮端在水龙头下,让热水浇在米饭上,然后从底部滤出。热好饭后,她们就返回她们的机器旁吃饭。^④ 在日商厂,吃饭时间机器会被关掉。然而,在大多数华商和英商厂,午餐时间机器不停,因此女工们要轮流吃饭:当一群人吃时,另一群人照看她们自己的以及正在吃饭的工友的机器。^⑤ 人们经常抱怨这样的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180页;也参见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84页。

② 白英:“做工的头一天”,《女青年月刊》,1936年第5卷,第6期,第29页。

③ 朱邦兴等,第37页。

④ 高梅韦尔,第224—225页。

⑤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53页;朱邦兴等,第37页。

环境不卫生,因此,永安厂的管理者允许工人在餐厅使用蒸饭箱(能放 50 多个餐篮)赢得了人们的赞扬。^①

每一个工厂都有许多刚生产的妇女,这些妇女在午餐时间不仅要自己吃饭而且要给她们的孩子喂奶,一些母亲偶尔会给她的孩子服点安眠药,这样,当她们的孩子在车间睡觉时,她们可以工作。^② 上海童工委员会报道:“在许多工厂,在转动和嘈杂的机器中间摆放着一排排的篮子,里面放着婴儿或小孩子,他们有的睡着了,有的醒着。”^③有些年轻母亲在她们工作时,把她们的婴儿背在背上。这样做的好处(大多数工厂管理者表面上禁止这样做)是她们能够给孩子喂奶,同时又不影响工作:许多女工“在给孩子喂奶时,继续工作”^④。

对把她们的婴儿放在家里的大多数母亲而言,给孩子喂奶的过程比较复杂,家里的某个人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工厂来喂奶。一个女工回忆说:“我生产后,每天中午我母亲就把孩子带到工厂,这样我能给孩子喂奶……在同一时间我既要吃饭又要给孩子喂奶。”^⑤1949 年以前,没有一家工厂有婴儿室;然而,有几家工厂留有“哺育室”,家庭成员仍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工厂,不过不用站在工厂门口,他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孩子带进厂,带到哺育室找他的母亲。之后,再把孩子带回家,女工则返回她的工作岗位。^⑥

① 朱邦兴等,第 78—79 页。

② 布勒(Bulle),第 11 页。

③ RSCLC,第 548 页。

④ 方福安(音译)(Fang):《中国劳工》,第 38 页。

⑤ 对余蓉(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 年 3 月 30 日。

⑥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 57 页。工人抱怨在 1931 年,当荣氏家族收购三新厂、建申新九厂时,管理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哺育婴儿这一事情上,强制执行更加严格的规章。在过去工人们来去自由,孩子们能够被带到车间喂奶。但是,申新九厂的管理者不允许工人这样做,工人不能自由进出,孩子不能被带到工厂。孩子必须留在家中,当到了喂奶时间,由某人把他们带到工厂大门,女工可以在那儿给她们的孩子喂奶。见 SSTJY,荣家,第 1 卷,第 590 页。能雇起奶妈的妇女则没有让人带孩子到工厂来的顾虑。拉姆森采访一个女工,她一年要付给奶妈 72 元,自己一年挣 220 元。见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 1057—1058 页。

一直纺纱到下午六点

午饭后就没有正式休息了。接头工继续照看她的机器，下午是上午的重复。常规清理，加油工、清扫工、运筒管工、工头等的到来，以及偶尔的上厕所常调节这单调乏味的工作。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另一班的工人到了，准备接管机器；下午六点钟哨声响起，12小时的班结束。^①日工接头工准备离开，她换掉她的“油服”，离开车间前可能要迅速地梳理她的头发，涂抹一点脂粉，照一下小口袋镜。^②

女工到出口后，在允许离开工厂前，必须被搜身。在棉纱厂出口处，设有一路障防止工人们不接受检查就冲出去，路障是木制或铁制的，或者是一个弯弯曲曲的“迷宫”，或是一个旋转门——在同一时间只能允许一个工人通过。^③许多工厂在工人进入路障前，会被鼓励交出他们可能试图从工厂里偷窃的任何小物件。一个美国商业代理人这样描述：“靠近路障的柱子上有几只红盒子，一支白色的大手指向打开的盒子，底部印有如下文字：你把什么东西放进你的口袋里了吗？问你的心，你想偷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立即把它放进这盒子里。大约在14天内每一支盒子都会装满各种废弃物、筒管、碎布等。”^④

不管她是否自愿交还偷窃的东西，她都不得走进单行线经过路障。男工或女工分别站成分开的两行，女门卫检查女工，男门卫或锡克

① 实际上在1945年前，每个工厂都有12小时班制，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从上午6:00到下午6:00，申新一厂是唯一的例外，1925年前，申新一厂上午4:30上班，下午5:00下班。扣除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正好是12小时班。郭鉴清、仲祖龄，第35页；另一个例外是织布间：织布间晚上不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日工一直持续到12—16个小时。见SSKJY：《恒丰纱厂产生发展与改造》，第511页。

②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52—53页。

③ 莫泽，第70页；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85页。

④ 莫泽，第70页。

警察检查男工。^① 排队等待检查使工人花费在工厂内的时间增加了一小时。到她离开工厂时,她的头上、衣服上粘了一层白绒毛,她已在厂里呆了近 13 个小时。^②

回 家

当女工离开工厂时,她常常不得不对付那些想借机调戏女工的男工人们。1935 年一份日报报道:“晚上,麦克脱路(今马丁路)永安工厂的工人一下班,男工人们常调戏和挑逗女工,常引发斗殴。这一时间,在附近的普陀路和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制定了详尽的专门政策以维持秩序,防止麻烦。昨天,巡捕不得不动用警力驱赶正在找女工麻烦的一群男工。从警方那里逃脱的一位女工不幸掉进苏州河,在她获救前淹死了。”^③

更严重的威胁是在工人街区闲逛的地痞恶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隶属于附近的帮会:黑虎帮、白虎帮、第一龙等等。^④ “你能从他们的着装辨别地痞恶霸。”在棉纱厂工作一女工回忆说:“男地痞恶霸穿着西装、大衣、卷着袖口的中式长袍。通常在他们的胳膊上刺有文身。他们还戴一顶帽子。”^⑤这些地痞恶霸一直是女工日常生活中的敌人。

性骚扰是他们造成的最显著的威胁。以前的拿摩温荣佩秋(音译)回顾:“地痞恶霸在工厂门口伺机等候,如果你长得漂亮的话,他们会强迫你同他们睡觉。”当女工们走在从工厂回家的路上时,徘徊在街道上的地痞恶霸就调戏和追赶她们。甚至在家也不是躲避这些地痞恶霸的天

① 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 85 页。

② 哈瑞森。

③ 晚新闻,1935 年 7 月 25 日,引自刘大春(音译)(Liu Ta-Chun):《上海的成长和工业化》,第 169 页。

④ SSKJY,上海棚户区的,第 24 页。

⑤ 对朱发女的采访。

堂。某一女工回家时，她接连几天被一地痞恶霸盯上了。一天晚上九点，当其他所有人都出去了，他闯进了她的房间，强奸了她好多次。^①有势力的地痞恶霸，诸如西部著名的吴房章，经常威胁女工做他们的情妇。一位女工回忆当她离开丈夫带来的压力让她难以忍受时，她不得不暂时辞去工厂的工作。^②

但是，性骚扰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对于当地帮会来说，挣工资的女工是不可忽视的收入来源。地痞恶霸们编造各种理由来试图瓜分女工在工厂挣的工资。一些理由如果不是难以置信，就是极富想象力的。然而，许多女工都有类似的经历，因此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工人生活中的常事。

一种敲诈勒索的方法是控诉一个女工和她的丈夫犯通奸罪，然后迫使他们赔付以弥补他们的清白。可能会发生类似下面的情形。一女工和她的丈夫一起步行上班，由于正在下雨，他们一起依偎在同一把伞下，当他们快到工厂门口时，突然一个地痞恶霸挡住他们的路，叫嚷着要控告他们。他喊着：“那是我的妻子，你想同她私奔！”为了解决这一“误会”，这对夫妇不得不给恶霸地痞一些钱。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他就强迫他们到警察局，在那里他对警察坚持说那女性是他妻子。由于恶霸地痞通常同警察（他们自己通常是帮会的成员）沆瀣一气。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公平正义。警察和恶霸地痞都能从这对夫妇那里得到钱，这样，他们才能被释放。^③

恶霸地痞从男女工那聚财的另一花招是声称其身体被伤害，要求赔偿。例如，当一个女工下班回家时，一个恶霸地痞故意撞她，指责她伤害了他，坚持要她赔偿。或者他可能把一女性绊倒，指责她损害了他的鞋。买杂货为这种行为的另一变种提供了机会。当一小贩把一舀腌菜倒进

①《申报》，1930年5月26日。

②对席佩玉的采访；SSKLY：《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17—219页。

③对席佩玉和朱发女的采访；也参见SSKLY：《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16—217页。

女性手持的容器时,恶霸地痞可能故意碰撞小贩的胳膊,使咸水撒到他的衣服上。买腌菜的女性要承担责任,不得不赔偿。^①最后,还有一种方法,被称做“牵羊”。一恶霸地痞抓住一女性,偷她的衣服,然后把衣服卖掉,同时,他经常也抓住机会强奸她。(偷小孩儿衣服叫“牵蛙”;如果受害者是成年男人,叫做“牵猪”。)^②

对比这些行为,从女工那里诈取钱财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简单地提出来,这一定看起来较文明。一个工人解释说:“在任何他们能想到的场合——假日、结婚、生孩子、生日或葬礼——他们就会给我们街坊邻里的每一个人送去请帖,当你收到了请帖,你必须要给他们送钱过去,否则他们会过来,把你毒打一顿。我们通常送一两块钱,大约是一个月工资的1/5。”不只是收到一个恶霸地痞的请帖,我们从许多恶霸地痞那里都收到过请帖。^③那些不送钱的人立即遭到斥责。一个名叫杨美英(音译)的女工没能满足恶霸地痞的金钱要求,他三番五次派他的手下要她去拜望。他们揪她的头发,把一些头发揪了下来。这类事情一直在发生。^④

显而易见,大多数这些勾当是男恶霸地痞干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痞恶霸都是男性。一个女工称:“啊!许许多多恶霸地痞是女性!”“你能分辨出哪些女性是恶霸”;另一个女工补充说:“她们穿得非常好。她们穿绸缎长袍、戴金项链。”^⑤

一些女地痞恶霸放高利贷,有些经营妓院。许多人绑架小女孩子,把她们卖给妓院。“在上海最常见的犯罪之一是绑架。”1916年,高梅韦尔在访问期间报道:“大多数劫持犯是妇女,这项罪恶交易的利润是如此丰厚,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干这一行当。劫持犯变得既敢于冒险又诡计多端,她们抱走在街上玩耍或做事情的孩子们,甚至从她们自家的门口诱

① 对席佩玉和朱发女的采访;也参见SSKLY:《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16—217页。

② 对韩金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2年10月11日。

③ 对王高坤(音译)的采访,上海,1982年10月6日;也参见SSKJY,上海棚户区的,第25页。

④ 对杨美英(音译)的采访,上海,1981年5月10日。

⑤ 对席佩玉和朱发女的采访。

骗或抢走她们……漂亮的小女孩儿经常容易处置，或卖给妓院或卖给某户人家作家奴或童养媳。”^①许多劫持犯是青帮成员，自 20 世纪初期起，青帮成员既有男性，又有女性。^②

想方设法使自己免于帮会的伤害是在上海的工人街区生存的关键。许多女性同她们的朋友“拜姐妹”，许诺上下工时相互保护（见第八章）。然而，常常是只靠其他年轻女性的帮助，抵抗地痞恶霸是不够的。许多工人发现，实际上加入帮会或同帮会头头建立正式的关系是免于侵扰的唯一有效方式。朱发女回顾：“男工寻找男地痞恶霸的保护，女工寻找女地痞恶霸的保护。当男工拜地痞恶霸时被称做拜‘老头子’，当女工这样做时，被称拜“干娘”或拜地痞恶霸的妻子。当你找到愿保护你的人时，你要给他或她送礼。这样如果其他恶霸地痞欺辱你，你可以告诉你的保护人，他或她会保护你。”^③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女工经常拜她车间的拿摩温为“干娘”。通过选择拿摩温，女性既能使她的工作得到保障又能使她的人身安全得到保护。

同样地，由于害怕男女恶霸地痞，女工一直都被护送回家。下工后小女孩儿有时常被她的母亲接回家。顾莲英回忆说：“一直到我 13 岁，每天晚上我的母亲都会在工厂门口接我，和我一起步行回家。”^④女性经常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她通常有来自同乡的朋友依靠。“当我们下工后，一起步行回家。下工后我们聚在一起的人并不多，因为每个人都要回家，直到第二天都要再次见面。”^⑤

一般，女工到家就已晚上七八点钟了。由于第二天早上必须四五点起床，所以九十点她就要上床睡觉了。那么，晚上的时间仅两三个小时——除了吃饭、洗涮、准备上床睡觉外，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

① 高梅韦尔，第 210 页；也参见《上海黑幕一千种》，第 1—31 页。

② 《青红帮考议》，第 124—128 页；谢诺：《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的秘密社团》，第 50 页。

③ 对朱发女的采访。

④⑤ 对顾莲英的采访。

准备晚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因为晚饭是一天中的主餐，唯一一顿新鲜的烹调。大多数蔬菜必须每天购买。^①在工人生活区没有大市场，只有肩挑货物的小商贩，他们走街串巷，兜售新鲜蔬菜、鱼和豆腐乳。蔬菜的种类取决于季节。不过，白菜、洋葱、蒜、红薯、蔓菁差不多是一直都能见到。春天，上市的蔬菜有毛豆、菠菜、芹菜、草头、青刀豆以及西红柿。豆腐乳产品整年都能见到，与肉相比，是工人阶级更为常见的菜。^②

买好一篮子的菜后，接下来她们得把菜洗干净。有时她们用早些时候挑到家中的水洗菜，要不然她们需要再去挑两桶水。许多女工则是把蔬菜拿到附近水管或井或小溪旁，和邻居们一起把菜洗净，除去菜梗。当一切就绪后，她们把一些煤球填进炉里，等它烧热后，开始做米饭、烧一两盘菜。

并不是每一个工厂女工都要准备晚餐。她是否要烧饭，主要取决于她的家庭构成以及她在家里的地位。例如，如果她是一个小女孩，她母亲不再在工厂工作，很可能她母亲在她下工到家前已买好菜，准备好晚饭了。在许多家庭里，祖母或外祖母烧菜、做饭。不过，如果是年轻的妻子或童养媳同她的婆家住一起的话，她会被要求烧饭，尽管她的婆婆没在外做工。^③有时，由谁来烧饭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是为了方便，在一些情况下，家庭的男成员烧饭更为便利些。同她的丈夫在同一工厂不同车间工作的一个女工回顾说：“只要谁有空或第一个回家，谁就烧饭。”其他人也讲述了类似的习惯。^④

当然，有些女工在上海并没有家。许多人是独自一人移居到上海的，她们在某个朋友的房间中租一地方，根据契约来安排她们的晚饭。通常来说，如果一户工人家庭想要多花些钱为七八个非家庭成员做足够

① 仅有家境好的家庭可能买得起冰箱。甚至在今天，极少数人家有冰箱。

② 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10—151页。

③ 白：“纱厂里女童工的生活”，第66—67页。

④ 对退休工人樊卦龙（音译）的采访，1980年4月22日；对史晓梅的采访。

的饭菜,这些年轻的单身工人需要每个月支付六七块钱。^①一些人在“露天餐厅”烧、吃一顿非常快的饭菜,所谓的“露天餐厅”通常是:在工人生活区的主街道旁边摆放上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放一把板凳,在桌子前面放两个煤炉,上面坐着两口锅:一口锅里盛着热腾腾的米饭,另一口锅里盛着有点肉或鱼的蔬菜。^②

他们吃完晚饭和清理好后,对大多数女性来说这一天就结束了。一个叫史晓梅的女工回忆说:“晚饭后,我们就不再做什么了。电灯——哦,用电要花钱。所以我们没有电灯。我们正好可以早些睡觉。”^③

夜工:工作夜

尽管政府规章和社会改革家坚决反对 24 小时生产运作制,但工厂管理者仍坚持这一制度。尽管夜工在大多数方面和日工相同,但两种班并不完全一样。不同之处是:夜工女工在厂外睡得少,在厂内睡得多。

正如我们已知道的,夜工工人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到班,六点开始工作。她们一直工作到半夜,她们会有一刻钟或半小时的晚餐时间。^④从凌晨一两点一直到早上六点晚班结束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许多工人都会在这段时间里打盹。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哈瑞森在她访问上海期间写到:“对于任何一个从未看过夜工工作的人来说,在凌晨四点左右参观工厂能让人大开眼界。从正在睡或半睡的工人身上判断,人们很想知道,除了有任何其他考虑,上夜工怎么能是一件值得的事。”^⑤许多女工打

① 钟,第 44 页。在 1930 年上海社会局关于 305 户工人家庭预算的研究中,其中有 75 家有寄宿的工人和他们一起吃晚饭。见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 91 页。

② 屠,第 3 部分,第 10 页。

③ 对史晓梅的采访。实际上,大多数工人阶级家里没有安电。人们靠烧煤油或本地产的油油的油灯照明。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 1551 页。在对 305 户家庭的研究中,有 274 户(89.8%)用油灯。

④ 朱邦兴等,第 35 页。

⑤ 哈瑞森。

盹并不一定降低生产率。通常当一个女工休息时,其他人接管她们的工作,然后她们轮换。^①

得知车间的实情后,许多工厂管理者采取措施帮助工人在夜间保持清醒。大多数工厂至少会给夜工工人发一张大饼和一根油条。在享有相当现代化声望的永安厂,“工厂会给我们每个人两块饼干吃,然后,凌晨三点,每个人还会得到一杯咖啡,这样我们就不会睡着了。”^②尽管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很少有女工能在整个夜晚一直都清醒地工作。

对一些女工来说,能多睡一会儿使得上夜工优于上日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位中国工人,解释了废除上海工厂夜工制的原因。当她得知女工们喜爱上夜工后感到吃惊。1928年,她写道:“那些看到女工上夜工的社会效果以及上夜工对女工自身和对社会影响的人,觉得应该禁止女工上夜工。然而,女工可能喜欢上夜工,当问及原因时,一个小女孩儿天真地说:‘我喜欢在晚上工作,因为工头不像他们在白天那样紧盯着我们’。另一个女工也说:“上夜工能让我们尽其他的责任,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家庭的。”^③一个上夜工女工的回忆听起来上夜工是很开心的事。“当我们上夜工时,我们在白天就有自由时间了。”桂简英回忆:“我们可以看电影或逛商店,或躺在床上看书。”^④

夜工工人比日工工人有更多的方法度过他们不上工的时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用这额外的时间来做社会或家内的事务。理想的是:上午六点完成工作后,女工就回家吃早饭,然后大约在上午九十点睡觉。在理论上,她能一直睡到下午四点;然而实际上,白天时间睡觉并不总是行得通。由于女工同几个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小房间里,噪音一定使睡觉变得困难。1930年调查杨树浦女工状况的上海大学毕业生

① 朱邦兴等,第35页;对王罗英的采访。

② 对余英的采访。

③ 甘(Kyong):“中国工业妇女”,第3—4页。

④ 对桂简英(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5月13日。

研究发现,白天几乎没有人能设法多睡几个小时。为了解释她们在白天可能遇到的情况,她列举了下面的事例:

我认识一个女孩儿,她是某户人家的童养媳,一天上午十点我去看她。她还没有睡觉。夜工后她回家了。之后,必须为全家人做饭、洗衣服。正当她准备上床睡觉时,突然来了两三个男工。他们来找她的未婚夫打牌。他们坐在床上玩,同时也赌博。他们的噪音充斥着整个房间。女孩对我说:“昨晚我工作了一整个晚上,我本希望今天能睡觉。但是在这种噪音下,我怎么能睡得着?”^①

不充足的睡眠和夜间在潮湿的、布满尘埃的车间里长时间劳作,极大地损害了工人的健康。一个调查显示,两年中,每隔一周上夜工的十个女工中有七个人患有结核病。^②

工作周

除了那些在织布间工作的女工外,其他女工交替上日工和夜工。大多数工厂隔一周换一次班;周日机器停止运作,日工工人和夜工工人都休息。^③ 上日工开始一周工作的女工要在周一早上六点进厂,连续工作六天。从周六晚上一直到周日晚上,她休息。从周日晚上六点起,她 will 开始一周的上夜工工作。^④

这是规定的生产流程,但是经常不被遵守。每周的工作表经常随着棉纱市场的波动而变动。例如,当纱和棉的生意好时,工厂会设法尽可能增加生产。这样做的一种方法就是减少机器在周日闲置的时间。为

①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情况”。

② 吴(S. C. Wu),国家反肺结核协会总干事,“关于对工业团体大规模胸检查的第一次会议记录”,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48年7月。(国际劳工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③ 常楚芳(音译)(Chang Chu-fang):“上海的华商棉纱厂”,《中国经济》,1928年第3卷,第5期,第909页。换班记录表明一些工厂每10天换一次班。

④ 朱邦兴等,第34页。

了使生产最大化,管理者经常实行“周日工作”;那些上夜工的工人,周六晚上被要求一直工作到周日上午九点钟;正常本该在周日晚上六点工作的那些工人被要求在下午两三点钟工作。因此,每个群体要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除了因延长工作时间而被支付额外的薪水外,大多数工厂还发给每个工人三张大饼作为报酬。

在沪西的华商新裕厂因最大限度地利用周日工作而著称。它的要求和其他工厂的要求类似,夜工工人在上午十点下班,下一周的夜工工人下午两点半上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当生意特别好时,工厂宣布在粗纱和细纱车间工作的任何工人,周日先到厂的工人将得到一笔奖金。拿摩温得到1元,每个工人将得到两角。当夜工工人离开时,想要赢得奖金的群体在上午九点到厂接班,然后继续工作21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①

在某些时期,诸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销售骤降,棉纱厂主减少了每周的工作时间。工人们被给予他们称之为大周末的假期——多放一天假。当大周末时,日工工人在周六晚上六点完成他们一周的工作,周日白天和晚上工厂停工。晚班的工作直到周一晚上才开始。^②当然,工人的薪水反映了工作时间的减少。特别是在炎热的天气里,甚至在繁荣时期,一些工厂也实施这一制度。

所谓的大周末是减少生产的合适惯常做法,特别是由于工厂遭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被迫缩减生产甚至是严重削减生产。1935年,国际劳工组织(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中国记者报道大多数工厂已联合暂停夜工工作。英商怡和和公益厂每周生产三天,永安厂每周生产三一五天,申新、新裕、统益厂一周开工四天。^③

女工的工作周不经常与工厂宣布的工作表一致。经常是,由于多种原因(生病、照顾小孩儿或家庭问题),女工不能上工。一份女工出勤记

①② 朱邦兴等,第34页。

③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35年7月。(国际劳工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录显示了在她工作的一年时间内可以被缩减的限度，她一年缺席 19—30 天；生孩子 45 天，照顾患结核病的丈夫 74 天；照顾患病的婆婆 28 天，婆婆去世后请假 10 天；照顾生病的孩子 36 天。^①

如果她们的家庭不完全依靠她们的收入，一些年轻女工偶尔会因非紧急的原因休假一天，如和朋友们聚会。一位记者评论说：“有时这些年轻女工宁愿用一天时间来休闲和娱乐，也不愿挣一天的工资。”^②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为此几乎所有的工厂或者对那些旷工的工人给予罚款或者对那些出勤记录完整的工人发奖金。例如，在某一日商厂，一年内从不缺勤的女工得到 4 元奖金；一年内缺勤一两天的女工得到 2 元奖金；缺勤三四天的女工得到 1.5 元奖金；缺勤六天的女工得到 1 元奖金。^③ 在某些华商厂，奖金同每笔工资一起核算，也就是说，每隔半月核算一次。在永安厂两周内有相当好的出勤记录的女工得到的奖金与一天的工资数额相等。违纪的女工被处罚（因病缺勤或假期没有工资）。一周内缺席两天的女工被罚半天的工资；一周缺勤三天被罚一整天工资。^④ 夏天当女工由于生病或天气炎热经常误工时，一些工厂给予工人的处罚甚至更为严厉。她们被扣一两元，在有些情形下，因过量缺勤，她们很可能被解雇。^⑤

棉纱厂女工在工作日参加的一项重要日常活动是宗教活动。大多数女工是佛教徒，尽管信佛对于不同的女工意味着不同的含义。^⑥ 一些女工，如何宇珍，是素食主义者。她回忆说：“当我很小时，我已学会吟

① 李欣：“从 1000 个夜校学生看上海女工”，《生活知识》，1946 年第 36 期，第 7 页。

② “上海女工生活剪影”，《国际劳工通讯》，1939 年第 6 卷，第 8 期，第 75—76 页。

③ 唐海，第 140 页。

④ SSKJY：《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 83 页。

⑤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 56 页。

⑥ 黄宓丁（音译），上海大学的毕业生于 1947 年在杨树浦组织了一项关于工人的调查，发现棉纱厂大多数女工是佛教徒。见黄宓丁（音译）。杨美真也有类似的发现（见“杨树浦女工情况”）。在大康纱厂的历史上提到在女工间有“三个太多”，其中之一是太多的女工吃斋，信仰佛教。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咏所有的佛教经文。因为浙江所有的老年妇女都在我们家附近的山上采茶。因此,当我帮我母亲采茶时,听她们吟诵,我学会了这些经文,后来当我来到上海棉纱厂工作后。我从不吃猪肉或牛肉。我只吃蔬菜。”^①其他人仅在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不吃肉。

在这些天她们也烧香。上海的一个导游指出:“在旧历十四或十五,或是十五晚上的任何时间。你肯定能在街上听到浦东的女子吆喝着卖香。”^②尽管一些女工在她们家中烧香祷告,但许多女工喜欢到当地的寺庙去祷告,她们经常离开工厂几个小时到寺庙祷告。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工厂,如申新厂和永安厂,在工厂区建造了供奉着观音菩萨塑像的小庙。一个参观申新九厂的参观者在参观女工宿舍时,顺便参观了工厂的寺庙。工厂管理者告诉她,在每个农历的初一和十五,200名女工将会休假去红庙进香,不过在工厂内建寺庙,可以使管理者能够“消除那么多女工离开工厂去进香的困境,同时,减少工厂的损失。让他们站在佛教神像前祈祷,获得神祈是有益的。”这位参观者这样被告之。^③

除了去寺庙进香外,一直到1945年对于大多数女工的日常生活而言,另一个每隔两周的大事是:发薪日。在几个方面,发薪日区别与一般的工作日。当然,首先,工人们得到了他们的工资;其次,由于许多工人迷信,知道工人们发薪水的女算命先生们将在这一天来到车间,她们靠她们的“神力”将为女工提供有偿服务,告诉女工的未来,为其驱邪或举行仪式减少她将来的不幸。^④

在工厂门口,人们会看到发薪日的另一显著特点。被称做印花放贷人的放高利贷者聚集在那里。通常印花放贷人是本地的恶霸地痞或锡克警察,每年的放贷利息率高达120%。放高利贷的人拿着印有高利贷

① 对何宇珍的采访。

② 屠,第3部分,第90页。

③ “申新九厂女工友宿舍访问记”,《纺织染工程》,1948年第2卷,第4期,第13页。

④ 资料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名称的文件夹,里面夹有每次借贷人分期付款的贷款合同。在发薪日这一天,放贷人知道工人们手里有了钞票,就来到工厂,在她们离开工厂前设法强迫她们偿还贷款。^①

想方设法保住她们工资的那些人在地痞恶霸面前是脆弱的,在发薪日,地痞恶霸发现了一个获取金钱的大好机会。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沪西,有一个叫邓海周(音译)的恶霸地痞,他的团伙专门干偷女工工资的勾当。^②

休息日

一般说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工厂的一个班次里工作六天后,工人有一天的休息日。尽管她在那天不一定必须进工厂,但她也没必要用这一天休息。

洗衣和洗澡通常是女工在休息日首先要做的事。因为,她家中缸里储存的水不够用来洗衣,因此,周日她要把她家里的衣服带到公共水源地去洗。当拉姆森调查杨树浦的一个工人生活区时,他发现“周日井里的水比其他时间的水更脏,因为在那天女工有时间来这里洗衣服。她们在井的附近洗,因为在那里便于汲水。脏水被就地倒掉,其中一些脏水流回了井里。”^③洗衣是女人的活。女人经常为她自己的家人,同时也为她邻里的单身男工洗衣,因此赚得一些额外的收入。^④洗完她自家的衣服后,年轻女工有时不得不到拿摩温家去帮她做家务,诸如洗衣、拖地、照料她的孩子。^⑤

尽管包括打扫房间在内的家务花费掉许多时间,不过许多女工也会抽出时间去走亲访友。大多数女工在上海有亲戚,通常都住在同一街

①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72页;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06页。

② 《申报》,1923年8月22日。

③ 拉姆森:“中国工人住房问题”,第145页。

④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⑤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第138页。

区,周日是串门的日子。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女工和那些家务责任相对轻的女工经常去看望朋友。顾莲英说:“工作了较长一段时间后,你就开始有朋友了,在周日,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她们家玩。大概当我十七八岁时,我早就这样做了。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棉纱厂工人。”^①有时她们到附近的公园玩。更为经常的是她们聚在一起边聊天,边沿着商业街道闲逛、浏览橱窗。小沙渡大钟塔附近的区域以及曹家渡五街的环行区是年轻女工周日聚会的好地方。

偶尔女工们也去看本地戏演出。一个叫陈招弟的工人,她老家是苏北滨海区的。她回忆说:“我们喜欢看苏北戏。”

女人们愿意去吗?为什么差不多都是女人去呢?我们不仅去看戏,而且有时在车间我们也唱戏。在沪西有个戏班子。我们晚上从七点到十点去看戏。很难买到票。票价是7角。我们从来不和丈夫、孩子一起去戏院。通常是和一起工作的几个工友一起去看。但是我不告诉我的家人我要去哪里。要不然我婆婆根本不会让我去。我只好偷偷去。^②

买不起票的人们聚在戏院门外听戏。来自上海和江南城市的女工们也喜欢听本地戏,但是她们对苏北戏不感兴趣。例如,上海本地人愿意花更多一点的钱买票去听在沪西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明月茶馆的苏州戏。*

休息日工人们去的另一个地方是所谓沪西的大世界。不像西藏路上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与之同名的西郊的大世界是类似庙会的临时

① 对顾莲英的采访。

② 对陈招弟的采访。

* 当我天真地问来自苏北的年老女工,她是否曾看过越剧(来源于绍兴周边地区的一种戏剧)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傲慢和偏见非常清楚地展示在我面前。在采访中,一个年长些的工厂男官员生气地打断我说:“他们(来自苏北的人)不看越剧。在工厂的大多数人是苏北人,因此他们不看我们的越剧。越剧是我们绍兴、宁波、余姚人看的。苏北人不看。像陈师傅他们愿意看江淮戏。”

性街市。每周日在空地上搭起三四十个棚子,一些特色小吃,如面条、汤或糕点;其他的,如玩戏法的、说书的等等。这有大京班三处,苏北戏两处,本滩一处。^①

女工们无论是去逛西部的大世界、看戏、逛街或探望亲朋,她们几乎很少离开她们自己生活的区域。顾莲英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一直都在杨树浦,我们几乎从不进城。”^②

尽管严格说来,事实上杨树浦和大多数其他工人阶层生活区都属于上海的一部分;但许多女工把这些地区看做真正的农村。对她们而言,上海是指沿着外滩的洋行和商业办公群以及沿南京路的商场和商店这一心中区域。她们有较少的理由去这些市区,而且,没有连接工人生活区和“城市的公交车甚或柏油路”^③。只有在假期,一些女工才会到上海中心城区去。

假 期

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的假期。几乎所有工厂的假期都包括:春节休假三天(旧历新年),端午节休假一天(旧历五月初五),中秋节休假一天(旧历八月十五)。有几家工厂也过孙中山的生日(12月12日)和独立日(10月10日)。^④

春节假期需要最全面地准备,包括各种庆祝活动。“不管多么穷,每个人都会庆祝春节。”陈招弟*回忆说。大多数工人在新年的头三天拜

① 朱邦兴等,第95—96页。

② 对顾莲英的采访。

③ 对王富英的采访。

④ 奥古斯塔(Augusta Wagner),第43页。

* 对陈招弟的采访,上海,1981年4月11日。在1930年代期间,民国政府宣布新年是公历1月的头三天。之后一些工厂调整了新年假期以符合这一法令。然而,他们发现无论旧历新年是否是法定假期,工人们都会休假三天,因此他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做法。见奥古斯塔:《中国的劳工法》,(北京,1938),第43页。

望亲戚或宴请客人,甚至有很少钱或没钱的工人也会买他们在平时从不吃的食物:鸡、鸭、新年糕。为了宴请客人,许多人也摆上茶、花生、瓜子、糖果、绍兴红酒或高粱酒。^①

对于那些佛教徒而言,去寺庙是新年庆祝的一部分。一些人长途步行到位于上海南端郊区的龙华寺。徐淑梅回忆说:“我们相信如果你连续三年到龙华寺进香,你就会有一个较好的来生。”^②更为常见的是工人们去老中国城中心的城隍庙进香。

在城里有60尊佛像,从1岁到60岁每一尊佛像代表一个年龄。你要到和你年龄相符的佛像前。每年我和我的母亲在新年都去寺庙。在那时庙里的人那么多让你寸步难移。你真的不需要走,熙熙攘攘的人群会推着你走。有时,那么多人在庙里进香,神像可能会被点着,燃烧起来。^③

新年的另一习俗是请算命先生算命,他能预测明年的事情。徐淑梅回忆说:“算命先生是商人,他坐在路旁,用一小锤敲着锣,吸引人们前来算命。”几乎难以避免,第一个预言是很可怕的,但是给他些钱,他能给你更乐观的预言。”^④

春节是工人们到上海中心城区,游览著名的娱乐场所为数不多的机会中的一次。一位女工,每年春节期间都与她的父亲和哥哥到城里去,她还记得:“从我们家到城里大约步行半小时,你可以吃东西,可以看各种演出,一旦你买票进去,你可以一直呆到午夜后他们打烊关门。”^⑤

庆祝中秋节和夏天的端午节就不那么复杂了。过中秋节时,工人们去专门商店买蜡烛、香、月神小塑像。徐淑梅说:“你是买大的或小的月神像,只取决于你有多少钱。”在中秋节前夕,人们按习俗在家中月神像

① 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11,159页。

②③④ 对徐淑梅的采访。

⑤ 对高俊的采访。

前摆上一碟苹果和梨、一块月饼、一碟大豆,也许还会有一个鱼头,同时在神像两侧点上香。第二天家人们吃给神上供的供品。愿意放弃假期在工厂工作的女工会得到两块月饼。过端午节时,对于那些选择继续工作的工人,工厂会奖励两只粽子(竹叶包裹着糯米和猪肉,形状呈三角形)——在端午节吃的传统食品。^①

工人庆祝假期更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感谢或讨好她车间的拿摩温和本地帮会的头头。当假期来临之际,女工经常买礼物,通常是食物或白酒,送给她的保护人。

上海工厂女工的工作日不仅时间长而且要求又高,在某种程度上较残酷。许多人在炎热的、布满棉尘、噪嘈的车间操作机器 12 小时后,回到家还要处理琐碎的家务事。然而,女工既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独自经历这一日常生活,他们也不完全是资本家剥削和工业贫困被动的受害者。工厂工人的部分经验是学会了掌控工作日:当朋友或偷来学艺的人接管她的工作时,她经常借机小睡一会儿;她知道如何放慢机器;她假装弄丢工卡,这样当她休几天假时,邻人能够接替她的工作——同时她也仍能因较好的出勤率获得奖金。

为了做这些事情,女工需要依靠她的工友。下班后对工友的依赖也许是最迫切的,当女工独自一人步行回家时易遭受恶霸地痞的袭击。正如第八章将说明的,由于相互帮助和保护的需要,首个自发组织在女工中间产生。但是,大型工厂雇用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数千名工人,人在这样的工厂工作,不可能完全改变女工的社会关系。她在一天内接触的人是非常少的。一进厂后,她就到她自己的车间,在她被分配给的区域度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可能因上洗手间或在午餐时间取热水浇饭而离开这一限定区域,但她几乎从没有机会去其他车间。

因此,女工间并没有认同感,实际上在本章所叙述的大多数相互帮

^① 对高俊的采访。

助和共享的工作关系,是建立在先前(第三章已讨论过的)传统的地缘关系的基础上的。女工在周日拜访她的朋友们或和她们一起去逛公园或看戏,这样就使得同乡间铸造的纽带持续下来,她们团结在一起,坚持在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可怕的城市环境下生存下来。

尽管上海这个大都市肯定经常击垮来自乡村的女性,但是,她日常生活的世界既小又自给自足。平时工作日要求她不能离开工厂,并且当她休息时,她差不多总是拜访在同一区域的亲戚和朋友或到附近的戏院看戏。她几乎不和其他区域的工人或上海中心城区的世界联系。在许多方面,她过着一种“城市乡下人”的生活,正如乡下的农民那样,养鸡,从街贩那里买食物,在街区井边或小溪旁聚在一起洗菜、洗衣服。她坚决保持着她原有的宗教活动,尽管这意味着违反工厂的纪律。工厂女工在上海和她的城市乡下伙伴们一起——那些和她住在同一弄堂或在同一车间工作或去同一寺庙上香或同一戏院看戏的人——找到了在上海这个工业世界里生存的方式。

第七章 工作生活

尽管女工在棉纱厂工作的天数可能比在其他任何职业都多,但是通常在棉纱厂工作仅是她工作经历的一部分。她可能也当过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养蚕人、街头小贩,有时甚至做过乞丐。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有些人被卖到了妓院。在某一时期,大多数人是妻子、媳妇和母亲。

这些各种各样的经历表明大多数人并不是简单清晰地从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尽管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就已出现了工人阶级,但我们发现随着女性出入工厂,往返城乡,这一阶级的成员不断地变动着。甚至在城市里,农民和产业工人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因为在棉纱厂工作一年后,第二年她可能靠在工厂附近的城郊挖菜过着拮据的生活。

孝顺的女儿

不管她是在上海还是在乡村出生、长大,既然她是女孩儿,为了她的家最终她将会被带进棉纱厂工作。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自女孩儿五六岁起,她就被指望能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通常(至少是在最初)她是在家里做。女儿很少能独立挣工资,不过由于她能做家务,这样她父母就能工作挣钱养家。

来自江南和苏北两个地区的女工在孩童时所做的活反映了两地在地域上和经济上的不同。王罗英回忆她在苏北盐城的童年时说：“我小时候，帮我父母下地干活。地里有大量繁杂的事儿要做。在田里干活，我们必须播种、锄草、收割庄稼。我常常拔草。我们得把草拔掉，要不然稻子、谷物或大豆就不能生长。因为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我挖来的野菜。”^①在苏北兴化县出生的另一个女工记得她曾跟着她的父亲和兄长一起做雇工。起初她帮忙挑水浇地，后来当她12岁时，她父亲和兄长在前面牵马，她在后面扶犁。她也帮母亲洗衣服，照看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们。^②在苏北的小女孩都喂牛或帮家里采盐。有些小女孩，当她们七八岁时，就认为可以帮忙划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送货了。^③

与苏北相比，在江南乡村手工业通常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在这些地方（诸如无锡、常州）长大的女工的记录，表明许多人小的时候在家就学会了纺纱和织布。在江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手工织布盛行时，小女孩儿们帮她们的母亲在家里织布。她们每天24小时能够持续地轮流织布。在江阴的其他女孩儿的母亲在散工制（under a putting-out system）下为批发商织袜子，她们则帮母亲剪贴商标。^④

在上海长大的女工有更加多样的早期工作经历。一些来自江南乡村的女工，在家中帮忙纺织。许多人是工人的女儿，她们小的时候就被指望能帮家里做家务，这样她们的母亲就能够外出工作。一些在上海出生的女孩的父母为不同种类的商店做计件工作。小女孩帮父母做工可以增加父母的工资。例如，一个叫徐红梅的女工，她在上海郊区宝山长大，她的父母有一些地。她父亲种地，母亲在棉纱厂工作。她和她的姐妹们帮她父亲做农活。农闲时，她父亲在公共租界一家外国人开的商店

① 对王罗英的采访。

② 对上海第二纺织厂退休工人的采访。

③ 对小女孩儿工作经历的论述来自棉纱厂A的退休卡。

④ 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第238—241页。

里缝衣服。她回忆说：“我父亲每天都去那里，他早上六点钟就得离开家，直到晚上才回来。根据他每天缝的数量付给他工资，因此，如果他额外带一些衣服回家来做，他能挣得更多。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帮爸爸缝衣服。我一直做到了12岁。”^①

一些女孩儿的父母在自己家中为工厂做工。例如，就火柴制造业的某一部分工作而言，中间商把原料配给女人们，她们在家做这一工作。上海童工委发现，在1924年实际上制火柴盒的大部分工作是由5—10岁的小女孩和她们的妈妈一起在家完成的。^②

最终进棉纱厂工作的女性在她的童年时代很少受过教育。^③更为常见是小女孩儿之所以做工，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的兄弟上学。当代社会学家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和她的兄弟们相比，女孩儿们在更小的年龄就开始挣工资了。当邓裕志在上海组织她的关于368名女工预算的研究时，她“经常听到女孩儿们说，她们的兄弟们正在学习贸易或为了找到一份较高工资的工作正在上学，她们工作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④拉姆森发现女孩儿们在十一二岁时就成了挣工资的人，但是她的兄弟直到20岁才开始挣钱。^⑤

成为挣工资的人

大多数棉纱厂工人在他们九十岁时，以在工厂做童工开始了他们的

① 对徐红梅的采访。

② RSCLC, 第550页。

③ 退休卡。在一家工厂中，年少时曾接受过一两年学校教育的女工差不多一直都来自无锡。一些迹象表明，这一情况随着时间而发生了变化。尽管说大多数棉纱厂工人都识字从来就不符合事实，但是在1920年代晚期出生，在1940年代晚期进厂的那些工人可能要比她们的前辈人受过更多一些的教育。进一步而言，对那一群体而言，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不仅来自无锡，而且也来自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宁波、绍兴、盐城和东台，这一发现不可能表明女性受教育不是很普遍。但是家境出身好的女性受过的教育程度要比二战后进厂的前代人受的教育程度更高。

④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72页。

⑤ 拉姆森：“工厂工人生活标准”，第1244—1245页。

工厂工作。^① 她们何时离家参加工作,要由她父母决定,同时也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工作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一些女孩儿像宋二梅一样,她们的母亲不干了,她们就进厂成了工人。宋二梅的母亲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好多年,后来生病了,而且她还有一个婴儿要照看。所以她就辞职了,宋二梅接替了母亲的工作。^②

一旦女孩儿开始作为挣工资的人工作,她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常常是极其重要的。在拉姆森调查的 21 户家庭的预算中,15 岁以下的女孩儿给家庭带来的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 19.7%。拉姆森进一步计算得出:在这一组有工作的家庭中,由于女儿的贡献,家庭每年平均节余 36.07 元。要是没有她们的贡献,家庭每年平均赤字为 75.95 元。^③ 女儿的工资对家庭的重要性反映在她们父母的态度上,他们开始把女儿看做生财的宝贝,而不再是他们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是经济上的累赘。父母对她们有工作的女儿态度的转变给拉姆森的学生调查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妇女对调查人员说:“是的,今天的男孩儿和女孩儿确实是一样的。女孩也能帮她们的父母。对我而言,女孩儿比男孩儿更好,我的大儿子现在 17 岁了。由于他小学毕业……他只呆在家吃闲饭。”

调查人员在傍晚时分采访了一户家庭的母亲,她正在准备晚饭。调查人员留意到她正在烧肉,并对她提及。她说:“我自己不吃肉,因为它太贵,两天就要花 30 个铜板,这是给我女儿的,她在工厂工作挣钱,所以我必须好好待她。”^④

① 退休卡。

② 对宋二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11月11日。

③ 拉姆森:“工厂工人生活标准”,第1246—1247页。1930年杨西孟组织研究了230户棉纱厂工人的家庭,他的研究也证实了拉姆森的发现。他发现女儿给家庭挣的收入平均占家庭收入的19.1%。见杨西孟。第34页。

④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1074—1075页。

现在她们自己挣工资的事实使得她们的第一份工厂工作不同于她们以前的工作。挣工资的年轻女性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于家庭的意识,这让当代许多观察家颇为震惊。一些人,特别是已开始工作的那些人,把她们所有的工资都交给了父母。尽管大多数女性在结婚前仍继续把她们挣的工资交给家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开始为自己留下一部分工资。邓裕志发现她在1937年研究的368名女工的预算中,289人住在她父母的家中,其中,127人(44%)仅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她的父母。邓裕志写道:“在和女孩儿们说到这一点时,她们告诉笔者,她们留下部分工资,就有更大的自由买她们想要的衣服,也不用征得家中老人的同意。在少数情况下,女孩儿们说为了不把她们的全部工资交给家里,她们不告诉长辈实际挣多少钱。”^①她们用她们存的钱买饰物,要不然她们没钱买或不被允许买。在杨树浦工厂工作的很多女工,都购买诸如绸手帕、手表、金耳环、脂粉或擦脸膏、时髦的衣服等,购买这些物件的女工的人数使拉姆森颇为震惊。^②

由此产生的家庭冲突,经常使时髦年轻女工现象成为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有这样一个案件:晓枫(音译)——来自盐城的19岁女孩儿,用她挣的钱买了一件旗袍,在鞋上刺上绣,并且把头烫了。当和她一起住的阿姨因她这一“不合适”行为指责和训斥她时,晓枫为此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人们猜测她可能已住在她男友那里了。^③

那些离开家的女性表现出极强的独立性。邓裕志发现在她研究的样本中,有一小群女性用她们挣的钱同其他几个女工一起租房或住在基

①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46—47页。邓她自己注意到她研究的女性尽管在雇佣女性的主要工业中,同时,也在不同的工业区域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但是,这些女性在几个方面可能也是非典型的。她观察到她们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班意味着她们可能比大多数工人年轻些,稍微更独立些。由于她们能够负担起教育和娱乐的费用,尽管仅是一小数目,她们可能来自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同上,第10页。

②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1074—1075页。

③ 《申报》,1930年6月13日。

督教青年会旅馆里,尽管她们所有人的家都在她们工作的工厂附近。邓裕志注意到:“这些女孩儿想独立,想得到比住在家里更多的自由。”^①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女性而言,挣工资并不意味着要从家庭中独立出来,许多观察家也相信这一点。在邓裕志调查的群体中,尽管有127名女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下部分工资自己支配,但150名女工把她们的全部工资交给父母,反过来,父母给她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等。^② 这些女工中的大多数不会在意她们挣的钱怎么花,只是由于它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余蓉回忆说,这是说好了的,“我一得到工资,就交给我的母亲,然后她将为全家人花这笔钱”^③。

工厂工作加深了女工同她们家人的关系,这就很可能弥补了独立挣工资能给她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女性们走出家门参加她们的第一份工作,差不多都有她们的母亲或兄弟姐妹做伴。余蓉和她母亲在同一缫丝厂工作:她母亲在楼上剥茧,她在楼下打茧。徐红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她两个姐姐工作的缫丝厂里。来自盐城的一个女孩儿在1925年和她的姐姐一起进申新棉纱厂工作。她们两个一起操作同一台摇纱机。当她姐姐生病去世后,她母亲接替了她姐姐的位置。^④ 这些故事引起了数百名工人的共鸣。

从打蚕茧到缠筒管

后来在棉纱厂工作的许多女性,无论是来自苏北、江南还是上海本地,都是在缫丝厂开始她们的工作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在较小的年龄时就能在缫丝厂找到工作:尽管缫丝厂靠八九岁的女孩儿在滚烫

①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36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对余蓉的采访。莉迪娅(Lydia Kung)在1970年关于台湾工厂女工的调查基础上,也得出结论说:尽管在外挣钱提升了女儿的价值,但挣钱并不导致增加女性的独立性和在家中的权力。见莉迪娅。

④ 对余蓉、徐红梅及上海第二纺织厂退休工人的采访。

的热水做打蚕茧的痛苦工作,但是,棉纱厂喜欢雇用至少十岁出头的女孩儿。^①

中国社会改革家和外国参观者反复强烈谴责女孩儿在缫丝厂的工作条件。上海童工委员会 1924 年的报告报道:

在缫丝厂几乎所有的年轻雇工都是女人和小女孩儿。总的来说,童工与成人的比例是 1:2。孩子们擦蚕茧,清除废物为摇纱作准备,这样丝线就露出了头。这一操作在盛着几乎沸腾的热水盆上进行,孩子们的手指必须不断地伸进热水中。因此她们的手变得既粗糙又难看。……由于盆中的热水,工作间的温度常常远远超过常温。屋内空气也非常潮湿。在炎热的天气中孩子们常常晕倒。总的来说,孩子们向人们呈现了一幅可怜的景象:她们的生存状况很差,她们的脸上缺乏任何高兴和安乐的表情。她们看起来身心都很痛苦……委员会确信这些孩子们的工作状况非常糟糕。^②

可以理解,在上海打蚕茧被认为是女工能得到的工作中最不值得做的工作。余蓉回忆说:“我的工作打茧。”

这有两口大锅。他们向锅里注满滚烫的热水,我们不得不把茧按进水里,并且让其停留在水里。蚕茧必须被煮沸,直到它们变得非常软,丝能够被抽出来。

当我们在缫丝厂工作时,我们的手每晚都会肿起来,所以我们要去药店买药膏。我们把药膏敷在手中,然后把手缠起来。晚上我们的手指会一直痛。^③

工头对待年少打茧工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缫丝厂工作的怜悯之心。工头并不常简单地训斥或鞭打犯错误的女孩们,而是常把烧开

① 邓裕志。

② RSCLC,第 549 页。

③ 对余蓉的采访。

的滚烫的热水泼在她们身上惩罚她们。^①大多数女孩儿在缫丝厂工作不超过一两年；她们只要找到其他工作，就马上离开。有位妇女9岁时，就已开始从事打茧工作了，她说：“我不能忍受在那儿的工作。”

所以我告诉妈妈我想辞工……后来我遇到另外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儿。她在棉纱厂工作，她说在棉纱厂工作可能比在缫丝厂好一些，至少那儿没有沸水。我问她能否帮我在她们厂里找份工作。她说厂里正在招工，她能帮我。她要上夜工，就让我早上四点钟在门口等她，她将引见我进厂。^②

不是所有的女孩儿都是从缫丝厂直接到棉纱厂的。期间一些人在毛纺厂或麻纺厂、织袜厂或别针制造作坊、或糖果包装厂工作过。史晓梅回忆说：“从9岁一直到16岁，我在五家不同的工厂工作过。”^③一旦她们已开始作为挣工资的人工作后，她们几乎不能承受起辞工之苦。

对于大多数小女孩儿而言，能在棉纱厂谋得一份工作，被认为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尽管有噪音和棉尘，毫无疑问棉纱厂的工作环境要优于缫丝厂。除了这一感受外，棉纱工业还是唯一能够为女性提供全年雇佣机会的行业。通常说来，丝厂租用几个月的纺车，在这几个月间，丝厂将用完其购来的蚕茧，一旦加工完蚕茧后，缫丝厂就要歇业了，工人也就会被遣散，一直到来年再重新雇工开业。^④女性在毛纺织厂的工作也是间断性的，史晓梅回忆她在某一毛纺织厂工作时说：“当他们有毛时，他们将招工，当他们没有毛时，你就得回家。”^⑤尽管卷烟厂和鸡蛋厂的工作一

① 对余蓉的采访。对孙简梅(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3月2日。也见《罪恶的旧社会》，第2卷，第22—27页。

② 对退休工人樊卦龙的采访。

③ 对史晓梅的采访，也见退休卡。

④ 刘大春：《上海缫丝工业》，第92页。

⑤ 对史晓梅的采访。根据章华和大华毛纺厂(女工占一半)的记录，60%的男工是固定工，实际上所有的女工(除了女工头)都是临时工。见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工会，第155页。

般被认为既轻松工资又高,但是这些工厂也是季节性地雇用女工。^①

棉纱厂工人的晋升

尽管上海棉纱厂孩子和母亲一起上班是常见的事,不过大多数女孩儿直到10岁出头才开始在工厂工作。由于是新手,她们被分配做非技术工作。通常几个月后,她们实现了首次提升,逐步得到技术工的身份。在厂里获得技术有几种方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偷偷地进车间,从朋友或亲戚那里偷学技术。当一有机会,就申请一份正式工作。另一种开始工作的不常见的方式是以养成工身份进厂。用一两年时间进行正式培训(在此期间她的工资要低于正式工)后,养成工可以参加测试,如果能通过测试,她将得到一份正式工作。^②

女工一旦获得到技术工的身份,就能借助其他的几种方式进一步提升她在工厂工作的级别。女工的流动性经常意味着她在其所在车间重新被分配工作。对于女性在工厂做的每一份工作,差不多都有一系列的级别,级别每高一级,工资就稍高一些。由于资历以及她已提升的技术,她从一个级别晋升到较高的级别。我们有一份关于1925年在日商工厂如何晋升的详尽描述。一个十几岁的非技术工以养成工的身份进厂,在学习一份工作的两个月期间,她每天挣0.15元。两个月后,如果通过测试,她就变成了10级工。再过三个月,她可以有资格升到8级;再过六个月,她能够升到6级。一年稳定的工作结束时,她可能在1级和5级之间。最低等级和最高等级的工资每天几乎要相差1.5元。^③

除了工资不同外,有时每一等级被分派的任务略有变动。工人们很

① 钟守静和巴格维尔,第14页。

② 见第四章和第五章有关养成工制度的讨论。

③ 唐海,第156页。

在乎她们在工厂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所以尽管这些不同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她们来说却很重要。陈招弟的回忆就证明了这一点。她曾得到和她等级不相符的对待,她回忆说:

因为我技术好,所以当我进入内外第十三厂的粗纱间时,我是一级工。如果你是一级工,你不需自己来回拿纱,纱由较低等级的工人来拿。但是,日本工头想要我去拿纱,我说我不拿,不管怎么说我是一级工,我为什么要拿?工头说:“好,那么我们让你成为二级工!”^①

一项工作从最低等级上升到最高等级,可以在同一车间内实现。另外,在每一车间里都有数个工种,有些工作较容易,有些则较难,每种工作的薪水都不同。1938年,在同兴厂细纱间工作的女工,她们日工资从0.5元—0.95元间不等,这取决于她是接头工、落纱工,还是“组长”(group head),即机器操作工,她们被认为赋有某种监管责任。换句话说,有些女工每月挣大约14块钱,有些大概挣27块钱,几乎是前者的两倍。^②

女工渴望得到的最高职位是工头或拿摩温(处在更高职位的人都不来自工人阶层)。仅有为数不多的女工能升至拿摩温,更常见的是从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的工头中选拔拿摩温。^③很显然,那些成功当选为拿摩温的人因她们被授予的更高级别而引以为豪。高梅韦尔发现拿摩温“既精明又干练,她们对她们职位的尊贵有全面的理解”。

最近,有一个人走进有轨电车的头等舱。她穿着宽松的蓝袍,围着围裙,戴着工人的头巾,当华人售票员经过她身边态度生硬地

①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② 朱邦兴等编,第56页。

③ 例如,1948年申新九厂仅有100个拿摩温,其中,79个为女性。这一数字不到工人总数的1.5%。见申新九厂废除拿摩温制度工作总结。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说：“老婆子，你属于三等舱，出去！”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为什么出去？我有钱在头等舱买座位。”售票员意识到在粗糙衣物背后显著的个性，立即改变了口气和态度。他说：“对不起，女士！”然后，谦恭地接过递过来的铜板。^①

最终能升至拿摩温的女工大多数是上海籍或无锡籍或常州籍^②，可能因为大多数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自江南的这些城市。

换车间

女工在工厂里晋升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从一车间换到另一车间，因为不同车间的工资经常有巨大的差异。工厂里女工间最为显著的等级划分是在细纱工人与织布工人之间。一直到二战结束时，织布工人挣的工资大概一直都是细纱工人的1.5倍(见表5)。

表5 细纱和织布工资的对比(1926—1946)

女工平均日工资		
年 代	细 纱	织 布
1928(a)	0.44 元	0.35(手织机)
		0.60(动力织布机)
1930(b)	0.421	0.583
1931	0.449	0.504
1932	0.448	0.581
1933	0.477	0.522
1934	0.470	0.588

^① 高梅韦尔,第226页。

^② 退休卡。

续表

女工平均日工资		
年代	细纱	织布
1938(c)	0.60(最高)	0.80(最高)
	0.40(最低)	0.50(最低)
1946(d)	6109.25	5853.35

资料来源:(a) 上海社会局:《大上海工厂工人工资指数,1928年7—12月》,上海,1928,第7—13页。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The Index Numbers of Earnings of Factory Laborers in Greater Shanghai, July-December 1928*(Shanghai, 1928), pp. 7-13. (b) 上海社会局:《上海工资率,1935》,上海,1935。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Wage Rates in Shanghai, 1935*(Shanghai, 1935). 这些引用的数据是女工平均计时工资和平均计件工资。(c)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1939),第53—54页。这些是最大的英商公司,怡和棉纱厂的工资。1938年没有关于上海女工工资的总数据。(d) 上海社会局:《上海工厂劳工统计》,(上海,1946),第49—52页。货币贬值情况下的女工平均计时工资和平均计件工资。

为什么织布工挣得比细纱工多? 我们只能推测其中的原因。首先,织布需更多的技术,一般说来,在织布间工作的女工要比细纱间的女工年长。1925年,大体上在细纱间工作的女工的平均年龄——日商厂是16岁,在织布间工作的女工平均年龄是23岁。^① 其次,工资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在两个车间中工人性别构成的差异: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多数工厂细纱间的工人中,女性已占绝对优势,但织布间女工仅占一半。^② 尽管关于女性如何进入每一车间,从而影响工资水平的更加大量的研究对于支持这一假设是有必要的,不过这一假设好像说明了二战后,当女性成为了纺织工人的主体时,带来的变化。正如表5所表明的,也就是在那时她们的工资下降了,比纺纱工人的工资还要低。^③

尽管对于大多数工厂而言,纺纱和纺织的工资差异好像确实存在,但在每一家工厂里,有更加具体的工作等级。有些工厂,粗纱工挣得比

① 王清彬等编,第376—378页。

② 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和贸易》。

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战前织布间是江南女性的范围,不过战后,苏北移民开始进入织布间,因此工资降低了;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细纱工多；有些工厂，摇纱工挣得比粗纱工和细纱工都多。尽管一份工作之所以值得做，取决于其所支付的薪金，不过，如果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条件的话，女性偶尔也会喜欢这样的工作。例如，徐红梅在同兴厂的钢丝间工作。她说：“实际上，尽管工资低，钢丝间要比细纱间和织布间好些。在细纱间，机器高，我们太小够不着；在织布间，噪音太可怕。”^①

尽管女工们关于在哪里开始她们的工作的问题谈得很少——她们被介绍进入哪个车间工作，她们就进入哪个车间工作——她们想方设法从一个车间换到另一个车间。最终，换工作也取决于不可控的因素，诸如是否有车间正在雇工；她们是否能找到熟人把她们引见给那个车间的拿摩温。不过，与此同时，如果机会来了，许多已学好技术的女性可以在其他车间被雇用为技术工。王罗英回顾说：“当我初来上海时，我学的是摇纱。”

摇纱简单易学，不过我想做细纱工。如果你能纺纱，那么你就再也不需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你能在任意一家工厂找到工作。所以我开始学习纺纱。我偷偷地学。我上完日工后，就留下来“上夜工”。我有一个亲戚在细纱车间，她教我纺纱。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②

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需要换厂。一个女工10岁时在申新二厂做摇纱工开始她的工作。她14岁离开了申新厂，由于她听说内外六厂需要在细纱间工作的工人。由于如果她在内外六厂做细纱工，她能挣得更多，她付给某一地痞流氓五块钱，引见她到内外厂做养成工，两个月的养成工培训结束后，她通过了测试，被雇用为正式细纱工。^③

女性换工厂是为了换车间。除了工作有等级外，棉纱厂也有等级，

① 对徐红梅的采访。

② 对王罗英的采访。

③ 对退休工人的采访，上海第二纺织厂。

选择某一工厂工作而避开其他工厂,则被认为是合适的。

换棉纱厂

尽管女工不可能经常能在其相中的工厂里工作,但是她可以选择工时、工资、工头对她的态度以及福利。^①毫不奇怪,女工优先考虑工资,许多有记载的女工工作史,指出女工换工厂的原因是因为“在某某工厂工资太低”或“在某某工厂工资较高”。

在不同的工厂,相似工作的工资千差万别(见表6)。例如,1938年,华商永安三厂细纱间的落纱女工一天挣0.74元,日商内外九厂的落纱工一天只挣0.40元。^②甚至隶属同一公司的工厂,例如,十四家不同的内外厂,工资常常是相差悬殊。^③

表6 不同工厂工资比较,1925年和1938年

工厂	粗 纱	细 纱	摇 纱	织 布
1925 年				
振泰(C)	.26/.36	.24/.36	.34/.39	—
大丰(C)	.29/.35	.23/.34	.33/.39	—
丰田(J)	.30/.40	.33/.40	.33/.40	—
公益(C)	.36/.40	.25/.40	.35/.40	—
内外(J)	.30/.45	.31/.46	.30/.40	—
申新(C)	.31/.37	.20/.27	.37/.40	—
同兴(J)	.37/—	.30/.40	.32/.40	—
永裕(C)	.31/.35	.20/.25	.35/.39	—

① 看起来好像只有那些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党的积极分子或其他人把工作的工厂一律视为残忍的地方。例如,范小凤在采访中说:“我几乎曾在每一家工厂工作过。我在一家工厂工作,发现他们剥削工人。然后,我去另一家工厂,发现他们也剥削工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或者打我,或者他们的工资低,没有理想的工厂。从中我理解了一件事: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开办的工厂没有一家是对工人好的。他们都压迫和剥削我们。之后,由于这一教育,我参加了解放战争。”

② 朱邦兴等编,第56页。

③ 同上。第54—58页。

续表

工厂	粗 纱	细 纱	摇 纱	织 布
1938 年				
鸿章(C)	. 48/. 88	. 28/. 82	. 48/. 77	—
申新九(C)	. 30/. 95	. 24/1. 10	. 41/. 80	. 60/—
同兴(J)	. 50/. 70	. 50/. 78	. 48/. 65	. 45/. 92
怡和(B)	. 35/. 85	. 40/. 60	. 40/. 60	. 50/. 80

资料来源:1925年的资料来源于唐海:《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26),第150—152页。1938年的资料来源于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1939),第50—58页。

注:(B)英商工厂 (C)华商工厂 (J)日商工厂

某一工厂是否值得去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来自苏北的女性更喜欢在日商厂工作,在那里她们不会再受中国工厂管理者的鄙视和歧视(见第三章)。一些工人喜欢许多日商厂在工作时间提供的茶。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华商厂的工程师说:“在日商厂工作过的女性,不愿意在我们华商厂工作。主要原因是华商厂的工作较难。例如,以纺纱为例,在日商厂不经常断线,但在华商厂女工确实很忙,由于线一直在断。”^①资本主义化能使日商厂老板购买优质原棉,花费更多的钱来维护机器,这样他们的纱比华商厂的纱更结实,更不易断。

上海有一家工厂是工人们一直想避免去的,那就是申新九厂。人们普遍认为华商厂的工头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申新九厂的低工资也是臭名昭著的。^②在1938年的一本工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申新九厂的一位女工说:

我们想使这个所谓的模范厂成为真正的模范厂。申新九厂工人的生活被认为是上海所有工厂中最糟糕的。数百个工头遍及全厂。工程师、审查员、巡视员、监工、助理监管、教导员、检察员、工头

^① 对史文然的采访。

^② 朱邦兴等编,第58,70—71页。

等等,从早到晚,他们来来回回巡视,如果他们抓到你休息,甚至休息一秒钟,他们就会打你。在日商厂的工人对我们说:“对我们来说,日商工厂的工人,在白天期间休息是较容易的,并且夜班我们也经常能睡觉。为什么华商工厂的待遇甚至还不如日商工厂呢?”

在上海的棉纱工厂工人中,只要你提到申新的名字,他们就会说:“不要去那,除非你确实无路可走了!”申新厂的任何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离开申新去其他工厂。^①

离开申新九厂的工人们谴责她们在厂里遭受的待遇,不过她们也同样渴望表扬永安厂。在同一本工人杂志上,在永安十三厂工作的一位女工(听起来像一个工厂管理者的公共代理人)辩护说:“我并不是设法替资本家自夸”,她写到:“不过在我们工厂里,在吃方面我们提供的设备比其他工厂都好。”她指出,不像其他工厂,永安为工人们提供热米饭和菜的设施。她也赞扬工厂老板给工人们提供服装、高工资、诊所。^②永安管理者允许工人在夏天每天休息半个小时;给工人们茶或开水喝,其他人对管理者的这些考虑印象很深。^③正如第六章提到的,永安厂也给夜班工人提供一杯咖啡和两块饼干。^④

无论女性是在受欢迎的工厂或不受欢迎的工厂,她很少呆很长时间。1928年,关于日商厂的一个调查表明:在这家工厂里绝大多数的女性在工厂工作了一年或更少些时间,其中,在工厂呆了三年以上的工人不到一半。^⑤更常见的是,女工在她的工作生涯中,至少在三四家不同的

① 金想(音译):“我们要把“模范”变为真正的模范厂”,《朋友》,1938年第1卷,第6期,第26—29页。

② 贺子卿(音译):“永安三厂通讯”,《朋友》,1938年第1卷,第6期,第29—30页。

③ 朱邦兴等编,第37页。

④ 对余蓉的采访。

⑤ 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和贸易》,第1卷,第126页。棉纱厂A退休卡证实了这一观察,同时也表明直到1949年这一现象确实存在着。

棉纱厂工作。^① 女工的流动率非常高,为此许多工厂制定了一项政策:不给新进工厂的工人发最初半个月的工资,而将其作为押金。这一政策的目就是阻止女工们跳槽。^②

女工们如此频繁地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工厂并不意味着她们在上海的流动性增强。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很少伴随着从上海的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女工选择跳槽通常都在她所生活的区域里。女孩儿们经常和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或朋友们一起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例如,余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杨树浦的恒丰工厂。她工作三年后,换到了永安厂。“我离开恒丰厂是因为曾在恒丰教我工作的两个师傅已换到永安厂了,所以我也就跟她们一起去了。”^③

通常来说,棉纱厂的工作是女性在上海能得到工作的等级中最高工作,棉纱厂工人很少换到略有名气的卷烟厂和香水厂,那里是宁波人的天下(正如第三章所解释的)。没有听说过有工厂女工离开工业化的工作而从事商场店员的工作,那里由受过更多教育的女性把持着。

尽管女性在她的工作生涯中得到升迁受到明显限制,但她降到什么程度却没有类似的限制。年轻女性们有时被她们的丈夫,但更为经常的是被绑匪卖作妓女,她们在工厂的工作就结束了。有关这样的案件非常多。^④ 许多女工她们自己变成了绑匪。在极端的情形下,这些女工和那些吸鸦片的人或抢匪一起进了监狱,结束了她们的棉纱厂的工作。^⑤

① 退休卡。

② 朱邦兴等编,第60页;对何志光的采访。

③ 对余蓉的采访;也见退休卡。姐妹转厂或母亲转厂经常出现在退休卡上关于女工跳厂的原因中。

④ 例如,参见《申报》,1930年6月21日;1930年11月20日;1930年8月21日;1930年4月28日;1930年5月26日。

⑤ 徐惠芳和刘清于。这一研究是建立在对上海三家女监狱359个女犯人的采访基础上,研究发现她们中有1/3的人最早是工人。作者也发现最大的一个群体,即33%是来自苏北女性。

结婚,做母亲,工作

女工除了从一个车间换到另一个车间,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外,她在工厂工作的阶段与她呆在家的阶段通常是交替的。1900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位女性的工作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当她还是孩子时,她学会了手纺棉,她12岁时,她进了内外三厂的摇纱间。她在那里工作了六年,1918年,她跟随和她一起工作的邻居转到内外七厂,一直工作到1925年,她结婚、生孩子。从那时起一直到1928年,她呆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1928年底,她因家庭经济紧张,就在同兴厂的细纱间得到了一份接头工的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后来生病了,她就回家养病,在家呆了两年。1937年,她到丰田厂做摇纱工,一直工作到1943年,由于一只脚受伤,她再次辞职回家。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她在家编织。战后,她在统益棉纱厂做摇纱工,工作一年后,转到了国棉二厂,在那里一直工作了九年,直到1955年退休。^①

大多数女性因相似的原因暂时离开工厂:结婚、生小孩、受伤或生病、家庭成员去世以及被解雇。^②对在十来岁就开始工作的女性而言,在她们工厂工作中第一次重要的休息差不多一直都是由于婚姻。

到了适婚年龄

已二十大几岁了仍没结婚的女性人数常常让当代观察家震惊。例如,在大康厂,人们开玩笑谈及女工中的“三多”:其中“一多”指一直没结

^① 退休卡。

^② 同上。方显廷引述了一项关于工人离开上海工厂原因的研究。在2150个离开上海的工人中,其中608个(28.3%)工人是由于“长期旷工”而离开;385个(17.9%)工人可能因“拖拉、懒惰、工作差”被解雇而离开;244个(11.3%)工人由于疾病和伤害而离开;168个(7.8%)工人由于“家中有事”而离开;259个(12.0%)工人为了回老家而离开;129个(6.0%)工人因结婚或生产而离开。剩下的因诸如身高达不到要求,偷窃,打架,参与罢工、纠察等原因而被遣散。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和贸易》,第1卷,第122页。

婚,已变成老姑娘的女性太多。^①当拉姆森听说他研究的乡村女性已经30岁了仍独身时,他很吃惊。^②他和其他的观察者认为,这些未婚女工体现了逐渐增强的独立性。

然而,经仔细考察,这些女性之所以被关注,好像不是因为她们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她们是例外:上海女工通常在18—24岁结婚。^③看起来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一样,没有证据证明女性的结婚年龄逐渐增大。但是,到工厂工作的女性比在乡村她们的同龄人结婚要晚些,乡村女孩子一般在十五六岁时结婚,20岁则被认为是老女人了。^④很显然,女性在城市工厂里工作的机会致使婚姻延误。^⑤

婚姻的延误并不意味着女性有更大的权力安排她们自己的婚姻;相反,推迟她们婚姻的决定是由她们的父母作出的,是建立在对家庭利益最大化考虑的基础上的。由于大部分单身女性把她们工资的一大部分交给父母,因此大多数父母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尽可能地把女儿留在家中。一旦她们结婚了,这钱就要交给丈夫家,尽管女孩儿自己的父母将减轻一个人的吃住负担,但他们也将要被夺去主要的收入来源。拉姆森同一位住在上海近郊的农村妇女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她18岁的女儿在棉纱厂工作。当拉姆森问起她女儿什么时候结婚时,她说:“哦,再等两年吧!现在女孩儿们结婚比以前晚。一些家庭仍让她们的女儿早些出嫁,但大多数家庭不这样做。由于她们挣钱,我们不想让她们那么快

①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②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1073页。

③ 见退休卡,也见杨美真,杨树浦婚姻,第8页。作者是上海大学的学生,1931年,当她开展调查时,她获得了厚生棉纱厂的统计数据:在187名女工中,有109人在15—20岁间结婚;43人在20—25岁间结婚;19人在25岁后结婚。见下面的讨论。方福安(音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女工在22岁结婚。见方:《中国劳工》。

④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22页。

⑤ 关于女性在工业化中的作用的一些研究已发现:结婚年龄正在稳步地增大。例如,萨拉弗(Sallaf)在她关于当代虹口女工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在1964年20—40岁的女工中有一半还没有结婚,但到1974年,仍有68名未婚。见萨拉弗,第29页。

结婚!”^①

女孩儿到了 25 岁左右仍未出嫁这一不常见的情况,仍可以由她们家庭环境和经济上的考虑来解释。若把这些女性看做一个群体来看,我们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但具体到某些人而言,我们知道一些:她们来自这样的家庭——“失去”一个有工作的女儿,她们的家庭确实会承受不起。1930 年,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杨美真组织了对杨树浦女工的调查,她遇到了几个 25 岁左右还未结婚的女性。当她设法寻求原因时,她发现她们大多数没有兄弟。她们的父母由于没有儿子,要依靠女儿的收入,因此,他们特别不愿意让女儿出嫁。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来他们家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女婿。^② 杨美真注意到,不幸的是,父母仍健在的大多数年轻男性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只有孤儿和地痞恶霸儿对此感兴趣。^③

在上海还有另一个推迟她们婚姻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结婚年龄比工作女性一般的结婚年龄还要大:20 世纪 40 年代,工人在工运中、在中国共产党中,或在两者中都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女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史晓梅,她们直到二八九岁才结婚。“我结婚非常晚,当我 28 岁时才结婚。那是解放后的事了。在那时大多数工人在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我直到 28 岁才结婚因为我是党员,太忙于开会做事。直到解放后我才有时间思考诸如结婚这样的事情。”^④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女党员积极分子推迟婚姻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在 25 岁左右没结婚的女工经常被怀疑是党员。为了保护女工积极分子免受迫害,中国共产党指示她们快些结婚。何宇珍在申新厂工作,

①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 1073 页。

②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的婚姻”,第 8 页。

③ 同上;玛杰里(Margery Wolf)在她关于台湾女性的研究中,也发现有女儿但没男孩儿的父母设法找到一个愿意进他们家的准女婿。她发现,和在上海一样,愿意接受这一安排的男性或者是人品可疑,或者由于“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孝之子更令人憎恶的了……抛弃他的父母、离开他的祖宗,将在他的来生遭到报应”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被人们唾弃。见玛杰里,第 191—204 页。

④ 对史晓梅的采访。

1940年入党,她回忆说,她所在工厂的人们开始怀疑她是共产党员。

党组织想立即给我介绍一个准伴侣。[笑]他们想让我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女人一旦结了婚,她就不会做事了。她只是上班,照顾家庭,她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我要是结了婚,那么国民党就不会太怀疑我了。所以我就结婚了。之前我甚至不认识我丈夫。他们给我介绍的那个人也是共产党员。我结婚后我仍住在宿舍里。我没住到他那里。^①

尽管最初何本人决定推迟她的婚姻(她因太忙没结婚),但在什么时间以及与谁结婚问题上,她和其他女工的命运绝然不同。就她而言,不是她的家庭,而是党为她作出这些决定。

说媒

尽管五四运动冲击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但大多数女工在选择她们的伴侣上几乎没有发言权(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外,上海其他阶层的大多数妇女的确如此)。当代社会学家,诸如拉姆森和杨美真,遇到了几个不同寻常的工厂女工,她们很可能凭借她们挣钱的权力,拒绝嫁给她们父母为其选择的伴侣。然而,两名社会学家发现她们采访的大部分女性回避自由结合的思想。杨美真观察到,大多数女工“认为自由结合,男女他们自己订婚,是不光彩的。”拉姆森的采访认同这一观点:“女孩儿自己选择丈夫是可耻的。”^②

对自由婚姻的反应仅部分地归因于女工对传统价值的坚守。对于女工而言,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背景下,这一概念可能并不意味着男女相互自由选择的婚姻是“体面的”婚姻。这很可能也是对自由婚姻意味着什么的反应。相反,它可能意味着一些女工所表现出来的“随便的和不

^① 对何宇珍的采访。

^②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的婚姻”,第6页;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1075页。

道德的”行为,她们“丢脸的”行为经常见于当地的新闻。例如,来自常州的一个漂亮女孩儿,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来到上海。她一开始在棉纱厂工作,就“租了一间房子,同来自河北的一个男子住在了一起”。另一个小女孩儿,在某一棉纱厂工作的上海人,被她所在车间工头的情妇介绍给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他们一起租了一间房子,共同生活了13年。^①然而,另一个工厂女工被发现同她厂里的工头同居,尽管这一事实:他已结婚,并且已有三个孩子。^②在这些案件中,有些人是受街头地痞恶霸儿的欺骗。一个当代观察家写道:“这些地痞恶霸中许多人看起来‘一表人才’。”

有的穿西装皮鞋,一些人穿绸衣服,高领子……许多年轻女工被他们的外貌所炫耀,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欺骗。往往就和他们一起“轧姘头”,进一步嫁给他们做妻子。结果因为流氓的挥霍无度,一定要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被流氓丈夫骗去用光,衣服首饰也都拿去当光。最后,甚至会被流氓丈夫拖去卖给妓院。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棉纱厂女工身上。^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不常如人所愿,以传统方式安排的婚姻,可能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实并非经常如此。

一些女孩子在她们才两三岁的时候,她们的父母就把她们许配了人家。另一些人在同样的年龄,就被卖作了童养媳,在她们未来丈夫家长大成人。几百年来,这两种风俗习惯,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也在上海的

① 后来女人生病了,男人就失踪了。最终,她去法院起诉她丈夫花了她挣的钱,请求离婚。法官告诉她,由于他们从来没正式结婚,只是住在一起,只要她愿意她随时可以离开他。新闻报道没有说这一诉讼是怎样被解决的。《申报》,1930年7月13日。

② 刘大春,第168页。

③ 朱邦兴等编,第92页。

工人阶级家庭中延续下来。^①

把女儿卖做童养媳是相对贫穷的家庭最常见的求助方式。杨美真发现把女儿卖做童养媳在上海的苏北人中最为盛行。^②从经济极其困难家庭的父母的角度来看,把女儿卖做童养媳既为他们减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礼金。从小男孩父母的观点来看,从长远考虑买童养媳可能为他们省了钱。父母明白将来为他们的儿子买媳妇要花几百块钱,有时他们就返回老家为儿子买个童养媳。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可能只需花二三十块就能买下穷家女儿。他们就把她带到上海来,亲自抚养,等她十二三岁时,设法为她在上海工厂找一份工作。^③报纸经常报道女孩儿被卖做童养媳的悲剧:最初女孩们在能为她们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的许诺下被诱骗到上海,或者是她们开始工作后被绑架。报纸关于上述这类报道的频率表明买卖童养媳的生意很火。

尽管差不多所有女性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不过许多女孩儿只有到了十几岁,父母才会操持她们的婚姻。通常为女儿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是父母的责任,为此,父母常需要媒人的帮助。朋友、邻居、亲戚、工友都可能成为媒人。陈招弟谈及帮她撮合婚姻的媒人:

首先,媒人到男女双方的家里去,夸耀对方是多么好。她告诉我母亲男方家多么富有。我母亲想那挺好,这样我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告诉男方家我非常漂亮、非常诚实。那么双方就都同意了。

后来证明媒人撒谎了。她曾说我丈夫的父亲是工头,而实际他只是个凿岩石筑路的工人。对于媒人而言,说媒的好处是她为此能

① 有关童养媳的分析,见沃尔夫和黄杰山(Wolf and Huang)。

② 杨美真推测在杨树浦,大约80%—90%的工人夫妇的新娘曾经是童养媳。见“杨树浦女工的婚姻”,第7页。

③ 朱邦兴等编,第90页。

得到礼物,比如18条猪腿。^①

有时媒人的谎言更为恶劣。有一女子在结婚后才发现,原来媒人在介绍准新郎的优点时,漏掉了很重要的一点:他和他的父母都吸食鸦片。^②

工厂车间的拿摩温经常为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女工做媒介绍对象。^③当然,由于女工的工作受制于拿摩温,所以她们很少拒绝这些撮合。

当我19岁时,拿摩温给我介绍了一个男人。我想嫁给他还不如死了呢,但我想我就是受苦的命呀,最终我还是与拿摩温给我介绍的那个男人结婚了。他以前结过婚,有个小孩儿。他的父母非常封建。由于他前妻的家境很富有,我那么穷,他们瞧不起我,我和他母亲经常吵架。^④

由于许多拿摩温与帮会分子关系密切,为此他们经常为其介绍对象,要不然他们可能很难找到对象。

一般来说,说媒有某些讲究。首先,准新郎和准新娘得来自同一区域。^⑤找到来自同乡的人选后,一些家庭就会花钱请算命先生测算准新郎的“生辰八字”是否与准新娘的相合。最后,商定好订婚钱后,一对新人就被认为订婚了。订婚无异于契约,尽管很少采取书面形式。解除婚约经常需要法庭批准,不止如此,如果女孩儿的父母不同意,那么她无权终止婚约。

来自通州的一个16岁女孩,在上海某一棉纱厂工作。她的案件说明了许多女工的窘境。《申报》报道了她的案件。她11岁时,她的父母在通州籍的一个媒人的帮助下,把她许配给了也是通州籍的一个19岁

①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② 对徐淑梅的采访。

③ 朱邦兴等编,第92页。

④ 资料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⑤ 白:“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第58页。实际上我采访的所有口述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的工人。在双方家庭的同意下,男方家付给女方 32 块钱的订婚钱。(在听庭期间,年轻人称他已给女方 70 块钱)1930 年春,当女孩 16 岁时,仍未正式结婚。准新郎借口要把她从穷苦家庭中救出来,强行把她带走和他住在一起(他找来大约 30 人帮他),就这样完成了婚约。在同一天,她逃出来,跑回了家。之后,她找了一个律师帮她在区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婚约。只要女孩儿的父母不愿解除婚约,法官就不能受理她的请求。他告诉女孩,由于她 16 岁,她必须遵从她的监护人的意愿。^① 报纸上有关其他案件的报道表明,陷入类似窘境的大多数年轻工人很少能摆脱婚约。

某户人家的儿子与被拐卖的女性订婚并不常像看起来的那样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不能担负起正式婚礼费用的家庭发现“偷新娘”是个省钱的法子:一般婚礼要花掉男方家 100 多块钱。^②

在女工的生活中,婚礼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儿。婚礼也形象地反映了工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富有的家庭租用一等的轿子,把头戴凤冠、盖着红盖头的新娘抬到新郎家。其他人租用二三等的轿子,特别贫困的家庭则靠步行。女工请婚假的长短也同样反映了相关的影响。陈招弟回忆说:“我们较穷的工人大多数是周日结婚,周一就去上班了。不过条件好些的工人能休几天假。”^③

许多女工的家已从乡村搬到了上海。为了举行婚礼,她们要返回老家。例如,尽管余蓉和她的未婚夫都住在上海,他们回到绍兴举行婚礼,在结婚的那天,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她丈夫和她父母返回上海。余蓉和她婆婆留在了乡下,直到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才回到上海,恢复了她在工厂的工作。

① 《申报》,1930 年 4 月 21 日。

② 1930 年,在杨西孟研究的 230 户家庭的预算中,婚礼的花费从 7.59 元到 250 元不等。在他研究的群体中平均花费为 100.25 元。见杨西孟,第 75 页。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京,1930 年。

③ 对陈招弟的采访。

尽管女工通常因举行婚礼而休假，但她的工作生涯很少因此而终止。大多数女性返回工厂继续工作。和余蓉一样，当她们生孩子时休假，不过她们一有机会就返回工厂。关于1947年上海第一厂女工婚姻状况的统计（在全厂2289名女工中，大约73%人已结婚。^①）证明：尽管管理者偏好雇用单身女性，但许多已婚女性也能守住她们的工作。

工作儿媳

不管新郎新娘来自哪里，也不管他们在哪里举行婚礼，一旦他们结了婚，几乎所有的工作女性都要搬到丈夫家去，随之被看做是丈夫家庭中的一员。对于许多年轻媳妇而言，日常事务要比在自己父母家多得多。王富英回忆说：“婚后，我到他父母家住。当我和我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时，我只是在工厂工作，从不做家务。一旦我离开了，我必须两样都做。”^②

除了帮助料理家务，儿媳还应把她挣的工资全部交给她丈夫家。一个工人回忆说：“如果我想买东西，我必须问我的公婆。”^③公婆死后，女人要把她的工资交给她丈夫。一些人对这种安排很不满意。当杨美真问一位女工她是否经常把她的工资交给她丈夫时，她抱怨说：“我必须把工资给我丈夫！如果我不给，他就打我。因为我是女人，我打不过他。他经常拿我每月挣的八块钱赌博。”^④进一步说，尽管年轻的妻子想继续供养她自己的父母，但她也不能那样做。一位女工记得她仍

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概况》，第105页。没有更早期的可资比较的统计数据，因此，由此确定这一比例是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相背离是相当困难的。1925年棉纱厂女工年龄的统计数据表明，二战前女性结婚后继续工作可能并不普遍。在1340名工厂工作的女性中，21—25岁年龄段有234人（17.5%）；26—30岁年龄段有116人（8.7%）；年龄超过30岁的女工仅有50人（不到4%）。如果我们假定她们大多数人在21岁结婚，婚后继续工作的女工大约占1/3。见宇高，第330页。

② 对王富英的采访。

③ 对上海第二纺织厂退休工人的采访。

④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的婚姻”，第70页。

能继续看望她的父母，“有时我能给他们带点东西，像花生什么的”^①。

对那些有哥哥或弟弟的女性而言，看起来是那么糟糕。不过要是像陈招弟那样，只有一个妹妹或姐姐的话，处境也很难。她把其看做一生中遇到的最难的情形之一：“我结婚后，母亲根本没有任何收入，以前我把工资给她，她不必去乞讨。但是我结婚后，她每天都出去讨饭，甚至她可能仍吃不饱。”她瞒着婆家人，借钱给她母亲，可是不久这笔钱却被偷了。

回想起那时我怎么待母亲的，我就感觉很不舒服。我埋怨她不小心。我对她说：“你那么有经验，却连钱都看不住！”我担心我借的高利息。我母亲只是一味地哭，她说她的命真苦，不能为我生个弟弟全是她的错。

她病了，不久就去世了。我们就用她睡觉的床板做了一口棺材。^②

尽管许多女性结婚后仍继续回来工作，但婚姻通常意味着接连不断地生孩子。大多数女性在婚后一两年就开始有孩子了。陈招弟回忆说：“我们既没受过教育又没避孕方法没办法控制。如果我们不来月经了，我们就知道自己怀孕了。如果你怀孕了，那就怀孕了。”^③差不多她们每次生产，她们就必须休产假，尽管只是分娩的前后几天时间。

1946年，经过一系列罢工，女工取得的一项成果是：她们每次生孩子，都被允许休56天的产假。直到那时起，怀孕女性就经常被解雇。据说棉纱厂管理者宣传“三不想要”：年老的我们不想要，缠足的我们不想要，怀孕的我们不想要。最后一条是最要命的。因为大多数女工仍年轻，没缠过足，她们差不多都会怀孕。从某个角度来看，在她们打算或可以不工作之前怀孕，这样常常会好一些。怀孕的工人经常做人流。尽管

① 对上海第二纺织厂退休工人的采访。

②③ 对陈招弟的采访。

在那时做人流很危险，很多女工为此而丧命。^①

为了保住工作，大多数怀孕的女性设法瞒着工厂管理者和工头。穿宽松的衣服可以很好地掩饰，不过在最后的几个月她们就用布缠紧肚子。她们这样做，再加上怀孕期间完全缺乏孕前检查，导致女工流产和死产事故高发。^②要是女工在上班时流产，工厂车间的洗手间则常是最乱的。在大康厂不管什么时候发生这种情况，成群的女性就聚在洗手间，烧锡纸钱或纸钱来驱赶死婴儿的亡灵。^③

尽管大多数女工能够测算她们的分娩日期，但由于她们在测算的分娩期前仍继续工作，所以，对她们来说工作时分娩不是不常见。^④唐海讲述了一个女工在分娩前设法勉强完成其工作的故事：

当我在三新棉纱厂工作时，有一个来自江北的女工，她在粗纱车间工作。她很健壮，怀孕已满10个月了，但是由于她需要维持生计，生产前她继续在工厂工作。一天她感觉腹部疼痛，她想孩子很快要生了。她想请假回家，不过她转念又想现在已经三点了。如果她没完成这个班次，就要扣她的工资。因此最好等完成这一班次，工作一结束就回家。因此，她仍继续工作，一直到下班哨声吹响，她双手托着肚子往外走。但是她甚至还没走到门口，婴儿就出生了，她非常艰难地躺在石阶上，许多男女工人围观！^⑤

一些更为幸运的女工在即将生产前能休假数天。例如，余蓉评论说，永安厂被认为优于其他厂的原因之一是“如果他们认识你，你怀孕

① 钟，第48页。

② 流产是那么常见，以至于1946年棉纱厂终于开始允许女性休产假。如果不能为已流产女性提供产假，则被认为是主要缺陷。见“沪西十大纱厂劳工福利便利情形”，《中国工人专刊》，1946年第10期，第2页。

③ 资料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④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1096页。

⑤ 唐海，第261页。

了,当你生产时,如果你休几天假,他们不会解雇你”^①。大多数孕妇想法休假,在产婆的帮助下在家生产。关于女工面临的重要问题的1950年报告,引述了无能的产婆使女性在生产时死去的几个极端的案例。报告的作者痛惜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产婆手下有多少产妇丧命。”^②还有一些女性在没有任何帮助下生产,拉姆森的一个学生,采访了杨树浦近郊的一个乡村的女工,他惊骇地发现许多女性“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生产,在人们进入房间前,就已迅速地给孩子洗好了澡,穿好了衣服”^③。

一考虑到女工怀孕和生产的环境,就不会对婴儿的高死亡率吃惊了。仅有一小部分的孩子幸存下来:据一项估算:60—70%的婴儿死亡。^④一位已生过八个孩子的女工仅有一两个存活下来。^⑤

女工生产后,多久去工作主要取决于她个人情况。生产的第一个月,她被认为是“红人”,最理想的情况是,她要避免接触其他人。在这一时期,她要住在婆家,躺在床上。如果父母如愿得到了男孩儿,这一月的月底就会庆祝。“我们要吃长寿面,希望儿子长大后不再当工人。”^⑥但女儿满月时并没有类似的庆祝。

但是大多数女工负担不起在家呆一个月的奢侈享受,如果有人帮她照看婴儿,为了不丢掉工作,她过不了几天就回厂工作了。要不然,为了尽快回厂工作,她干脆就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去上工。(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有时没有这些选择,为了保住工作,她要么把孩子送人要么把孩子丢弃。^⑦有一女工由于她家急需钱,她不得不把她的头两个孩子

① 对余蓉的采访。

② 吴云之(音译):《妇婴卫生问题》,见上海总工会女工部,第92页。

③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第1096页。

④ 钟,第48页。

⑤ 吴云之:《妇婴卫生问题》,第92页。

⑥ 对陈招弟和徐淑梅的采访。

⑦ 钟,第48页。

送到孤儿院：

当我怀孕了我被工厂解雇。孩子出生后，我丈夫失业了。我们的生活很艰难。我不得不把孩子送进孤儿院。我生产后，等了三周，然后花了五块钱去看工头……得到一个进工厂的名额。我丈夫上街兜售商品，但是有一次当他正在卖大米时，被一个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拿走了他所有的商品还打了他。那时我已生了第二个孩子。除了把第二个孩子也抛弃，我们别无选择……我给我在工厂认识的拿摩温送了一份礼物，然后登记了一个名额。不久，我恢复了工作。^①

通常妇女生产后不立即恢复工作，而是呆在家照看孩子。这一时期，她可能靠当奶妈继续挣得一些钱。尽管她可能打算恢复工作，但她是否能被重新雇佣以及她什么时候能被重新雇佣并不由她决定。例如，余蓉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她母亲照顾小孩儿，她能够立即恢复在永安的工作。但是，1944年，当她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工厂正在缩减生产，裁减工人。由于不能恢复工作，她在农村的家里呆了数年，一直到她听说工厂正在再次雇工。^② 陈招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在家呆了半年，但是孩子长到六个月时，得了一场重病，夭折了。三天后，陈招弟打算恢复工作。然而，那时是战争时期，早在她生产前，她曾工作的工厂就已关闭。幸运的是，不久后，以前和她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工把她引见到内外第十三厂的粗纱间工作。^③

总结女性结婚生子后的工作模式是相当困难的。有些人，像余蓉和陈招弟那样，除了生孩子不得已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外，没有辞职而是继续工作。其他人在抚养孩子期间没有工作，不过，当她们三十八九岁左

①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也见李少阳（音译）：“女工与育婴堂”，《劳动界》，1920年第4期，第3页。

② 对余蓉的采访。

③ 对陈招弟的采访。

右或四十出头时,她们就返回工厂持续地工作下去了。^①不幸的是,关于女工退休的年龄没有系统的记录,唯一能得到的工作记录(来自某一工厂的女工退休卡),也仅是那些生完孩子后仍没有终止工作的女性的记录。

不管怎样,由于我们知道40多岁的女性只是工人中很小的部分,由此我们推测大多数女工在三十八九岁时就不工作了。许多妇女一旦她们开始有孩子,可能就再也恢复不了工厂工作。一些人当她们结婚回农村的家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如果一个女性开始有了孩子,她继续工作的话,当其中的一个孩子长到能够当工人为家庭挣钱时,她很可能就不再工作了。

战争中的女工

女性做工人时间的短暂——进出工厂和往返城乡的模式——不只是城市女工坚守传统社会关系和习俗的结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解放的30年间,其中有13年上海在遭受日本侵占。对大多数女性来说,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工作的那些人,战争和日本的侵占对她们工作的重大影响和婚姻、母亲身份一样重要:她们工作的转折点与这些事件同步。最后,正如第八章将要讲述的,为了理解女工间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为了理解这些女性的工作史,我们必须考察1932—1945年间的事件是如何影响她们的。

1932年1月28日午夜,借口中国军队挑衅,武装的日本军队侵袭了上海,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区(见第一章)。上海工部局工厂监察员写道:“步枪、机关枪扫射了四个小时,枪炮声不绝于耳。到了凌晨四点钟,新的恐怖在那个可怕的第一个夜晚出现了。听到日本飞机在头上盘

^① 退休卡。

旋,炮弹从这些战机投落下来,我透过窗户能看到尾随炮弹而来的刺眼强光。在开火的四个小时内,在人口极其密集的区域,很显而易见,预料中的恐怖完成了。”^①

闸北(火车北站周边的工厂区)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路透社(Reuters)报道:“闸北中国城看起来像一个大火场,100英尺高的火焰直冲天空,在很远处就能听到吼叫声。上海被这可怕的火光照得通明……从公共租界望去,闸北好像已变成了火海。”^②

许多女工住在闸北。她们在这次袭击中醒来,加入了正在膨胀的难民队伍,大多数人首先逃往公共租界。陈招弟回忆那时她在家里的经历:

我9岁时,日本第一次入侵上海,战争来了。我家住在闸北的太阳山路上。我们住在草棚里。当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房子被烧毁了。我们逃到了苏州河的南岸。我们在路边住下来。我们睡在街上,靠近我工作的缫丝厂门口。那时,许多人已逃了出来,晚上,当工厂关闭时,我们就都睡在门口……外国巡捕怀疑我们是抢匪,逮捕了我们,把我们带到巡捕房。我们告诉他们由于我们的家被烧毁我们逃了出来。这样他们就把我们送进了收容所。我们都被锁在那里不能出去。^③

甚至在袭击中家没有被毁坏的女性也受到了影响。由于许多棉纱厂暂时停业,在1932年春的战争期间,所有的日商厂都关闭了,大约5万名工人失业,除了两家企业外,所有的华商厂也都全部关闭。^④大多数工厂至少关闭了六周。^⑤

① 海德给世界基督教女青年的信,1932年2月9日。

② “战争在上海:飞往收容所和战火中的闸北”,《伦敦画报》1932年3月5日。

③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④ 雨枝:“中日战争对于上海工业界的影响”,《女青年月刊》,1932年11月,第6期,第17页。

⑤ 布什,第203页。

原来来自乡村的大多数女工再次返回她们的家乡。因没有了工作而离开,当工厂可能重新开工时,她们也根本不知道。^① 余蓉记得:“我结婚前,日本人来了。那时我 21 岁。我们吓坏了,返回了浙江老家……实际上在乡村生活成本很低。我们用我们曾在上海挣的钱,由于我们自种自吃,没有那么多花费。”那时我在乡下呆了两个月。许多人经常往返上海。当上海局势安全了他们就告诉我们。^②

像余蓉一样,已逃回农村老家的大多数女性在一年内又返回了上海。之后不久,1933 年,棉纱工业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某时许多女工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工作了(见第一章),棉纱厂工人的规模从 1931 年的 14.9 万人降到 1935 年的 10 万人。^③ 在这一期间,许多女性在上海不能维持生计,就再次返回家乡。

到 1936 年棉纱工业开始复苏,好几年没工作的女性大多数能够恢复工作。但是,1937 年战争爆发,使许多女工再次逃离上海的家,放弃工作回到她们的农村老家。^④ 农村地区也遭到沉重打击,到 1940 年,周边乡村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浙江东部,遭受着严重的食品短缺。所以说,尽管许多女性呆在农村做家务或干农活一直呆到战争结束,但许多难民返回了上海,她们希望至少能买到大米,最终能找到工作。申新六厂的一位工人回忆了她在战争初期的经历:

由于 8 月 13 日晚上的事件,我们工厂停工了。生活在工厂周边地区的人们都带着他们的钱财逃跑了。我们的一些工人呆在工

① 退休卡。

② 对余蓉的采访。

③ 华商工厂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在这些年间,日商工厂的工人人数已从原来的 5.1 万人仅下降到 4.4 万人;而华商工厂的人数从 8.5 万人下降到 4.5 万人,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工会,第 42—58 页。

④ 退休卡。据一项估算,1937 年战争爆发前,在公共租界的工业中有 84255 名女工,1938 年 5 月,工厂女工人数为 56158 人。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38 年 6 月,有关二战期间棉纱工业的讨论,见第一章。

厂里。8月15日,日军已开始在我们工厂附近开火,8月19日上午,细纱间楼上飞来一个流弹。我们就逃出去了。

我先跑回平梁路家,带同家眷逃难,登上一艘小船,过河来到浦东。之后,我们回到法租界。但由于路上不好走,一直到深夜十一点钟,我们才到了法租界。我们没地方住,便搭民船返回了苏北高邮家乡,帮我的公婆种地。

大约半年后我返回上海,在新裕棉纱厂找到了一份工作。^①

实际上,从战争爆发之初到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的这段时间是上海棉纱工业的黄金时期。对许多工人而言,她们有可能恢复她们以前的工作。

像陈招弟一样,成千上万工人农村的家早就没有了,她们涌入了公共租界,最终住进了收容所。陈招弟回忆说:“当开始同日本打仗时,我14岁。”

我们在街上住了两个月。那时很多人回到了乡下,但是我们家在农村什么都没有。我们既没有地也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甚至不能被雇用。所以我们逃出来,在街上住了两个月。后来我们被抓了,再次被送进收容所,这次是在新闸路。两年后,我16岁时,父亲去世……11月收容所被解散,我们都被逐了出来。^②

在1941年12月日本占领前,许多工厂女工都曾在公共租界的某一收容所住过一两年,这是她们经历的一部分。戏院、行业协会、学校、银行、旅馆、饭店都变成了收容所。^③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2卷,第326页。关于战争第一天大量的个人叙述,见朱和梅。

② 对陈招弟的采访。

③ 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SWIX(1981),第4卷,第37页。战争开始后的一天内,26个难民收容所在租界建立,容纳3万名难民。到1937年底,有190个难民收容所,容纳大约9.5万名难民。1938年,难民收容所数目下降,到1939年,仅有29个难民收容所运营,大约收容3.1万名难民。在日本占领租界前夕,仍有1.6万名难民住在13所难民收容所中。见巴尼特,第44—45页。

有时候收容所的生活无异于囚禁。这一时期一位外国观察家在上海参观一所收容所时,他这样描述收容所:“一个大空房子里,放置了临时拼凑的三层木制床。”为 2000 人提供住所。

屋子里那么黑,白天不得不用电灯照亮床铺。然而,电灯的亮光微弱得像几只萤火虫发出的光一样。在另一房间里,条件更糟。那是在一条外租界路(an extra-settlement road)上一片空地上搭建的一间小帐篷。在帐篷里,人们几乎分辨不出躺在地上的人与从棚顶挂下来的破布包、篮子等物件。成年人被抱怨他们从未吃过一顿饱饭……在收容所里没有自来水,所以难民们不得不在棚外挖一个大坑储水,水很浑浊,他们用来洗衣甚至洗菜。^①

霍乱和其他疾病肆虐,许多难民因此而死亡。^②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入公共租界,幸存下来的那些人被遣散。工人们家已被毁,他们聚集在稻草屋里的安置点或有时能得到工厂的房间。^③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要想找到固定的工作并非易事。大量技术工经常失业。不过一小部分女性能够继续在棉纱厂工作,许多工厂已被日本人接管,要不然就被他们的日本工厂老板调整生产,以便更好地为战争服务。一位女性记得那时她刚开始在同兴棉纱厂工作。日本占领后不久,工厂变成了同兴军服厂。“当他们改变产品时,他们没有解雇工人。那些想留下来工作的可以留下来。当他们改变产品时,我们不得不学习新的操作。不过由于我们都非常年轻,我们能非常迅速地学会,不管怎样,由于这儿有缝纫机,制造军服要比纺棉轻松。”^④

然而,大多数女性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来养家。例如,周阿宝,她在

① 给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信,1938 年 4 月 22 日。

② 威尔斯(Wales),第 87 页。

③ 在战争期间,草棚收容所发展相当迅速。见 SSKJY:《上海棚户区的变迁》。

④ 对徐红梅的采访。

闸北的家被毁后，她搬到了公共租界。有时，她能在租界的一间小摇纱间工作，其余时间她和她的朋友去乡下到处捡拾蔬菜，然后带回上海来卖。

我同住在我附近的其他女孩一起去拾蔬菜。我们都来自苏北。每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就去闸北以外的郊区。我们能捡到农民们丢在地里的蔬菜。由于这些菜是他们不想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捡走了，他们并不在意。我们捡小麦、土豆、芜菁，甚至野菜。在吃中午饭的时间，当所有的农民都回家吃饭了。我们就呆在地里，吃地里有的任何东西。夏天，我们吃西红柿，冬天我们吃胡萝卜，我们只是用衣服把上面的泥擦去。晚上，我们把已捡到的所有东西背在背上，带回家去。

这些年来，有时我有一份固定的工厂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一没工作我就去捡菜。^①

许多女工变成“跑大米”(rice runners)的，她们把大米缝在衣服里从上海城区偷运到租界，那里因缺乏大米常常爆发骚乱。

无论她们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在战时的上海勉强度日很艰难。大多数女性把战争时期看做她们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之一。王富英的儿子回忆说：“在战时，我们的生活十分难熬，我母亲有工作，但她的工作不足以养活我们一家。那时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吃日本人剩下的残羹冷炙。我们必须付钱，必须要花钱买。有人捡这些垃圾，然后卖给人们，比如我们。我们没任何衣服穿，我——一个小男孩儿——不得不穿女孩儿的衣服。”^②许多没工作的女性靠拾荒将其卖给需要的人家，像王富英家，勉强

^① 对周阿宝的采访，上海，1982年9月28日。

^② 对王富英和他儿子的采访。对食品供给、米骚乱、燃料短缺以及工人购买力下降等问题的叙述，见巴尼特，第46页。他通过引用街道上死尸的数目总结战争造成的严酷形势。1935年，在战前，上海街道上的尸体为5590具。1937年，这一数目升至20746具，1938年，猛增至101047具。也见海德。

维持生计。其他人则设法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诸如拉车这些以前只有男人才干的活。最为幸运的是能找到像家庭保姆那样的工作。^①

女工与和平

1946年是很多工厂工人的工作生涯又一转折点。当战争一结束,一些工厂差不多马上重新开张,但是许多工厂(特别是日商厂,被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几个月来都不能恢复生产(见第一章)。尽管许多女性的工厂工作生涯在战时结束,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和平意味着她们工作的恢复。

当工厂重新开工时,许多管理者希望借机招募新工人。他们发布了招募要求,明确指出——缠足的女性或超过25岁的女性、文盲、长得丑的或胖的都不符合要求。老工人组织起来反对这一政策,最终,大多数工厂同意重新雇用一部分以前的技术工。^②

1945—1946年间,大量的年轻女性第一次进入工厂工人的行列,在这些年间开始她们工作生涯的那些人代表着新一代的工厂工人。她们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于她们的上一辈人。虽然这新一代人中有一些人是工人的女儿,不过,不同于战前的工人,许多人看起来出身于曾经较富裕的家庭,不同于在20世纪2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后者的童年或者是做农活或者从事手工劳动;前者中的许多人在进厂前已上过几年学。前代人在她们十岁初头甚至更早时就已在工厂工作了。与此不同,新一代的许多女性直到20岁才开始工作。^③

最后,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影响前一代工厂女工工作生涯的唯一最重大事件的话,那么,解放则是后一代女工工作生涯中的重大事件。

① 退休卡。

② SGYLW, 上海工人, 第4卷, 第56页。

③ 退休卡。

1949年后,这些女性的工作史不再具有往返乡村的阶段性移民的特征。生育补贴和照顾小孩儿的设施使得她们在生育孩子的时期继续工作成为一种常态,并得到较好的保障:她们通常在55岁退休。

这一代人的集体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氛围下被加工改造了。这些变革怎样影响棉纱厂女工的生活,以及女工的经历与解放前的前代人的经历怎样相似或不同,所有这些都是问题,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八章 变化的视角

前几章已经说明了在上海女工中许多妨碍工人团结和工人阶级意识发展的力量。例如,我们已看到尽管棉纱厂雇用了几千名工人,但来自不同社会和地理背景的人们未必就能团结到一起。与之相反,雇佣和日常生活模式反而强化了来自同乡的女工间的联合;同时也强化来自不同区域人们之间的对立。

女工们为了庆祝家中大事儿诸如婚礼等回农村老家或在失业期间为了生存下去回老家,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她们建立在籍贯认同基础上的关系。战争及日本的占领增加了工人们返回家乡的趋势,同时也突显了她们从一家棉纱厂换到另一家棉纱厂的趋势,以及在工厂工作和当家仆或兜售蔬菜的街贩间角色转换的趋势。最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解放的整个 30 年间,女性继续束缚于或专注于从属的、传统的家庭角色。所有这些要素强烈地阻止了女工们建立在她们作为工厂工人共同经历基础上的关系的发展——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

与这一描绘相对的是一段充满数千名女工罢工的历史记载。可以说,上海第一家棉纱厂一开业,就出现了女工们为了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提高工人福利待遇而罢工的情况,并且 1949 年类似的罢工仍在继

续。这一记载表明女工毕竟已超越了传统的分化,作为工人已培育出了非常不同于她们雇主利益的自我意识。

为了协调女工群体这些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描述,我们必须认识到每次罢工并不常等同于工人团结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 20 世纪 20 年代的女工,我们发现加入诸如工会、中国共产党等专门工人阶级组织的女工,可能远比加入姐妹会传统互助组织的女工少。20 世纪 40 年代,加入姐妹会的女性可能仍旧比加入其他组织的女性多。不过,20 世纪 40 年代的姐妹会非常不同于 20 年代的姐妹会。他们已经变成了政治性、社会性的保护组织。姐妹会在基督教女青年协会的间接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转型,之后中国共产党则更直接地设法借助姐妹会组织女工。

五卅女英雄:重新评价

如果说上海无产阶级曾在某时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舞台,那就是五卅运动时期。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 1927 年的国民党政变,上海的工人们频繁举行罢工。这一罢工活动在五卅运动后达到高潮:在 1925 到 1927 年间,上海棉纱厂共发生了 171 起罢工。工人们要求高工资、短工时、组织工会制定禁止体罚的规章制度;要求男女工同工同酬。1927 年 3 月,上海总工会 80 多万名武装工人率先暴动,夺取了军阀控制的上海(见第五章)。

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令人瞩目的活动已成为大多数中国工运研究的核心。^① 谢诺的巨著以时间顺序研究了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到 1927 年政变这一期间上海工人阶级政治化的历程。在谢诺关于上海工人的叙述中,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成长为具有

^① 见谢诺:《中国劳工运动》,单(音译)(Chan);谢夫(Shaffer);《毛和工人》。

阶级意识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者。尽管他赋予上海棉纱工业工人以重要性,并且他详尽描述了女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但奇怪的是谢诺在关于工运讨论中并没有提及女工。可以由此推测女工与她们的男工友一样具有阶级意识和革命性。也许与工人运动相伴而来的五四后女性运动的发展加强了这一推测,中国共产党对压迫女性这一问题的直接关注也强化了这一推测。

探明纱厂女工在工运中的作用并不容易。上海社会局发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每一棉纱厂有多少工人参与了这些罢工,然而,这些记录并没有连续地具体说明参与罢工的男工、女工及儿童的人数。当他们具体列出参加罢工的男工、女工和童工的人数时,数据显示出大量的纱厂女工经常参加罢工;实际上,女工经常构成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而且,由于上海工人的大多数以及最具战斗力的工业工人之一是女工,因此有理由推断出女工构成了罢工工人的主力。

如果说每次罢工是工人组织和工人阶级意识的晴雨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 20 世纪 20 年代女工参与罢工的记录显示了工人高水平的战斗力和组织力。^①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罢工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为了推断女工组织的性质及其意识,我们必须近距离考察她们罢工的原因。尽管目前能得到的所有资料还不足以系统地评价 20 世纪 20 年代,不过其中一些报道表明必须提出这类问题:女工罢工的原因是否和男工一样? 她们罢工的原因反映了阶级意识还是固守传统? 谁是她们罢工的领导者?

这些报道揭示出女工参与罢工的原因并不常和男工相同。1925 年 2 月,使上海西部许多日商工厂倒闭的罢工始于 1925 年 2 月,起因是内外棉第八厂粗纱间的 40 名男工被解雇,由女工取代了他们。罢工迅即

^① 一些作家,诸如鲍伯(Bobby Siu)已经发现在这一时期关于“女工运动”的记录证实了女工运动“从偶然的自发的小规模罢工到有组织的有凝聚力罢工的发展”,见鲍伯。

发展到其他的内外厂,以及日华、丰田、大康厂,最终大约 30800 名棉纱厂工人被卷进来。尽管我们不知道参与罢工女工的确切数据,不过肯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那时上海所有日商厂的男工人数不超过 2.1 万人。^①

恰巧在罢工失败后不久,张国焘(那时他和邓中夏一起领导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访问了上海。在他的自传中,张国焘回顾了他对罢工及组织罢工的党员的评论。他从他的同志那里获悉:“罢工工人在‘抗日’的口号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②换句话说,尽管女性不工作,因此似乎是在“罢工”,原因是男工罢工就是为了阻止女工工作。如果罢工工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女工可能从中受益,尽管如此,但她们几乎不会自愿地提出她们自己的要求。

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另一场罢工表明这不是独一无二的。1925 年 5 月 15 日,正好是在工人积极分子顾正红被日本卫兵枪杀后,大约 1000 名男工冲击了内外棉第五厂的车间,一路打砸机器。报道指出:“由于女工害怕男工的骚乱,她们从南部逃到出口,跑到工厂外。”^③看起来统计记录再次表明女工参与了罢工。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或者大多数事件中,女工罢工仅仅由于她们被恐吓或胁迫那样做或因为她们被阻止参加工作。不管怎样,他们提醒我们不要仓促下结论:参与罢工这一简单事实意味着组织、抵制或工人阶级意识。

的确,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的许多罢工是由女工们自己发起和组织的。例如,1922 年 5 月,日华一家工厂整经间的女工举行罢工,原因是管理者拒绝了她们按计件制支付工资的要求。^④ 1923 年 5 月,由于管理者

① 见佐藤晶子(Sato),第 26 页。关于这一罢工叙述,见邓中夏。

② 张国焘,第 1 卷,第 414 页,张也知道这一策略已被安源煤矿工人罢工采纳。

③ SSKLY:《五卅运动史料》,第 1 卷,第 599 页。

④ 邓中夏,第 36 页。

推行了一种新剪刀,另一场罢工开始了。

尽管女工罢工的规模可能表明一定的组织水平,不过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相对于女工要求增加工资或反抗工头、拿摩温毒打的每一起罢工而言,这儿也有女工罢工要求捍卫传统忠诚,特别形象的例子是第四章描述的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发生在日商日华厂,1926年3月,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即将达到武装运动的高潮。3000名女工参加罢工,反对管理者拒绝雇佣她们的拿摩温推荐的女工。警察不得不被召集起来控制这场罢工。由于我们了解拿摩温管理其车间女工的权力,所以对女工们表现出来的忠诚并不感到吃惊。它再次提醒我们,如果罢工记录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女工在罢工中的作用,以及她们的组织和她们意识的话,除了参加罢工的女工人数外,我们必须要知道更多的情况。

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并不像革命英雄一样参与罢工。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时候上海还不是解放运动的摇篮,只有在解放运动的时候,工人才成为主要的参与者。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设法在上海无产阶级中灌输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热情,组织男女工参加革命事业。而且,正如柯罗尔(Elizabeth Croll)已指出的那样,1923年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政党首次尝试着把女性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将其动员和组织起来”^①。这些对纱厂女工有什么影响呢?可查的资料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微乎其微。^②

中国共产党绝没有忽视上海女工的状况。从他们的第一期期刊起,党的杂志诸如《向导周刊》就发表了大量关注女工工作的文章。看起来党好像希望揭露纺织女工遭受的剥削,这就将有利于许多行业的上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但由于绝大多数女工不识字,这些文章是否

^① 柯罗尔,第119—120页。

^② 与党的历史相关的大多数记载,包括组织女工的计划,国外学者无法得到。因此,意味着这一关于中共的讨论是参考性的而非确凿的。

能真正触动她们，是值得怀疑的。

看起来党积极组织的大多数活动目标定在男工身上。为了建立与上海工人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初次尝试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上海的数个工厂区建立工人学校。可得到的在这些学校注册人数的不完全统计表明：1921年工人学校有200名学生，其中女学生仅有20人。^①女学生的过低比例很可能并非由于党明确禁止女性进校，相反，看起来是由于党没能采取其他方法，从而使得极少女工参加学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没有努力克服女工参与的传统障碍——要求男女工分校。在1920年代，社会认可的是女性只和其他女性，而不是和男性一起参与活动。有些时候，党的男性组织者不怎么尊重这一现实。一个女工描述了她第一次遇到邓中夏的情形：“我下夜工回家了，我已上床了。邓中夏坐在我床边，拍着我说，‘小丫头，你上夜工啊？’我吃惊得要死——从来没有男人像他那样走进来和我说话。他坐在我床上做什么？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与男性交谈。”^②

女性组织者可能对传统较为敏感，来自湖南的知识分子向警予曾在1924年写了一篇短文，批评忽视禁止女性进入男女合校的学校传统观念的“左的错误”。她谴责说：“结果是工人教育变成了男人的特权。”^③向警予建议为女工建立单独学校的请求石沉大海，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她的建议被采纳。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工人运动大多数领袖是男性，其中大多数人在这些学校接受过教育。

一个党的组织者的回忆强化了这一描述，即组织战略的目标是男工。1924年，他抱怨中国共产党仍几乎没同女工建立联系。他回忆说：“总的来说，我们已联系的工人人数比以前多了。可是，这一联系并不很牢固，而且完全限于男工。就女工群体而言，我们甚至还没同一个女工

① SGYLW:《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第1卷。

② 对刘桂宝(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11月11日。

③ 向，第145—147页。

取得联系。”^①他继续回忆,当1924年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工作的一些党员遵守党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建议时,有一条不被他们采纳。这一条是请求派一名女同志帮助组织工作。他回忆说:“他们说这不得留待将来考虑。”^②党好像没兴趣组织女工,根本原因在哪里并不清楚。

尽管中国共产党工人俱乐部没有女性组织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数名党员积极分子投身于组织上海纺织女工的事业。最为著名的是向警予,以及另外两个来自湖南的知识分子王一知和杨之华。她们三个都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她们在那里听邓中夏的演讲。向警予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一名组织者。她察觉到中国妇女运动的资产阶级定位,她对此提出了批评,由此而赢得了警觉的批评家的美名。她在妇女杂志上的文章频繁地批评孤立女工群体的工人运动成员。^③

尽管向、王、杨作为女工的代言人,都有一定的威望,并且向和杨有时还在罢工工人的队伍前演说,但她们与纱厂女工有多大程度的直接接触尚不清楚。(影响她们与女工建立联系的一个障碍是向和杨的湖南口音)尽管找寻其他工运领导者是可能的,不过最终发现,她们差不多也是知识分子。五卅运动时期活跃的领导者中无一人是女工。^④

中国共产党未能有效组织女工的所有这些原因,工会中的少数党员已阐述过了。我们得不到工会的名单,尽管我们不知道在每一行业中男女工会成员的人数,但我们知道1927年政变前夕,在上海工人中占52%的女工在总工会成员中的比值还不到15%。^⑤

① SSKLY:《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86页。

② 同上,第287页。

③ 向,吉布兰(Gipoulon)指出尽管她有女工组织者的名望,但向所关注的不仅限于工人阶级的问题。

④ 关于1925年2月罢工的叙述具有代表性。其报道了一群罢工工人,“好像是由一个挥动着白旗的女学生带队”。伍德赫德,1926,第915—916页。

⑤ 毛池春(音译):“上海自治市的失业问题”,《中国经济学》,1928年第3卷,第5期,第219页。(Mao Chi-chun,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in the Municipality of Shanghai,”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3(1928), no. 5: 219.)

尽管她们可能没加入工会或参加中国共产党办的学校课程,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纱厂女工,并不是脱离她们的工友而作为独立的个体经历工厂生活的。大多数人加入了姐妹会这一传统互助社会组织。为了弄清楚工厂工作如何改变女工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意识,我们必须考察这些姐妹会。外面的组织者未能有效动员女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忽视了这些现存的女工组织。

烧香,拜姐妹会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解放的 30 年间,在上海棉纱厂工作的女性都曾普遍地结成姐妹会。这些姐妹会产生于日常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反映了女性互相帮助和相互保护的需要。正如我们在工作日的叙述中看到的,从女性离家动身去工厂的那一刻起,她们就要依靠她们的工友了。为了避免地痞恶霸的伤害或辱骂,她们一起上下工;为了在几乎没时间吃饭、上洗手间或休息的 12 小时上工时间中生存下来,她们与同一车间的女性一起共同分担工作。

发展一个“姐妹”网——你能够依靠其他工人组成的群体获得帮助——是工人在工厂成长经历的一部分。一位女工回顾说:“在车间里我们较年少的工人并不互相帮助。不过当我长大些,我有了‘妹妹们’。这样当我吃饭时,她们其中的一人就会帮我照看机器。我们相邻过道的女孩儿们互相帮助。这是当我大概 14 岁时开始的。”^①这些关系最初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也发展成了社会关系。这位女工继续回忆说:“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开始有朋友了。你如果星期天有时间,你可以去找她们玩。我大概是在十七八岁时开始有朋友的。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棉纱厂工人。”晚上,陈招弟经常瞒着她婆婆,和她工厂的工友一起去

^① 对顾莲英的采访。

看本地戏演出。

这些关系常是松散的,但有时也会成为正式的,如姐妹会。一个女工讲述了这一过程:“由于自己一个人走路不好,所以起初我们一起上工,一起下工。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彼此熟悉了。这样要是我觉得谁相当不错,我就会对她说:‘我们为什么不结拜呢?这样如果你有问题我就帮你,如果我有问题你就帮我。’”^①结拜并由此创建姐妹会需要举行一个仪式。有时,只需一起去饭馆吃顿饭,用一杯“同心红酒”来互表忠诚就可以了。由于大多数女工信佛,更为常见的是那些要拜姐妹会的女工一起去寺庙,在神像前烧香。一位女工解释说,在寺庙,“每一个人都得发誓,我们发誓结成生死之交。如果谁有半点不忠,那么我们就诅咒她坐船时翻船”^②。

有“六姐妹会”、“八姐妹会”、“十姐妹会”等等。一旦她们结拜了,姐妹会的成员根据年龄按亲属称谓互称,例如,年龄最大的是大姐,其次是二姐。一些群体,当她们一起外出时,都穿合身的蓝布长袍,显示出她们的团结。

无论在厂内还是在厂外,姐妹会都能使其成员的重大需求得到满足。除了工作上相互帮助,下班后或周日聚在某一成员家聊天外,姐妹们也相互保护以免男工、船上的督警及街上流氓的骚扰。宋二梅回顾:“地痞恶霸常在工厂门口,盯着我们小女儿儿,所以,我们结拜姐妹都一起离开工厂,当这些地痞恶霸制造麻烦时,我们就设法一起对付他们。”

姐妹会成员也在经济上相互帮助。为了满足重大事件的花费,诸如婚礼、葬礼、支付家人治病的费用,甚或买一件“奢侈品”,诸如服装或大衣,一个工人通常要花更多的钱,这超出了她挣工资攒下的钱,甚至超出

① 对桂简英的采访。

② 对宋二梅的采访。

了她整个家庭的支付能力。除了借高利贷,姐妹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① 为了避免姐妹们不得不从这些放高利贷者手中借高利贷,她们经常支付“姐妹费”,每一个成员每月都从她的工资中拿出一小部分放进这一基金。如果有姐妹需要借钱,她可以利用该基金,之后,再归还本金,加上5%—10%的利息。^② 一个工人讲述了她的姐妹们集资的方法:

大概我们四个女孩儿聚到一起。每月当我们拿到工资时,我们每人就捐出一定数目,共同凑集一笔钱。然后我们再决定在那时谁最需要这笔钱。例如,在那些日子,我们要买一件旗袍,一件蓝色的好旗袍,非常难,因此,有时我们就用这笔钱为需要旗袍的人做一件旗袍,或者也许有人用这笔钱来做衣服。如果有成员家里有了困难,比如某人需要看病,或某人去世了,她们将使用这笔钱。^③

当拜姐妹会的女工开始意识到她和她在同一工厂工作女工之间的联系时,她正在与她家庭外的人们建立起正式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把其他所有女工甚至或是在同一工厂工作的所有女工视为潜在的姐妹。迁移和定居到上海的模式以及雇佣通常致使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聚集在某些车间,也通常致使来自同一区域的女工组成姐妹会。这些女工有共同的方言、相同的着装风格及饮食习惯。当问及一个来自无锡的女工,她是否曾加入过姐妹会。她回答说:“我在的车间里,除我外没有来自无锡的人,所以我同谁结拜呢?”^④拜姐妹会的女工既在来自同一区域的那些人间巩固了她们的联系,又强调同那些来自不同区域间人们

① 《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的作者注意到:“工人们自己以及报纸都讲述了非法的高利贷盘剥如何毁掉许多家庭的故事……放高利贷者的过分要求猛烈地压迫借债人;一些受害者被逼自杀,其他人则不得不卖掉他的孩子来还贷,有时,他们变得相当绝望,变成了犯罪分子或社会的弃儿。这样的事儿并非鲜见。”见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第109页。

②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第73页。在邓研究的368名工人中,114人参加了这一类的经济互助群体。

③ 对何宇珍的采访。

④ 对席佩玉的采访。

的差别。

就像姐妹会的名字所含的意思那样,姐妹会看起来通常是由女性组成的。不过一些事例表明姐妹会的成员并不完全都是女性。在讲述姐妹会时,一个女工解释说:“当我们十个女工拜姐妹时,我们通常包括一个男工和两三个彪悍的女工。否则,我们的群体就没有防御力量。”^①在上海的妓女中类似的现象表明这并不完全违背常理。“野鸡”——妓女中最低等级,只有她们才到街上去拉客——也组成姐妹会。她们的姐妹会经常由九个妓女加上一男子组成。男子通常是地痞恶霸,他同当地警局有联系,当她们晚上出来时,如果有任何人想骚扰她们,他要负责保护她们。^②

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有男子参与的工厂女工的姐妹会是否普遍,我们也不知道男子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也许男性在必要时会保护女性的人身安全,但他不参加姐妹会的其他活动,诸如分担工作、经济互助及社会交往。男工有兄弟会,兄弟会有这些作用。像女性一样,八九个男子烧香互表忠诚,也像女性一样,兄弟会成员按照亲属称谓相互称呼——大哥、二哥等等。

姐妹会的成员并不严格限于同一地位的工人。在一些情况下,姐妹会包括工厂里的一个拿摩温或通常由于帮会关系,包括这个地区有影响的一个女性。一些女工可能同时选择拜姐妹和拜干娘(见第四章所描述的方法)。把姐妹会描述为包含一个男性或两三个彪悍的女性的那位女工,已经含蓄地说明这两种形式已经合二为一。那时在上海话中“彪悍”暗指和黑帮有关。而且,在抗战期间,当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创建姐妹会来演变为女工所熟悉的组织形式,这些姐妹会中有一些组成是复杂的。某一个报道指出某一姐妹会包括数个一般的工厂工人、一个拿摩

^① 对韩金梅(音译)的采访。

^② 材料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提供。这一材料不能解释男性同妓女姐妹会的关系。由于拉皮条的男人在文中的某一节被讨论,有理由说这些男性不是皮条客。

温、一个嫁给帮会头头的年长女性。^① 在这些姐妹会中,我们发现工厂里不同地位的女性和不同年龄的女性结合在了一起。很显然,这些组织并不常是“姐妹会”名字本身所含有的“平等的”组织。

尽管姐妹会有时包括男性和拿摩温,尽管工厂女工并没有把她们所有的女工友都看做自己的姐妹,事实表明女工在正式组织中同她们的一些工友团结在一起。她们能在工作中互助、一起步行上下工,一起参加社交,而不必去佛教寺庙烧香,拜姐妹会。为什么对她们来说创造组织是必要的呢?

为了组成姐妹会,上海女工演变和改造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组织形式。研究者们对于传统的女性组织这一课题,仅作过非常少的研究。已研究过的两个实例——19世纪晚期,由广州附近顺德的农民组成的姐妹会;20世纪初期,由川沙县(近上海)的女性组成的姐妹会——有共同的几个特征。无论是在顺德还是在川沙加入姐妹会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都偏离了传统的家庭制度。顺德姐妹会由一起生活在佛教斋堂,发誓永不出嫁的女性组成;拒绝再婚的年轻寡妇是川沙姐妹会的中坚力量。在这两个案例中,姐妹会的成员由于她们都独立挣工资能离开家庭生活在一起。在顺德,女性收入来源于丝工业;在川沙来自于棉纺纱和纺织。她们都属于世俗佛教派,她们有独立的收入,她们渴望生活在传统的家庭制外,这些是两类姐妹会的实质。^②

上海棉纱厂女工的姐妹会成员既不住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挑战传统社会关系的意愿。这两个姐妹会群体同上海棉纱厂女工组成的姐妹会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一组织形式是否从乡村地区传播到了城市,如果是的话,是怎样进行的?在上海的一些女工中,世俗佛教的传统要比姐妹会的最初形成更重要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为广泛的研究姐妹会

^① 马纯古:《上海女工工作报告》。

^② 托普利(Topley),第67—88页;普拉兹尼亚克(Prazniak);安德烈(Sankar)。

的历史。研究可能发现了佛教区域同姐妹会起源有紧密联系。尽管一项同样可能的发现是遍及中国的乡村女性组成了姐妹会。而且,姐妹会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结拜的仪式。还有一种可能是姐妹会与其说是具有地理特质,不如说具有历史特质。可以想象,姐妹会的形成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亲属关系网破裂的产物。

因为拜姐妹会的现象看起来在城市中很普遍,所以要解释女工间姐妹会的形成,我们不仅需要考查移民传统,而且也要考查上海其他阶层的传统。姐妹会是如何普及的,以及哪类群体的女性结成姐妹会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像工会或本地联合会,它们的存在可由其文字记载证实。关于上海姐妹会的记载只有散乱的、附带的参考资料。不过除了以上提到的妓女们的姐妹会,证据证明太太们、舞女们、丝工及上海巡捕房的女性们也有姐妹会。^① 姐妹会绝不是棉纱厂女工所特有的。

尽管我们对中国社会姐妹会的历史了解得还远不完全,但我们能够从上面收集的信息推断出棉纱厂女工的姐妹会不完全是女工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具体环境的产物。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的女工既没有创建新的组织形式,她们也不常采纳外面的组织者推行的那些组织形式。也许把姐妹会理解成为了满足城市工业化环境中女工新的需求而适应传统习俗的过渡性组织,最为贴切。当女工们组成姐妹会时,她们借用传统的老乡关系。不过姐妹会不只包括这些传统关系。新工人甚至那些有许多老乡工友的新工人,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姐妹会。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女性在工厂工作,姐妹们的关系发展了。在那种意义上说,姐妹会确实是工厂生活的产物。

尽管姐妹会不是自觉的政治性组织,但它们采取的行动经常具有政治含义。有时,姐妹们团结在一起保护某一成员,反对甚或攻击她们的

^① 见矛盾,第111页;白先勇(音译),第60—61页;吴(音译),第33页。

雇主。一位女工记得：“一次，一个女工被一个工头骚扰，她告诉了她的姐妹们，我们就一起攻击那个工头，把他痛打了一顿。”^①为了相互保护，经常使她们处在类似于罢工的情形中：如果拿摩温威胁要解雇某一姐妹会的女工时，她的姐妹们就会拒绝工作，直到拿摩温撤销他的威胁。

这些是常见的、自发的事件。不过不需要花费过多的心思去想象，在一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这些忠诚的作用。如果姐妹会的一个成员关掉她的纺纱机器或织布机器，那么，如果仅为了忠诚，她的姐妹们也被要求关掉她们的机器。那么，女工参与劳工运动可能有赖于姐妹会中有变革意愿的某些女工。这些女工可能来自哪里？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当然具有变革意识，但是他们没有利用姐妹会。男女分开、地域关系、同过房娘和帮会的联系——所有这些削弱了阶级团结，也可能限制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姐妹会来开展组织活动。

20世纪20年代晚期，第一个外部组织激发了女工群体的政治意识，反过来开始逐渐改革女工们的姐妹会。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组织并不是希望动员女工参加革命运动的组织，而是外国的传教士组织——基督教女青年会。

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女工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有大量女工参加的第一个外部组织。在上海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论坛，在那里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聚在一起。这些女工在不同的棉纱厂工作，并且经常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基督教女青年会就为这些女工们提供了其中一个论坛。尽管一直以来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课程的女工人数仅是女工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过1937年后在工人运动中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变得活跃的绝大多数女工，都把她们最初的

^① 对韩金梅的采访。

“政治觉悟”归功于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女工开设的夜校。

自 1890 年以来,基督教女青年会就已在中國存在了。从早期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教色彩远小于大多数基督教团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传教仍是其公开宣称的目的之一,不过很显然,社会福利工作比向工人传教更重要。^①特别是对工业部的官员来说,确实如此。与其他部门的官员相比,他们更不能容忍宗教信仰。阿加莎(Agatha Harrison)是工业部的一个英国专家,1920 年她被雇为上海支部工业部第一干事。她曾“很坦率地说,她不是任何教堂的成员……当她被直截了当地问及她是否赞成基督教传到非基督教国家时……她回答说她不确定。不过如果她只要看到当地有这一需求时,她就会变得肯定。”^②她在中国工作的记录没表明她曾发现这一需求。

阿加莎来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开发一项工业化计划^③,她最初关注于影响公众,而不是教育工人本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官员,震惊于他们所看到的上海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状况,因此,他们把童工运动作为第一项重要的工业化计划(见第一章)。在 20 世纪中期,基督教女青年会针对女工的大众教育开展了一项小规模实验,包括在闸北丝区建一处收容所,在鸡蛋包装厂开午间文化课;在南阳兄弟卷烟公司为女工头开班。这些计划只包括少量的女工,也包括一般工人和她们的工头。^④

大规模的和意义深远的工业计划的发展,是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的部分结果。见证这些事件的外国干事呼吁基督教女青年会致力于为一般女工大众服务。一个美国干事写道,

① 关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國的早期发展的讨论,见德鲁克(Drucker)。

② 给格雷斯(Grace Coppock)的信,1920 年 12 月 8 日。(Letter to Grace Coppock, Dec. 8, 1920)(World YWCA Archives, Geneva.)

③ 1920 年前管理工业化工作的努力还只是零星的。对这些计划的阐述,见巴格维尔(Bagwell)。

④ 见巴格维尔,也参见波特(Porter)。

基督教女青年会本身致力于女工教育的正当理由，“存在于这一事实中：劳工运动是构成我们未来经济社会的一大因素，劳工运动的思想将要改变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希望帮助创建那种思想，我们需要从工人那里入手”^①。为了把女工培训成工人运动领袖，1928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了一项成熟的计划。

几乎是很矛盾的，这一计划随着1927年的白色恐怖而产生。摆脱了敌人的逮捕和处决的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逃离了上海，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他们都致力于组织乡村的革命。上海总工会被解散，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严格限制劳工组织和罢工活动。在南京十年期间，工会仍继续存在，但是他们或者被国民党控制或是同管理者有着紧密联系的“黄色工会”^②。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组织试图悄悄地向女工灌输激进思想，使她们能够全面理解她们作为女性也作为工人的地位，基督教女青年会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计划最初是由邓裕志发起的，她在1930年成为组织民族工业部干事(the organization's national industrial secretary)。邓裕志祖籍湖南，1919年五四运动时她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学生部，同活跃在上海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干事芒德·拉塞尔(Mund Russell)一起工作。从拉塞尔那里，邓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邓回忆说：“芒德教我学英语，她也教我读一些革命书籍。她要求我和她一起学习《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一书。那时我英语非常不好。那本书上的那些大字——我不得不一直借助字典来查找它们的真正含义。我已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多么小的知识都是从我与芒德接触后才学到的。”^③邓和拉塞尔一起拜访黄包车夫和

① 莉莉(Lily Haass)给玛丽(Mary Dingman)的信，1928年1月5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②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放弃城市工人运动，不过看起来并没有尝试着去组织棉纱工业的工人。关于这一时期的组织活动和工运的讨论，见哈蒙德(Hammond)。

③ 对邓裕志的采访，上海，1980年4月15日。

工厂工人，逐渐对发展女工计划感兴趣。邓裕志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社会学后，获得基督教女青年会奖学金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回国后她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计划的领导职务，她希望能帮助女性理解她们在中国经济制度中的作用。

在1928—1930年间，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所有的主要工厂区都建立了学校：小沙渡两所；曹家渡、杨树浦、浦东、闸北各一所。不过建立学校仅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招生。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官员很快就意识到：“公共媒介，诸如报纸、广告、传单、海报等不起作用，由于她们不识字。”^①于是，他们就借助口头传播。当基督教女青年会计划开办新学校时，干事们就告诉几个热心的学生，依次类推，她们告诉她们所有的朋友；另一种方法是在工人生活区演出娱乐节目。一个干事写道：“这样的聚会经常受中国人的欢迎，特别是受那些很少有机会看电影、戏剧的工人人们的欢迎。这样，在众人面前阐释教育的重要性，随后宣布学校计划。节目一结束，他们脸上渴望的表情表明，他们十分想来学校。”^②首先靠迎合女工的社会兴趣，而不是靠创设它自己的日程表，想当然地认为女工会对此感兴趣，基督教女青年会逐渐在女工中间培育了一群追随者。正如一个工人非常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我去学校是因为学校看起来有趣，而不是因为我真想学阅读。她们唱歌、演节目，所以我想在那里比呆在家里有趣多了。”^③

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提供三年学习计划，一周上五天课，每节课一个半小时。夜班女工上午上课，白班女工晚上上课。她们经常因父母反对而苦恼。顾莲英回忆说：“我母亲一直说我不该去。”

她告诉我：“你的工作够辛苦了。除了工作外，你不需要上学。”

她说我会没足够的时间睡觉。如果我不睡觉，我就不能工作，如果

① 景菲镇：“工业妇女和女孩儿的教育”，《教育》，第15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对高俊的采访。

我不工作,那么我们家就不能生活。不过我坚持去上学。我每天去。当我们上夜工时,我们早上6:00下班。我回家吃早饭,然后去学校。我工厂的“妹妹”中,有三四个人上学。^①

因生病、承担家庭责任、劳累及坏天气而缺席是学校的重要问题。学生连续几天不来上课,老师就去家访。如果学生得了重病,教师就安排她去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医生。必要时基督教女青年会将为学生支付住院费。教师们经常在学生家里辅导正在康复中的学生。数年间,女工们之所以能始终参与基督教女青年会计划,教师们的坚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其三年学习计划的描述并没有冒犯国民党,这可能使得国民党能容忍学校存在。但是国民党很可能已发现一些课程的实际内容很让他们头疼。头两年,女工学习的课程有写作、算术、地理、历史、时政、唱歌、娱乐。第三年学生能选课,诸如工业问题、工团主义、劳工法规。^③她们使用过的课本再也见不到了。20世纪30年代间,张淑义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她曾记得学生们开始使用的课本中的两本:“一本是国民党要求的课本,一本是三民主义理论。除此之外,我们也把简单的课文整理在一起,教她们什么是帝国主义;怎样是爱国;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工人的生活为什么不如资本家。”^④写信的课补充了这些课本。学生们使用的小册子叫《秀英的信》,是在上海工作的一位女工写给乡村的家信以及家里给她的回信。这些信描述了迫使女性离开乡村在城市工作的状况,以及城市工业生活的贫困。^⑤按照这一课

① 对顾莲英的采访。

② 对张淑义的采访,北京,1980年5月17日;也对李明剑(音译)的采访,上海,1980年10月28日。

③ 第三届工业部干事会议的报告,1933年1月。(“Report of the Third Conference of Industrial Secretaries,” January 1933.)(World YWCA Archives, Geneva.)

④ 对张淑义的采访,北京,1980年5月16日。

⑤ “回忆上海女青年会的农工夜校”,SWIX(1979),第5期,第85页。

文模式,学生们写了关于她们自己家庭经历的信。

钟韶琴教中级班,她借口教学生写信来鼓励女性成为积极分子。她让学生们阅读、讨论上海工部局的工厂法规,然后要求她们列出她们各自所在工厂中不符合法规安全条款的情况。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给工部局委员会写信报告这些非法情况。钟评论说:“当然这些信不起作用,但这是一种教学方法。由此,她们能意识到如果你想获得解放,你必须依靠自己。”^①

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诸如唱歌、讲故事。表演一周一次,取代正常的班级课程。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培养学生成为工会领袖的技能。一位女工回忆起她曾参加的俱乐部聚会:“我们辩论,一方观点是贫穷是我们的命运,另一方观点是我们之所以贫穷是社会结构使然。”^②有时俱乐部组织生活在其区域内的大量女工和观众表演节目。例如,在1931年的一次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上,俱乐部里的一位女工作关于女工向往的工作标准的演讲。紧随这一演讲的是一部由其他俱乐部成员编写和表演的短剧,题为“礼物和给予者”。短剧描述:

一位学生在过生日那天,收到了许多家人和朋友的礼物。在她的睡梦中,制造各种物品的工人们——她接到的礼物就是她们制造的——来到她面前,告诉她为了她的幸福她们已做的贡献或她们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作环境。请她不仅要记住送给她礼物的朋友们,而且要记住努力工作制造这些礼物的妇女和女孩们。戏剧以一位工人和“劳动节精神”的入场结束。和他们一起,学生们起立,唱起了劳动歌。^③

除了设法联系和教育更多女性这一显而易见的目的外,基督教女青

① 对钟韶琴的采访。

② 对顾莲英的采访。

③ 《女工庆祝五一劳动节》1931年5月3日。(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理事会档案,纽约)

年会的官员还希望设计这些计划能给女工们一些筹划和组织计划的经验。“所有这些对劳工运动而言都至关重要。”^①

考虑到女工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所学的内容,就不会吃惊于许多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变成了劳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位女工回忆了她15岁时同工厂某一拿摩温的初次冲突,原因是她看到一拿摩温正在殴打她的工友。她记得:“其他人都不和拿摩温争执。但是我会,因为我觉得不舒服。”当问她为什么不舒服时,她回答:“因为我正在上夜校——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②

尽管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的教师并不积极鼓动罢工,但是罢工一旦发生,她们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学校里,来自某一工厂的女工能够同其他工厂的女工一起讨论她们的罢工行动,以获得她们的支持,借助这种方式她们使罢工从一家工厂迅速传播到另一家工厂。1936年,有一场罢工开始于日商同兴厂。顾莲英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们学校有一些女工在同兴厂工作,她们告诉我们她们的罢工情况。于是,我们都去瞧看,我们去了工人的住处,设法劝阻她们不要去上工。晚上我们有空时,我们学校的所有人一起去。最终,日本人妥协了,提高了她们的工资。当我们看到她们的工资涨了5分时,我们都说:“我们也不得不想办法要求加工资了。”最后,我们永安的女工也发起了罢工。^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解放这一时期,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学生作为积极分子的作用和夜校作为聚会中心的作用甚至变得更为明显。然而,在研究那一时期前,我们必须考察战争本身。因为在日本袭击上海的背景下,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发的计划被拓展了,超出了夜校的范围,参与的女工人数也远远超过在学校学习识字的人数。

^① 景菲镇:“工业妇女和女孩儿的教育”,《教育》,第16页。

^{②③} 对顾莲英的采访。

救国运动开始于1936年。从那时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已在其教育工人的教学日程中包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东北被侵占情况熟悉的人们,被邀请到夜校向女工们作有关日本在中国侵略行径的演讲。当大规模抗日游行爆发时,夜校的女工和她们的老师一起参加抗日游行。

1937年8月,战争爆发后,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暂时关闭。许多以前的学生投身于爱国活动。一些最富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加入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身着军装”,由30个女工组成的队伍开赴前线,“同在前线的军队和全国人民一起工作……她们同群众交谈,挨家挨户号召人们抗战,劝说他们与军队合作”^①。服务团也照料伤员,帮助军营做些日常事务。^②

由于战争一开始工厂就关闭了,大量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失业,她们运用她们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接受到的教育,在上海从事大众教育。一些人帮助开展城市计划,在胡同里弄建立非正规学校。一份报告称:“在民族危机关头,女孩儿们自己写墙报、开课、指挥唱歌、演讲、组织讨论。”^③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失业女工建立了难民收容所。其他人去那里为她们上课。一位观察家谈及这样的一所难民收容所:“它像一个旧式的中国大家庭一样。”难民收容所像一个合作社:根据女工们的兴趣和技能,她们分担日常事务:诸如烧饭、清扫、守门、看护。白天她们能学习如何缝衣服、作纸艺、玩具、刺绣和编织。她们出售她们制造的产品,用这笔收入为合作社购买食物和补给品。女工也能参加识字班,在难民收容所的大多数女工以前没机会学习。同夜校的班级一样,在难民收容所的

^① 刘玉霞和张淑义:“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众教育工作”,《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报告》,1940年4月。(“Mass Education Work in the YWCA of China,”in“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YWCA of China,”)(World YWCA Archives, Geneva.)

^② 抗战时期,类似的组织遍及中国。例如,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广西妇女营,见柯罗尔(Croll),第176—177页。

^③ “战时特别计划的例子”,1937。(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识字计划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抗日宣传，也同历史和社会分析联系在一起。当有机会时，基督教女青年会官员会为难民收容所的女工安排正式的工作。^①

基督教女青年会不是难民收容所中唯一具有代表性的组织。1937年，随着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合法党派。尽管自1927年中国共产党被驱赶出城市后，党组织网络同其以前一样，一直扎根在农村，不过，党的一些干部返回城市开展组织活动。他们看到了在上海难民收容所组织大众教育的机会。后来，被派去教学和组织活动的党员把难民收容所称为“上海的解放区”^②。

中国共产党和女工

在日本占领上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再次试图组织城市女工。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完全不同于其在20世纪20年代采用过的组织策略。已修正的策略中两个最重要的组织策略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和姐妹会。

抗日

当日本侵略者大肆逮捕政治积极分子时，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过的策略（诸如演讲、发传单、建工人俱乐部）则变得毫无效果。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吸收成员，党开始改造女工中已存在的组织形式，诸如姐妹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党组织者不是试图劝告工人脱离她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试图理解和变成这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以前中国共产党缺乏成功组织上海女工的经验，这就要求中国

^① “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部妇女和儿童收容所概况，1938—1939”。（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② 赵朴初：“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SWZX(1981)，第4期，第38页。

共产党采取这一新的策略。不过党在招募女工问题上新的敏锐性是党在乡村流放期间发展组织策略的部分结果。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多数党员已有了组织群众工作的经验,组织群众工作要求他们必须尽可能关心他们希望组织的那些群众的境况。

并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上海实施这一组织策略的。1941年马纯古写的一份报告是最早的重要证据。马曾是党的一名组织者,自1930年后期以来,他一直负责上海工人教育的组织工作。除此以外,对马的背景我们知之甚少。马的文章很有意义,因为它是唯一一篇专门广泛地论述关于组织上海女工的障碍问题的著名报告。而且,这是第一篇指出党员已下功夫去理解女工的具体问题和女工动机的报告。^①

在这篇报告中,马的重要观点之一是党员在他们每天的组织活动中必须团结女工。马写道:“由于她们生活的主客观环境,妇女们通常必须互助。为了防止人们调戏她们或防止地痞流氓偷窃她们的工资,她们经常一起上下工,在她们休假一起买东西时,她们也通常七八个人一群一起去。在所有的群体中,一两个人处于核心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吸收她们,那么,吸收这一群体的其他人就很容易。”^②除了敦促她们通过姐妹会争取一般女工外,马也鼓励组织者关注工厂掌权的女性。他说这样做的方法是通过用女工她们自己习惯用的相同方法来获得那些有权人的保护,即拜过房娘。他说:党员应成为工厂拿摩温的干女儿。他也鼓励她们拜看守和监管工人宿舍的老妇人为过房娘。“那么,在这些过房娘的保护下,就有可能组织住在宿舍的所有女工。”^③

执行这些策略的组织者很可能不需要学习女工内在组织的性质。和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前辈不同,通常这一时期大多数组织者自己本

^① 当然,也有可能党更早就开始了这一努力,只不过是我們没有找到这样的报告。不管怎样,党在1920年代使用过的方法没有显示出这种理解,不过他们在抗战时期这样做了。

^② 马纯古:《上海女工工作报告》。

^③ 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第64,75—76页。

身曾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的学生，抗战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党员已属于某一姐妹会，她们能够较容易地影响她们的姐妹们。桂简英（音译）回忆，20世纪40年代初她成了一名中共党员，很长时间以前，她就已是某一姐妹会的成员了。不过自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的姐妹会就成了“党的公开组织”^①。更为经常的是，积极分子鼓励女工同其他工人们拜姐妹。甚至这些姐妹会在党的帮助下，继续坚持原来的组织形式。党员们陪她们的姐妹们去佛教寺院，和她们一起烧香，在观音佛像前，鞠躬拜生死姐妹。同传统的姐妹会一样，党组织的这些姐妹会有时也包括拿摩温和在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帮会分子的妻子。^②

如果说这些新姐妹会和传统姐妹会不同的话，仅表现在小的几乎是无法觉察到的方面。例如，大康厂的一群女工拜姐妹会后，她们每个人都出少量的钱买一块白布。她们把布剪成正方形，缝成手绢，在每块手绢上绣上“同心协力”^③。尽管传统的姐妹会成员偶尔也制作统一的袍子或手帕来象征她们宣誓姐妹的关系，但她们不可能用如此的格言来表达她们作为工人的共同利益。

同样地，姐妹会成员通常在周日聚在一起，逛街或逛公园。党员们支持和参与这些活动，逐渐地给她们带来了新内容。例如，当她们逛公园时，党员们就用一部分时间向她们的姐妹们讲述俄国妇女在俄国革命期间取得的进步，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工作。^④党的组织者鼓励赞同这些思想的女性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⑤一些人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⑥

在抗战期间，党并没有设法动员其新成员参加革命运动，而是试图组织女工抵抗这些日本人——他们控制的大多数上海的工厂在抗战期

① 对桂简英的采访。

② SGYLW:《国棉十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第10页。

③④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⑤ 汤桂芬。

⑥ SGYLW:《国棉十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第10页。

间继续开工(见第一章)。由于激烈的罢工或游行示威致使日本人打击报复活跃分子,为此工厂中的党员试图组织女工尽可能地暗中破坏生产。

常见的抵抗方式是偷。战争期间在一工厂工作的女工记得:“在日本人手下,我们偷了很多东西。”

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工厂里有很多零散的棉布和线。我们把棉布和线带出来,然后卖掉换成钱。要把棉布和线带出厂需经门卫的搜查,有时我们用饭盒装。有时他们也会发现,不过由于搜查的人是中国人,所以有时他们会放我们走。他们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中的一些女工也把东西放进胸罩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了。有时在一个车间的每一个人都计划偷许多纱或布。我们一起同时迅即冲出大门。这样他们挡不住我们。^①

偷不只限于工人制造的棉布和纱。在这一食物严重短缺的时期,甚至日本人在工厂里种的蔬菜都成了工人们偷的目标。陈招弟回顾:“当日本人睡着了,我们就去菜园偷他们种的菜,我们用细纱间的棉包包菜。”^②

党的积极分子组织的另一颠覆策略是降低车间纱和布的质量。只要日本工头不来车间,女工们就以较慢的速度操作机器,经常一起停工。有时她们会冒险关掉机器,直到工头走近时,才开启机器,当工头离开后再关机器。她们希望工头永远发现不了大多数机器停止运转了,或如果被发现了,他试图寻找和惩罚闹事者的行为会被干扰和阻止。

每一车间的女工都想出各种对策来降低日本人纺织生产的利润。在细纱间,接头工每次接断头时,都故意揪下较长的线头,浪费棉纱。日本人察觉后,他们就建立了称废纱线的制度:工人下工时,称她揪下的废

^① 对徐红梅的采访。

^② 对陈招弟的采访。

纱重量。如果超过了规定的重量,就要罚款。女工们并没被吓倒,而是给予有力反击,她们隔段时间就把她们制造的大量废纱线带到洗手间处理掉。织工故意犯错误,生产质量差的布,然后又故意和质量好的布包在一起运送给买主。^①

在当时研究中,实施抵抗的组织性质比日本是否曾因这一颠覆活动而遭受严重损失更重要。有时,女工群体在姐妹会的掩盖下组织这些计划。据某一报道,上海棉纱厂10个工人组成了姐妹会“行动起来支持地下抗日”^②。在日本占领期间,没有值得报道的罢工抑或工人强大的战斗力没有展现出来,不过,偷、减速、试图生产次品都需要合作,这表明以前在女工间不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团结。

这些活动也证实了外来组织——共产党——的影响范围,用传统的组织形式作切入口,逐渐改变了女工间的关系和意识。结果是党在女工间奠定了基础,这就为在战后工人运动中获得女工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在战时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女工很不同寻常。首先,战前和战后工人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一小部分,其次,在战时条件环境下,女工可能更需要组织。就从获取米饭到保护自己免受日本士兵强暴的基本需求而言,女性比以前更需要互助。最后,敌人的性质与以前大不相同。过去,劝说女工把资本家当做敌人,从而与其作斗争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当资本家是日本人时,由于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并占领了上海,女工更倾向于抵抗。

尽管这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战时组织技巧与战后组织技巧有重要的连续性。已习惯于刻意破坏日本工厂的女工战后仍利用这一经验。在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女工在日本投降后继续工作,在动员女工参

^① SGYLW:《国棉十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第13—15页;汤桂芬。

^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从斗争到胜利》,北京,1949年,第50页,引自柯罗尔,第181页。

与工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创造发明的组织策略在战后仍继续使用。

走向解放

到1945年末，当前日商工厂仍未完全恢复生产时，上海工人组织了大约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要求重新复工或发放生活维持费。那些复工的工人们组织起来，要求根据剧烈波动的生活消费指数减少工时，增加福利，提高工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的城市劳工运动首次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女工在那次运动中表现卓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劳工运动的历史以及与因内战和严重的经济混乱而兴起的其他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的运动，超出这一研究的范畴。但是，这一运动的几个重要主题与女工组织和女工意识的讨论相关：共产党的女工动员；共产党在女工中声望的提高；姐妹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女工作为劳工运动的领袖崭露头角；在劳工运动的议程表中，与女性特别相关的越发重要的问题，诸如产假和托儿所的问题。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共产党再次转入地下，组织活动再次成为秘密活动。尽管许多地下党员是战时入党的女性，不过，扩大的战后工人队伍几乎都是由战时从未进过工厂的女性组成。因此，党员的重要任务是在这些工人中间建立起信任。同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共产党组织者一样，他们不是靠集会或拥护政治信念，而是靠用女工们熟知的方式与之交流沟通，赢得她们的尊重和信任来完成组织工作。

有些女工在工作中生产时，产生了威胁生命的并发症，党员就为她们安排就医。诸如此类的行动，使党员们所在车间的女工很感激。范小凤既是党的积极分子又是工运领袖。她解释说甚至会剪发也能为党赢得工人们的支持。

起初，我们只是想方设法发展同女工的友谊。后来，我们能够谈论工人的状况。那时我知道怎样剪发。每周我都为许多人剪发。

周日我去她们家。她们都欢迎我去，因为理发师理发的费用高，并且，我剪得很快，仅几分钟！在她们家我能帮她们做事儿，所以她们都乐意我到她们家去。这样我能够同她们家中的年轻女性交谈。相反，同小女儿儿谈话，她们就根本不喜欢。婆婆会非常不高兴。你想象不出来中国的婆婆是多么的凶恶！因此，首先，我去照料她们的家务。我非常有礼貌，称婆婆为奶奶等。她们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从那以后，我能同她们的女儿或媳妇交谈。中国老百姓确实喜欢努力工作、勤劳和有礼貌的人。如果你去某人家，好像你是大人物，那么没有人会理你。^①

党员们继续使用拜姐妹的传统，将其作为组织在某一工厂一起工作的女工的一种方法。尽管许多女工继续传统意义上的姐妹会，党发起的协会离传统姐妹会的自发性越来越远。它们不再简单地象征着在同一车间工作或一起步行上下工的8—10个女工间工作共享关系的肯定。

在战后拜姐妹成为更需精心策划和更慎重的行为。例如，在恒丰厂，据说党支部在三个特定的场合组织了拜姐妹典礼：一个是1946年底，清花间和梳棉间女工的拜姐妹会典礼；一个是1947年夏天，纺织间、准备间和细纱间女工的拜姐妹会典礼；1947年底，来自细纱间的一些巡视员、会计和拿摩温参观了拜姐妹会典礼。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间谍的怀疑，每个姐妹会都包括有影响的老工人以及本地地痞恶霸的妻子，这样看起来与传统的姐妹会无异。^② 在其他厂，一些有党员发起的姐妹会达到200人。

作为姐妹会的成员，女性通常从事甚至与过去非常不同的活动。1946年3月8日，中纺第十二厂（前日商大康厂）的党支部成员组织了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邀请了杨树浦附近工厂的姐妹会群体参加。大约

^① 对范小凤的采访。

^②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1500名女性参加了在工厂的一间宿舍举行的聚会,听取了何子英(音译)代表上海妇女会,讨论她对苏联的参观以及女权主义思想诸如男女同工同酬的演讲。她们也学唱三八节歌曲。^①同一天,沪西工厂的党员积极分子动员了3万姐妹参加在极司非而花园(今天的中山公园)的妇女节游行,一些人参加了从市中心到大光明剧院的游行,在大光明剧院正在举行由市长夫人发起的妇女节庆祝活动。汤桂芬写道:“正当她们的活动结束,所有穿高跟鞋的高层女性正要离开时,我们就到了。”我们游行队伍的妇女们高喊着“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解放”^②的口号。

动员姐妹会参与这些活动——更为常见的是参与罢工——党员们逐渐发现了积极分子,并请她们加入党组织。没有数据说明成为合法党员的女工人数。不过,毫无疑问,这一数目仅是工人总数的一小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通过在大多数工厂车间发展党支部,能够提升党在女工中的影响力。

对于那些已入党的女性而言,支部成员的关系不可能看起来完全和姐妹会成员间的关系不同。尽管入党不包括烧香和拜忠诚的仪式,但根据车间和性别来组织党支部:某一单个党支部可能被称做统益棉纱厂织布间女工党支部。同姐妹会一样,党支部由在同一工厂同一车间的一部分女工组成,因此她们的籍贯也很可能相同。^③

而且,党支部的成员以姐妹会聚会为掩护,聚到一起商讨策略。孙招弟回忆:“有时我的姐妹们周日来我家聊天——正如她们往常那样——不过没人知道实际上我们正在开会,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或正在领导活动。”^④当来自不同支部的党员需要相互协调她们的计划时,她们就在基督教女青年夜校碰头。30年后,党宣称基督教女青年

①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② 汤桂芬,第4页。

③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④ 对孙招弟的采访,上海,1980年4月11日。

会夜校实际上由“地下党管理”。这就说明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在党的战后组织工作和罢工计划策略上的重要性。不可能完全承认或否认这一论断,确实看来在战后和解放期间,夜校党员教师人数逐渐增加。在党的地下组织活动这一时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继续为女工们提供领导才能训练,并为在党和潜在的劳工运动领袖间建立联系创造条件。战后最重要的女性党组织者(诸如汤桂芬、何宇珍、顾莲英、范小凤、桂简英)都是作为夜校的学生开始她们的政治生涯的。

尽管从表面上看,战后女性加入的组织和战前一样,也就是说,姐妹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共产党,但其中每一个组织的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如果女工参加任一组织,很可能像以前的姐妹会,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性工人阶级组织。然而,40人的姐妹会非常不同于20人和30人的姐妹会。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已变成了善战的政治性团体,而不是代表女性互保互助的防御性组织。一些女工通过上夜校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但是,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也远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管理的传教性组织。它不可能宣讲革命,但它确实教授给女工们成为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或领导者所需要的教育、社会分析技能和组织能力。最后,对于上海女工而言,共产党不再是由说难听懂的方言的外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异己组织。负责组织女工的大多数党员积极分子是她们争取组织的女工的工友、街坊邻居、朋友或干姐妹们。

罢 工

战后时期,女工组织的转变可能使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女工罢工非常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的女工罢工。如果基督教女青年会确实培育了一批领导工运的具有远见卓识和领袖才能的女工的话,如果姐妹会的性质已被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和党改变的话,如果中国共产党已在女工

中有了基础的话,那么将有证据证明女工在罢工中以及在呼吁改善女工的具体工作环境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8年初,申新九厂的6000名女工罢工,要求发放米、煤配给品以及为带薪产假提供供给品。工人们占据了工厂四天,动用了装备三辆装甲车的数百名警察才迫使工人们离开工厂。这起激烈的罢工,史称申新九厂“二·二惨案”。对于这起罢工的叙述,表明上面已讲述的一些变革方法在战后工运中反映出来。^①

在一些重要方面,1948年申新九厂女工的状况比她们十几年前的状况好得多。1946年席卷全市的罢工的一个结果是上海几乎所有的棉纱厂女工,包括申新九厂在内,已赢得了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根据生活费指数调节日工资;8周的带薪产假;公司提供照顾儿童的设施等罢工成果。不过,工厂主虽已妥协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坚持执行下去。工人和管理者在实施改革上的论争已成为战后劳工运动的内在主题。

在一些工厂中,这些论争极为频繁,申新九厂就是其中之一。在申新九厂,很少有女工曾享受休8周产假的权利。获准休假的程序是那样的烦琐,阻止了大多数女工申请。大多数女工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威胁:任何女工如果休假超出被获准的8周,哪怕是一天,就会被自动解雇。本应有的照看婴童的设施几乎不存在。1946年在工厂里建的托儿所“非常漂亮”,那时在工厂工作的一位女工回忆说:“不过,那里甚至从未有过婴童。那只是被工厂主用来向来厂参观的外国人展示的。”^②

工人们因管理者在为他们提供休假和婴童设施上的失败而愤慨,不过在缺乏这些福利的情形下,他们已在工厂生活了许多年。1948年突如其来的问题是工资的计算。这一时期物价飞涨是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

^① 没有关于战后工运的详尽研究,这里也并不是有意这样做。将来的研究可能会更系统地考察战后工运中女性参与的模式。

^②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年里，一再被讲述的经济动荡的一部分。大多数工人形象生动地回顾了她们发完工资冲出工厂大门的瞬间。在大门口她们的亲戚正在等着取走钱，尽快购物。五分钟的延误可能意味着要花费相当高的价格。商品价格的升高伴随着工人工资实际购买力的下降。1947年和1948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1947年申新九厂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是1946年的48%；到1948年，工资实际购买力已暴跌到1946年的35%。^①

即使工人们有足够的钱，但由于这一时期基本商品严重短缺，工人们很难，通常是不可能买到米、煤、油。1947年年底，上海的大多数工厂已答应发给工人们这些配给品。申新厂的工厂主允诺提供配给品但却始终没发放。工厂主对工人要求发放配给品的答复是：“煤仍在南京的煤矿里。要一直等到煤矿开矿，道路修好，然后我们才能把煤运来。大米在无锡，农民甚至还未完成耕种。”^②1948年初，所有这些问题都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随着春节的临近，工人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买到东西庆祝假日了。而且，已允诺给工人传统的年赏也从未发过。在这些背景下，工人们开始组织罢工。

不管共产党是否正式批准在这一时期的罢工，工厂中的党员在罢工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罢工开始前不久，党员曾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安排女工们观看一部俄国电影，电影描述了同被派来镇压她们的俄国军队斗争的罢工女工的故事。一位罢工领袖回忆说：“那部电影确实教给我们一些怎样斗争的思想。”^④何宇珍——申新九厂的党员积极分子，她因照看新生儿而离厂几周，在罢工开始前，她把孩子背到背上返回工厂工作，同厂里其他大约30多名党员一起协调罢工计划。她们同意

①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2卷，第733页。

②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③ 一些迹象表明随着胜利临近，中国共产党反对在工人中间煽动仇恨。不过没有记录能证实这一观点。

④ 对何宇珍的采访。

在1月30日上午九点钟,全厂工人将关掉他们的机器。那时,申新九厂雇用6000名女工和1000名男工。^①

很显然,不只是工人知道开始罢工的时间。在上午八点半,当每一个人都在盯着表,急切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时,突然机器停止运转,周围一片寂静,停电了。党员们推断管理者希望阻挠罢工,为此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在中午十二点半,当大多数行政官员忙于吃午饭,而不是监督工作时,工人们将关闭机器。

很快来电了,每一个人又开始工作。工厂行政人员紧张地等待九点钟将会发生什么。九点钟到了,又过了,什么都没发生。罢工已被阻止,或它看起来被阻止。中午到了,工人们开始轮流吃午饭,同时,工头、巡视员、大多数拿摩温去行政人员餐厅吃饭了。正好按计划,在十二点半整,一个工人跑出铜匠车间喊叫着:“铜匠停工了!”织工立即关闭机器,然后是粗纱工和细纱工。在五分钟内,整个工厂没有一台机器在运转,罢工正在进行。

在每一车间,工人们聚在一起选代表;讨论将要向管理者提出的要求,在细纱间一个叫戚怀琼的女工——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的学生,爬上桌子,讲着工人应得到的利益,然后主持讨论。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工厂的其他车间。工人们同意要求配给品;必要时延长休产假的权利;春节奖;根据生活费的变化调整月工资。准备好要求,几百名代表向工厂主提条件,但是工厂主甚至拒绝接见他们。

与此同时,工人们安顿下来打算长时间呆在厂里。在细纱间,女工们坐在简管箱上;在织布间,女工们舒服地躺在布匹上;在粗纱间,女工们把几个简管收集到一起,做成枕头。在每一个车间,女工们成群结队坐在一起,磕干西瓜籽、聊天。最后,党员组织队伍去每一车间,确保工

^① 除非特别说明外,关于罢工的描述来自: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2卷;SGYLW:《申新九厂二·二斗争历史资料》;《申九工人的光荣斗争》;“申新九厂二·二斗争纪要”,SWZX(1979),第3期,第13—25页;《申报》,1948年1—3月。

人们清洁好机器,并未毁坏机器。当罢工开始后,一些情绪过分高涨的工人已激动得不能自持,她们在成排的机器旁跑来跑去,毁坏棉线,破坏线轴。

随着下午慢慢过去,管理者开始担忧当夜工工人来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门卫被派过去挡住工厂宿舍的门,阻止工人们离开。然而,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夜工工人决心参加罢工。他们打破宿舍玻璃爬出来,向工厂大门跑去。他们迫使大门打开,蜂拥进车间,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们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到傍晚时分,7000名工人都到了工厂。

在午夜,管理者最终同意同工人谈判。对于工人们要延长休产假时间的要求,管理者答复:“如果我们按照工人要求安排休产假,那么工厂就成了康复院,我们就得关闭。”对于其他的要求,管理者也没有更多的应允,谈判陷入僵局。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工人们拒绝妥协。他们大多数时间呆在车间里。陈招弟回忆说:“在罢工期间,我们在车间里坐着闲聊,或者去其他车间探听消息。我们较年轻的工人有时玩游戏。我们渐渐地相互了解了。”^①来自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的学生,利用她们受到的教育,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教工人们唱歌,把罢工问题编成话剧来演出。他们也组织工人们用麻袋(申新九厂的一种产品)制作旗子,在第二天罢工游行计划中使用。女工们用她们的工作工具剪开麻袋,用几根纱线在每支旗子上绣上“工人大联合”几个字。当游行开始时,女工们挥动着这些手工制作的旗子引导着从每个车间涌出来的工人队列,向即将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走去。

在罢工的头三天,暂住在车间的女工并不是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她们的家人聚在工厂门外,朝她们喊着为了不危及她们的工资让她们停止罢工。晚上,工厂主雇用的暴徒在工厂外发出奇怪的吼叫声,试

^① 对陈招弟的采访。

图引诱迷信的工人相信,由于她们的不法行为鬼怪已经来惩罚她们了。

人们也来支持她们。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其他工厂的女工得知申新九厂的罢工后,立即组织安排支援。附近工厂的女工为工人们送来面包和蔬菜。前来支援她们的那些群体中有上海舞女组织的代表。在申新九厂的妇女们并不知情的情况下,1月31日(罢工的第二天),大约6000名舞女,要求政府取消对商业舞厅的限制,到上海工部局的办公室游行示威。当舞女们进入大楼,从一间办公室跑到另一间办公室毁坏办公用品、打砸玻璃、破坏办公文件时,骚乱爆发了。^①这一斗争的新闻使得申新九厂的妇女更有决心将她们的罢工坚持到底。

戚怀琼带着一群女工从后楼梯爬上工厂大楼的房顶。她们每人拎着一包传单,这些传单是在前些天用借的蜡纸油印机印好的。她们到了房顶,她们开始向走在街上去周边工厂上工的工人们投发传单。在一小时内来自附近统益棉纱厂和福新面粉厂的工人也出现在她们工厂的房顶上,宣布她们也关闭了机器,以示她们同申新九厂工人们的团结一致。

就在此时,街上的工人和警察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警局头领催逼工人停止罢工。他喊着:“我们国家正处在艰难时期,我希望你们高兴点。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们必须全面考虑这一形势。”工人们答复道:“我们早已全面考虑了这一形势,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求工厂给我们大米!”最后警察局头领命令工人们返回车间,开车工作,他喊着:“如果你们不开车,我们就开枪了。”可是,没有一个工人挪动地方。

当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冲向工厂大门,试图迫使工人们进去时,几百名工人冲上去阻止了他们。警察只是暂时被吓住了,警局头领命令开动装甲车,装甲车开向工厂大门,边开动边开火,开进了厂区内。

一群女工一直在战斗。她们用运筒管和纱线的车子把供应品运到

^①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48年2月。(国际劳工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三楼,然后再运到屋顶。在何宇珍的领导下,女工们贮备了大量的砖块,机器零件,5000个盛食物的金属碗,盛满石子的10个油桶。当一辆装甲车向工厂院内疾驰时,在屋顶的妇女们把她们的弹药投向装甲车,其他女工跑到屋顶加入了她们的行列,为她们补充供应。一个50岁的妇女,抓着她在细纱间找到的铁棍朝其他人喊着:“我是一个老妇人,我活到现在从未见过如此无法容忍的事儿。我要与你们拼了!”一边喊着,一边把铁棍投向装甲车。女工们用她们临时做的炸弹,破坏了装甲车的发动机,但是第二辆装甲车向大门开来取代了第一辆。当屋顶上的女工们已用完她们的炸弹时,下面的人就接上来。几百人站在装甲车要经过的路上,试图阻止它向前行进。几名男工强征了一辆停在工厂场地的道奇卡车,全速驾驶着向装甲车开去。他们撞向装甲车。双方车辆都受损。当士兵开着第三辆装甲车进入工厂时,工人们把警卫室推倒堵住装甲车的去路,其他工人用水龙头喷射警察。

警察用催泪弹报复,端起机关枪开始朝拒绝散开的工人们开火。在拥挤的人群中,几名怀孕的女工被击中流产。正在争斗着,忽然一位身着红色衣服(表明她刚结婚)的女工偷偷走到一名警察的后面,抓住了他的枪。没人知道她是谁。警察们只记得她穿着红衣服,之后,逮捕了所有穿红衣服的女工。

伴随着警察和何宇珍——唯一一个留在工厂屋顶的人——最后的较量,战斗达到了高潮。“五点了,由于现在是冬天,天已经开始变黑了。他们已开始扔催泪弹了,我的眼睛已泪水汪汪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当一些警察突然在屋顶上从我后面走过来抓住我时,我是那么吃惊!”何宇珍设法同他们抗争,但他们朝她射击,伤了她的腿,把她带到三楼的自助餐厅。她决心逃跑,她朝窗户跑去——甚至没停下来看一下——就跳出去了。当她跳下时,在下面的工人惊恐地看着,她恰巧被挂在二楼窗外挂衣服的晾衣架救了。她抓住了杆子,她推了自己一下,继续下落到地上,受了重伤。她被带到了警局医院。

在这一天结束时,3名女工牺牲,500名工人受伤。警察逮捕了132名男工、104名女工,其中30名被怀疑是穿红衣的女孩儿。2月2日大屠杀的新闻迅速传遍上海的所有棉纱厂。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几乎是立即召开会议,来自其他棉纱厂的代表都获悉了申新九厂发生的事情。她们组建了支援委员会(由汤桂芬领导,汤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学生,党员,统益棉纱厂工会的领袖),会议决定在2月22日下午二点二十二分,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戴上黑纱悼念2月2日被枪杀的三名女工。在上海市的工厂里,成群女工开始制造黑纱。在中纺十二厂,几名积极分子找到了一台缝纫机,几天来把她们的寝室变成了黑纱制造车间。中纺十二厂的14名工人,由于参与支持罢工活动被捕,他们被关进了申新九厂工人所在的城市监狱。^①

最终,工厂主至少对工人们的一些要求妥协了:所有的工人都收到了煤和小米配给品。被捕工人被释放复工。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预先阻止了罢工的解决,任何争论都有可能爆发。到1948年中期,共产主义胜利即将到来,党开始在城市里准备最后决战。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会上庆祝了申新九厂工人的胜利,不过,会议的主题是上海和其他城市中心的地下党应避免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煽动暴乱冲突。他们应该发动工人加入“护厂队”,防止在共产党接管前和接管期间机器设备和原料被破坏。^②

不过,罢工并没有完全被忘记。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首批故事片之一是“为了明天团结起来”。在故事中,参与罢工的妇女们被歌颂为解放女英雄。在领导罢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女工——何宇珍、汤桂芬、范小凤——被授予两个新成立的团体——工人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的官员职务。在申新九厂工作的许多女工自1948年后已退休

^① 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

^② SSKJY:《荣家企业史料》,第2卷,第761—763页;张祺:“回忆上海工人的护厂斗争”,SWZX(1979),第2期,第80—94页。

或去世。那些继续在申新九厂工作的女工享受着她们在 1948 年斗争来的权益,同时也享受着许多其他的权利:带薪午休、自助餐厅、被准许休产假以及照顾小孩的设施、卫生保健、病假。

结 论

自 20 世纪 20 年代罢工以来,工厂女工的组织以及她们的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申新九厂工人的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20 年代的罢工妇女很少表现出阶级意识或投身革命的精神。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要捍卫传统的忠诚,或有时她们实际上是被迫罢工。为数很少的女工加入工人阶级组织,诸如工会。在工运中也没有女工成为工运的领袖。

相比之下,1948 年的罢工主要是由妇女领导的。罢工妇女不仅争取到男工支持她们取得如休产假这样的权利,而且还发表演说,组织唱歌和戏剧表演,组建队伍收集炸弹来抗击警察。周边工厂的女工也同罢工工人团结在一起:为她们送来食物,关闭自己的机器停止工作,以及后来缝黑纱悼念在罢工中遇难的女性。甚至不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尤其是舞女,也公开支援罢工。这些发展都表明了对以往阻碍妇女政治活动的地方观念的超越。

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很显然,工业发展同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意识,以及革命活动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特别是,棉纱厂工作的经历本身并不能使女工产生工人阶级意识。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使女工分离的大多数因素仍很强大。理论上可能使女工团结起来

的工厂工作的那些方面与迫使她们分离的那些方面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20世纪40年代的工人队伍和几十年前一样,在许多方面具有流动性。大多数工厂工人是移民上海的农民的女儿,不过却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于诸如结婚、生子等大事,以及休假、或者当她们找不到工作时,她们就回到农村老家——有时就一直待在老家了,不过更常见的是暂时回去。她们工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往返于城乡之间。20世纪30年代日本袭击上海及随后的战争,意味着女工的迁移更为频繁。

20世纪40年代同20年代一样,女工同棉纱工业的联系并不比同城市的联系多。尽管许多妇女婚后继续工作,不过,在许多情形下,大多数妇女生完孩子后就不会长时期在某一家棉纱厂工作。她们不仅频繁地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而且在其他工厂的工作或当兜售蔬菜的街贩、奶妈或女佣经常与棉纱厂的工作交替。这些模式阻碍了她们自己作为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同样地,这就使她们很难在棉纱厂共同的工作经历基础上建立关系。

女工们确实是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不过是昔日为人熟知的地缘网的典型延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方言不同、工作不同、居住地不同,使得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相互分离,有时相互敌视。尽管组建姐妹会的起因最初是由于城市工厂女工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但是姐妹会成员最初是建立在共同的地理来源上,而不是共同的工人身份上。并且,有时,新的关系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比如当女工宣誓忠诚,成为帮会成员或棉纱厂拿摩温的干女儿时。

工人生活的其他两个方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工不易于成为工运的积极参与者。首先,大多数女工认为帮会和当地的地痞恶霸远比工厂主和管理者难对付。在20世纪30年代,青帮在女工中的势力增强,整个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女工在包身制下受包工头的直接管控。第二,许多棉纱厂属于外国资本家所有,特别是日本资本家。这些工厂的工人之所以仇视他们的工厂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不是

因为他们是资本家。而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外商所有权进一步强化了江南女工和苏北女工间的分化和对立,特别是1932年日本袭击上海后更是如此。

然而,变化发生了,在某些方面,20世纪40年代的棉纱厂女工不同于20年代的棉纱厂女工。20世纪40年代,更多的女工曾受过一定的教育,尽管不是特别多;大多数女工有中等阶级背景;战后,大多数女工通过养成工制招募进厂,为她们提供住宿以及正规培训。战后,先前归日本资本家所有的棉纱厂(上海棉纱厂的大部分)也国有化了,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

不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很重要,但是,并不能说明女工在劳工运动中参与的增多。在成为积极的工运领袖的女工中,识字的女工(参加过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的除外)可能和不识字的女工一样多;养成工可能不比非养成工多;有中等阶级背景的女工可能不比没有中等阶级背景的女工多。

显而易见,前日商工厂的国有化同劳工反抗模式无关。战后的罢工也可能同样地发生在华商工厂,如申新,以及现在已归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的那些工厂。如果我们想要理解1948年申新九厂女工罢工展示出来的意识和组织类型,我们必须考察其他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回顾上海女工从来都不是工业贫困或资本家剥削的被动受害者。她们不断地努力加强同其他女工的关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她们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尽管这一力量非常渺小。尽管姐妹会最初的性质是防御性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政治环境变化了,这样的组织也已作好了改变的准备。

不是靠对抗资本家而是抵制日本人,大多数女工获得了她们首次政治经验。然而,在1948年罢工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意识远远超出了在战时产生的政治抵制。其不同之处在于政治教育造就了具有变革理想的女工的出现。为女工提供有效的政治教育的第一个组织不是中国共产

党,而是基督教女青年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教授女工如何阅读,如何做公众演讲,如何分析社会结构——她们作为女性,也作为工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首次同来自不同工厂和行业的女性一起筹备和组织社会活动,由于受益于合适的课程,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的一些毕业生成了政治积极分子。到20世纪40年代,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已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更为有趣的是,许多女党员已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试图把女工组织起来,但却未能如愿。原因之一是仅有一小部分组织者设法动员几千名工人;重视男工,忽视女工,并且大多数组织者是男性知识分子。不过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误认为上海女工会把她们自己视为同其他工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她们自己本厂内的职工还是本厂外的职工——有共同利益。

在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的方法非常不同。不再是作演讲、发传单、试图劝说女工加入工会,取而代之的是,党的组织者去拜访女工的家,帮她们做日常家务劳动,诸如洗衣、购物,陪她们在休息日和朋友们一起逛公园或听本地戏。不再为女工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党的组织者参加和演变已存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形式——姐妹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些组织风格的变化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组织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多数组织者是女性;大多数组织者同女工一样来自同一地区;大多数组织者本人就是或曾是工人。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共产党从根本上已经改变了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性质的理解。到1948年申新九厂罢工时,共产党认识到这一现实,对于女工而言,阶级意识不能被超越,但是至多能同其他的忠诚并存。

表面上看,申新罢工表明女工变成了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女英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也确实如此。然而,罢工更为重大的意义在

于其展现了阶级和革命意识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像许多解放前的党组织者和研究工人阶级历史的当代学生所认为的那样,地方主义和传统的等级忠诚的模式与工人阶级意识相对立。工人阶级意识,如果其有任何意义的话,一定能够容纳各种忠诚。甚至对于最具阶级意识的上海棉纱厂女工而言,她们也不会绝对地甚或首先把她们自己看做工人阶级的成员。

引用文献

资料来源的说明

个人采访

这一研究的大多数资料源于去上海的两次研究访问期间组织的采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1979—1981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1982年9月—10月我回国继续做这一研究。对女工的采访几乎都是由复旦大学组织安排的,通常在棉纱厂进行采访。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劳工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也帮助安排采访。

我大概采访了75名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从棉纱厂退休。通常我们围坐在圆桌旁讨论,我向四五名妇女提问,每次采访大概需要三个小时。仅有很少的机会对单个妇女再次进行访谈。大多数妇女或者说上海话或者说苏北方言,常常有一官员出席将其译成普通话。我录下所有的采访,之后请熟悉那些方言的人听磁带以确保翻译完整和准确。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是该所搜集的并尝试按时间顺序编辑的一部分关于上海解放前劳工运动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没有被列出来。联系作者可以获得关于这些数据的详尽信息。

退休卡

解放后上海的大多数棉纱厂保留着一部分个人记录,即退休卡。工人退休时,他或她要填退休卡:填写他或她的出生年月和籍贯,以及他或她的工作经历。我已经翻阅了上海某一棉纱厂,可称作棉纱厂 A,在 1949—1980 年间退休的工人(大约 1000 名)退休卡。

引用著作

《上海及其周边:一本标准指南书》,上海,1934 年。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A Standard Guide Book. Shanghai, 1934.

安德森:《中国人和中国劳工:工业参观及其续,1923—1926》,伦敦,1928 年。

Anderson, Adelaide Mary. *Humanity and Labor in China: An Industrial Visit and Its Sequel (1923 - 1926)*. London, 1928.

巴金:《死去的太阳》,上海,1949 年。

巴格维尔:“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工作的叙述,1904—1929”,世界基督教女青年协会,日内瓦。

Bagwell, May. “An Account of the Industrial Work of the Shanghai YWCA, 1904 - 1929.” (World YWCA Archives, Geneva.)

白宝君:“纱厂里女童工的生活”,《女青年月刊》,1934 年第 13 卷,第 5 期,第 65—70 页。

白宝君:“上海纱厂女工之一般生活”,《女青年月刊》,1933 年第 12 卷,第 5 期,第 51—60 页。

《包身工的仇恨》，上海，1974年。

《包身工的血泪仇》，上海，1965年。

巴尼特：《经济上海：政治的人质，1937—1941》，纽约，1941年。

Barnett, Rober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伯恩：《布莱克本中国商务代表团的报告，1896—1897》，布莱克本，英国，1898年。

Bourne, F. S. A.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 1896-1897*. Blackburn, Eng. 1898.

赴远东英国经济代表团，1930—1931：《棉纱代表团的报告》，伦敦，1931年。

British Economic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1930-31. *Report of the Cotton Mission*. London, 1931.

布勒：《中国的劳苦妇女》，莫斯科，1933年。

Bulle, M. O. *Chinese Toiling Women*. Moscow, 1933.

布什：“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权和扬子江下游华商棉纱厂老板，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

Bush, Richard. “Industry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Lower Yangtze Chinese Cotton Mill Owners,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8.

单明（音译）：《劳工和帝国：广州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1895—1927》，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1975年。

Chan, Ming.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21—1927》，共两卷，堪萨斯州罗伦斯，1971年。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2 vols. Lawrence, Kans., 1971.

赵冈：《中国棉纺织生产的发展》，马萨诸塞州剑桥，1974年。

Chao, Kang.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4.

- 查曼普:《棉纱工业和贸易》,伦敦,1905年。
- Chapman, S. J. *The 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London, 1905.
-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29年。
- 陈翰笙:《追念蔡子民先生》,《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68年。
-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 1927*. Stanford, Calif., 1968.
- 谢诺:《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秘密社团》,密歇根州安阿伯,1971年。
- Chesneaux, Jean.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nn Arbor, Mich., 1971.
- 焦、汤普逊和陈:《中国人口统计登记的经验》,俄亥俄州牛津,1938年。
- Chiao, C. M., Warren Thompson, and D. T. Chen. *An Experi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of Vital Statistics in China*. Oxford, Ohio, 1938.
- 《中国论坛》,1932—1934(上海)。
- China Forum*, 1932 - 1934(Shanghai).
- 《中国经济杂志》,1927—1933(上海)。
-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927 - 1933(Shanghai).
- “中国劳工和包身制”,《人民论坛》,1933年第5卷,第8期,第407—410页。
- “Chinese Labor and the Contract System,” *People's Tribune*, 5 (1933), no. 8: 407 - 10.
- 钟守静(音译)和巴格维尔:《上海闸北、虹口和浦东的工业女性》,上海,1931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理事会档案,纽约。)
- Chung Shou Ching and May Bagwell. *Women in Industry in the Chapei, Hongkew and Pootung Districts of Shanghai*. Shanghai, 1931. (YWCA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New York.)
- 可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1927—1937》,马萨诸塞州剑桥,1980年。
- Coble, Parks.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 - 1937*. Cambridge, Mass., 1980.
- 科尔:“绍兴:晚清社会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1975年。

Cole, James. "Shaoxing: Studies in Late Ch'ing Social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葛德石:《中国地理基础》,纽约,1934年。

Cressey, George Babcock.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New York, 1934.

柯罗尔:《中国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纽约,1980年。

Croll, Elizabeth.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1980.

戴维森-休斯顿:《黄浦江:上海的故事》,伦敦,1962年。

Davidson-Houston, J. V. *Yellow Creek: The Story of Shanghai*. London, 1962.

达文:《妇女的工作:革命中国的妇女和党派》,伦敦,1976年。

Davin, Delia.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ondon, 1976.

邓裕志:“中国工业妇女的经济地位——以上海某一群体为例”,硕士学位论文,纽约大学,1941年。

Deng, Cora.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Industry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in Shanghai." M. A. thesis, New York University, 1941.

邓裕志:“参观包身工的工房”,《中国基督教年鉴》,1934—1935年,第19卷,第1—4页。

Deng, Cora. "A Visit to a Contract Labour Dormitory," *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19(1934 - 35): 1 - 4.

邓发:《战后敌后工业与工人的变动》,《中国工人运动史料》,1960年2月第2卷,第1—51页。

邓裕志:“参观上海缫丝厂”,《绿年增刊》,工业卷,1928年11月第17卷,第9—12页。(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理事会档案,纽约。)

Deng Yuzhi. "A Visit to a Silk Filature in Shanghai," *Green Year Supplement*, Industrial Number, 17(Nov. 1928): 9 - 12. (YWCA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New York.)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北京,1953年。

德鲁克:“基督教女青年协会在中国妇女运动发展中的作用,1890—1927”,《社

会服务评论》，1979年9月，第421—440页。

Drucker, Alison. "The Role of the YWC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1890 - 1927," *Social Service Review* (Sept. 1979): 421 - 40.

屠诗聘等：《上海市大观》，上海，1948年。

杜白琳：《工作的妇女：马萨诸塞州卢维尔的工作和社区的转变（1826—1860）》，纽约，1979年。

Dublin, Thomas. *Women at Work :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 - 1860*. New York, 1979.

埃斯佩：《其他城市》，纽约，1950年。

Espey, John. *The Other City*. New York, 1950.

费正清：《心系中国：50年的回忆》，纽约，1982年。

Fairbank, John King.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1982.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1953年。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 Mass., 1953.

方福安（音译）：《中国劳工》，上海，1931年。

Fang Fu-an (Fang Fuan). *Chinese Labour*. Shanghai, 1931.

方福安：《上海劳工》，《中国经济杂志》，1930年第7卷，第2期，第853—885页。

Fang Fu-an (Fang Fuan) "Shanghai Labor,"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7(1930), no. 2: 853 - 85.

《纺建》，1948—1949（上海）。

《纺织周刊》，1932—1948（上海）。

《纺织染工程》，1948—1949（上海）。

费孝通：《江村经济》，伦敦，1962年。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1962.

福伊尔沃克：《中国经济（1870—1911）》，密歇根州安阿伯，1969年。

Feuerwerker, Albert.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 - 1911*. Ann Arbor, Mich., 1969.

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和贸易》,共2卷,天津,1932年。

Fong, H. D. (Fang Xianting). *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in China*. 2 vols. Tianjin, 1932.

方显廷:《中国的工业组织》,天津,1937年。

Fong, H. D. (Fang Xianting).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Tianjin, 1937.

罗伯特:《在中国北部省份的三年游记》,伦敦,1947年;台北1972年重印。

Fortune, Robert.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London, 1947; reprint ed., Taipei, 1972.

《妇女》,1945—1949(上海)。

高梅韦尔:《中国门户:上海景象》,纽约,1916年。

Gamewell, Mary Nind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New York, 1916.

盖伦·特威切特编:《中国朝代集》,伦敦,1974年。

Geelen, P. J. M., and D. C. Twitchett, eds.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 London, 1974.

吉布兰:“女权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向警予”,《民国》,1984年第10卷,第1a期,第29—41页。

Gipoulon, Catherine. “Integrating the Feminist and Worker’s Movement: The Case of Xiang Jingyu,” *Republican China*, 10(1984), no. 1a: 29 - 41.

大不列颠外交部:“中国劳工状况备忘录”,伦敦,1927年。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Memorandum on Labor Conditions in China.” London, 1927. (Cmd. 2846.)

《绿年增刊》,1916—1933(中华基督教女青年协会,上海)。

Green Year Supplement, 1916 - 1933(Shanghai: YWCA of China).

格林沃尔德:《美丽的商品:中国的娼妓,1860—1936》,纽约,1982年。

Gronewold, Sue. *Beautiful Merchandise: Prostitution in China, 1860—1936*. New York, 1982.

郭鉴清、仲祖龄:《申新第一厂参观记》,《钱业月刊》,1925年第5卷,第2期,第

30—42 页。

《国际劳工通讯》，1931—1941(上海)。

国棉二厂厂史编写组：《上海国棉二厂史》，上海，1969年，油印。

哈蒙德：“上海有组织的劳工，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8年。

Hammond, Edwar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 - 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8.

哈雷文：《家庭时代和工业时代》，英国剑桥，1982年。

Hareven, Tamara.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Cambridge, Eng., 1982.

哈瑞森：“中国工厂制度的出现，1923”(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档案，日内瓦)。

Harrison, Agatha. “The Coming of the Factory System to China, 1923”(World YWCA Archives, Geneva).

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纽约，1940年。

Hauser, Ernest. *Shanghai: City for Sale*. New York, 1940.

海德：《上海的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上海，1942年。

Hinder, Eleano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 Shanghai, 1942.

黄宓丁(音译)：《杨树浦工厂生活调查》，硕士论文，沪江大学(上海)，1947年。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1979年。

黄逸峰：“旧中国资本的发展”，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第4卷，上海，1979年。

黄逸峰、周尚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79年。

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共5卷，上海，1979年。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21—1926(上海)。

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农业中国》，上海，1938年。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grarian China*. Shanghai, 1938.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部：《月报》，1927—1949。(国际劳动组织部档案，日内瓦。)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hina correspondent. *Monthly Reports*, 1927

49. (ILO Archives, Geneva.)

国际劳工组织档案,日内瓦。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Archives. Geneva.

爱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51年。

Isa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1951.

爱萨克斯编:《国民党退化的五年:帮会对上海的统治》,上海,1932年。

Isaacs, Harold, ed. *Five Years of KMT Reaction: Gang Rule in Shanghai*. Shanghai, 1932.

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北京,1976年。

琼斯:“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马克·埃尔文和斯金纳编:《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城市》,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4年。

Jones, Susan Mann.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Mark Elvin and G. W.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 1974.

菊人:《上海职业妇女生活》,《女声》,1935年第3卷,第12期,第6—8页;1935年第3卷,第13期,第11—13页。

觉悟生:《妓女的生活》,上海,1941年。

凯利:“寺庙和贡品队:18世纪的罗教和白莲教”,《近代中国》,1982年第8卷,第3期,第361—391页。

Kelley, David. “Temples and Tribute Fleets: The Luo Sect and Boatmen’s Associ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 8(1982), no. 3; 361—91.

莉迪娅:《台湾工厂妇女》,密歇根州安阿伯,1983年。

Kung, Lydia.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Mich., 1983.

景菲镇(音译):“中国工业妇女”,《绿年增刊》(1928),第17期,第3—4页。(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理事会档案,纽约。)

Kyong Bae-tsung. “China’s Industrial Women,” *Green Year Supplement* (1928), no. 17: 3—4. (YWCA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New York.)

景菲镇：“工业妇女和女孩儿的教育”，《绿年增刊》(1928)，第 17 期：第 15—16 页。(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理事会档案，纽约。)

Kyong Bae-tsung. “Education of Industrial Women and Girls,” *Green Year Supplement* (1928), no. 17: 15 - 16. (YWCA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New York.)

拉姆森：“工业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杂志》，1931 年第 9 卷，第 4 期，第 1025—1081 页。

Lamson, H. D.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9(1931), no 4: 1025 - 81.

拉姆森：“中国工人住房问题”，《中国经济杂志》，1932 年第 11 卷，第 2 期，第 139—162 页。

Lamson, H. D. “The Problem of Housing for Worker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1(1932), no. 2: 139 - 62.

拉姆森：“工厂工人生活标准：上海 21 户工人家庭收入和支出的研究”，《中国经济杂志》，1930 年第 7 卷，第 5 期，第 1240—1256 页。

Lamson, H. 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Factory Workers: A Study of Incomes and Expenditures of 21 Working Families in Shanghai,”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7(1930), no. 5: 1240 - 56.

《劳动界》，1920—1921(上海)。

《劳工月刊》，1932—1936(南京)。

梁元生：“19 世纪中叶上海的区域竞争：广东人与宁波人”，《城市问题》，1982 年第 4 卷，第 8 期，第 29—50 页。

Leung Yuen Sang. “Regional Rivalr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Cantonese vs. Ningpo Men,” *Ch'ing shih wen-t'i*, 4(1982), no. 8: 29 - 50.

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 60 年》，《工商史料》，1980 年 11 月第 1 卷，第 1—15 页。

李莉莲(音译)：《中国丝贸易：近代世界的传统工业，1842—1937》，马萨诸塞州剑桥，1981 年。

Li, Lillian.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 - 1937*. Cambridge, Mass., 1981.

刘大春(音译):《上海的成长和工业化》,上海,1936年。

Liu Ta-chun(D. K. Lieu). *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1936.

刘大春:《上海缫丝工业》,上海,1941年。

Liu Ta-chun(D. K. Lieu). *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Shanghai, 1941.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33年。

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资料室重印,北京,1954年。

马纯古:《上海女工工作报告》,延安,194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资料室重印,北京,1954年。

马超俊:《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28年。

《棉纱工业手工工作描述》,澳大利亚工业福利分支机构劳工和国民服务部,1946年7月。

Manual of Job Descriptions in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ustralian Industrial Welfare Division, Department of Labour and National Service, July 1946.

茅盾:《子夜》,北京,1979年。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战争前后上海劳工统计资料》,上海,1942年。

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kaisha, Shanghai jimusho chosashitsu. *Kaisen zengo no Shanghai rodo kenkei taikai shiryō*, Shanghai, 1942.

马瑞斯:《印度产业劳工的产生:孟买棉纱厂,1854—1947》,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65年。

Morris, Morris David. *The Emergence of an Industrial Labor Force in India: A Case Study of the Bombay Cotton Mills, 1854 - 1947*. Berkeley, Calif., 1965.

莫泽:《远东棉纺织工业》,波士顿,1930年。

Moser, Charles.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of Far Eastern Countries*. Boston, 1930.

村松:“清末民初江南中国地主的文献研究”,《亚非拉学院学报》,1966年第24

卷,第3期,第1—43页。

Muramatsu, Yuji.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4(1966), no. 3: 1-43.

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马萨诸塞州剑桥,1953年。

Murphey, Rhoads.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3.

纳尔逊:《管理者和工人:美国工厂新制度的起源,1880—1920》,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75年。

Nelson, Daniel. *Managers and Workers: Origins of the New Fac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20*. Madison, Wisc., 1975.

西川:《中国劳工现状》,东京,1925年。

Nishikawa Kiichi. *Chushi rodobsha no genjo*. Tokyo, 1925.

《北华捷报》,1920—1937(上海)。

North-China Herald, 1920-37(Shanghai).)

《女青年月刊》,1934—1937(上海)。

《女声》,1932—1948(上海)。

奥德尔:《中国棉货》,华盛顿,1916年。

Odell, Ralph. *Cotton Goods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1916.

白先勇(音译):《游园惊梦:台北人的故事》,乔治译,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82年。

Pai Hsien-yung.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 Translated by George Kao. Bloomington, Ind., 1982.

潘翎:《上海掌故》,香港,1982年。

Pan Ling. *In Search of Old Shanghai*. Hongkong, 1982.

皮克:《棉纱:从原棉到成品》,伦敦。

Peake, R. J. *Cotton: From the Raw Material to the Finished Product*. London, n. d.

《朋友》,1937—1939(上海)。

胡素珊:《中国内战:1945—1949 的政治斗争》,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78 年。

Pepper, Suzanne.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 - 1949*. Berkeley, Calif, 1978.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80 年。

Perry, Elizabeth.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 - 1945*. Stanford, Calif, 1980.

波特:“中国基督教良心和工业福利(1919—1941)”,博士学位论文,蒙特利尔大学,1977 年。

Porter, Robin. “The Christian Conscience and Industrial Welfare in China, 1919 - 1941.”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ontreal, 1977.

卜舛济:《上海简史》,上海,1928 年。

Pott, F. L. Hawks.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1928.

鲍威尔:《我在中国的 25 年》,纽约,1945 年。

Powell, John B.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1945.

普拉兹尼亚克:“川沙的织工和女算命先生:收入和女权意识对传统中国乡村女性自立的影响”,伯克利中国地区研究会议论文,1983 年 2 月。

Prazniak, Roxane. “Weavers and Sorceresses of Chuansha; The Influence of Cash Incomes and Female-Oriented Ideology on Women’s Self-Reliance in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Berkeley Regional Seminar in Chinese Studies, Feb. 1983.

《青红帮考义》,台北,1973 年。

“上海童工委员会报告”,伍德赫德编:《中国年鉴(1925)》,天津,1925 年。

“Report of the Shanghai Child Labor Commission,” H. G. H. Woodhead, ed. *China Year Book, 1925*. Tianjin, 1925.

萨拉弗:《香港有工作的女儿:家庭孝道或影响力?》,英国剑桥,1981 年。

Salaff, Janet.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Eng., 1981.

安德烈:“尼姑:京叶师傅:尼姑庵”,萨拉弗和谢利登编:《生活:中国职业妇女》,

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84年。

Sankar, Andrea. "Spinster Sisterhoods: Jing Yih Sifu: Spinster-Domestic Nun," in Janet Salaff and Mary Sheridan, eds.,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 1984.

佐藤晶子：“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海史》，1980年6月，第27期，第19—36页。

Sato Akiko. "Gosa undo ni okeru chugoku fujin", *Shikai*, 27(June 1980): 19 - 36.

马克：“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变革和政权(1850—1950)”，沃勒斯坦编：《世界社会秩序中的劳工》，加利福尼亚州贝佛利山庄，1983年。

Selden, Mark.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the State in China and Japan, 1850 - 1950," in Immanuel Wallerstein, ed., *Labor in the World Social Structure*. Beverly Hills, Calif, 1983.

谢夫：《毛和工人：湖南劳工运动，1920—1923》，纽约阿曼克，1982年。

Shaffer, Lynda.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 - 1923*. Armonk, N. Y., 1982.

谢夫：“近代中国劳工史(1895—1949)”，《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1981年第20期，第31—70页。

Shaffer, Lynda. "Modern Chinese Labor History, 1895 - 1949,"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1981), no. 20: 31 - 70.

善习仁(音译)：《的笃班蜕变为绍兴剧的来由》，《浙江月刊》，1968年第1卷，第2期，第22—23页。

上海社会局：《大上海工厂工人工资指数，1928年7月—12月》，上海，1928年。

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The Index Numbers of Earnings of Factory Laborers in Greater Shanghai, July-December 1928*. Shanghai, 1928.

上海社会局：《上海劳工生活标准》，上海，1934年。

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Shanghai Laborers*. Shanghai, 1934.

上海社会局：《上海工资率》，上海，1935年。

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Wage Rates in Shanghai*. Shanghai, 1935.

上海社会局:《大上海劳工的工资和劳动时间(1929)》,上海,1929年。

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Wages and Hours of Labor in Greater Shanghai, 1929*. Shanghai, 1929.

上海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四纺织厂1946年年度工作报告》,上海,1946年。

上海纺织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外语系:《纺织初级本》,上海,1975年。

Shanghai fangzhiju, qiershiyi gongren daxue waiyuxi. *Preliminary Texts on Spinning and Weaving*. Shanghai, 1975.

上海工人历史委员会:《国棉十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上海,1956年,油印。

上海工人历史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恒丰纱厂工人的斗争情况》,上海,1956年,油印。

上海工人历史委员会:《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共四卷,上海,1957年,油印。

上海工人历史委员会:《申新九厂工人二·二斗争历史资料》,上海,1956年,油印。

《上海黑幕一千种》,上海,1939年。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8)》,上海,1938年。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38*. Shanghai, 1938.

上海工部局:《年报(1939)》,上海,1939年。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39*. Shanghai, 193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恒丰纱厂产生、发展与改造》,上海,1959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58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第1卷:1896—1937,上海,1980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第2卷:1937—1949,上海,1980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1965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1981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译者注:此处有误,应为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北京,1964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2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1980年。

上海社会局:《上海工厂劳工统计》,上海,1946年。

上海社会局:《上海之农业》,上海,1933年。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7—1981(上海)。

上海总工会女工部:《工会女工工作》,上海,1951年。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会和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上海,1962年。

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工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上海,1950年。

《申报》,1920—1949(上海)。

《生活知识》,1945—1946(上海)。

《申九工人的光荣斗争》,上海,1963年。

施民雄(音译):《清朝的丝绸工业》,孙任以都译,密歇根州安阿伯,1976年。

Shih Min-hsiung. *The Silk Industry in Ch'ing China*, Translated by E-tu Zen Sun. Ann Arbor, Mich., 1976.

进藤:《日本棉纱工业的劳工》,东京,1961年。

Shindo, Takejiro. *Labor in the Japanese Cotton Industry*. Tokyo, 1961.

俊三:“日本劳工招募及其管控”,《国家劳工评论》,1925年第12卷,第4期,第482—299页。

Shunzo, Yoshisake. “Labor Recruiting in Japan and Its Control,”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12(1925), no. 4: 482 - 99.

鲍伯:《中国妇女:帝国主义与妇女的反抗,1900—1949》,伦敦,1981年。

Siu, Bobby. *Women of China: Imperialism and Women's Resistance, 1900 - 1949*. London, 1981.

兰德尔:“暗淡的前景:江苏西部的中国农业政治经济,1911—1937”,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1982年。

Stross, Randall. “A Hard Row to Ho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Agri-

culture in Westernjiangsu, 1911 - 193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2.

孙宝山:《上海纺织厂的包身制工人》,《华年周刊》,1932年第1卷,第22期,第430—432,467—472页。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共两卷,北京,1957年。

汤桂芬:“沪西纱厂工人斗争的概况”,《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6年第9期,第1—17页。

唐海:《中国劳动问题》,上海,1926年。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1979年。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纽约,1966年。

Thompson, Edward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6.

托普利:“广东乡村的抗婚”,玛杰里·沃尔夫和洛克杉·维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5年。

Topley, Marjorie.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1975.

托尔加舍夫:《中国矿工》,南京,1930年。

Torgasheff, Boris. *Mining Labor in China*. Nanjing, 1930.

宇高:《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25年。

Udaka Yasushi. *Shina rodo mondai*. Shanghai, 1925.

和田英:《福冈日记》,东京,1978年。

Wada Ei. *Tomioka nikki*. Tokyo, 1978.

奥古斯塔:《中国劳工法》,北京,1938年。

Wagner, Augusta. *Labor Legislation in China*. Beijing, 1938.

威尔斯:《中国劳工运动》,纽约,1945年。

Wales, Nym.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1945.

王南屏:《江北农村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1936年。

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京,1928年。

丝米勒:《中国的女工和童工》,巴黎,1933年。

- Wang, Simine. *Le Travail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en Chine*. Paris, 1933.
- 王：“杜月笙(1881—1951):略传”，《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5月，第26卷，第433—455页。
- Wang, Y. C. “Tu Yueh-sheng, 1881 - 1951: A Tentative B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May 1967): 433 - 55.
- 沃尔夫和黄杰山：《中国的婚姻和领养，1845—1945》，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80年。
- Wolf, Arthur, and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 - 1945*. Stanford, Calif, 1980.
- 玛杰里·沃尔夫：《台湾农村的妇女和家庭》，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2年。
- Wolf, Marger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1972.
- 玛杰里和维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5年。
- Wolf, Margery,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1975.
- 《我们在工厂》，《妇女》，1947年第3卷，第10期，第17—19页。
- 伍德赫德编：《中国年鉴(1924)》、《中国年鉴(1925)》、《中国年鉴(1926)》，天津，1924—1926年。
- Woodhead, H. G. H., ed. *China YearBook, 1924, 1925, 1926*. Tianjin, 1924 - 26.
- 世界女青年基督教协会档案，日内瓦。
- World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rchives. Geneva.
- 蒂姆：“逃避管理的方法：1937年前中国煤矿的包身工”，《社会史比较研究》，1981年第23卷，第4期，第656—678页。
- Wright, Tim. “A Method of Evading Management: Contract Labor in Chinese Coal Mines Before 1937,”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23(1981), no. 4: 656 - 78.
- 吴小古(音译)：“60岁自述”，《浙江月刊》，1973年第5卷，第8期，第33—35页。
- 五卅运动编写组：《五卅运动》，上海，1976年。

夏衍:《包身工》,北京,1964年。

向警予:《向警予文集》,长沙,1980年。

《新青年》,1919—1920(北京)。

徐惠芳、刘清于:“上海女犯的社会分析”,《大陆杂志》,1932年第1卷,第4期,第71—93页。

王仰清、许映湖:“上海清洪帮概述”,《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63—65页。

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60—178页。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北京,1955年。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情况”,硕士论文,沪江大学,上海,1930年。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的婚姻”,《女声》,1933年第1卷第9期,第6—9页。

杨美真:“杨树浦女工的衣食住”,《女声》,1933年第1卷第10期,第7—9页。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京,1930年。

玛丽莲编:《中国妇女:社会变革和女权主义研究》,密歇根州安阿伯,1973年。

Young, Marilyn,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Mich., 1973.

基督教女青年协会中国部全国委员会档案,纽约。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hina collection.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New York.

《战时妇女》,1937—1939(上海)。

《战时联合旬刊》,1937—1939(上海)。

哲非编:《抗战中的中国女工》,出版日期和出版地不详。

钟韶琴(Helen Zhong):《我所看见的女工生活》,《女青年月刊》,1933年第12卷第5期,第42—50页。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二三纺织厂概况》,上海,1947年。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概况》,上海,1947年。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论刊》,上海,1948年。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四纺织厂1946年年度报告》,上海,1946年。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概况》,上海,1947年。

《中国工人运动史料》，1960—1962，1979—1981，北京。

《中国经济全书》，(日文: *Chugoku keizai zensho*, N. p., 1908.)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共五卷，北京，1957年。

周而复(A. C. Barnes 译):《上海的早晨》，北京，1962年。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1939年。

朱作同、梅益等编:《上海一日》，上海，1939年。

《罪恶的旧社会》上海，1978年。

注:

下面这些缩写被用在了注释里。作者的姓名、标题、出版日期的完全信息见参考文献。

RSCLC 上海童工委员会的报告

SGYLW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委员会

SSKJY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SSKLY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SWZX 上海文史资料选集

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鍈 张一兵 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 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 著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段忠桥 著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 张一兵 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张亮 著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 谢永康 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景源 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李景源 吴元梁 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 姜建成 著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周穗明 王玫 等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 张文喜 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孙伟平 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 唐正东 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 欧阳英 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 王广 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 王浩斌 著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 施瓦茨 著 徐佳 译
-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 著 郭为桂 黄宁莺 译
- 《控制国家:从古希腊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 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 译
- 《社会正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 著 应奇 译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 译
- 《新社会主义》 [加]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译
-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 著 余江涛 译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 译
-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 著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 著 应奇 译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克 大卫·韦戈尔 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 译
- 《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著 唐皇凤 武小凯 译
-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 著 郭为桂 李艳丽 译
-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 著 刘骥 等译
-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 诺德林格 著 孙荣飞 等译
-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 著 张长东 译
-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 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 译
-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著 刘训练 等译
-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 著 刘训练 译
-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冯克利 译
-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张国清 译
- 《社会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译
-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允春喜 译
-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劳斯科 著 毛兴贵 译
-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 达尔 著 范春辉 等译
-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著
-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 著 辛亨复 译
- 《阐释和社会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忠华 编
-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 主编
-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美]安娜·M. 史密斯 著 付琼 译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三、纯粹哲学系列

-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 叶秀山 著
-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 黄裕生 著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 谢地坤 著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尚杰 著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 宋继杰 著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赵广明 著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黄裕生 著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赵广明 著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王恒 著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 黄文前 著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SEIN》 李文堂 著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尚杰 著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期文本研究》 陈志远 著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方向红 著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 陈亚军 著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刘永谋 著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 叶秀山 著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 叶秀山 著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 户晓辉 著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 倪梁康 著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王齐 著

四、宗教研究系列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 杜继文 著
 《中国佛教通史》(15卷) 赖永海 主编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魏道儒 著
 《佛教史》 杜继文 主编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基督教史》 王美秀 段琦 等著
 《伊斯兰教史》 金宜久 主编
 《中国律宗通史》 王建光 著
 《中国唯识宗通史》 杨维中 著
 《中国净土宗通史》 陈扬炯 著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中国三论宗通史》 董群 著
 《中国华严宗通史》 魏道儒 著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 潘桂明 著
 《禅与老庄》 徐小跃 著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基督教思想史》 [美]胡斯都·L.冈察雷斯 著 陈泽民 孙汉书 司徒桐 莫如喜 陆俊杰 译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美]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美]A. 麦金太尔 著 宋继杰 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R. M. 昂格尔 著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文化的解释》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颖 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 [美]理查德·塔克 著
 罗炯 等译
 《人类与自然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男性气概》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刘玮 译
 《黑格尔》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张国清 朱进东 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 默顿 著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个体的社会》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实践感》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蒋梓骅 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利奥·施特劳斯 著 申彤 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褚松燕 译
 《传统的发明》 [英]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美]海登·怀特 著 陈新 译
 《卢梭问题》 [德]恩斯特·卡西勒 著 王春华 译
 《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 [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 著 周允程 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权威的概念》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 著 姜志辉 译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 著 赵旭东 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 著 杨立华 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 [美]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中国与达尔文》 [美]詹姆斯·里夫 著 钟永强 译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 著 陈仲丹 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黄卫总 著 张蕴爽 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王晓山 著 文韬 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 著 王启发 译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著 黄建华 黄迅余 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 著 史建云 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刘岳兵 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 著 李伯重 连玲玲 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 著 甘万萍 译
 《为权力祈祷》 [加]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 译
-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洪天富 译
-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德里克 著 翁贺凯 译
-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 布朗 等著 朱勇 译
-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 著 王福明 译
-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唐晓峰 译
-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 著 程钢 译 刘东 校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 著 高淑娟 孙彬 译
- 《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 著 卞东坡 译 张强强 朱霞欢 校
-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 胡纛 著 龙瑜成 彭珊珊 译
- 《〈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 著 陆越 译
-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 著 苗延威 译
-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 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点 译
-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芮乐伟·韩森 著 鲁西奇 译
-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风 著 纪志刚 郑诚 郑方磊 译
-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 著 王建刚 王贤知 贾维 译
-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 著 张天虹 张胜波 译
- 《18世纪的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 罗有枝 著 陈仲丹 译
-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 著 梁侃 邹劲风 译
-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 著 严蓓雯 韩雪临 伍德祖 译
-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 著 郭万平 高飞 译
- 《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 杨美慧 著 赵旭东 孙珉 译 张跃宏 校
-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 [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智芹 译
-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董科 译
-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王玉茹 张玮 李进霞 译
-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郑洁西 译
-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 著 卜永坚 译
- 《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刘岳兵 何莺莺 孙雪梅 译
-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孟凡礼 尚国敏 译
- 《虎、米、丝、泥:晚期中华帝国南部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王玉茹 译
-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形象》 [美]卢苇菁 著 秦立彦 译
-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七、历史研究系列

- 《世界现代化历程》(6卷) 钱乘旦 主编
- 《中国近代通史》(10卷) 张海鹏 主编
- 《极端的年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等译
- 《漫长的20世纪》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 著 姚乃强 译
-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